

# 傳播研究與實踐

第4卷 第1期 2014年1月

## 特邀論文

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一些個人的初步思考／李金銓

## 專題研究論文／論壇：新媒體研究之方法與概念重構

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關於研究方法的探討／王淑美

我們即是我們和誰連結？

社會文化觀點的超連結文本研究主題建構與研究方法的挑戰／郭文平

向運算轉：新媒體研究與資訊技術結合的契機與挑戰／鄭宇君

流動的空間，液態的隱私：再思考社交媒體的隱私意涵／江淑琳

## 研究論文

國內政論性節目中國防部與軍事名嘴的資本流動／競逐

——以2011年重大軍法事件為例／崔艾湄

我群與他群：兩岸學生社會認同差異之跨群體溝通研究／李佩雯

## 典籍再現

資訊時代的最低限倫理：G. Vattimo《透明社會》的詮釋倫理與多元主義／黃厚銘

## 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一些個人的初步思考

李金銓\*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講座教授

### 摘要

本文處理五個主題。其一，先從字源分疏「傳播」的三層意義：溝通、交通及媒介。二，施拉姆受「統一科學」的影響，企圖建立廣義的「溝通學」而終告失敗，由此反映了「溝通學」和「媒介研究」的張力。三，分析美國早期媒介研究兩個學術範式的興衰軌跡，即哥倫比亞學派逐漸取代芝加哥學派成為主流。四，美國主流傳播研究日趨「內眷化」，對內求窄深，誤以為本學科自給自足，不假外求，以致技術愈來愈精良，卻缺乏思想創新，甚至逐漸脫離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主要關懷。五，作者呼籲聯繫本土經驗與全球理論，以匡正時弊。

**關鍵詞：**溝通、傳播、學術範式、學術內眷化、本土化與國際化

---

\* Email: [chinchuan.lee@gmail.com](mailto:chinchuan.lee@gmail.com)

## 壹、前言

據說傳播學引進中國大陸三十年了（在臺灣已六十年），許多學者對「傳播學」有嚴重的身份危機感：到底傳播學在中國走對了路，還是走錯了路，下一步何去何從？其實，不僅華文學界對於傳播學有認同危機，國際傳播學界對這個學科也有認同危機。我提到傳播學「引進」中國是很關鍵的，因為傳播學不是繼承中國傳統知識體系，而是從外國全新介紹進來的。有學者批評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一味追求「全盤西化」。我們一方面要「引進」西方學術，一方面又要批評「全盤西化」，怎麼辦？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先要鑽進去學人家的東西，然後要能夠跳出來，才能攀登另一個高度，所謂「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彷彿是老生常談，但所有嘗過為學甘苦的人都知道是很難做得好的。

不管在中國大陸或在臺灣，常常有人問我，傳播學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廣義來說，文化學者（例如 Carey, 1992）認為媒介是社會生活鬥爭的場域（site of struggle），裡面有各種勢力和觀點在折衝樽俎，在互相合作、競爭和對話中建構象徵意義。如果每一個學科都有它的邊界（boundary），有一組基本問題，有一套特殊語言乃至看世界的方法，那麼這樣的「場域」顯然企圖貫通各領域，算不算是一個性質特殊的「傳播學科」呢？但若從狹義來說，傳播學能不能取得像社會學或心理學的學科地位？中國大陸有所謂「一級」或「二級」學科的設置，那是教育行政的措施，牽涉許多別的考慮，無關學術；但以學術論學術，傳播學是不是一個獨立學科？很多人很焦急，一直想知道：「到底我是誰？」我自己倒不太為這種事操心，因為水到自然渠成，要是一時水不到、渠不成，平白操心也是徒然。學科地位畢竟是靠學界共識認定的，而不以我們主觀的意志為轉移，要是為了求心理安慰，逕自宣布自己是獨立學科，卻不被別人所認可，這樣自卑又自大的「壯膽」有什麼意義？基於我個人的訓練和興趣，我總相信現代社會不能脫離傳播生活而存在，如果社會學可以研究家庭、犯罪、人口等等問題，我們又有何理由不能研究媒介和傳播的制度、現象、過程和效果？英國學者 Tunstall (1970) 編過一本書，就叫《媒介社會學》。有人稱我做的是「媒介社會學」，我總是欣然接受。也許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我在乎的是有無能力針對媒介和傳播提出原創性的問題，並給以堅實的分析，至於貼上傳播學或媒介社會學的標籤，是無關宏旨的。

當然，從學術行政的角度來說，如何為傳播學定位是重要的，因為這和資源分配息息相關。在中國大陸，傳播學被認可成為「一級」學科，只要行內學者不

因此沾沾自喜，以為「學問之大，盡在於斯」，那麼能爭取到更多資源和地位自然是應該歡迎的。在美國，傳播學大體還是交叉的邊緣學科，許多大學文理學院的核心是文學系、數學系、哲學系、物理系、歷史系之類，新聞系雖然熱門卻非核心。有的大學成立傳播學院，儼然自成系統，不隸屬於文理學院，但傳播學院內部各系的課程往往多所重複。我也做過學術行政，深知到大學當局去和各系爭取有限的資源時，不能太自貶身價，總要力言傳播是溝通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橋樑學科，是佔據中心位置的新興學科。學術政治必須在科層體系內建立學科的正當性，這個道理我完全理解。然而本文以學術論學術，不涉及實際的學術政治，旨在探討學科發展的道路，所以不妨有話直說，即使說錯了，也不影響到學科的根本利益，何況大家還可以平心靜氣地商量。

這是一篇通論性質的文字，我無意做地毯式的文獻掃描，何況這類書籍坊間也所在多有。我要提供的是一張路線圖，首先從字源探索廣義的「溝通」與狹義的「傳播」之間的關係，敘述早年在「統一科學」運動下建立統攝性「溝通學」的嘗試，接著述評美國傳播學的兩大範式及其興替，從而診斷整個傳播領域理論匱乏的原因，最後著眼於傳播研究的地方經驗與全球理論。秉承「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的古訓（朱熹語），我且效法野人獻曝，提出若干不成熟的孔見，以就教於華文傳播學術圈的師友們，其中以偏概全，掛一漏萬，非特不可避免，可能十分嚴重。無論讀者最終是否同意我的解讀，我願意開宗明義坦白交代這一點。

## 貳、傳播的三層意義：溝通、交通、媒介

根據科學家的估計，人類在地球上已有一百萬年的歷史。施拉姆（Schramm, 1981，另譯為宣偉伯）將這一百萬年畫到一個24小時的鐘面上，每分鐘代表700年，每秒鐘代表12年。這樣算來，照相術出現於午夜以前13秒，電報午夜前11秒，電話午夜前8秒，電影7秒前出現的，廣播午夜前5秒，電視午夜前4秒，衛星、電腦則是午夜以前3秒才出現的。總之，這些先進的傳播科技原來都是在午夜13秒以前才密集出現的，儘管一個接一個，快得令人喘不過氣來，然而它們不啻是歷史長河的小點滴罷了。我們眩惑於科技的神奇，常常忘記歷史的悠遠，各種炫目的科技不過是眼前的發明。以我的生長歷程為例，要到小學六年級家裡才有收音機，高中三年級才第一次看到電視的面目。但年輕一代是與電視共生的，哇哇落地即直接進入電視影響圈內。現在的兒童大概認定電腦和iPad

這些「玩具」存在五百年了，屬於他們的基本人權，難怪他們操作起 iPad 那麼嫻熟自如，不像他們的祖父母那麼笨，看了半天說明書還未必懂。

我想借用字源的界說（參考 Williams, 1976: 62-63），闡明 communication 所包涵的三種意義：溝通、交通與媒介。communication 的原始意義就是中文的「溝通」，它在拉丁文與 community 同個字源，都是 communis，即是要建立「共同性」（make common）——也就是透過社區內人們面對面的溝通，彼此分享資訊和情感，以建立深刻的瞭解。其中最重要的場域，莫過於家庭。家裡面的聲息氣味都熟得不得了，隔壁房間有人走過來，只要聽腳步聲就曉得是誰，根本不必抬頭看。可見「熟悉」是溝通的基本要素。因此有人建議，學好英文的不二法門，就是跟美英人士結婚——這倒也不見得，我有朋友娶美國太太，英文卻講得結結巴巴的；因為他們結了婚以後，許多話盡在不言中，只要起個頭或講半句，伴侶早已心知肚明了。難怪夫妻愈老愈像，連生活習慣、脾氣、語言行為方式都不知不覺互相感染，道理也一樣。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也是從家庭開始的；人們走出「家庭」的堡壘之後，進入一個充滿陌生人的「公共」場域，在那個場域裡彼此不熟悉，必須建立一個免於政治壓迫和資本污染的情境，使大家透過批判性的理性溝通，求同存異。

溝通最有效的媒介是語言，儘管語言有各種缺陷，科技再發達卻絕對無法取代語言的基本功能。（當然我也同意，心心相印，無聲勝有聲，禪宗拈花微笑，不著文字，是心靈溝通的最高境界，但那是另外一個語境的題外話了。）到了產業革命以後，communication 進入第二個階段，增加了「交通」的意義。工業社會製造就業機會，大量農民遷徙到城市，拜賜於舟、車、飛機、電話、電報，徙置遠處仍可維繫感情和意義的共同性。交通工具打破了地理的藩籬，延長人們溝通的能量，但溝通內容的稠密度卻非大為稀釋不可。今天交通銀行譯為 Bank of Communications，交通部譯為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別以為翻錯了，這是保留 communication 第二層的意義。以溝通「稠密度」來說，最高的是見面，可以近距離親身聆聽語言的意義，聽其言，觀其行，揣摩言外之意或未言之意，甚至察言觀色，即是進行「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這樣彼此透過各種直接接觸的方式，在反覆交涉中建立準確的意義。要是彼此見不到面，退而求其次，只好打電話；打電話總比不打好，但假如夫婦長期分處太平洋兩端，無法有肌膚之親，只靠電波傳情，結果愈傳情愈薄，最後怕要分道揚鑣的。為什麼生意人當面幾杯黃酒下肚，談不攏的東西也談得攏了？為什麼中國人喜歡請客吃飯「以肚子控制腦子」？原因無它，都是為了搞熟以後，拉下面具，大家好說

話。又如，冷戰時期白宮和克利姆林宮早就設有「熱線」，照說一通電話可以解決的事，何勞外交官風塵僕僕，飛來飛去？因為雙方必須坐下來當面談，察言觀色，聆聽弦外之音，或步步為營，或互相讓步，以避免擴大爭端。

晚至 1950 年代，英文才出現 mass media（大眾傳媒）一詞，泛指我們所熟知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乃至延伸到今天所謂的「新媒體」（包括互聯網、衛星和社交媒介等載體），這已經進入 communication 的第三層意義了。倘若第二層意義指「物質的」交通工具，第三層便是指「心靈的」交通工具。大眾傳媒無遠弗屆，超越時空，涵蓋面廣，由少數的傳播者與廣大的（massive）受眾建立「共同性」，但這種溝通是單向的，音影稍縱即逝，又都缺乏雙向回饋的功能，其內容的稠密度必然更加稀釋了。在古典社會學裡，mass 還意指中文所說的「烏合之眾」，形容受眾的背景分歧，組織鬆懈，群龍無首，受眾與受眾、受眾與傳播者之間互不相識。正因為是「烏合之眾」，老死不相往來，早期哥倫比亞學派才會假設媒介可以長驅直入，其資訊有力「擊中」這些「原子化」（atomized）的受眾，改變他們的態度與行為，後來的研究證明這個假設是無稽的（詳下）。照李普曼 (Lippmann, 1922) 的說法，大眾媒介把「外在的世界」轉換成為我們「腦中的圖像」，而記者居於兩者之間（mediated），他們必須運用「刻板印象」（stereotypes）捕捉複雜的外在世界，不免掛一漏萬，所以李普曼鼓吹由專家精英為公眾闡釋社會事項。早年芝加哥學派稱媒介為「有組織的情報」（organized intelligence），由記者、編輯等組成的科層組織，有目的地蒐集、製造和散發各種資訊。既然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代表「理性溝通」，為何又說「烏合之眾的媒介」（mass media）促進公共輿論的「理性溝通」，其中的矛盾如何統一？那就必須進一步假設：即使個人是無知愚昧的，眾人卻是有集體智慧的。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關於這個矛盾如何安排，產生許多社會理論的流派，這裡無法詳說了。

這三層意義出現的時間有先後，既獨立，又同時存在。任憑現代「傳播」科技有多先進，也無法取代面對面的「溝通」，而和「溝通」與「交通」的功能也不完全重疊。西方民主理論的浪漫原型，從希臘的城邦政治，聯想到美國新英格蘭小鎮的議事廳，都假設社區內人人互相熟悉，見多識廣，更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實際上，李普曼 (Lippmann, 1922) 批評在美國幅員這麼廣大的國家，這種為小國寡民設計的民主藍圖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明知不可能實現，美國總統選候選人還喜歡描繪一幅 electronic town hall meeting 的願景，雖然美國人民無法聚合在一個地方親身接觸，還是想像可以透過最新科技進行全民溝通，正是「身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可見這個印象如何深植於美國人的深層心理結構中。

過去二十年，數碼化技術把我們帶進一個「新媒體」的嶄新紀元。新媒體為舊媒體（特別是報刊）的生存帶來極大的威脅，而且促進各種新舊媒體的匯流與整合，發展之速宛如舊小說形容的「迅雷不及掩耳」，從 1990 年代中葉互聯網開始普及到現在，接二連三的變化令人目不暇接，資訊環境猶如舊貌換新顏，未來的面貌更難預測。當然，世事之理可以「自其變者而觀之」，也可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何者變，何者不變，新舊媒體如何互動，尤其值得密切關注。研究新媒體現在最為時髦，學界是否以原來的理論和知識體系來瞭解新媒體，新媒體是否產生以前未有的新理論？新媒體研究的歷史尚短，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

## 參、統攝性的傳播科學？

最近我在大陸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發現應邀報告的題目繁多而龐雜，有人談「文化帝國主義」、國家形象，針對的是傳媒的角色；但也有人談祖孫關係，那是涉及第一個意義的「溝通」了。這兩方面的知名學者都很認真，但好像在兩個世界各說各話，學術關懷和問題意識南轅北轍，完全無法交流得上。這又回到「什麼是 communication」的問題來了。這裡，我要提醒準備到美國念書的學生，如果你選報 speech communication（或 communication studies）系，那就是打算做類似祖孫關係的研究，舉凡對人際傳播、小團體傳播、組織傳播（少部分傳媒問題）、演說和言辭感興趣的，這個系是正確的歸宿。但你若選擇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則幾乎全心關注第三層意義的大眾傳播了。以學科定位而言，communication research 應該以「媒介」為中心，還是應該泛指各種「溝通」？如果泛指各種「溝通」，一般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也應該算在內，因為他們研究華人社會的人情、關係與權力網路，不啻是廣義的社會科學。如果是媒介為中心，我們縱使運用社會學、心理學解釋一些媒介現象，核心關懷始終是媒介問題，也就是以媒介為主，以其他知識背景為輔<sup>1</sup>。

我的學術興趣是以媒介為重心的，但必須把媒介緊密聯繫到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裡，而不是封閉式兀自關起門來「以媒介看媒介」。這種傳播研究關注什麼問題？社會學經常提到 agency 跟 structure 的互動：行動者有何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其極限何在？行動者採取哪些行動才可以改變結構？而結構又如

1 以學術專業組織來說，speech communication 以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為主，新聞與大眾傳播以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為主，但兩個領域的學者都參加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何一方面保障、一方面制約行動者的自由與能力？以此為分析的綱領，媒介研究包括三個層次：一、以媒介與社會的關係而言，媒介是行動者，社會是結構；媒介必須在特定的社會內運作，而和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發生複雜的辯證聯繫。二、在媒介內部，媒介組織（如報館）是結構，專業人士（如記者、編輯、市場行銷者）是行動者；記者可以影響報館的運作，但報館的規範反過來制約記者的行動。三、以媒介與受眾的關係而言，媒介是行動者，受眾就是結構；媒介對受眾產生什麼影響，而社會大眾又如何形塑媒介的品味與內容？抓住這三個綱領，我們自然可以引出很多子題（參考 Croteau, Hoynes, & Milan, 2012）。

在美國，傳媒研究之所以有今天，公認以施拉姆的貢獻最大。他多才多藝，高中畢業時，辛辛那提職業棒球隊要他去打棒球，他在哈佛大學念碩士時，在波士頓一個職業樂團吹長笛。拿到博士學位以後，他在 Iowa 大學英語系當教授，遇到美國經濟大恐慌，他寫短篇小說賺外快，小說得過著名的奧亨利獎，並收入中學的教科書裡。他晚年時曾告訴我，偶爾還接到那幾篇短篇小說的版稅。接著他創立 Iowa 大學新聞學院，更重要的是他後來在 Illinois 大學創立全國（全世界）第一個傳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我們這個年輕的學科從此宣布誕生。

1950 年代，二戰結束後，美國學術界掀起一個野心勃勃的「統一科學」（unified science）運動。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施拉姆認為，既然 communication 是政治學（如民意）、社會學（如社會結構）、心理學（如群眾心理與認知）、經濟學（如資訊經濟）等等學科的匯點和中心，何不建立一套獨特的 communication science，以居高臨下的角度俯瞰，足以統攝或整合社會科學各領域的視野？這個 communication（溝通）的定義顯然是廣之又廣的。事實上，在 Illinois 環繞施拉姆身邊的學者來自各種不同的專業，例如 Shannon 和 Weaver 是資訊科學的大家，Charles Osgood 是著名的語意學家。施拉姆顯然希望聚集一流的頭腦，讓他們從不同的觀點在一起碰撞，以爆發全新的知識火花，叫做 communication science。當然，這個「統一科學」運動證明是失敗的，施拉姆自己也慨歎道：「許多人穿過，很少人逗留」。他終於發現，社會科學的各路英雄好漢，因緣際會，偶爾在邊緣處相會，觸摸到若干 communication 的問題，但他們穿過十字路口以後，又向本學科的方向和旨趣直奔。施拉姆即使想要留他們別走開，但十字路口還是十字路口，只穿過，不逗留。傳播研究不但沒有成為統攝性的中心理論，而且邊緣如故，只能繼續拼命爭取中心的承認。



後來，施拉姆移師西部的斯坦福大學，創立另外一個舉世聞名的傳播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更是培養了數代傳播研究的領軍弟子。此時，他似乎已放棄建立統攝性理論的嘗試，目光轉而專注於建立狹義的「傳媒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跨學科的統攝性理論建不成，傳媒研究的理論根基又不足，施拉姆從老資格的社會科學吸取理論養料，以灌溉新興傳媒研究的園地，始終不遺餘力。他褒揚傳媒研究有四位「祖師爺」，都來自其他的學科，包括社會學家（Paul Lazarsfeld），政治學家（Harold Lasswell）及兩位心理學家（團體動力學的 Kurt Lewin 和實驗心理學的 Carl Hovland）。施拉姆的「點將錄」所推崇的傳播研究是實證主義的範式，特別重要的是 Lazarsfeld 和 Merton 在哥倫比亞大學發展的路數。他所推崇的其他三位大師，後來與傳播研究漸行漸遠，只有 Lazarsfeld 不棄不離，與同事（R. K. Merton）學生（例如 E. Katz）合作不懈，更奠定了美國實證量化傳播研究的基礎，進而蔚為美國傳播研究的主流，其長處短處都在這裡。等到這個路數變成支配性的主流範式，學術發展逐漸呈現偏枯的趨勢，幾乎忘記了更早前芝加哥大學社會系還有另一個主要的傳統，哥大範式比芝大範式與歐洲的激進思潮更是南轅北轍。

## 肆、美國媒介研究的兩個範式

美國的傳播研究深受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啟發，英國的文化研究脫胎於文學批評，淵源大為不同。在美國，傳播研究有兩個最重要的範式，一個是芝加哥學派，一個是哥倫比亞學派，它們的崛起、發展和消長各有時代的烙印，也反映美國社會情境的遞嬗。稱之為「學派」，是因為它們所提出的問題、使用的方法對傳播研究都有根本性的影響，內部縱有差異，但整體合起來看，芝加哥學派和哥倫比亞學派是截然異趣的。茲參考 Carey (1992)、Czitrom (1982) 和 Hardt (1992)，綜所述評如下（見表 1）。

美國版圖的拓展史是由東向西移動的，全國第一大城當然是紐約，而第二大城長期而言就是芝加哥。直到後來西部的洛杉磯崛起以後，芝加哥的關鍵地位才逐漸稍有退色。芝加哥是中西部最大的樞紐和集散地，轉運周圍農業州的資源到東部，但無論是地位、資源或價值取向，芝加哥也與東部都市平分秋色，甚至分庭抗禮。美國象徵人類史上橫跨新大陸的第一個民主實驗，這個新興國家歷經都市化、工業化和大量移民的洗禮，使得整個社會秩序和核心價值動盪不已，必須重新整合再出發，於是知識界領袖在上個世紀初發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進步運

	芝加哥學派	哥倫比亞學派
極盛時期	一戰到二戰之間，美國社會歷經動盪。	1950 年代以後，美國國力日正當中。
聚焦	報刊是社會文化機制的一部分，與城市發展和移民社會息息相關。報刊的作用在於維繫政治和道德共識。	以媒介效果為主。把社會結構視為當然。
範式	實踐主義，報刊促進社會改革。與「進步運動」同步。	結構功能主義，媒介維繫系統的平衡。
研究方法	人類學參與式觀察深訪，社區研究。	以問卷調查和內容分析為主。不重視歷史。
知識論	經驗性，也闡釋性。象徵互動說。	實證經驗研究。
代表性學者	Robert Park, Gerorge Herbert Mead, Herbert Blumer, Morris Janowitz, Kurt and Gladys Lang	Paul Lazarsfeld, Robert K. Merton, Elihu Katz

表 1：芝加哥學派與哥倫比亞學派的比較

參考：Carey (1992); Czitrom (1982); Hardt (1992).

動」。政治上，它鼓吹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好政府主義」，鼓勵報刊揭發政客貪腐無能，它提倡個人憑本事升遷，反對絕對或武斷，主張以科學方法促進社會改革；經濟上，它反對社會資源與財富寡頭壟斷，並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反對資本家剝削勞工；文化上，它提倡新的中產生活方式、新式藝術和建築品味，以及都市計畫 (Carey, 1997)。「進步主義」更新了美國的核心價值，孕育了美國社會的「媒介專業主義」，其餘緒更是開啟了美國對外擴張的歷史，包括進入中國發展勢力範圍。

芝加哥大學是「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的重鎮。芝加哥大學首創全國第一個社會系，該系在一戰到二戰之間獨領風騷。芝加哥的社會學家們受到杜威的「實踐主義」(pragmatism)所影響，放棄歐洲式的抽象玄思，而注重學術在社會和政治改革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他們以芝加哥這個城市為活生生的社會實驗室，有系統地做了大量人類學式的開創性社區研究。他們研究的範圍很廣，其中一環是把報刊視為社會的有機環節和組成部分，探討報刊如何促進社會秩序的整合、社區和諧及種族融合。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而是與整個都市發展、移民過程和社會秩序有相伴相生的關係，研究旨趣充滿了自由主義漸進改革的精神。大規模的社會變遷引起動盪，社會上的道德基礎與政治共識失衡，學者探討如何使用媒介維護社區的整合與共識，以促進社會的改革與進步，其終極目標即在於完善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

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既是經驗性的，又是詮釋性的。它著重參與式觀察，也使用歷史和人類學田野方法，以社區研究為主。記得他們曾派出學生駐在商店門前

「站崗」，實地記錄交易的種族和階級情形，店主不知道他們幹什麼，打電話要員警驅逐他們。芝加哥學派的掌門人派克 (Park, 1967)，研究報刊的「自然史」及移民報紙對融入美國社會的影響，他曾到燕京大學做訪問教授，是費孝通的老師。布魯墨 (H. Blumer) 是「象徵性互動派」的代表，在集體行為和民意研究的貢獻卓著，影響很大。Janowitz 研究社區報紙與社區權力結構，以及社區報紙如何促進社區和諧。Lang 氏夫婦配合實地觀察和電視內容的分析，提出媒介的「社會建構」。這些都是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取代英法帝國主義成為世界霸權，國力如日正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持盈保泰，學界所關注的是維護社會系統的穩定平衡，研究旨趣日趨保守，他們提的問題比芝加哥學派窄化得多。這時，社會學的重心已從芝加哥大學移轉到哈佛大學，但帕森斯 (T. Parsons) 的宏觀結構功能論過於抽象艱澀，無法接受經驗證據的考驗。以傳播學而言，其重心又轉移到哥倫比亞大學。理論家莫頓 (R. K. Merton) 提倡「中距」的結構功能論 (middle-range theory)，以接通抽象概念與具體經驗，使理論能夠接受經驗證據的檢查。理論家莫頓和以量化研究方法見長的拉查斯菲爾德 (P. Lazarsfeld) 合作無間，相得益彰，訓練了數代社會學 (包括傳播社會學) 的領袖。哥大仰賴企業界 (尤其是紐約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和政府提供大量研究經費，他們使用相當精細的問卷調查和內容分析，研究媒介如何改變人們的短期態度與行為，特別是選舉與消費購物方面。大公司和政府資助學術界，自然不願意學術界用這些研究來檢驗甚至批判它們，因此哥大的學者們幾乎凍結了社會制度與結構性問題，把媒介與權力結構的關係視為當然，只以工具的眼光孤立看媒介產生什麼效果。他們原來期望媒介發揮「魔彈式」的強大效果，但各種實證研究卻紛紛否定這個假設，反而發現媒介無力改變人們的態度或行為，只能鞏固他們固有的預存立場。這個結論使得他們開始懷疑傳播研究的價值，以前的樂觀期待轉變為悲觀情緒，以至於哥大的重要成員之一貝勒森 (Berelson, 1959) 過早為傳播研究發出訃聞。

拉查斯菲爾德原是來自奧地利出色的應用數學家，移居美國以後發明了若干重要的量化研究和統計方法。他的 panel study 當初是為美國農業部設計的，正好碰上美國總統大選，他就把這套方法拿到 Ohio 州的 Erie 縣使用，即在選舉過程中每隔段時間就反覆回去訪問相同的樣本，以追蹤選民投票意向和行為受媒介影響的方向與程度。研究成果總結在《人們的選擇》(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8) 這本書中，這是開傳播研究量化實證研究的先河。(有一次，我和業師羅傑斯開車經過該地，看到高速公路 Erie 的路標，心中彷彿觸電，頗有到麥

加「朝聖」的味道。)該書否定媒介有強大效果,提出「兩級傳播」的說法,也就是媒介無法直接影響受眾的態度與行為,有一群意見領袖先吸收過濾媒介的資訊,再傳布給廣大的受眾。後來,他和學生凱茲合作,在《個人的影響》(Katz & Lazarsfeld, 1955)把「兩級傳播」和意見領袖做更詳實的試測。

現在回顧哥大對於「兩級傳播」和「意見領袖」的提法,和李普曼(Lippmann, 1922)早年對於公共輿論所提出的見解,實在不無若符合節之處。前面說過,李普曼認為公共事務複雜萬端,新聞媒介需要靠「刻板印象」瞭解外在世界,新聞報導本身有相當大的內在缺陷,而且為政府和大公司操縱心靈的公關企業又方興未艾,為此他提倡由專家精英為公眾闡釋公共事務。李普曼的論敵杜威雖然也承認公共事務複雜,但杜威寄望於公眾參與和社區溝通,以凝聚民間智慧,反對精英治國。杜威哲學是芝加哥學派的指南針,從這裡我們也看出它和哥大學派在政治立場上的基本差異。

正當哥大學派取代芝加哥學派成為傳播研究的主流,美國的國際傳播研究也在麻省理工學院醞釀形成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冷納(Lerner, 1958)的著作《一個傳統社會的消逝》。這本書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影響,力言第三世界要現代化,必須利用媒介灌輸人們的「移情能力」(empathy),潛移默化,使他們打破宿命論;如果人人具備這種「移情能力」的現代人格,整個社會必然告別傳統,步入現代的門檻。這個理論到現在已被攻擊得體無完膚,但它曾為國際傳播研究定下數十年的基調。施拉姆(Schramm, 1964)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寫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發展》,一度被第三世界領袖奉為「聖經」;羅傑斯(Rogers, 2003)的「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也影響深遠。兩人都以冷納的學說為範式,鼓吹第三世界以媒介為現代化、國家發展的觸媒劑,以媒介促進民族整合、經濟現代化和文化自主。在這裡,我要指出一個知識社會學上的吊詭:一方面,在美國國內,哥大學者總結「媒介有限效果論」,媒介只能強化人們固有的立場,無法改變他們「短期」的態度與行為;但另外一方面,在國際上,美國學者憑藉有限的證據,卻信心十足,以預言式的話語強調,媒介在第三世界社會變遷的「長期」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的發展軌跡既合流,又分途,其間關係尚待細緻分析(Lee, in press-a)。(政治情況和學術見解變化很大,倘以當今左派的觀點重新做180度相反的解讀,則哥大學者的發現不再證明媒介的效果「有限」,反而證明媒介具有「強大」的保守效果。假如媒介強固人們的預存立場,維持他們態度和行為的長期穩定,阻礙社會變革,豈不正是權力結構進行社會控制的思想利器?這樣說來,反而符合克蘭西的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

芝大和哥大這兩個社會系留下傳播研究，早已各自往別的方向走，而傳播研究則被各地後來興起的新聞傳播院系接收為版圖。但無論從哲學思想、研究旨趣或方法技術來說，哥大因緣際會，逐漸凌駕芝大之上，仍是影響當今美國傳播學的主流範式，歷久不衰。上個世紀 70 年代，歐洲激進派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先後引進美國，它們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張本，把美國主流傳播研究攻擊得不遺餘力。但美國畢竟是世界最大的學術市場，自成一不假外求的體系，歐洲的挑戰未能動搖哥大範式在美國的支配地位。歐洲的批評理論原來是對美國提出「敵對的」的世界觀，但到了美國就被分插到整個學術光譜中成為一支，其批判性當然明顯削弱。美國式傳播研究的流風餘韻更擴散到世界上許多國家，中國學界似乎也多在這個影響圈內打轉，亦步亦趨。「全球化」的聲音響徹雲霄，傳播研究卻未必更多元或更國際化。

芝大的傳播研究範式縱然退隱為暗流，但從未完全失傳。上個世紀 6、70 年代，美國社會各種要求變革的勢力（反越戰運動、婦女運動、種族運動和學生運動等等）風起雲湧，改革派學者回去芝大範式尋找血脈，重新發現先驅學者懸而未決的問題。尤其重要的，芝大的範式比哥大更能接通歐洲思潮，提供進一步切磋琢磨的空間：其一，芝大雖然採取自由主義的立場，與法蘭克福學派及以後的左派觀點立場大相徑庭，但兩者的主題意識都扣緊了媒介和權力的互動關係。其二，芝大先驅學者米德（G. H. Mead）發展的「象徵互動論」，允稱美國文化研究的源頭，和歐洲傳進來的現象學也有些曲通幽徑之處。許多美國傳播學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幾乎只知道哥倫比亞學派的工作，而最積極重新發現、詮釋芝加哥學派的貢獻者，莫過於雄辯滔滔的文化學者凱瑞（James Carey）。

## 伍、理論貧乏與「內眷化」

美國新聞院系和傳播研究的接軌相當偶然，而新聞院系接收社會系遺留的傳播研究有何得失？新聞教育是美國的特殊產物，歐洲的精英貴族大學和美國的哈佛大學排斥新聞教育，輕視它缺乏知識骨幹。1908 年密蘇里大學成立全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四年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相繼出現——普利茲死後，希望捐贈遺產以成立新聞系，先為哈佛所拒收，後來哥大才勉強接納，乃有現在舉世聞名的新聞學院與普利茲獎。（按，上述「哥倫比亞學派」指的是社會系應用社會研究局，與新聞學院沒有什麼關係。）但哥大是例外，美國主要的新聞院系都集中在中西部的農業州，因為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撥劃聯邦土地，成立州立大

學，除了追求人文與科學知識，還高懸「服務社區」為主要使命，一些應用學科（尤其是農學、軍技、商學、新聞）因而在高等學府獲得正當性。當時一般記者多半桀驁不馴，不乏才華洋溢之士，卻很少有人念過大學，新聞職業的整體聲望不高，所以各州的新聞同業團體紛紛乘機慫恿州立大學成立新聞系。這樣憑內外兩股力量合流，為美國大學的新聞系接生。必須指出，密蘇里新聞教育的模式對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我們另有長文（張詠、李金銓，2008）做過詳細的歷史分析，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大學有了新聞系是一回事，新聞系在大學裡有沒有地位是另一回事。美國大學的新聞系一般都是從英文系分支出來的，目的在於培養編採寫作實務人才。二戰期間，有些老記者徵調參加軍旅，戰後回到大學校園讀研究所。但新聞系沒有博士班，在研究型的大學裡是很難有地位的，幸虧威斯康辛大學的 William Bleyer 獨具遠見，在政治系裡增加新聞輔修，教授新聞和相關的政治學、法律和倫理學、公共輿論和宣傳等課程。這些老記者獲得政治學（或其他老學科）博士以後，相繼應聘到各重要大學新聞系任教，逐漸發展新聞學博士課程（早年以威斯康辛、伊利諾、明尼蘇達和斯坦福四所大學為重鎮），以至於蔚為學府建制的一部分，而在這個過程中又逐漸吸收、發展傳播研究的學術路徑（參考 Rogers, 1994）。數十年來，全國新聞學院紛紛改名為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表面上平安無事，學生人數愈來愈多，其實新聞與公關廣告的哲學關係從來沒有處理好，內部的新聞實務和傳播理論更一直處於緊張狀態<sup>2</sup>。

回顧施拉姆時代，傳播學緊密依附其他社會科學，從跨學科引進理論、概念和視野。他和麻省理工學院普爾 (Pool & Schramm, 1973) 合編《傳播學手冊》，厚達一千多頁，各章作者多為著名的政治、社會和心理學家，其中有 1/5 的篇幅是關於國際傳播問題。十多年後，下一代學者 (Berger & Chaffee, 1987; Berger, Roloff, & Roskos-Ewoldsen, 2010) 合編《傳播科學手冊》，作者都來自傳播本行，其他學科的作者幾乎絕跡。後書的編者自詡傳播已經成為「科學」，既是「科學」當然就自給自足了，從此不假外求，不再需要其他學科的奧援；而且，他們對國際傳播幾乎全然漠視，國際傳播彷彿只是國內傳播的延長，國界與文化差異儼然

2 將近一百年前，李普曼 (Lippmann, 1922) 早就批評公關遮蔽新聞的真相，其後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歸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更極力攻擊廣告和公關為服務資本主義的社會「盲腸」。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除了教新聞，還教廣告和公關，原因有二：一是新聞與廣告是媒介生存的兩轡，在媒介組織內部的安排上刻意把新聞和廣告分開，以保持新聞的獨立，不受廣告的影響，但由於媒介經濟愈來愈萎縮，新聞與廣告逐漸有匯流的危險；二是從媒介研究的版圖來說，廣告和公關都屬於媒介效果的分支，故紛紛包裝改稱為「策略性傳播」，所吸引的學生人數甚至超出新聞。

都是無關緊要的。Chaffee 是施拉姆在斯坦福的得意門生，他比他的老師更強調「科學」，但科學一旦變成「主義」，他的眼光卻比老師狹窄得多。Chaffee 曾於 1980 年代初撰文辯稱，傳播科學有自己的博士班建制、學術期刊等等，當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學科。他不僅從外緣的制度面「合理化」傳播學，以《傳播科學手冊》的精神看來，他顯然也認為傳播「科學」在內涵理論上有獨立的貢獻。Paisley (1984) 形容傳播學是一門「橫向」學科，連結其他的「縱向」（例如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學科。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 Chaffee 似乎想把傳播學從「橫向」扭成「縱向」學科。這到底是福是禍，見仁見智，至少在現階段我覺得是走向死胡同。

再說一遍：施拉姆時代力求和別의學科接枝，後來從新聞傳播建制內產生的文獻卻力求「獨立自足」。上個世紀 70 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讀時，新聞系內部密集出現以下的「理論」：議程設置 (agenda setting)、知識鴻溝 (knowledge gap)、媒介使用與滿足 (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 (spiral of silence)、認知共同適應 (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 (third-person effect)、涵化 (cultivation)、框架和鋪墊 (framing、priming)、創新擴散，等等。這些「理論」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開始就有氣無力，有的剛提出時頗有新意，但因為長期孤立使用，過勞而透支，「馬力」呈現疲態。幾十年後，我都快退休了，看過各種走馬燈似的流行，抓住幾個老題目不斷再生產，固然資料累積很多，但見解增加幾許？何況連這類「內部理論」也長久不見有人提出，而整個學科生態又滿於劃地自限，不作興跨學科互動，其理論貧瘠的尷尬境況可想而知。坦白說，今天在美國有些大學博士課程，可以狹窄到從上述的「理論」選擇一個題目，寫一篇不痛不癢的論文，就可以拿到學位了。無論讀者是否同意我的判斷，都必須面對一個尖銳而嚴肅的問題：為何我們缺乏深邃的「範式」引導傳播學的研究工作？

我認為這個現象是學術發展的「內卷化」(involution) 過程。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格爾茲 (Geertz, 1963) 在印尼研究爪哇島和巴厘島的農業經濟生態，發現爪哇島天然條件優厚，由於荷蘭統治者強取豪奪，又有巨大的人口壓力，爪哇島採取的農業發展策略不是更新變革，而只求在現有條件下「殺雞取卵」。也就是說，爪哇島沒有提升耕作技術和品種，只是不斷增加耕作人口——反正農田最容易吸納過剩人口，只要加一雙筷子，大家都有飯吃——每畝地的產量非但沒有提高，農地且過度墾殖分割，以致良田變廢墟，造成社會、經濟和生態上的災難。格爾茲稱這個過程為「內卷化」(或譯為「內捲化」，偏重略有不同)。

我們可以引申「內卷化」的意義，指學者抱住一個小題目，在技術上愈求精細，眼光愈向內看，問題愈分愈細，彷彿躲在自築的一道牆圍，得到心理安全，拒絕與外界來往的壓力，其結果是不但忘記更大的關懷，更阻礙思想的創新。格爾茲形容這個過程是「技術性的分髮絲」（technical hair-splitting），捨本逐末，縱然把髮絲數得分毫不差，也看不到整個頭型的全貌。優生學鼓勵基因相異的人結婚，反對近親繁殖。豪門如果只顧分產，不事增產，再多財產也要敗家。在我看來，「內卷化」是學術創造力的退化，特別是在當今急功近利的大學獎懲體制內，鼓勵放大鏡照肚臍眼，抱住一個小題目做到死，不但隔行如隔山，甚至同行如隔山。社會科學的知識一旦喪失「公共性」，便只成為學苑內部的嬉戲。這是可怕的學術危機，尤以中國的傳播邊緣學科為然。中國經濟發展與學術自信或積澱迴不相伴，自然產生一種莫名的焦慮感，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指標，美其名為國家的「軟實力」強力推行，道理在此。好在近年來大量著作譯介到中國，儘管選書和譯事均水準參差，年輕學者如欲開拓眼界，機會之多倒是前所未有的。

蘇鑰機 (So, 1988) 曾分析傳播主要期刊的引文指數，發現它們引用其他社會科學的文獻愈來愈少，引用傳播領域的文獻愈來愈多。如果從 Chaffee 等人的觀點來看，這正是象徵傳播學的成熟，我沒有這樣盲目的樂觀，反而擔心這是典型學科「內卷化」的證據。純粹「從傳播看傳播」理論資源如此貧乏，特別是那些從新聞系內部產生的「理論」，通常和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脈絡脫節。家底本來就薄，關起門自娛，情形更為不堪，焉能不邊緣化？我覺得 1970 年代 G. Gerbner 主編的《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雖然文章良莠不齊，但經常激起重要辯論的知識火花；現在篇篇文章在技術上精緻得無懈可擊，卻缺乏知識上的興奮，有時候我稱之為「毫無用處的精緻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我寧願回去讀點老書，分析容或不夠成熟，那種開闊的氣象卻充滿生命的躍動。

這 3、40 年來，很少傳播學者在傳播領域之外還有影響力的，有活力的傳播研究反而多是從外面帶來的衝擊，且讓我舉幾個例子說明。一是統稱為「媒介社會學」的研究，在上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交，突然密集出現，它們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探討媒介組織內部的科層運作，新聞製作的流程、過程和因素，以及新聞製作與社會運動的互動（例如 H. J. Gans, G. Tuchman, T. Gitlin）。即使過了三十多年，這些分析視野還是生機蓬勃，可惜很久沒有人提出其他重大的新觀點了。我相信社會學也有「內卷化」的情形，可能是整個學術界的「後現代」現象，並以傳播這類邊緣學科尤然。其二，政治經濟學的挑戰，使媒介無法孤立



看待，而必須分析媒介話語的政治經濟基礎（例如 J. Curran, H. I. Schiller）。拉丁美洲的激進政治經濟學也曾有重要的貢獻，但它與第一世界的政治經濟學互動不多。其三，文化研究使媒介話語更緊密聯繫到背後的深層意義，以及意識形態的脈絡，包括英國的有威廉斯（R. Williams）和侯爾（S. Hall）對美國主流範式的批判，芝加哥學派文化研究的重新發現與詮釋（J. Carey, H. Becker）。薩伊德（E. W. Said）提出「東方主義」的命題，啟發了「後殖民主義」的開創，對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尤具深意。這些理論在美國各新聞傳播學院發生的影響甚不均勻，有的學校頗重視它們，但有些以庸俗實證主義掛帥的學校則淡漠視之。中國在引進傳播學的過程中，應該以開放的視野取精用宏，而不是出於短視或無知，只局限在簡單的層次和粗糙的面向。

## 陸、傳播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

西方傳播學理論不能定於一尊，而且除非經過國際層面的考驗，終究還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論層面。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但傳播研究的國際化腳步很慢。我們從西方學習傳播學，不是為了替西方理論找海外根據，而是希望活絡思想，幫助勾勒素材，以研究本社會的重大問題，從而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看法，與西方文獻平等對話。

中國向西方學習現代科學，科學無國界，中國人學起來很快。人文有濃厚的民族色彩，中國的人文傳統源遠流長，有輝煌的成果與其他文化溝通，自不待言。社會科學介於兩者之間，一方面受到科學的影響，一方面受到人文的影響。美國式的傳播研究通常是跟著科學走的。科學追求宇宙外在客觀存在的規律，主要的方法是實證主義，企圖把複雜的社會現象化約為少數重要的元素，而建立其間的因果關係；若能用數學公式把因果關係表達出來，則最為精簡，涵蓋的內容也最豐富。但從人文的角度來看，世界秩序是混沌複雜的，不可能化約，我們必須用語言的解釋力量，使其意義能夠層次分明地顯現出來。文史哲首先追求的是意義，而不是規律。

長期以來，以哥大為主流範式的傳播研究是向實證主義科學靠攏的，其成就與限制可以有公論。我認為，這個學科應該適時回頭注意韋伯式（M. Weber）的知識論和方法論，以拯救傳播學主流範式的偏差。韋伯企圖平衡規律與意義，以經驗研究為基礎，但未必拘泥於實證主義的路徑。他的知識論和方法論為人文與科學搭一座橋樑，不但對傳播研究的本土化最有啟發，而且這個路徑的學術業

績輝煌，足以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質言之，爬梳豐富多元的意義脈絡，固然要層層建立系統性，但追求規律卻不宜流於簡單化或形式化。韋伯依照他的法學訓練，以具體之「因」聯繫到具體之「果」，而不是追求抽象的普遍規律。由韋伯知識論所發展出來的現象學道路，強調「互為主觀性」，容許不同的詮釋社群建構不同的現實，然後求取「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的溝通與瞭解 (Berger & Kellner, 1981)。世界觀不同，並不代表完全無法互相瞭解。而詮釋社群可能取決於性別、階級或種族，但對我們最貼切的莫過於文化因素。一般公認韋伯、涂爾幹 (E. Durkheim) 和馬克斯是社會學的三大鼻祖，代表三種不同的旨趣與方法，但不同的學者也可能互相滲透。我特別在此提出韋伯，一是因為美國式主流傳播學 (哥大範式) 漠視韋伯的啟示，二是因為韋伯和現象學為傳播研究本土化提供知識論的基礎。

我寫過一篇文章提倡「地方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聯繫，容我在此略為申述一下 (Lee, in press-b)。任何研究都必須在語意學家所說的「抽象階梯」上下來回游走，企圖找出勾連具體經驗和抽象理論的最佳點。社會科學既然不是中國固有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是自外國接枝生長出來的，我們向外國學習構思的理路、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在方法的實踐上，我毋寧贊成韋伯式現象學的路徑，一切認知、題旨和問題意識先從華人社會的生活肌理和脈絡入手，尋找出重大問題的內在理路，然後逐漸提升抽象層次，拾級上升到一個高度，自然會與整個文獻 (不管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 直接觸，這時我們站在制高點取精用宏，有意識地選擇最適當的理論。很少理論是可以直接拿來套用的，許多理論必須再造才行，有些理論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實在不同條件下可以互相參照或補充。萬一現有的理論都無法解決問題，學者可以試圖自創一個合適的理論，但那顯然不是簡單的事了。倘若放棄文化自覺，「先驗地」拿一個現成的外國理論當標準問題和標準答案，然後在華人社會拼命套取經驗印證，我認為是本末倒置的。

這個取徑還有幾個特點必須說明。第一，19 世紀德國史學泰斗蘭克 (L. von Ranke) 說：「從特殊性出發，我們可以拾級攀登到普遍性；但從宏大理論出發，我們再也回不去直覺地瞭解特殊性。」蘭克的話切中肯綮，社會科學結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甚至從特殊性去瞭解普遍性。第二，我們反對西方理論的霸道，也反對華人封閉的文化民族主義。說到底，社會科學的旨趣是要解答母社會的核心關懷，虛心學習西方理論，是為了幫助我們活絡思想或勾勒材料，而不是要抓住一個西方理論，在華人社會拼命再生產。倘若喪失了主體性，只顧給西方理論寫一

個華人地區的註腳，實在無關痛癢。我們當然要提倡國際視野和跨文化研究，知己知彼，道理還是相通的。第三，我提出的「全球理論」，當然不限定是歐美理論，地方經驗和理論會合時，各文化觀點應該有不斷平等對話、競爭和修正的辯證過程。我們一方面努力學習（learn）西方理論，一方面淘汰（unlearn）純粹是西方本位的理論；尤其，哪天我們拿得出學術業績，足以和西方學界共同「再學習」（relearn），那麼理論的創新便指日可待。經過這樣反覆切磋修訂，理論的概括力、包容性、解釋力必會大大提高。我必須強調：上面說的是「正反合三部曲」，必須永不歇止地唱，周而復始，止於至善，這才是打造「全球理論」的真諦。現象學提倡「詮釋社群」之間互為主觀的理解，無論在知識論和方法論上，正好為華人學界爭取「主體性」提供自主的空間，其精微的涵義猶待有識之士闡發。

我們處在世界傳播學術的邊緣，要像貓頭鷹一樣保持清醒：不但努力「知己」，且要努力「知彼」。千萬不能把華人文化圈本質化，更不能定於一尊。一方面，我們必須容許甚至鼓勵內部多元發展，和而不同，但合而觀之，的確提出一個與「西方」（必須再進一步分疏「西方」）有同有異的文化視野。另一方面，更要與世界一流的學術成果保持一種動態的交流，並轉化成為研究「最切身」問題的理論資源。最後，希望華人文化圈的學術社群聚合起來，不斷突破藩籬，為開拓世界傳播研究的邊界注入活力與創意。早年芝加哥學派內部雖有分歧，但合起來卻提供和哥倫比亞學派截然不同的視野。再如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取徑不同，文化研究內部還分各種支流，但合起來就和美國主流研究分庭抗禮。這就好比一首悅耳或雄渾的交響樂，是由高低不同的音符和音調組成的。掌握這樣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底蘊，才有跟人家對話的基礎。這是我心目中華人傳播學社群應該黽勉以赴的願景，是需要靠整個學術社群幾代人努力不懈的。

最後，我願意「夫子自道」，引用一段話以明志，兼亦總結本文的題旨（Lee, 2011: 834）：「我們研究中國傳媒，部分是因為我們受中華文化所薰陶，但這並非唯一的原因；也不是因為我們認同中華文化，只能研究中國傳媒。在知識上，研究中國傳媒不是自足的，不是孤立的，而必須與國際傳播、甚至整个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進展並駕齊驅，互相滲透。……我們最終希望建立的普遍性理論視野，一方面在問題意識和意義的解釋上具有中華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透過文化反思，汲取更寬廣的洞見，以瞭解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我們若能建立這種理論視野，容納內部差異，又有獨特的文化聲音，排除理論上的狹隘主義，我們就更能以開放的心靈與西方文獻平等對話，互相進步。」

## 參考書目

- 張詠、李金銓 (2008)。〈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 (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321-350。臺北，臺灣：政大出版社。
- Berelson, B. (1959).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 1-2.
- Berger, C. R., & Chaffee, S. H. (Eds.). (1987).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erger, C. R., Roloff, M. E., & Roskos-Ewoldsen, D. R. (Eds.). (2010). *The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Los Angeles, CA: Sage.
- Berger, P. L., & Kellner, H. (1981). *Sociology reinterpreted: An essay on method and vocation*. New York, NY: Anchor.
- Carey, J. W. (1997).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On the edge of the postmodern. In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228-260).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roteau, D., Hoynes, W., & Milan, S. (2012). *Media society: Industries, images, and audiences*. Los Angeles, CA: Sage.
- Czitrom, D. J. (1982).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rdt, H.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atz, E., & Lazarsfeld, P. F.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Lazarsfeld, P., Berelson, B. R., & Gaudet, H. (1948).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e, C.-C. (in press-a). Local experiences, cosmopolitan theories: On cultural relevanc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in press-b).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a new point of departure. In C.-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2011). Voices from Asia and beyond: Centr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urnalism Studies*, 12, 826-836.
-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 Paisley, W. (1984). Communic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sciences. In B. Dervin & M. J. Voigt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 5, pp. 1-43). Norwood, NJ: Ablex.
- Park, R. E. (1967).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ol, I. de sola, & Schramm, W. L. (Eds.). (1973).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 Rogers, E. M. (200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Schramm, W. L. (1981). What is a long time? In G. C. Wilhoit & H. de Bock (Eds.),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vol. 2, pp. 202-20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 C. Y. K. (1988). Citation patterns of cor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An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236-255.
- Tunstall, J. (1970). *Media sociology: A reader.*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Paradigms and Identit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Lee, Chin-Chuan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ive topics. First, it begins by elucidating the three layers of meaning in “communication”: the classical sense of “making common” among members of a community, transportation, and media. Second, it analyzes the failure in Schramm’s early attempt to establish a broad “communication science” as inspired by the “unified science movement,” thus revealing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media studies” as a field of inquiry. Third, the paper compares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Columbia School that informed early media studies in the U.S. and traces the trajectory of their respective influence. Fourth, the author criticizes media studies for its introversive tendency toward what Geertz calls a process of “involution,” as researchers pursue technical sophistication at the expense of conceptual innovation. Fifth, to correct the malaise, it argues for integrating “local experiences” with “global theories” in media studies.

**Keywords:** communication, media, academic paradigms, academic involution, indigenization & internationalization

## 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 關於研究方法的探討

王淑美\*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學者討論現代社會時間的加速、標準化、壓縮等特質時，經常將傳播科技放在核心位置。然而，有關傳播科技與時間經驗的實證研究非常少，仍處於初探階段。探討人們實際如何感受時間加速，亦即日常生活中行動和經驗的速度與壓縮，常見的研究方法包括量化取向的時間運用調查，質性取向的民族誌觀察、日記、深度訪談等，本文除了檢討這些方法的優缺點，也提出一研究設計實例，並反思執行的細節及可能的分析方向。

**關鍵詞：**傳播科技、時間、時間壓縮、研究方法、日常生活

---

\* Email: sw@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3 年 9 月 9 日  
接受日期：2013 年 11 月 6 日

## 壹、前言：關於時間的討論

利用鐘錶理性規劃時間是現代社會的特色，不同的個體為了能一起行動，必須預先安排時程，並且依照共同的時間標準來協調，社會才得以進行有效率的協作。隨著現代性的推展，社會時間已明顯從自然時間秩序中獨立出來，有另一套運行邏輯。

《更快一點：幾乎所有事物都加速》（*Faster: The Acceleration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是 Gleick (2000) 著作的書名，因為精準地描寫了當代現象被廣為引用。從 80 年代後期起，或許因為時空經驗改變的程度加劇，多位學者不約而同提出見解，並將此現象與資本主義及傳播科技的發展緊密連結。Harvey (1989: 147) 指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是「後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藉著衛星通訊與便宜交通，私人或公共的決策都可以立即傳送得更遠且更廣，這種彈性和行動力使得跨國分工成為可能，其影響性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電子通訊使整個空間像是『地球村』、整個地球像是經濟與生態互相依賴的『太空船』，……時區縮短至只剩當下……我們因而必須學習對應當代時間與空間世界壓倒性地壓縮」（同上引：240）。Harvey 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追求效率、縮短生產流程的需求，是促使傳播科技發展進而時空經驗改變的主因 (Scheuerman, 2001)。

其實，關於社會時間的討論，一直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緊密連結。從馬克斯（Karl Marx）視「時間」為最常被視為勞動的單位，社會的加速也被等同為資本主義進展帶來的工作擴增。Mumford (1934) 將資本主義對時間的規訓回溯至中古世紀僧侶的作息紀律，Thompson (1967) 指出隨著工業化的擴張，以時計酬的普遍化，資本主義的時間工作紀律也逐漸內化至勞動者的價值裡，並塑造了當代生活形態。Zerubavel (1976, 1982) 承接 Weber 認為時間理性化是資本主義基本精神的看法，考察世界時間的標準化與資本主義的擴張、交通工具的延伸有絕對關係。Thrift (1990) 也考據，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著分工細化，生產時程不斷縮短，時間紀律伴隨著學校等機構，已經內化成為現代人的時間韻律與生活方式。

除了 Harvey，不少學者約在相同時期也提出相近概念<sup>1</sup>。如 Giddens (1987: 398) 用「時空聚合」（time-space convergence）來傳達運輸與傳播科技對於時間

1 除了 Harvey 與 Giddens，多位學者也提出相似關注，如 Bauman (2000) 提出「加速」（speed-up）、「液態」（liquid）為晚期現代性的特徵，描繪人口、金錢、資訊、商品、影像等事物的流動共同建構出全球的「液態」網路。Castells (2010: 491) 指出，網際網路不僅擴大了「同時性」（simultaneity）、提供前所未有的立即性，且打破時間序列的線性關係，帶來「無時間性」（timeless time）。



與空間經驗的影響。他使用「高度現代性」(Giddens, 1991: 25) 來指涉 80 年代後的社會，並指出「越來越複雜交織的印刷媒體與電子傳播媒體科技發展」(同上引) 為其起源。他認為，大眾媒體是由現代性諸多條件共同創造出來的，媒體本身又加深了現代性的特質，且深刻地進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明顯地改變生活形態與作息，將各地發展不一的人們都帶入標準化的工作時程，向都會區集中的工作及生活形態，並加速且加劇了全球化。除了討論資本主義，Giddens 也將現代國家的權力施展視為影響因素之一，例如美國境內的郵政電話系統發展，使國內的時空聚合程度遠勝於國際 (Giddens, 1987)。

「時間就是金錢」是朗朗上口的定律，多數關於時間與社會的討論也特別著重於經濟因素，但 Scheurman (2001) 認為，科技帶來的同時性與瞬時性不應只從經濟面考量。例如古典政治學理論中認為理想的民主形態是小眾、代議式、長時辯論的審議民主，在當代科技條件下，更快速即時的政治辯論可能取代不必要的審議遲緩，公民可取得公開資訊並跨越時空橫向聯繫，直接民主似更有可為。因此，加速現象確實應與文化、社會等其它面向的影響一起考量。傳播科技如手機、電子郵件等，的確提供了橫向聯繫、細部協調等功能，只是在科技與社會共同演化的過程中，新的文化、標準、需求也一起衍生。

Rosa (2003) 也認為，西方社會為首的加速現象不應只有經濟因素，還有文化與結構面向：文化面向指的是現代社會的文化價值，追求「滿」的人生，也因此帶來生活腳步的加速；結構面向則是因為社會以政治、科學、經濟、法律等任務分工且高度複雜化，使得結構的更替更加快速並刺激了社會變遷。Rosa 提出三個分析層次來討論西方社會的「加速」現象：第一是科技加速 (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交通與傳播科技的加速縮短旅遊傳播時間都歸此類。第二是社會變遷加速 (acceleration of social change)，相對於第一類是社會內元素的加速，第二類則是社會本身的加速，包括各種美學、政治、規範、科學或認知，亦即文化與結構等各面向的更替。第三是生活步調加速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指的是日常生活中行動和經驗的速度與壓縮，以及明顯的時間壓力。

Rosa 提出，常見的解讀認為是資本主義與科技的發展，帶來社會整體與時間經驗的加速，也就是把第一種與第三種加速相連結。但若第一種加速帶來傳播與運輸的省時，應該會帶來空閒時間的增加，何以反而導致匆忙的經驗？例如 Rifkin (1987: 19) 寫道：「現代世界的高效率運輸、瞬時時間、省時科技應該讓我們從時鐘的支配中解放出來，讓我們有更多的休閒。然而時間好像永遠不夠。我們有的時間是被切成碎片，每塊都填滿了前置約定和計劃。」在臺灣，行政院

主計處 (2005) 時間運用調查也發現，當一天結束時，臺灣 15 歲及以上人口有 20.59% 自覺「總是」或「經常」無法完成預先想要做的事情；有 23.34% 自覺「總是」或「經常」沒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家人或朋友；有 24.64% 自覺「總是」或「經常」有時間的壓力，其中約 1/3 的 15-44 歲受訪者認為常有時間壓力。

Wajcman (2008) 批評，學界關於時間的理論雖多，但如何將時間的抽象理論聯結到真實生活經驗需要更多實證研究。Rosa 將加速現象概念化，並提出有助於實證研究的區分，他建議欲研究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的關係，應從第三種加速，也就是生活步調的改變切入，可從主觀和客觀面檢驗「生活步調」：主觀面是瞭解個人對於時間的經驗，包括時間壓力、感覺緊張等，客觀面則是從實際的時間配置，以及行動的壓縮或多工來測量。

Shove (2002) 指出，人們求助於資訊傳播科技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來解決時空問題，但每人都使用科技的結果，也使得個人的時間更加瑣碎，互相協調難上加難。這種動態的互動過程，逐漸改變並重新定義了「常態」生活。這個「常態」反映出社會認可的價值、義務、尋常與不尋常、以及社會的秩序。本研究著眼於 Rosa 提出的第三種加速，也就是生活步調的加速，並且特別關注研究方法的探討。若能從日常生活使用 ICTs 的經驗，瞭解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的關聯性，我們得以一窺加速邏輯下的新常態生活，以及所其反映的社會意義。

## 貳、傳播科技與日常生活

Snow (1987) 指出，媒體透過三種方式，形塑了個人與社會每天的韻律與節奏：一、使用媒體並維繫規律的行為，每天行動韻律與節奏是透過與媒體間有計畫且規律的互動來組成與標明的。二、媒體退入背景，卻是維繫韻律與節奏的依據。三、將媒體的韻律內化至日常活動當中而不自覺。Snow 給實證研究的啟發在於，欲討論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的關聯，應該直接切入日常生活中使用媒體與其他傳播科技的種種細節，包括有意識與無意識的舉動。不少前人研究也與 Snow 的看法相呼應，如 Hobson 研究電視節目在特定時段播出，成為人們日常的習慣與例行公事之一，與其他活動相交融與協調，形成一種「時間帶」(time band) (Hobson, 1982: 115)，但各家庭都因其特定的情境與媒體科技協調出不同的時間韻律。Moore (2000) 研究 BBC 廣播節目與英國家庭生活作息交互影響，使得皇室、宗教與國家的韻律都內化成韻律與價值的一部分。這些都呼應了第一種關係。

Bausinger 重視媒體的儀式性意義。人們常常不經意地選擇適當媒體作為維繫韻律，例如洗車、園藝、用餐的時候都可能聽著廣播或開著電視，即使並未專注於媒體的內容，還是習慣其陪伴。例如某些人一回家就打開電視，未必認真看其內容 (Bausinger, 1984)；有人在下午茶休息時間一定打開廣播，廣播內容並不重要，但是讓下午茶時間更加有趣 (Silverstone, Hirsch, & Morley, 1992)。這些都與第二種形塑有關。Bausinger 認為，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只用一種媒體，而是多種媒體交互使用。

發表於 1987 年，Snow 的指涉對象以雜誌、廣播、電視等媒體科技為主，但關於媒體韻律內化至日常生活的現象，在電腦時代可能更加明顯。例如 Rifkin (1987) 指出，電腦時代來臨使西方文明對效率的追求達到新高峰。電腦科技並改變了我們對時間的概念，也改變了思考自我與周遭世界的面向。網際網路伺服器永遠開機，隨時隨地可以近用，任何時間都可交易，卻也使人們的工作時間無限延長至每天廿四小時，打亂工作與休閒的界線 (Lee & Liebenau, 2000)。正如 Negroponte (1995: 195) 傳神地描寫：「電子郵件是一種衝擊我們工作與思考的生活方式，特別是改變了工作和遊戲的韻律。朝九晚五、周間五天工作而周末兩天休息的周期變了，工作和私人的訊息混雜，周日也變得跟周一沒什麼兩樣。」因此，在當代跨媒體、跨載具的時代，討論傳播科技對時間經驗的影響更具有挑戰性。正如 Tomlinson (2007: 102) 所言，手機成為新式「終端機」(terminals) 的發展，正是為了與人們生活日益增加的移動性相結合。

瞭解日常生活中各種傳播科技交織使用的情形，這些實踐與生活韻律的關聯為何，是研究科技與生活韻律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常見方法包括電腦記錄檔分析、時間運用記錄、以及調查法等。使用電腦記錄檔分析，可以精確掌握在電腦上的活動時間，例如用臉書同時又上了哪些新聞網站、看影片，但無法瞭解除了電腦以外的傳播科技交替使用的情形，也無法瞭解人們如何經驗或感受忙碌。行政院主計處不定期進行時間運用調查，其研究方法是請受訪者自述或記錄一天廿四小時各種活動的時數。以網際網路使用為例，這類調查可整理出網路經常使用者的人口學粗貌，但有三大限制：一、未考慮網際網路本身是多種科技的複合體，「上網」一詞包含搜尋、瀏覽、聽音樂、看網路電視等等多樣化的活動。二、使用網際網路時經常是一心多用，例如一邊上網、一邊看電視、一邊講電話，因此回報的時間數未能反映出真正的網路使用時間。三、無法瞭解網路使用與生活中其他活動交織的情況。

又如美國時間運用調查學者 Robinson 從 1965 年起在大型調查中問：即使只是做一些該做的事，你是否總覺得／偶爾／或從不覺得匆忙？18-64 歲受訪者回答感覺總匆忙的比例從 1965 年的 24% 上升至 1992 年的 32%。許多調查也發現，人們覺得休閒時間變少，並指出美國人花越來越多時間在工作上。這屬於受訪者對於時間經驗的主觀認知，但實際上工業國家的工作時間並未明顯增加，Robinson & Godbey (1997) 發現，1965-1995 年間美國人一邊抱怨越來越匆忙，實際上休閒時間是增加的。

也有人認為忙碌的感受是因為雙薪家庭增加，兩性都投入職場後，面對工作與家庭的責任，因此感到時間稀少、生活匆忙。但實際調查發現，兩性投入工作的時數其實並沒有太大差異，因此時間的匱乏感受並不只在於實際投入的時間「數量」。因此，對於時間匱乏、匆忙的感受，除了涉及時間的量以外，還須考慮時間的質。時間的質難以用量化方法探討，因此仍以質性方法為主流。已知文獻多採取觀察法、記錄法與訪談法等方式。

- 一、訪談法：Southerton 作了一系列跟時間運用有關的研究，雖不針對資訊傳播科技的影響，但討論忙碌感受的成因。例如 Southerton (2007) 訪問英國 Bristol 郊區的廿個家庭，包括單身、夫妻、有與沒有小孩等成員組合，年齡介於 25-65 歲間，包括雙薪、專業與退休人士，約訪的方式是在最貴與最窮的街上投遞信件，徵求訪談的對象。訪問題目包括「是否覺得社會整體來說比過去壓力更大」，「是否覺得時間壓力大」，「上週是否有覺得時間壓力大的時候，情況為何」，「請描述平常如何安排時間」。在該研究中，受訪者指出難以協調的困難也是感覺忙亂的主因，而他們因應的策略包括：固定家庭的慣例，列出任務清單、排出優先順序，與家人分享日記或行程表等。
- 二、觀察法：可以回溯到 1980 年代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進行家戶內傳播科技的使用研究，由研究者到受訪家庭內觀察並記錄。此類的研究優勢在於可瞭解傳播科技在日常生活情境下交替使用的情形，也可理解受訪者的想法與感受，但限制在於外人進入家庭內扮演的角色，一來觀察者難以 24 小時持續觀察受訪家庭各成員的生活，受訪家庭成員也難以在外來觀察者的凝視下自在活動。
- 三、日記法：Gauntlett & Hill (1999) 在 1991-1996 間蒐集 427 位英國人記錄自己每天收看電視的生活細節。這由一個大型研究計畫的經費支持，其問題在於跨時長、退出率很高，難以要求每位記錄者都持之以恆如實地長期記錄。

這些方法經常在實證研究中被綜合運用。如 Frissen (2000) 在荷蘭的研究，訪問了七個有小孩的雙薪家庭，以及一個有小孩的單親家庭，家長多為高等教育程度的受薪者。訪談對象包括所有家長，每次歷時約一個半至兩個小時，所有的對話都打成逐字稿並透過紮根方法來分析。他們發現，當描述與科技的關係時，女性常常說自己「不是那麼科技的人」。文中引用一對夫婦的對話，丈夫說「像今天假日我就想在家休息一下讀讀報」，太太則說「我就沒有那個時間」、「我要打掃、整理花園、洗衣，做這做那的。」傳播科技在生活中的確提供了彈性和更高的掌握，例如「誰先去接小孩就用手機聯絡一下」，不過也因為媒體科技就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受訪者很難清楚表達科技與傳播需求的關聯。

Nansen, Arnold, Gibbs, & Davis (2009) 記錄澳洲墨爾本地區五個典型家庭。此處是指父母與小孩住在墨爾本市郊有房子的家庭。研究者交給他們自我記錄的一套工具內包括：可標明來源和目的地圖，可記錄科技的使用者與頻率的彩色標籤，用來隨手拍下日常使用科技情況的照相機，每位成員一本日記及一本隨手記事與繪圖的素描本。為期三年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資訊傳播科技的情形，他們所發現的現象在傳播科技普及之富裕社會可能極為普遍：生活中無時無刻有多種媒體科技同時且持續地傳遞內容，人們對工作時間的延長感到挫折，卻又慣性地需求這些科技。本文的研究設計也嘗試綜合觀察法與日記法。細節在研究方法的部分說明。

## 參、ICTs、家庭與女性時間

Lewis & Weigert (1981) 提出現代社會時間的三大特質：鑲嵌性 (embeddedness)、階層性 (stratification) 與同步性 (synchronicity)。時間的鑲嵌性表現在人的壽命、事業、機構的時間表和個人計畫等等各種世俗活動上。因為每個人都同時屬於多個社會團體，時間通常是極複雜的劃分與交集。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將工作帶入家庭是把外來的「時間政權」(temporal regime) (Kaufman-Scarborough, 2006) 移入家中，因此個人必須整合、協商工作節奏於家庭生活之中。她發現，當前工作與家庭的界線已經模糊化。之前研究指出，ICTs 使得個人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更多了，在家工作不僅迴避了家務需要的時間、也使得個人的休息時間減少。但 Kaufman-Scarborough (2006) 發現，同樣須兼顧工作與家庭的責任，或是在家處理工作，兩性的感受卻有明顯差異。

ICTs 能轉化空間的意義，卻難以扭轉兩性在家庭的角色。Osnowitz (2005) 訪問美國居家工作者（包括作家、編輯、程式設計等）的工作歷程、每天生活、工作與家庭工作的分配策略，以及對在家工作的看法等，其中女性還是傾向負擔起多數家務，並且為了照顧小孩使得工作時間零碎化。女性必須應付更多的性別期待，因家務為其自然的責任，專業工作的部分常被忽略。相對的，男性居家工作者就可以安心在家工作，不易因為家務而分心。Forsberg (2009) 對於瑞典雙薪家庭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結果。這些研究顯示，兩性在家務分工的地位仍不同，女性感受比男性更多的責任與時間壓力。

Southerton & Tomlinson (2005) 比較 1985 與 1992 年兩波英國健康與生活形態調查 (Health and Lifestyle Survey, HALS) 資料，七年之間回答「感受到時間壓力」的受訪者明顯增加。與人口背景資料比對，又發現性別是最顯著相關的因素：相同職業的兩性之間，女性總傾向感受到更高的時間壓力。由於女人須兼顧家庭責任，配合小孩的作息，女性對於生活步調加速的感受也更加明顯 (Southerton 2007, 2009)。尤其職業婦女，必須在家庭、公司、孩子學校之間穿梭，趕每個組織的時間點，過著像是有十八般武藝的「雜耍型生活」(juggling lifestyle) (Thompson, 1996)。

針對時間壓力，Southerton & Tomlinson (2005) 提出三種有用的區分。第一是實質沒時間，肇因於需要完成任務的時間「量」不足；第二是時間失序，因為彈性工時、作息各異，與他人協調困難；第三種是時間密度太高，有限時間內要做太多事情，以至需要多工並進或一心多用。換言之，三種造成時間壓力的類型分別是沒時間、沒共同時間、以及忙碌時間。但是如果與廿世紀初相比，當前的整體工作時間並未比過去增加，但緊張和焦慮的情緒不減。因此更可能造成忙亂的因素是後二者。Bittman & Wajcman (2000) 檢視 OECD 國家女性休閒時間，發現女性的休閒經常是零碎的，必須在照顧孩子及許多其他無償工作之間斷斷續續地進行，男性在家裡經常得有一整塊完整的休閒時間。對照 Southerton & Tomlinson 的研究，缺少完整的休閒時間，可能是「時間不夠」的焦慮來源。

Couclelis (2004) 提出網路使行動零碎化 (fragmentation of activities) 的概念：ICTs 容許人們將行動拆解至不同的時空中進行。最常見的例子是購物，原本上街購物的行動可拆成多次上網查價比價、手機與朋友確認款式、下單、然後等候快遞，這些零碎化的動作可以分時、分地進行。延續零碎化的概念，Hubers, Schwanen, & Dijst (2008) 分析荷蘭都會區購物者使用 ICT 與行動零碎化的關係，卻發現非科技因素影響比起是否使用科技來得高，例如養育幼兒的家庭休閒活動

最零碎。Schwanen, Dijst, & Kwan (2008) 認為這樣的研究結果並不令人驚訝，因為科技本來就是與其它因素，例如社會規範、人的生命歷程等等，一起成為影響生活中活動的力量。

Jarvis (2005) 認為，多數關於加速社會、時間緊迫的文獻都歸因到資本主義對於工作時間的要求，以及傳播科技使得時間感加速。但其實時間韻律在各地可能不同，實際上人們的生活中有許多結構性的條件（materially embedded infrastructure）影響了時間的感受，研究者應該實際去瞭解人們的生活情況，也就是加速經驗的情境因素。他選擇在倫敦中央地區和外圍的城市進行 20 個訪談，這些家庭有共同點：異性雙親家庭、有小孩、幾乎雙親都在工作，但工作時間、次數和職業有多元性。受訪者關注於生活中的難題，包括住的負擔、照護幼兒的人力、交通阻礙和學校選擇等等。

上述與時間感受、科技與家庭相關的研究都指出兩個重點：一、女性因家務分工，似比男性更易感受到時間壓力；二、討論傳播科技與時間感受的關聯，應瞭解在日常生活中科技與其他活動交織的情形，因為傳播科技並非影響生活韻律的單一原因。

## 肆、研究設計

受上小節文獻的啟發，本文從女性的角度來探討生活韻律，並且將傳播科技放在日常生活的脈絡下來進行研究。本研究採取多種方法探討網際網路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與時間韻律的關聯性。第一階段先招募年齡介於 18-25 歲的女大學生或研究生擔任受訪者兼訪員。受訪者先經過初步面談，瞭解其家庭成員、居住地點及家中是否使用網路，以及暑假能否至少與媽媽共住一週。由於女性在臺灣常被賦予不善使用科技的刻板印象，聚焦在女性使用者可望一探此現象。

訓練訪員時，我們先分批為受訪者講解記錄的方法，先以自己與室友為對象試作記錄，寒暑假時再記錄自己跟媽媽的生活。受訪者不僅需記錄自己的作息與使用網路的時機、場合等，也需記錄家中其他成員使用傳播科技的情況與生活作息，並順手拍下使用傳播科技的照片。記錄的主題不限於某一種傳播科技，因為我們認為傳播科技在日常生活中是交互使用，且與其他活動密切交織。若只側重特定科技，恐有見樹不見林之慮。訪員記錄期間需長達一週，至少需完成自己與母親平日、假日各兩份記錄，一共八份。此設計避免了陌生觀察員在家的尷尬，由於記錄者受過訓練，可提高回收資料的品質。

訪員除了做文字的記錄，還需填作息表格。此表格乃從 BBC Daily Life 調查的表格簡化而來，側重日常網路與手機的使用，並容許記錄者新增項目。BBC Daily Life 是針對成年女性、男性、4 歲以上未成年人設計不同的表格。以 2002、2003 年調查為例，5,212 份回收資料中七成來自 PDA 記錄資料，其餘來自傳統紙本，表格為 24 小時制、每 30 分鐘劃一欄位。有鑑於本研究目的不在量化統計出大眾的普遍作息，且 BBC 所設計的活動項目也不適合臺灣，因此大幅地簡化並改造其內容。

日常生活記錄表格（附錄一）是由研究者與多位研究助理共同試作、討論而後定案。三位研究助理為受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的碩士生，他們試著記錄由研究者草擬的記錄表，指出可能有的疑問、難以歸類之處，再予以修正。另外，記錄表不限定某種傳播科技，也包含其他活動，以期探討生活中活動相互交織的情形。橫向欄位為時間欄，從早上七點到隔天早上六點；縱向欄位為活動欄，分 ICT 媒體與工作、休閒、通訊、家中活動、運動、外出活動等六大項，除了所列細項外，每一大項都附有「其他」欄，方便記錄者說明。

## 伍、研究反思

此研究獲得大量的實證資料，包括日常生活記錄表、日常生活記錄及照片等三大部分。在此小節，研究者將針對此研究方法提出反思。

### 一、徵選訪員

研究者先透過任教單位的公告系統徵求訪員。公告中寫明：「需要徵求 18-25 歲之間的女學生擔任觀察員，記錄自己與母親的日常生活，幫助我們瞭解當代社會中，女性與資訊傳播科技的關係。」我們原先認為學生們就讀同一所大學方便集體訓練，暑假時學生回到各自家鄉，如此得到的生活經驗就不僅限於特定都市與校園。

然而，可能因為徵求途徑、主題、數位落差等關係，多數應徵的訪員都來自臺灣西部都會區中上家庭，於是又循管道請師長介紹藍領背景或家居東部的原住民學生協助。徵求報名表中，除了要求訪員填上個人聯絡資料，也包括父母親年齡、職業、學歷及家庭經濟情況等欄位（附錄二）。統計收到的 30 份報名表中，8 位住在臺北市，13 位自認家庭經濟情況從是「低收入」「普通」「小康」到「富裕」中的「小康」。母親年齡最輕者為 43 歲，最年長者 61 歲，約八成集中在 45-53 歲之間。有填母親學歷者分布情形如下表 1：



學歷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博士
人數	1	9	8	7	2

表 1：記錄者母親學歷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避免資料過度集中於都會中產階級，再透過師長尋找認識的學生來擔任記錄者，特別是藍領背景或是臺灣東部的原住民家庭，以期使資料能夠反應更多元社經與文化族群的經驗。但是有些訪員回家跟媽媽解釋這份工讀的目的及內容時，就發現這份表格的內容難以描述被記錄者的生活，「這是適合都市上班族的、這些活動跟我的生活都沒關係」。

這也凸顯了研究的限制，其一，關於傳播科技無所不在的印象，是否過度集中某些族群。Couldry (2005) 曾整理三種關於社會對於媒體的想像：一是「功能論」，認為媒體存在於社會上有許多功能，例如可以促進公共溝通、穩定社會秩序等。二是「中心論」，認為媒體是討論社會現象的中心，當代人們的生活也是以媒體為中心。第三是「懷疑論」，認為媒體無端攪亂社會活動。他認為這三種都過度假設，研究應該回到個人如何選擇媒體、媒體如何與生活中其他活動關聯，也就是回歸到媒體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當研究者將視角完全集中在媒體身上，容易忽略其他面向，誇大了媒體的重要性，例如衍生出媒體科技進展帶領生活步調的歸因。在我們進行研究前，可能也過度聚焦在網路與手機上，將之視為現代生活必需品。

其二，承襲英國文化研究傳統，Silverstone 的馴化理論強調，同樣一種科技在不同社會、個人會有不同用法，即使是同一人在不同生命階段、使用情境下，也有不同用法。我們一方面不希望資料來源過度集中於都會區中產家庭，但是也發現所設計表格未必適用於非都會區使用者。這樣的限制可能需再細分不同的生活形態，設計出相符活動的表格，以更多的實證研究來彌補缺憾。

其三，由於資料包括訪員自我日記及觀察媽媽記錄兩部分，可以發現兩者有明顯差異。自我記錄的部分包括更多細節、當下心情及感想等等，觀察媽媽的部分相對簡略許多。有些訪員請媽媽轉述，例如媽媽去上班時的情況，在下班回家後再陳述給女兒；也有些訪員因為跟媽媽一起活動的時間很長，便把日記與觀察記錄寫在一起，變得難以區分。而本研究設計是希望不要干擾到受訪對象的自然作息，但也有訪員寫道：「媽媽知道這是最後一份記錄，很高興地說終於解脫了」。可見觀察研究要完全不介入平常生活是非常困難，只能勉力為之，而日後研究若能加入深度訪談的部分，或可補足女兒對母親記錄不周的缺憾。

## 二、時間記錄

Ellegård & Cooper (2004) 指出，每日生活看起來非常簡單且每人都有經驗，但是當學者想要從某個角度進行有系統地探索時，卻發現日常生活的複雜性難以處理。個人、家庭和社會經濟群體在興趣和活動類型上的差異超級巨大。因此許多嘗試分析的方式，最後都流於過度簡化。

這也是所有時間運用研究所遇到的難題。在文獻中提到，過去時間運用資料被批評為過於簡化，無法窺得日常生活的全貌，尤其若研究焦點聚於特定媒體科技上時，便無法理解該科技在生活中的位置，以及與其他活動的相互關係。但是擴大視角可能會使得資料過於雜亂而難以分析，例如在本研究收集到的日常生活記錄表中，包含 ICTs 使用，以及生活中的其他活動，照片及示意圖呈現家庭中使用科技的空間分布，觀察日記則有使用的細節和心得，提供使用的脈絡。如何將這些資料有系統地分析是一大挑戰。

Lauer (1981: 28-35) 提出五個有用概念來探討工作場合的時間條理：韻律（或週期性）、節奏、同步（時機）、歷時與順序（*rhythm or periodicity, tempo, synchronicity or timing, duration and sequence*）。Fine (1990) 以餐廳為實例來衍伸：韻律指的是行動週期性，例如餐廳工作以用餐時間最忙；節奏討論行動速度的快慢；時機是看相互協調以同時進行，例如這程序與哪個並行最適宜；歷時指的是完成某行動需時長短，例如完成烹飪菜餚的時間；順序則討論適當的先後秩序。

若把上述時間概念運用到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的主題中，我們可試著從實證資料挖掘以下問題：

- （一）韻律：使用傳播科技的韻律週期，例如，工作日、假日的使用方式是否有差別？什麼時候是使用的尖峰時間？
- （二）節奏：使用傳播科技的節奏感是否有差異？如：同樣是聯繫管道，發 email 或網上留言可能都比不上打手機迅速。等待電視播出某則新聞，跟上網直接搜尋，其節奏感也有所不同。
- （三）同步：使用傳播科技時通常與哪些行動一起發生？例如資料中顯示工作、家事時伴隨著廣播，用餐時開著電視，邊上網邊與人聊天也是常見的情形。而且使用者經常同時使用多種科技。
- （四）歷時：不同科技的歷時性為何？例如手機簡訊每傳一通費時很短，但使用者可能花好幾個小時專注在與朋友間的簡訊往返。
- （五）順序：傳播科技的使用通常是整合實踐，是否能從資料中拆解實踐細節中的先後順序？

本研究中的日常生活記錄表並未著眼於很精確的時間記錄，但從中確實可以獲取使用傳播科技與時間之韻律、節奏、同步、歷時與順序的線索。佐以日記資料，便可更進一步瞭解使用內容與使用者的心情、環境、個人背景、家人互動等重要情境因素的關係。

例如從訪員日記中發現，由於暑假中對學生而言並無假日與工作日的差別，使用傳播科技的韻律跟周間或周末關係不大，但跟當日是否外出活動有關。通常獨處、用餐的時候，同步多工的情況也越明顯，工作、娛樂與通訊活動同時進行，每項活動歷時不久，但可能一整天都是掛在網路上。多位訪員們的一天是在手機鬧鈴中開始，隨後打開電腦，查信箱、看臉書、掃描入口網站的新聞標題，邊看邊吃早餐，許多時候打開網頁的順序也有既定流程，形成生活中的慣例。從日記中對不同媒體科技的描述，也區分出科技節奏的差異，例如報紙新聞的節奏可能比網路還快：

覺得報紙跟網路新聞的不同是，網路新聞雖具有快速更新的特點，但網頁通常有廣告，版面看起來感覺比較雜亂。因此還是喜歡先看報紙、瀏覽大事，上網無聊時再看網路新聞。我都是在吃早餐時一邊閱讀報紙一邊與家人討論時事，會與媽媽一起聊娛樂版（編號 24 訪員記錄）。

記錄中的媽媽們很少透露出自己「很忙」或覺得「有壓力」，但是可看出媽媽與傳播科技的互動是在家事、接送家人及工作的空檔進行。例如一份訪員（編號 10）的記錄中描述，媽媽五點起床後與爸爸去作運動，之後開始瑣碎的家事，邊看股市節目邊吃早餐，載哥哥去補習順便去上班，擔任兼職清潔工。中午返家，午餐邊看電視，卻是被收曬衣服的動作屢次打斷。晚餐全家一起看電視的時間，媽媽則是忙著煮菜、洗碗、切水果，最後才邊拖地邊看電視的方式參與討論劇情。由於媽媽可能不會透露自己的心情，研究者需要更仔細詮釋資料才能理解其生活情境。

### 三、數位落差

時間是文化的，時間感受因生命階段、社會角色等有所差異，除此外，傳播科技對於生活韻律的影響還須考量物質條件，畢竟舉凡廣播、電視、網路、手機等，背後涉及複雜的支援系統。Silverstone (2005) 認為傳播科技構連私人與公

共領域，能藉著科技納入現代社會能獲得更多機會，若無法透過傳播科技參與網絡，可能形成社會排除。從所蒐集的實證資料中，還可朝以下方向來思考數位落差問題：

- (一) 地理：約 1/3 訪員來自臺北市家庭，這些訪員在居家、通勤、上學時，都處於高密度的無線網路服務中。其他來自非大臺北都會區，包括位於西部都市、鄉鎮及東部如宜蘭、臺東等地的家庭，其傳播科技與時間韻律的關係，理應受到城鄉科技條件與生活型態差異的影響，研究者可試圖從實證資料中比對。
- (二) 階級：從日記中可以瞭解訪員家庭中成員的生活作息，互動關係，從照片中可以瞭解科技的空間分布，由誰使用，以及被賦予的任務。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生活風格與品味區辨研究中，階級是分析消費與實踐的關鍵。生活韻律與職業、階級也密切相關，研究者可從經濟面向切入，瞭解階級因素之於傳播科技使用的影響，包含使用者對於科技之物質與象徵意義的詮釋。
- (三) 世代：研究設計邀請女兒觀察他們的母親，即著眼在世代比較。從資料中可以看出學生與主婦／職業婦女的生活情況不同，使用傳播科技的習慣與韻律也有差異，年齡與科技技能是關鍵影響因素，但也有不少精於使用傳播科技的母親。

從所搜集的記錄中，可以發現很多時候女兒對於母親的低網路技能感到不耐，認為怎麼解釋媽媽還是不懂。但也有些訪員呈現出跟刻板印象不同的記錄，如網路技能未必受限於學歷、城鄉差距、職業階級，住在臺灣東部、中學學歷的母親，因為擅長使用臉書，樂於聽女兒喜愛的 YouTube 音樂、一起觀賞網路的連續劇，不僅親子關係親密，也成為女兒眼中很酷又能幹的典範。從此也可瞭解，欲縮短數位落差應不是開設文書處理等電腦技能班，而是從生活中提升數位資訊技能。

## 陸、小結

如前所述，學界關於時間與科技的討論非常豐富，尤其對於當代社會所運用的科技，是否導致生活風貌與過去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吸引了各種論述。理論家們嘗試描述新科技的特質，並擴及現象面的分類與概念化。不過，也因為時間難以捉摸的特質，理論雖多、實證研究卻非常稀少。

在 Rosa 所提的三個社會加速層次中，生活步調加速，包括日常生活中行動與經驗速度與壓縮，是實證研究可切入的角度。他建議從主觀與客觀面檢驗生活步調，主觀面是指個人對時間的認知與經驗，客觀面則是從時間配置、行動壓縮與多工來討論。換句話說，實證研究或可探討感覺忙碌，與時間的配置、行動時間擠壓、以及需同時從事多種活動是相關的，而這些現象與科技的關係為何？亙古的因果難題為：究竟是電腦、網路、手機等新傳播科技使多工環境成為常態？或者，片段、零碎、一心多用原本就是人們生活的實況，傳播科技更貼近服務這樣的需求？

本文聚焦於研究方法的探討。關於時間運用的量化研究，包括電腦記錄、時間運用調查等，或可從大規模資料彙整出現象，但難以深入瞭解背後的原因，也難以理解使用傳播科技時多重並用，以及與其他活動交織的情形。至於質性研究方法，則以深度訪談、觀察法與日記法最為常見，其優點是可挖掘出使用者與傳播科技互動的具體細節，但是因為個別差異極大，難以擴大推論。

綜合量與質性研究方法的優缺點，本文嘗試提出一整合的研究設計，招募訓練訪員，由訪員記錄自己並觀察母親在日常生活中與傳播科技的互動。在招募方式、主題的限制下，所徵選的訪員可能會有偏向都會中產階級家庭的情況，因為傳播科技在社會中的使用原本就不是均質地分布。這也意味著需要進行更多的小規模質性研究，才可能瞭解不同年齡、族群、職業背景、地理分布與主觀偏好的使用者的時間韻律與傳播科技使用經驗。本文也指出，藉由時間記錄表，可嘗試將傳播科技使用與時間概念結合，試圖掌握科技使用與時間的韻律、節奏、同步、歷時與順序的關係。並從地理、階級、世代差異切入，理解數位落差與生活韻律的關聯性。

傳播科技介入生活以及時間壓力的感受是普遍的經驗，但傳播科技與時間經驗的實證仍少，以量化大型調查難以得知經驗的細節，以質化觀察記錄則有對象的數量限制，並且難以做跨世代的資料比對。進一步而言，欲瞭解當代的時間感受又與之前世代有何差異，與傳播科技演變的密切關係為何，在研究方法領域仍是待探索的課題。

## 參考書目

- 行政院主計處 (2005)。〈93 年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對時間的認知與感受〉。  
取自 [http://win.dgbas.gov.tw/dgbas03/ca/society/time-93/02\\_lib\\_01.htm](http://win.dgbas.gov.tw/dgbas03/ca/society/time-93/02_lib_01.htm)
-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ausinger, H. (1984). Media, technology and daily lif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6, 343-351.
- Bittman, M., & Wajcman, J. (2000). The rush hour: The character of leisure time and gender equity. *Social Forces*, 79, 165-189.
- Castells, M.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Couclelis, H. (2004). Pizza over the Internet: E-commerce, the fragmentation of activity and the tyranny of the region.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16, 41-54.
- Couldry, N. (2005). Transvaluing media studies: Or, beyond the myth of the mediated centre. In J. Curran & D. Morley (Ed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 (pp. 177-197). London, UK: Routledge.
- Ellegård, K., & Cooper, M. (2004). Complexity in daily life -- A 3D-visualization showing activity patterns in their contexts. *Electron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ime Use Research*, 1(1), 37-59.
- Fine, G. A. (1990). Organizational time: Temporal demands and the experience of work in restaurant kitchens. *Social Forces*, 69, 95-114.
- Forsberg, L. (2009). Managing time and childcare in dual-earner families: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of household strategies. *Acta Sociologica*, 52, 162-175.
- Frissen, V. A. J. (2000). ICTs in the rush hour of lif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6, 65-75.
- Gauntlett, D., & Hill, A. (1999). *TV living: Television,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Routledge.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UK: Polity.
- Gleick, J. (2000). *Faster: The acceleration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UK: Blackwell.
- Hobson, D. (1982). *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UK: Methuen.
- Hubers, C., Schwanen, T., & Dijst, M. (2008). Ict and temporal fragmentation of activiti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nitial empirical finding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9, 528-546.
- Jarvis, H. (2005). Moving to London time: Household co-ordination 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Time & Society*, 14, 133-154.
- Kaufman-Scarborough, C. (2006). Time use an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Examining workspaces in the home. *Time & Society*, 15, 57-80.
- Lauer, R. H. (1981). *Temporal man: The meaning and uses of social time*. New York, NY: Praeger.
- Lee, H., & Liebenau, J. (2000). Time and the internet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ime & Society*, 9, 43-56.
- Lewis, J. D., & Weigert, A. J. (1981).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 *Social Forces*, 60, 432-462.
- Moores, S. (2000).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society*.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Nansen, B., Arnold, M., Gibbs, M. R., & Davis, H. (2009). Domestic orchestration: Rhythms in the mediated home. *Time & Society*, 18, 181-207.
-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Osnowitz, D. (2005). Managing time in domestic space: Home-based contractors and household work. *Gender & Society*, 19, 83-103.
- Rifkin, J. (1987). *Time wars: 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New York, NY: Touchstone.
- Robinson, J., & Godbey, G. (1997).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osa, H. (2003). Social acceleration: Ethic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desynchronized high-speed society. *Constellations*, 10, 3-33.
- Scheuerman, W. E. (2001).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empire of speed. *Polity*, 34, 41-67.

- Schwanen, T., Dijst, M., & Kwan, M.-P. (2008). ICTs and the decoupling of everyday activities, space and time: Introduction.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9, 519-527.
- Shove, E. (2002, October). *Rushing around: Coordination,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SRC Mobile Network Meeting, London, UK.
- Silverstone, R. (2005). Introduction. In R. Silverstone (Ed.), *Media, 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 in Europe: From information to communication* (pp. 1-18). Hants, UK: Ashgate.
- Silverstone, R., Hirsch, E., & Morley, D. (1992).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In R. Silverstone & E. Hirsch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pp. 15-31). London, UK: Routledge.
- Snow, R. P. (1987). Interaction with mass media: The importance of rhythm and tempo.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5, 225-237.
- Southerton, D. (2009). Re-ordering temporal rhythms: Coordinating daily practices in the UK in the 1937 and 2000. In E. Shove, F. Trentmann, & R. Wilk (Eds.), *Time,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pp. 49-66). New York, NY: Berg.
- (2007). Time pressure, technology and gender: The conditioning of temporal experiences in the UK. *Equal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26, 113-128.
- Southerton, D., & Tomlinson, M. (2005). 'Pressed for tim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a 'time squeez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3, 215-239.
- Thompson, C. J. (1996). Caring consumers: Gendered consumption meanings and the juggling lifestyl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2, 388-407.
-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38(1), 56-97.
- Thrift, N. (1990). The making of a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In J. Hassard (Ed.), *The sociology of time* (pp. 105-129).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Tomlinson, J. (2007). *The culture of speed: The coming of immediacy*. London, UK: Sage.
- Wajcman, J. (2008). Life in the fast lane?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and tim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9, 59-77.
- Zerubavel, E. (1982).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ime: A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1-23.
- (1976). Timetables and scheduling: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ime. *Sociological Inquiry*, 46, 87-94.



## 附錄一：日常生活記錄表

日常生活記錄表

編號 \_\_\_\_\_

此表為 ( 歲 / ) 於 101 年 月 日 星期 的紀錄。 [如：此表為爸爸(65 歲/已退休)於 100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的紀錄]

本日為： 休閒日  工作日  備註：\_\_\_\_\_

時間 活動	7 時	8 時	9 時	10 時	11 時	12 時	13 時	14 時	15 時	16 時	17 時	18 時	19 時	20 時	21 時	22 時	23 時	24 時	1 時	2 時	3 時	4 時	5 時	6 時
<b>ICT 媒體與工作</b>																								
上網查資料																								
文書處理																								
寫 email																								
其他 _____																								
<b>ICT 媒體與休閒</b>																								
看電視、DVD																								
聽廣播																								
上網瀏覽訊息																								
上網看電視																								
上網玩遊戲																								
上網聽音樂																								
聽音樂(音響、隨身聽、電腦擴音器)																								
其他 _____																								
<b>ICT 媒體與通訊</b>																								
打家用電話																								
打手機																								
傳手機簡訊(包含 Whatsapp、line)																								
網路電話或視訊																								
即時通訊(MSN, Yahoo, FB 聊天)																								
其他 _____																								

## 附錄二：訪員背景資料表

編號	年齡	居住地點	母親 年齡	母親 教育程度	母親職業	父親職業	經濟狀況
01.	22	新竹市北區	51	大學	退休教師	退休商	小康
02.	19	臺北市文山區	52	大學	家管	商	小康
03.	19	臺北市中山區	52	專科	商	商	普通
04.	20	高雄市小港區	45	高中	家管	技術師	普通
05.	21	臺北市信義區	52	大學	保險業	退休教官	普通
06.	20	臺北市南港區	45	高中	會計 + 家管	工程公司	小康
07.	23	新北市板橋區	48	碩博士	金融業	科技業	小康
08.	19	臺南市南區	49	師專	國小老師	退休教職員	小康
09.	21	高雄市楠梓區	50	高中職	家管	賣衣服	小康
10.	20	臺南市善化區	51	高中職	清潔工	水電工	普通
11.	19	臺北市中正區	47	碩博士	家管	醫師	小康
12.	19	桃園縣八德市	45	專科	服務業	服務業	普通
13.	18	新北市瑞芳區	NA	大學	國中教師	國中教師	小康
14.	18	新竹縣新埔鎮	51	專科	家管	工	低收入—普
15.	21	臺北市士林區	56	大學	財務經理	經理	小康
16.	23	新北市板橋區	53	高中職	家管	軟體工程師	普通
17.	19	彰化縣社頭鄉	48	專科	家管	織襪業	普通
18.	20	臺北市大安區	50	高中職	家管	貿易商	小康
19.	22	屏東縣長治鄉	45	專科	公務員	教師	普通
20.	18	新北市雙溪區	47	高中職	商	商	普通
21.	20	桃園縣大溪鎮	55	大學	退休教師	退休教師	小康
22.	19	臺北市內湖區	51	大學	程式設計師	資訊管理	普通
23.	19	高雄市楠梓區	43	高中	服務業	服務業	普通
24.	19	宜蘭縣五結鄉	50	國中	家管	汽修	普通
25.	22	彰化縣員林鎮	61	高中職	家管	風水師	普通
26.	24	臺東縣臺東市	54	高中	開早餐店	(分居)	貧窮
27.	25	臺東縣海端鄉	47	國中	農	農	低收入

## ICTs and Everyday Rhythms: Looking into the Methods

Wang, Su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re is a rich body of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features of time in modern societies. Scholars often consider that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hanging paces of life. However,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daily experiences of time squeezing involving the ICTs. This paper reviews a range of research methods usually adopted to study time experiences, including time use survey,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diaries, in-depth interviews. Proposing a research design as an explanatory example, the author then assesses it reflexively and suggests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time, time squeezing, research methods, everyday life

---

\* Email: [sw@nccu.edu.tw](mailto:sw@nccu.edu.tw)

Received: 2013.09.09

Accepted: 2013.11.06

# 我們即是我們和誰連結？社會文化觀點的 超連結文本研究主題建構與研究方法的挑戰

郭文平\*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超連結是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主要結構骨幹，相關研究至今累積許多文獻，但從社會文化角度的研究至今缺乏。本研究從文獻、實證研究經驗，及運用理論架構三大面向討論，提出超連結不同層級觀點的研究主題架構。鉅觀研究關切連結如何反映社會乃至全球化的關係；中觀層級研究焦點在連結如何被組織或網站生產運用並形塑知識；微觀層級研究則關切使用者如何組織連結敘事或透過連結進行社會文化實踐活動。

**關鍵詞：**超連結、社會文化觀點、超連結研究、文化實踐、超連結使用

---

\* Email: Kuowinping@gmail.com

投稿日期：2013 年 9 月 9 日

接受日期：2013 年 11 月 2 日

## 壹、前言：超連結文本作為研究問題

本文試圖從概念和方法角度探討超連結研究的不同面貌，目的在對超連結研究相關問題提出反思和解決之道，同時建立一個可應用的超連結文本研究主題架構。為了達此目的，研究者回顧過去超連結研究文獻，從超連結文本概念、相關論述及研究者自身研究經驗中逐一梳理出超連結研究的「鉅觀」（macro）、「中觀」（meso），以及「微觀」（micro）三個層級研究主題，最後則提出超連結在研究方法的問題與挑戰。

超連結（hyperlink）和超連結文本（hypertext）兩者在本文中指的是相似、但卻有部分差異概念。前者指「用來連結不同資訊、網頁，或網路物件，如圖片、影像或聲音等設置」；後者則指「涵蓋不同形式而組成的文本結構」。此外，本文中「網際網路」一詞指的是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超連結與超連結文本是普遍被運用在此一網絡環境下的資訊與文本組成方式（Domingo, 2006; Steensen, 2011）。

超連結文本成為「研究問題」雖然不是開始於網際網路時代<sup>1</sup>，但嚴格說來網際網路興起確實讓超連結文本受到進一步關注、並且成為跨領域研究主題的關鍵。當代網際網路環境中，連結被視為一種「科技功能」（technological function），被運用在網頁中作為摘要資訊或指引閱讀的工具（Deuze, 2001; Halavais, 2008）。網際網路日益發展後，各網路連結之間彼此形成了一種「網絡群聚」（networked cluster），超連結文本意義就此超越單純科技功能，而涉入更多社會文化層面。Webster (2008) 便指出超連結環境可被視為是一個「虛擬市場」（virtual marketplace），內容的提供者在此間彼此競爭大眾的「注意力」（例如某些網站利用各種連結引導讀者閱讀方向）；Halavais (2008) 也強調，當網際網路逐漸成為一種產業，超連結超越了單純的摘要網路文件功能而成為被搜尋引擎等機制用來作為排序資訊的工具（這方面 Google 是最佳例證），這類資訊排序的技術雖然標榜客觀，實則是一個各種勢力交織場域。

因此，本文認為在討論超連結時，我們應當回到 Williams (1974) 關於科技的討論，將超連結視為一種「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而非單純「科技技術」。

---

1 超連結文本概念並非始於數位時代，Michel Foucault 在《知識的考掘》（*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一書中提到了「以網絡化及連結形式出現的文本」概念（Foucault, 1972: 23）。Roland Barthes 在《S/Z》一書中描述「理想文本性」（ideal textuality）時指出：「在理想之文內，網路系統觸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統，均無等級……」（Barthes, 1970 / 屠友祥譯，2004: 11）。

循此觀點，本文作者對超連結及其所形成文本的研究觀點，可更明確定義為是一種「關於超連結的社會文化意義研究」（the stud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hyperlink）。循此觀點，研究者認為超連結研究需擺脫過去單純以「設計完美的超連結文本」為主要問題，並且進一步的探索超連結文本在不同時空脈絡下如何組織社會關係、如何反映社會真實、如何形塑知識，以及如何協助社會文化實踐。即便是我們回歸到超連結文本設計本身的問題，我們也必須要問：是誰決定超連結的設置、依據甚麼樣的規範設置，以及背後是否具有甚麼特殊的目而設置？

在此必須一提是，當代超連結幾乎出現在網際網路上所有文本類型之中，整個全球資訊網可說就是以超連結形式所架構的文本環境。雖然本文在論述上偏重以新聞這類的「紀實文本」作為分析主題，這並不表示超連結只在這類文本中才是重要議題，事實上，其餘文本如勸服文本、娛樂文本或虛構性文本（例如超連結文本小說）等其他網際網路上存在的文本類型同樣值得探討。不同類型文本的超連結具有不同目的意圖，例如以廣告這類勸服文本來說，過去相關研究便著重在如何設計出能夠引起讀者注意的超連結文本形式，達到廣告文本意欲達成的效果；虛構的超連結文本則比較關注連結與敘事之間的關係；至於新聞文本的思考邏輯則比較傾向於提供連結讓讀者去自由點選或豐富新聞資訊。本文選擇新聞文本作為分析對象，最主要原因在於過去研究者針對新聞的主題有過較長時間探討，同時新聞文本也是當代大量運用超連結文本的網路文本類型之一，為了讓本文聚焦，研究者討論的焦點仍以新聞的超連結文本為主。

在討論本研究主要立論後，本文將先摘要過去對超連結文本的論述及研究者過去的超連結研究歷程，後續則將提出超連結文本的三個層次研究主題架構，最後則討論超連結研究在方法上的挑戰及可能解決方式。

## 貳、超連結文本的概念和論述基礎

1960 年代首先提出「超連結文本」一詞的「超連結之父」Ted Nelson 形容超連結文本為：「一種電子形式的文本，一種全新的資訊科技，同時也是一種出版的模式」（Landow, 1997: 3）。根據 Nelson 定義，超連結文本為一種沒有順序的（non-sequential）寫作，一種聚集了多重選擇路徑可供讀者自由選擇的文本（同上引）。另一位早期從批判角度研究超連結文本的學者 Landow (1997) 則認為，超連結一詞指的是一個文本內容同時聚集另外一群的文本，在網絡化環境中這些「文本群聚」是以電子化的連結彼此聯繫，而超連結文本所連結的各類文本群聚，

並不限於文字，其他如影像、聲音檔案、動畫或是其他的資料格式，均可納入超文本的群聚之中。

前述對超連結文本的定義指出了超連結文本的基本特性，歸納過去相關討論，超連結文本具有以下特色 (Baehr & Lang, 2012)：一、其文本資訊的結構方式是非線性的 (non-linearity)；二、超連結之間有許多的「節點」(node) 進行串聯，理論上這些節點可能是一個網路的物件、也可能是一個網頁甚至是一個龐大的社群；三、連結文本提供了彈性及多重路徑的文本內容，讀者可以自由選擇想要閱讀的方式與組合；四、超連結同時也顯示了 (作者或讀者) 在文本製作或閱讀過程中認知結構的組成；五、該類型文本的終點或結局是開放式的；六、超連結文本同時也是一種「文本作者」與「讀者」之間協同合作而完成的文本形式。

網際網路發展之初，超連結文本是一種新的文本組成工具，同時也是全球資訊網構成基礎，過去超連結理論與相關研究多半著重於「超連結如何協助作者達成更完美的文本及敘事」，受此影響後續關於超連結文本特性的討論也多半隱含著一種「超連結烏托邦主義」(Domingo, 2006) 的思維，這類論述多指出超連結的「正面」意義。例如 Rost (2002) 分析超連結文本概念在網路新聞的運用時提出了「理想超連結文本」(ideal hypertext) 概念，Rost 認為超連結文本允許延伸新聞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提供創新的新聞內容接收模式，以及增進互動性 (interactivity)。在上述條件均具備下，電子超連結文本組成的新聞內容便得以提供讀者更豐富資訊，以及更多參與建構新聞內容的機會 (同上引)。De Maeyer (2012) 指出超連結運用可增進網路新聞網站的互動性、新聞報導可信度，以及資訊的透明度等。Doherty (2013) 認為超連結文本增進了新聞報導的深度及允許記者以多重觀點來組合新聞報導。

## 參、實證經驗：一個網路新聞超連結的研究歷程

前一節中有關超連結文本的基本論述觀點，在網際網路時代已被廣泛討論，卻不是引起本文作者關注超連結文本問題的開端。本文作者開始關注超連結文本問題，起始於網路新聞的相關研究。從 2006 年開始本文作者進行了一連串關於網路新聞生產相關主題的田野訪談，對象主要是主流網路新聞工作者，歷經數年田野訪談歷程中，作者蒐集許多受訪者在網路新聞生產過程中所涉及關於新媒介技術如何影響新聞生產實踐工作的資料，在網路新聞工作者大量的描述資料中，作者發現「連結」是經常被提到的主題，部分新聞工作者當時尚未瞭解「超連結」

這個詞彙，但他們已開始描述網站或新聞報導被連結到哪些網頁、資訊或是網路相關主題等。

田野訪談記錄分析過程中，作者也發現網路新聞工作者在日常的新聞生產實踐中早已處理許多關於超連結文本的生產流程，雖然每人接觸程度不一。例如部分網路新聞工作者在寫（製作）完一則新聞報導後，會加入許多不同的連結作為參考新聞資訊，類似工作可能是基於新聞組織要求，或出自於認定超連結有助於增加新聞內容豐富程度，目的不一而足。此外，在討論網路平臺間的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時，網路新聞機構之間也很明顯的是以不同的連結來呈現匯流的聚合形態（郭文平，2012年7月）。

有趣的是，田野資料所呈現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中的運用，顯然和前一節討論的「超連結烏托邦主義」或「理想的超連結文本」差異甚大。最大的問題癥結點是多數新聞網站中所謂「理想超連結」文本似乎難以在現實的網路環境中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在於超連結文本既是一種「科技技術」，同時也是一種「文本形式」，這種「雙重特性」使得超連結文本在製作過程中，除考量到科技功能（作為資訊的引導、聯繫或組成）外，還必須要考慮各種新聞生產過程中內部（組織政策、文本生產的常態性限制，以及新聞工作者的個人技術等）或外部（包括政治經濟及文化社會等）因素，對超連結文本生產過程所造成的影響（郭文平，2012年7月）。

研究者的田野經驗所引發的疑問，使得研究者開始去勾勒超連結研究的基本面向。首先，研究者研究經驗發現，超連結文本或許應該被視為是一個「具有關係特性的空間」，而超連結文本之間彼此的引用與聯繫，也呈現出某些值得研究的軌跡，這些軌跡問題包括了超連結網絡中的節點之間是基於甚麼樣的關係被建立聯繫、如何被建立，以及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等。空間作為超連結文本的隱喻（metaphor），在相關文獻中也被提及，引證了研究者的主要觀點。例如，Turow (2008) 在介紹超連結文本時，便強調超連結是網頁上被標示的文字，功能是引領讀者到網際網路上的其他地方。上述定義超連結的方式雖然流於簡略，但卻點出超連結文本具有的空間及地理意義。例如，當某些網際網路上資料庫提供了不同的連結讓網路使用者連結到不同的網頁時，基本上也引導了使用者進入不同的社會組織空間，因此超連結文本所構築出的網絡狀態可視為一個「充滿各種關係的場域」（Beaulieu, 2005）。

而在這樣的場域中「軌跡」（tracking）成為觀察重點，換言之，當某個文本連結到另一個文本或是網路的場域時，彼此間軌跡關係就具有高度意義。網站



連結彼此之間的相互引用，實際上代表著「某些資料能見度指標」，當網站或資料被連結時，象徵著知識被發現的可能與彼此意義的交換 (Beaulieu, 2005)。此一觀點在早期 Landow (1997) 關於超連結批判研究的討論時便已經提出，但卻少有人進行深入探討。

此外，超連結的空間意義並非僅止於網際網路上虛擬空間的概念，同時也牽涉到實際的地理空間相關問題。針對網際網路上的連結分析顯示，全球的網際網路逐漸的相互彼此連結，但七大工業國 (G7) 仍然是整個連結網絡的中心，而在網絡邊緣的則是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一些比較貧窮國家 (Park, Barnett, & Chung, 2011)，這反映了網際網路雖讓世界彼此連結，但地緣政治上所謂中心與邊陲國家的情況似乎隱約存在。將超連結文本視為一個虛擬或實體空間關係的構成，促使研究者進一步思考，究竟超連結文本群聚中是誰被連結？誰又被排除在連結網絡之外？哪些節點是中心？哪些節點又處在邊緣？前述問題似乎從分析超連結文本在網際網路環境的結構可讓我們一窺端倪。

第二個透過本文作者的田野研究所確立的基本研究立論是，連結在某些時候必須被當成是文化形式的一環，因此有關於過去文化研究中對於文化形式的討論，理論上都應該可適用於檢視超連結文本的構成。此一觀點來自於研究者發現超連結文本在背後有許多生產的原則與前提，這些原則與前提在一定程度扣連至生產者的實踐意圖，但消費者的連結文本又在其網路瀏覽、搜尋和點閱過程中，重新解構與建構生產者的連結文本。這使得研究者去思考，超連結文本中所隱含的權力問題。

當權力關係的討論進入研究者的思考超連結文本研究的範圍之際，研究者很自然地去反思前面文獻提出關於超連結文本論述的某些觀點，例如前述討論，提出超連結文本在概念上隱含著去除中心控制、去除文本作者控制及文本消費者賦權 (empowerment) 等觀點，這些觀點的核心都指涉關於權力的移轉問題，尤其是當代新聞媒介閱聽人研究中，對於作者「製碼」和閱聽人「解碼」的討論中不斷地觸及文本作者和讀者之間詮釋權力的問題，研究者好奇，在一個現實的超連結文本環境中，讀者賦權的論述是否依舊適用？讀者透過超連結文本的閱讀是否真的可以擺脫生產者意欲強加於文本中的意識形態意圖？

這些思考事實上也在後續的相關研究文獻中浮現，部分學者指出超連結文本所建構的場域基本上就隱含著不同權力關係競逐，不同連結之間的相互「引用」／或「不引用」，可能基於彼此價值相同的互惠、也可能基於商業或政治的關係、更可能基於某些競爭的關係 (Tsui, 2008)。Beaulieu (2005) 在研究一個醫學資料庫與連結網站之間彼此的超連結引用時便發現，不同資料庫之間透過超連結建立不

同的關係形態，某些資料庫基本上可以連結到一些主要資料庫，但不一定這些被連結的資料庫也提供連結回到原始連結資料庫，此一結果暗示超連結軌跡造成不同資料庫彼此存在著「位階問題」，某些資料庫具有主控位置，而某些資料庫則因為「被引用」而成為「可被發現的知識」；本文研究者在網路新聞的研究也發現，網路新聞機構在設置連結時重要的考量點是「連結如何進一步增加讀者網站停留時間」或「透過連結進行商業互惠」，而非「提供更多資訊觀點」（郭文平，2012年7月）。

上述討論也顯示了超連結文本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下是透過不同選擇過程所「建構」的文本，其中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及「公共知識」也同樣經過不同程度篩選。換言之，連結文本所建構的資訊架構並非全然中立或同意讀者自由點閱（雖然讀者有時候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打破生產者的控制），實際上超連結文本設置的意圖往往使得超連結文本之間涉入了不同社會權力關係運作與協商。

前述兩項經由本文作者的田野研究所引發的對於超連結文本的基本研究立場觀點，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探尋超連結文本除了「理想化超連結文本」以外的不同面向，究竟超連結文本可以應用在那些研究？探詢甚麼樣的主題？仍有待進一步討論，以下的章節作者將提出以社會文化研究觀點的超連結研究主題架構。

## 肆、從鉅觀到微觀：超連結文本的研究問題架構

前一節中研究者闡述了實際的超連結文本田野研究經驗，突顯了從社會文化角度看超連結文本的諸多問題，然而本文研究者關注超連結在網路新聞場域中的實踐只是諸多問題一環，對於超連結及其文本的研究，我們仍然需要建立一個看問題的架構。整體而言，超連結文本研究雖然不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然而在網路新聞或媒介相關研究領域中，我們仍然缺乏一個全觀的研究主題架構。

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從三個社會學的研究層次來分析超連結的研究主題，這樣的主題分類方式在過去社會、文化及傳播研究中廣泛的被運用來區分不同的研究主題層次。透過這樣的研究主題建構，本文試圖建立一個比較「全觀」的超連結文本研究主題架構（見表1）。

在此必須一提，本研究將超連結文本研究區分為三個層級，目的是便於歸納超連結研究的主題發展，事實上許多超連結研究是跨越不同層級，因此對於每一個單一的研究都必須就個案進行實際考量。另外，由於研究者本身仍然著眼在新聞和媒體研究，以下討論在這部分也會有比較多著墨。

超連結分析層次	主題
鉅觀層級 (macro-level)	超連結文本的全球化脈絡和結構 超連結文本的資訊流 超連結網絡資訊的議題設定
中觀層級 (meso-level)	組織網站中的超連結文本建構 組織網站中超連結運用與組成意義 媒介數位匯流中超連結運用
微觀層級 (micro-level)	超連結文本的閱讀經驗和詮釋 超連結文本的消費者建構實踐 超連結設計與敘事 生產者／消費者的互動

表 1：社會文化觀點的超連結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一、鉅觀層級超連結研究

超連結研究的第一個層級是將焦點放在「鉅觀層級」，該層級觀點探討超連結文本在「全球化脈絡」或「網絡社會脈絡」下所產生的問題。前述討論已經提出，許多超連結論述都指出網際網路是「開放」且「去中心化」結構，但實際上網際網路充滿了各種政治或經濟勢力角力，鉅觀層級的網路超連結分析，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網際網路上地理、政治甚至是語言間隔閼如何移植到網際網路空間。過去一些研究已開始關注超連結中不同節點網絡所顯現的全球化關係。Chang, Himelboim, & Dong (2009) 分析 15 個國家的新聞網站，指出各國家的新聞網站彼此間相當封閉，九成以上新聞網站連結僅提供連結到本國的網站；Figuerola & Alonso Berrocal (2013) 分析歐洲前一百大大學網站發現，歐洲大學網站超連結分析顯示了幾個主要群聚：英國大學幾乎自己成為一個網絡、瑞士和奧地利大學則形成一個以德國為中心的群聚、地中海地區國家（包含法國）成為一個群聚、比利時和荷蘭及部分瑞士法語區的大學形成另外一個群聚、最後一個群聚則由北歐幾個國家的大學組成。

透過連結分析也可促使我們理解資訊社會中某些社會團體之間關係。Soon & Kluver (2007) 分析新加坡政治團體網站中的連結構成也發現，超連結政治團體網站用來作為「互惠」及「聚集」類似觀點和立場的網站，這使得連結多半被使用作為「維繫類似觀點的關係」而不是「提供多元化觀點」。

超連結的鉅觀結構分析，現階段似乎仍處於描述連結的結構如何反映現實社會中的地理分布或是全球化國際關係架構的階段，進一步可以思考的問題包括了某些資訊如何透過連結中的資訊流（information flow）進行傳布？這些資訊的傳

布對全球化或是網絡社會造成了什麼樣的結果？當前的網路環境中的超連結文本結構是否會促成另一種資訊的落差或不平等？如果有，我們又如何能夠扭轉這些情況？

## 二、中觀層級超連結研究

表 1 所列的第二個層級是超連結「中觀層次」研究，這個部分將超連結文本拉到組織或網站的層次來探討「組織（或網站）的超連結文本生產」問題，這些問題不單只是探詢「連結如何被設置」，也包含了某些知識相關的文化商品（如新聞報導）如何被超連結來框架及構成？各個組織及網站之間透過連結的分享形成甚麼樣的關係連結？以及某些特定的網路社群如何運用超連結來達到某些實踐活動目的等 (Park & Thelwall, 2003)。

這類研究例子頗多，基本假設前提是認定超連結是整體傳播網絡或社會網絡基礎 (Park & Thelwall, 2003)，因此超連結的關係可用來探討電子商務 (e-commerce) 發展 (Palmer, Bailey, & Faraj, 2000) 或不同組織（網站）間的網絡關係 (Thelwall, 2001)。關於中觀層級的超連結研究過去累積了不少研究，近期實際研究案例包括了 Biddix & Park (2008) 研究美國大學抗議生活費上漲的運動時發現，超連結在該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某些校園外部的網站被連結至校園的主要的抗議活動的網站，使得許多協助抗議活動的外部資源得已被接近同時支援抗議活動。站在中觀層級討論網路新聞網站的超連結設置的研究為數也頗為豐富，多數研究關切的是超連結文本網路新聞場域中所具有意義，研究者的結論多半指向連結被用來作為一種引導或過濾技術，原因是新聞網站提供的超連結都屬於連結到自己網站的「內部連結」而非可以連結到網站外部的「外部連結」 (De Maeyer, 2012; Dimitrova, Connolly-Ahern, Williams, Kaid, & Reid, 2003; Dimitrova & Neznanski, 2006)，因此連結反而成為網站的「守門機制」 (Halavais, 2008)，或吸引讀者注意力集中的技術工具 (Webster, 2008)。

第二類關於超連結文本研究的中觀層級的主題討論，則將議題指向超連結和「社會機構」 (social institutions) 或企業合作之間關聯性討論，媒體機構在討論數位匯流時，超連結也是關鍵之一。在這類研究中，學者發現多數的企業或是組織之間網站的連結選擇多數是基於商業合作、增加獲利或是獲得更多商業資訊 (Vaughan & Wu, 2004)，而針對北美地區科技產業公司連結研究發現，較多的教育單位連結到美國的科技公司網站，加拿大的科技公司則吸引較多的商業公司連結 (Vaughan, Gao, & Kipp, 2006)。

在關於媒體數位匯流研究中，超連結的分析也突顯了媒體組織在匯流型態的上的選擇與衝突，例如 Robinson (2010) 研究指出超連結被「匯流型記者」(convergers) 運用做為彙整網際網路上不同資訊的工具，但傳統型記者 (traditionalists) 仍然堅持傳統的記者與讀者階層區分的角色。Dimitrova & Neznanski (2006) 在分析美國網路新聞數位匯流階段時，便指出超連結是現階段運用來作為彙整不同媒體報導的工具之一。

總結來說，中觀層級超連結研究的意義在於這類研究促使我們對組織或網站中所鑲嵌的超連結及相關文本，採取更為貼近社會文化脈絡的角度思考，因此這類研究不應該只是單純以內部或外部來區分連結的特性，而是應該進一步探討連結、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未來相關研究似乎可更進一步的分析不同網站被連結或不被連結的社會意義？而不同的連結的聚合又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真實等問題。

### 三、微觀層級超連結研究

表 1 所列的第三個層級是「微觀層級」的超連結研究，這部分焦點是關切超連結的「使用者」(user) 的問題，本文採取「使用者」這個詞彙用意在於強調，超連結文本在某些情況下已超越單純的文本閱讀層面，而是進一步的讓網路使用者能夠透過超連結文本標記語法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 的編製來設置不同的超連結文本，或利用一些網站提供的簡易預設功能來設置連結。這使得超連結文本的使用超越純粹的閱讀敘事組合的選擇或網站內容的引導功能，轉而成為日常生活中各種相關實踐活動<sup>2</sup> 可運用的工具或資本。

早期研究者在討論超連結文本時強調，超連結文提供了讀者一個「脫離作者文本掌控」的機會，讀者在超連結文本環境中，得以任意選擇不同連結、進入、脫出不同的網頁進行閱讀，這類讀者賦權觀點的超連結論述替超連結文本消費設定了實踐的基調 (Landow, 1997)。然而超連結文本的微觀層級研究似乎並未全然呼應上述文本讀者的賦權論述，Huesca & Dervins (1999) 訪問網路新聞讀者超連結文本閱讀經驗，發現多數讀者批評超連結文本是「沒有組織且難以依循」，但同時也有一批讀者歡慶並享受超連結文本所帶來的自由連結和自主掌控的閱讀經驗。另一個關於印尼地區讀者的網路新聞超連結閱讀經驗則發現，多數讀者

2 本文所指的實踐 (practice) 並非單指「行動」(action)，實踐的意義包含了實踐者 (practitioner) 對於事物現象如何說，以及如何做的總和，實踐在此也是社會性的，包含了各種知識的理解、工具的運用、實踐的規範等。

表達了享受悠遊於超連結文本帶來的一種「前後遊戲式移動」(play-like back-and-forth moving)的閱讀方式，該研究也宣稱超連結培養出網路新聞讀者一種「解釋性實踐」(hermeneutic practice)，新聞文本的意義也因此被重組(Wilson, Hamzah, & Khattab, 2003)。實驗法進行的研究則發現，經常接觸超連結文本新聞讀者，對於公共事務新聞發展出更為緊密扣連的知識結構，接觸較少超連結文本新聞讀者則未發展出特殊知識結構(Eveland, Marton, & Seo, 2004)。某些研究者將超連結的使用連結到使用者的「資本問題」，具有較高網際網路素養相關資本使用者，比較能夠瞭解連結背後隱含的意義，同時正確的詮釋連結的內容(Halavais, 2008)。

不同的公民及消費者實踐行為如何和超連結文本結合，是超連結微觀層級研究的另一項重要主題，研究者假設超連結的網絡能夠被運用在拓展某些社會議題的資訊傳布與行動(Park & Thelwall, 2003)。這類研究包括了從超連結網絡探討不同社會團體對墮胎議題的辯論(Adamic, 1999)；政府、第三部門及私人公司對氣候變遷的態度研究發現超連結選擇顯示了對於該議題的結盟行動(Rogers & Marres, 2000)。

微觀層級的另一類研究包含了超連結文本的結構與敘事設計，以及這些設計如何影響文本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等。這類研究的最終關懷仍然是站在「超連結文本可以增進讀者對內容理解」的立場，部分研究焦點置於超連結文本空間與結構的設計問題，部分研究關切新聞脈絡下超連結媒介的設計(Hall, 2001)，也有研究者指出對於某些媒介而言，超連結使用長期來看可增進組織利益(Weber, 2012)，問題是當媒介內容生產者嘗試在網路空間設計出一個理想形式的超連結文本作為增進讀者更好的閱讀經驗為目的時，讀者扮演的角色卻耐人尋味，其中主要關鍵是當媒介內容被嵌入更多超連結之際，也同時意味著讀者有更多選擇，而更多的選擇暗示著一種生產者與讀者對於文本內容掌控的權力移轉(Doherty, 2013)，而這種作者／讀者之間文本掌控關係的轉變如何影響超連結文本的生產與閱讀，似乎仍然沒有被充分的研究。

微觀層級的超連結研究仍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的透過實證研究思考與釐清，幾個可能的角度是：第一，超連結文本基本上擺脫了「文本是固定不變」的概念，單一閱聽人所閱讀的文本可能因為其所選擇的連結不同，而出現不同的閱讀組合，因此如何判斷文本對讀者閱讀經驗的影響及詮釋歷程，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其次，從消費實踐的角度來看，連結文本的生產在網際網路環境中不再是傳統的「制度性生產者」的工作，包括部落格、社群媒介、網路論壇等

環境中，也有越來越多參與者製作出涵蓋不同連結組成的文本，這類網路使用者所生產的超連結文本在某些時候重新設定了資訊的傳散過程，同時也具有民主的意涵。第三，微觀層級的超連結文本研究雖然關切的是超連結文本和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問題，但我們仍不能忽略文本的生產者在過程中所扮演的某些角色，亦即是，究竟生產者設置的連結環境在多大的程度下會影響超連結文本讀者對文本的理解、詮釋及使用？整體來說，微觀層次的超連結研究雖然主題焦點在於讀者如何去閱讀超連結文本，以及讀者的閱讀軌跡與路徑對於原始文本的詮釋與解讀如何的問題。但必需指出的是，基本上超連結研究在讀者與作者的問題上，應該是一個「相互關係」的探討，也就是說即使在微觀層次的超連結探討，研究者仍然不能忽略生產者在超連結閱讀過程中試圖在文本中置入的權力問題。例如當生產者透過連結的選擇、設置，以及引導等，試圖影響讀者的超連結文本閱讀路徑時，研究者不可假定讀者完全可以自主於這些設置意圖之外。上述問題都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的發掘與探索。

## 伍、超連結研究的挑戰：方法論及其應用

本文回顧了研究者在超連結文本研究的田野經驗，以及過去文獻對超連結研究的相關結果，並提出了三個層級的超連結文本研究主題。在這一節要提出超連結研究方法論的問題，方法論的問題基本上著重於我們對於一個研究方法所思考的理論、觀點，以及對於研究主題的定義等 (Hart, 1998)。因此在討論超連結文本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時，必須要從超連結文本被視為是甚麼樣的研究主題作為起點。據此，在本節研究者將從對於超連結文本不同的理論觀點出發，探討不同研究方法上的運用情況及技術層面帶來的挑戰，研究者每一個觀點上都試圖提出質化及量化的方法角度及分析的路徑，作為後續對超連結有興趣的研究者參考。必須一提是，本文作者試圖在某些方法或技術的問題上提出一些解決方法，但部分問題目前看來沒有具體的解決方法，有鑑於程式軟體及硬體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某些問題在不久的未來預料將可獲得解決。

### 一、超連結作為文本及其分析方法

首先，超連結文本最普遍的觀點是作為一種新型態的文本類型，這類的文本類型具有摘要、引導及匯聚的功能，將超連結純粹視為一種文本類型進行研究，傳統的內容分析是可行的方法之一，運用內容分析進行人為判定連結文本的連結

標的、連結內涵，乃至連結文本的整體結構等，可以讓研究者透過量化的連結內容分析呈現不同超連結文類或網站的連結內容，以及超連結文本如何被運用來形塑不同的主題等。質性的超連結文本研究至今似乎尚未有深入的討論，過去質性文本研究以探詢文本的論述結構、符號學或意識形態等分析方法見長，在超連結文本環境中似乎可將連結在一個文本的群聚的結構進行論述、符號或意識形態的探尋，分析的重點可能是超連結文本在前述的角度上呈現哪些和一般性文本不同的特性，超連結文本的論述結構、符號運用及其中所架構的意識形態具有甚麼樣特殊的意義。

連結文本的內容分析遇到的方法問題，可能是超連結文本及其所存在網路頁面的擷取，透過一些網頁擷取軟體或電腦螢幕的攝影軟體來協助可輔助超結文本內容分析在資料上蒐集，雖然目前有許多這類的開放資源的軟體可運用，但是各種軟體擷取的情況不一，文字資料最容易被擷取，部分影音和多媒體資料則不容易獲取，需要另外方式儲存。

無論是連結網址或網頁資料的蒐集都必需考慮到「時間」因素，網際網路頁面不同於傳統的媒體具有高度的「存續性」，過去傳統媒介在內容或文本分析時採取的「事後現實的資料」(after-the-fact data)方式，顯然不太適用於「不斷更動的」網站內容資料蒐集 (Tremayne, 2004)。Mark Tremayne 在分析美國網路新聞網站時，採取一種被稱為「即時登錄法」(real time online coding)方式來進行分析，做法是在研究者選取資料搜尋時點上，所有網站內容登錄者 (coder) 同時上線進行內容登錄 (同上引)，此一方法雖然解決了網頁擷取時間的問題，但時空彈性低，需耗損大量研究資源。對於事後分析時候被移除而不復存在的網頁，部分研究者採取在某些保存網際網路頁面的資料庫搜尋已經被移除的頁面，例如 Google 有時會保存某些已經被移除網際網路頁面的內容，但這類方法並非保證，一些影音內容有時也不會被保存。目前許多資訊工程領域的研究者持續開發對於網頁或連結文本自動擷取的軟體程式，若未來這類應用程式逐漸普遍，或許可解決超連結文本分析資料蒐集在時間或空間上所遇到的問題。

## 二、超連結文本作為一種論述實踐及其研究方法

前述的內容分析基本而言無法回答超連結文本如何被「製碼」的問題，若要進一步瞭解超連結文本究竟如何被生產，以及超連結背後所鑲嵌的政治經濟或社會文化因素，則必需將超連結文本視為一種論述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 來看



待，也就是連結文本必須要以「實踐」的角度來理解。針對這類的問題，本文研究者採取的是質性研究角度切入，運用包括深度訪談或參與觀察等研究方法，這樣的方法能夠實際探詢超連結文本生產者在實際進行超連結文本設置時的考量、原則，或政治經濟因素等，進而瞭解超連結文本如何連結或是被連結至其他文本。

量化的調查研究在這部分近期也有不少著墨，近期一項針對美國新聞工作者的大型調查探詢了記者如何認知超連結文本的設置，結論發現記者傾向優先考慮美國為主的文本作為連結對象，特別是跟自家媒體同一網站內的內容進行連結，對於採訪同樣主題新聞的國外媒體內容被視為最不可能連結的對象，主要考量因素多半是商業競爭 (Chang, Southwell, Lee, & Hong, 2012)。

上述質性的深度訪談及觀察法與量化調查方法研究都被用在探詢超連結文本生產實踐，基本差異在於量化研究探詢超連結文本的生產者對超連結文本的認知與策略，同時提供量化資料作為佐證。而本文作者在研究新聞場域超連結文本生產時採取策略是結合深度訪談與觀察法，在觀察受訪者實際的生產過程中，研究者以生產者實際產出的超連結文本探詢受訪者在每個連結設置時的考量，這樣的方法一來有助於受訪者更容易回溯超連結文本設置當下的情境，同時研究者也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對於超連結文本的複雜思考，同時更近一步的發掘超連結文本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象徵意義 (郭文平，2013)。

### 三、超連結作為網絡及軌跡觀點及其研究法

另外一種，也是當代最普遍的觀點是將超連結視為一種架構資訊社會關係及網絡的方式。前述將超連結視為一種全球化或是社會網絡，或是將超連結視為一種軌跡研究路徑屬於這類觀點下開展的研究。這類研究無論是採取量化或是質化的研究方法，基本的問題都在如何界定經由超連結文本結構所帶來或反映的關係脈絡。

將連結視為一種網絡或軌跡的觀點最常詢問的問題是：誰連結到我？或是我連結到誰？這類的問題來探詢網絡社會中某些議題，包括了從超連結的組成而構成的互惠關係，以及社會連結等。這類問題多數採取量化的分析方法，蒐集連結資料並且進行連結對象的量化統計。質性的方法同樣需要蒐集連結資料進行深度的詮釋分析，和量化分析側重統計數據呈現不同的是，質性研究的目的是探尋連結的整體結構類型，這類的分析經常從單一個案出發，向下延伸逐層探詢連結文本的結構組成及意義。

網絡或軌跡觀點的連結分析先決條件，都是根據研究目的匯集連結網址然後進行分析，Park & Thelwall (2003) 指出連結的資料可以透過（一）觀察法；（二）電腦輔助工具測量；（三）合併前兩項方法來蒐集。對於質性研究而言，人工登錄資料的方法仍然可行，但對於需要大量資料的量化研究來說，則需要連結探勘軟體協助。目前許多網路上的免費軟體可以協助研究者將網頁所連結的網站或被連結的網站匯集，一些商業的搜尋引擎（例如 Google 或 Yahoo）也可達到部分目的，不過目前尚未有任何一種設計成熟且普遍被學術社群認同使用的軟體程式。

在連結作為網絡或是軌跡的觀點下，目前最常見的分析方式是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對於研究者而言網絡分析方法最重要的步驟之一是要選定符合研究目的節點進行分析。節點的選擇基本上是根據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設定，包括哪些節點最能代表研究者要討論的目標網絡，例如當一個研究者想要研究網路上學術社群的網絡關係，可能要思考的是甚麼樣的網站是研究的重要節點。節點的選擇可參考實際的社會機構或地理的組成，例如前述分析歐洲學術社群的連結關係時，研究者選擇的是排名前一百大的歐洲大學網站進行連結分析 (Figuerola & Alonso Berrocal, 2013)。

就網絡或是軌跡的觀點來看，超連結都不會單純的被視為一種科技技術，而是更進一步的被認為是鑲嵌在不同的權力網絡之中，連結彼此之間涉及的關係也就被認為是一種權力的關係，循此觀點研究者分析的另一個焦點會是超連結文本網絡所呈現的權力關係為何？這點如何影響知識的被定義及選擇？哪些機制（人工的、機器的）被運用在連結的選擇之中？這些問題透過對於權力關係的詢問，或許可以有更深入的解析。

#### 四、超連結作為消費者文本的及其研究方法

最後，超連結文本既然存在於網際網路之上，那麼讀者如何去解讀、詮釋連結文本便成為另一個研究者關切焦點。這個觀點所持的立場有別於過去超連結論述中不斷強調的賦權觀點，而是認為連結文本的消費與詮釋基本上是複雜且多樣化的，而超連結的文本結構關係也會影響讀者的閱讀和詮釋。

但在實際的方法層次來看，超連結文本促成了一種讀者任意的，且非線性的閱讀模式，要如何探索讀者在複雜連結環境中的閱讀軌跡是一大挑戰。部分研究者採取類似實驗法的方式研究讀者在超連結文本環境中的閱讀軌跡，被實驗者被

要求在特定的（或是建構的）超連結文本環境中閱讀網路文本，並且以相關工具記錄下閱讀的軌跡脈絡（這些工具可能是螢幕影像記錄工具，或是網路瀏覽歷史記錄），然後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

前述的實驗方法優點是可以測得讀者實際的超連結閱讀軌跡作為分析資料，但缺點是這樣的資料基本上無法瞭解讀者點選某些連結的動機，及不同閱讀軌跡所造成的影響或對於整體文本的詮釋。Huesca & Dervin (1999) 研究讀者對閱讀超連結結構新聞報導時，採取「多重方法設計」似乎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兩人的做法首先選擇數篇超連結文本的網路新聞並建構成為網站，邀請研究參與者閱讀該網站新聞，同時也讓參與者閱讀同樣主題的紙本格式新聞，參與者在閱讀時都被要求同時做閱讀筆記，事後則採取深度訪談（事後回憶法）的方式讓參與者比較超連結文本與非超連結文本（紙本）新聞的閱讀感受。然而這樣的方法的缺點是，即時記錄及事後回憶的方法都會遇到所得資料是否精確的問題，研究者在設計上必須更為謹慎，以免影響研究效度。

探索讀者超連結文本閱讀經驗的分析重心是「訊流」如何在讀者的連結點選中被組成，不同的訊流組成又是如何影響讀者對於文本的認知與詮釋，但是這類分析的困難在於讀者閱讀的訊流軌跡可能是破碎、衝突、併陳且多元，這種具有後現代（postmodern）樣態的閱讀經驗是否可以找到類型化的閱讀模式不無疑問。另外網際網路上的超連結閱讀模式在多數情況下是一種即興、任意且往復來回不同頁面之間的活動，對於這樣有別於其他媒介的閱讀消費實踐，文本內容對於讀者會有甚麼樣的效果？促成了讀者對於文本有些甚麼樣的詮釋？都是未來需要更多的實證資料來進行驗證的方向。

最後，先前提及在後端伺服器收集讀者的網頁及連結點選資料，然後進行分析，雖是蒐集讀者閱讀超連結文本的可行方法之一，但資料收集技術問題包括了如何記錄網路使用者的超連結瀏覽記錄，這部分可透過螢幕的攝影技術或蒐集網路使用者的網頁登錄資料（log data）來解決。然而這些技術收集的量化資料在解讀與分析上卻有許多挑戰，因為網路使用者所瀏覽的超連結文本網頁，只要短短的數分鐘或是數小時，就可能累計相當龐大的資料，這些資料如何進行編碼及分析，並且找出意義需要更有系統的方來進行。

## 陸、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文獻內容、研究者研究經驗及理論架構等三個層面進行分析，提出了研究主題的三個層次架構，同時討論了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和挑戰。總結來說，超連結文本是當代社會中重要的文化形式，連結不僅是一種網路文本的組成要件，同時也延伸、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某些面向，例如社群關係、文化隔閡，或是地理上的整合與群聚等。

雖然超連結文本的發展已經有數十年的時間，但對學術研究領域來說，超連結仍是一個需要持續開拓的研究領域，此間也包含了不同研究觀點轉變，例如過去強調如何在網頁中設計完美的超連結文本結構，到轉為強調超連結文本建構背後所涉及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因素。這些不同研究觀點的轉變顯示了當超連結文本之間的網絡關係逐漸發展且深化之後，連結的意義已超越了單純的科技設計，也使得超連結文本的研究逐漸接合到既有研究領域的某些研究。以媒體與傳播研究為例，研究者個人的經驗就顯示，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的生產逐漸呼應了過往媒介生產社會學、媒介政治經濟學及網絡社會等面向的探討，而本文的分析也將超連結文本的研究扣連到全球化、知識生產、場域關係及閱聽人實踐等層面，試圖替超連結研究重新定位。

最後，本文雖然嘗試探討超連結研究的方法及其挑戰，然而現實情況是，沒有任何單一的研究方法可全然應用在複雜的超連結文本的現象之中，因此採取多重方法設計是未來趨勢。此外，數位工具的應用及開發是未來超連結研究的另一核心，這些包括了連結資料的探勘及超連結分析工具等，未來如何讓這類的軟體能夠更廣泛的運用在研究分析，並且以研究者可以最容易取得及可以負擔的方式納入研究之中，也是超連結文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 參考書目

- 郭文平（2013）。〈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中的使用：一個文化實踐觀點的研究〉，《新聞學研究》，117：135-178。
- （2012年7月）。〈超連結文本在新聞生產實踐中的運用及其影響〉，「2012中華傳播年會」論文。臺灣，臺中。
- 屠友祥譯（2004）。《S/Z》，臺北，臺灣：桂冠。（原書 Barthes, R. [1970]. *S/Z*. Paris, France: Seuil.）

- Adamic, L. A. (1999). The small world web. In S. Abiteboul & A. M. Vercoustre (Eds.), *Research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librarie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ume 1696* (pp. 443-452). New York, NY: Springer.
- Baehr, C., & Lang, S. M. (2012). Hypertext theory: Rethinking and reformulating what we know, Web 2.0. *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42, 39-56.
- Beaulieu, A. (2005). Sociable hyperlink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connectivity. In C. Hine (Ed.), *Virtual methods: Issues in social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pp. 183-196). Oxford, UK: Berg.
- Biddix, J. P., & Park, H. W. (2008). Online networks of student protest: The case of the living wage campaign. *New Media & Society*, 10, 871-891.
- Chang, T. K., Himelboim, I., & Dong, D. (2009). Open global networks, closed international flow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1, 137-159.
- Chang, T.-K., Southwell, B. G., Lee, H.-M., & Hong, Y. (2012). Jurisdictional protectionism in online news: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hyperlinks. *New Media & Society*, 14, 684-700.
- De Maeyer, J. (2012). The journalistic hyperlink: Prescriptive discourse about linking in online news. *Journalism Practice*, 6, 692-701.
- Deuze, M. (2001). Online journalism: Modell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news media on the World Wide Web. *First Monday*, 6(10-1). Retrieved from <http://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893/802>
- Dimitrova, D. V., Connolly-Ahern, C., Williams, A. P., Kaid, L. L., & Reid, A. (2003). Hyperlinking as gatekeeping: Online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execution of an American terrorist. *Journalism Studies*, 4, 401-414.
- Dimitrova, D. V., & Neznanski, M. (2006). Online journalism and the war in cyberspace: A comparison between U.S. and international newspaper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248-263.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06.00324.x/full>
- Doherty, S. (2013). Hypertext and journalism: Paths for future research. *Digital Journalism*, 1-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21670811.2013.821323>
- Domingo, D. (2006). *Inventing online journalism: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s a news medium in four Catalan newsroom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Bellaterra, ES.

- Eveland, W. P., Jr., Marton, K., & Seo, M. (2004). Moving beyond “just the facts”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news o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 82-108.
- Figuerola, C. G., & Alonso Berrocal, J. L. (2013). Web link-based relationships among top Europea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39, 629-642.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UK: Tavistock.
- Halavais, A. (2008). The hyperlink as organizing principle. In J. Turow & L. Tsui (Eds.), *The hyperlinked society: Questioning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pp. 39-55).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all, J. (2001). *Online journalism: A critical primer*. London, UK: Pluto.
- Hart, C. (1998). *Doing a literature review: Releasing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magination*. London, UK: Sage.
- Huesca, R., & Dervin, B. (1999, October). *Hypertext and journalism: Audiences respond to competing news narra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dia in Transition Conference. MIT, Cambridge, MA. Retrieved from [http://Web.mit.edu/m-i-t/articles/index\\_huesca.html](http://Web.mit.edu/m-i-t/articles/index_huesca.html)
- Landow, G. P. (1997). *Hypertext 2.0: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J. W., Bailey, J. P., & Faraj, S. (2000).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ust on the WWW: The use and prominence of trusted third parties and privacy statement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5(3).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00.tb00342.x/full>
- Park, H. W., Barnett, G. A., & Chung, C. J. (2011).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2003-2009 global hyperlink network. *Global Networks*, 11, 522-542.
- Park, H. W., & Thelwall, M. (2003). Hyperlink analyses of the World Wide Web: A review.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8(4).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03.tb00223.x/full>
- Robinson, S. (2010). Traditionalists vs. convergers: Textual privilege, boundary work, and the journalist -- Audi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commenting policies of online news sites.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16, 125-143.

- Rogers, R., & Marres, N. (2000). Landscaping climate change: A mapping technique for understan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bat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9, 141-163.
- Rost, A. (2002, July). *The concept of hypertext in digital journ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arcelona, ES.
- Soon, C., & Kluver, R. (2007). The internet and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246-265.
- Steensen, S. (2011). Online journalism and the promises of new technology. *Journalism Studies*, 12, 311-327.
- Thelwall, M. (2001). Exploring the link structure of the web with network diagram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7, 393-401.
- Tremayne, M. (2004). The web of context: Applying network theory to the use of hyperlinks in journalism on the web.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 237-253.
- Tsui, L. (2008). The hyperlink in newspapers and blogs. In J. Turow & L. Tsui (Eds.), *The hyperlinked society: Questioning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pp. 70-84).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Turow, J. (2008). Introduction: On not taking the hyperlink for granted. In J. Turow & L. Tsui (Eds.), *The hyperlinked society: Questioning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pp. 1-17).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Vaughan, L., Gao, Y., & Kipp, M. (2006). Why are hyperlinks to business websites created? A content analysis. *Scientometrics*, 67, 291-300.
- Vaughan, L., & Wu, G. (2004). Links to commercial websites as a source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cientometrics*, 60, 487-496.
- Weber, M. S. (2012). Newspapers and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hyperlinking.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 187-201.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3.x/full>
- Webster, J. G. (2008). Structuring a marketplace of attention. In J. Turow & L. Tsui (Eds.), *The hyperlinked society: Questioning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pp. 23-38).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UK: Fontana.
- Wilson, T., Hamzah, A., & Khattab, U. (2003). The 'cultural technology of clicking' in the hypertext era. *New Media & Society*, 5, 523-545.

# We Are What We Link?

##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Hyperlink Research as Seen from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Kuo, Win-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Abstract

A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World Wide Web, the hyperlink naturally attracts academic attentions. Among the bulk of research accumulated so far, few investigate from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an attempt to fill the gap, this essay specifies three aspects of hyperlink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empirical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 more encompassing three-level research framework is then proposed, in an effort to embrace various concerns and perspective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macro level addresses issues such as hyperlinks and globalization, hyperlink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etc. The meso level focuses on how hyperlinks are produced and organized, and how knowledge space is conceived and constructed. The micro level explores users' experiences in a hypertextual environment, checking how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s are assisted by hyperlink use. Laid out as such, it is hoped that issues and challenges are covered and dealt with duly from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hyperlink research.

**Keywords:** hyperlinks,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hyperlink research, cultural practice, hyperlink use

---

\* Email: Kuowinping@gmail.com

Received: 2013.09.09

Accepted: 2013.11.02



## 向運算轉：新媒體研究與 資訊技術結合的契機與挑戰\*

鄭宇君\*\*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今日人們使用行動裝置與社交媒體的時間大幅增加，使用行為與傳播內容愈加分殊化，這對傳播研究造成極大挑戰。新媒體研究開始與資訊科學結合，在思維與研究面向產生「向運算轉」(computational turn)，利用資訊技術大量收集與分析使用者留下的數位足跡，藉此找出使用者真實的數位傳播活動。本文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透過批判性的文獻檢閱與實際的個案研究經驗，說明鉅量資料分析取徑對於傳播研究方法帶來的契機與挑戰。

**關鍵詞：**向運算轉、行動傳播、社交媒體、鉅量資料、數位人文

---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在社交媒體時代追求真實性的新聞專業：一種另類新聞傳散機制之初探」(計畫編號：NSC 101-2410-H-364-002-MY2)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2013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壇：新媒體研究之方法與概念重構」(2013 年 7 月 13 日，臺北：輔仁大學)。作者感謝論壇評論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吳筱攻教授給予的寶貴建議，以及主持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翁秀琪教授與現場參與者的熱烈討論與批評指教。

\*\* Email: colisa@gmail.com

投稿日期：2013 年 9 月 6 日

接受日期：2013 年 10 月 26 日

## 壹、向運算轉的人文社會研究

當今人們透過數位工具進行傳播活動的比例與時間大幅增加，從 Flickr、Youtube 等照片影音分享平臺，到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網絡服務，加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與隨身性，人們所留下的數位足跡愈來愈多。這些社交媒體具有分散式的結構特徵，無論是訊息的流動或參與討論的社群，不僅跨越了國家的界線，也逸出了特定虛擬空間（如：BBS 網路論壇）。在社交媒體時代，難以定義資訊流通或參與群眾的母體範圍為何，這對傳播研究的資料收集與分析造成極大挑戰。因此，今日的人文社會研究也開始運用資訊技術與軟體工具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處理，並且引進了鉅量資料（Big Data）的分析概念<sup>1</sup>。

拜資訊技術發展之賜，從 20 世紀末開始，透過電腦運算來收集與分析大量資料，徹底改變了生物學與物理學的領域，像是人類基因體解碼對於製藥業的影響；相對地，資料驅動的運算社會科學（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則是慢了許久才出現，但它正在發生並對各種領域產生影響，像 Google、Yahoo 等大型網路公司，或美國國安局等政府組織之中，運算的社會科學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領域，透過收集與分析大量資料，可以揭露個體與團體的行為模式（Giles, 2012; Lazer et al., 2009）。

鉅量資料是指用現有一般技術難以管理的大量資料群，它的特性可用三個 V 開頭的字母表示：大量（volume）、龐雜（variety）、快速（velocity），大量意指資料量為 TB 以上（但實際上未必如此）、需要更大的運算與儲存資源；龐雜則是指所產生的資料為非結構化資料，格式不一、資料欄位可能隨時會增減；快速則意謂資料隨時都在發生變化，特別是串流資料（即時資料）的處理，如：Twitter 上某位使用者的 followers 人數、Facebook 某篇貼文按讚人數，這些資料隨時都在變化，因此對於資料的讀取與計算造成挑戰。鉅量資料的這三個特性，使得資料科學家需要開發新的工具與技術來進行分析（城田真琴，2012 / 鐘慧真、梁世英譯，2013）。

然而，鉅量資料真正的影響並不在於資料集的大小而已，特別是對人文社會研究的鉅量資料分析而言，實際上許多資料集未必大於 1TB，鉅量資料分析強調的是全部的資料，或至少是盡量完整的資料，以便研究者查看資料中的其他細節

1 Big Data 的中文譯名包括海量資料、巨量資料、鉅量資料、大數據等，本文採取「鉅量資料」做為統一譯名，除了形容資料量的巨大之外，同時也有「鉅觀」的意涵，目的在於強調鉅量資料的分析方法能幫助研究者看到用其他方法無法得知的樣貌，特別是能夠掌握不斷流變現象之鉅觀樣貌。

或進行新的分析。因此，不像傳統社會科學研究從母體中抽出部分樣本進行統計分析，鉅量資料分析則是透過分析所有能得到的龐大資料，發現一些其他方式不可能找到的現象 (Mayer-Schönberger & Cukier, 2013 / 林俊宏譯, 2013)。因此，鉅量資料的出現，不只是意指採用了大量的數據、分析工具和操作程序，它重新形塑了知識建構與研究流程，以及人們應該如何處理資訊與分類，在思維與研究方面產生了「向運算轉」(computational turn)的趨勢，此影響逐漸擴及人文社會研究領域 (boyd & Crawford, 2012)。

「向運算轉」這個名稱起於 2010 年英國 Swansea University 舉辦的一場工作坊，這場工作坊以 computational turn 為主題，邀集數位人文相關領域學者發表論文並共同討論。工作坊召集人 David M. Berry 後來便以 “The computational turn: Thinking about the digital humanities” 為題，說明數位人文研究領域發展的三個進程，特別是 2009 年後興起的第三波數位人文研究<sup>2</sup>被稱為「向運算轉」，意指在藝術、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使用運算技術的輔助，轉變了它們既有概念與理論之批評基礎，反映在這些領域愈來愈重視瞭解運算取向的重要性，同時開始有愈來愈多跨學科的合作研究 (Berry, 2011)。

Berry (2011) 指出，第三波數位人文強調的是發生在電腦化媒介內部的形式之運算性 (computability of the forms)，此一取徑受到近年的軟體研究、批判的符碼研究、平臺研究之影響，強調與特殊平臺所提供的可運算性 (computability) 相關，以及對這類研究隱含預設之質疑。所有透過數位媒介完成的作品都可以是軟體研究的對象，軟體 (software) 作為一種程式語言，它像語言一樣有文法結構，但又像是科技物一樣可以執行完成任務，軟體同時提供了其媒介與情境。Berry 強調，在某種意義上，瞭解數位人文就是理解程式碼 (codes)，並且以一種豐富方式來理解文化生產，像是數位印刷改變了報業、電子書與電子墨水科技，因此運算化 (computation) 是一個關鍵議題，它強調這些跨越媒體、產業與經濟的改變。

向運算轉對於人文社會研究的影響，特別反映在數位媒體研究新興方法的出現，這關聯到原生的數位對象與研究它們的方法，儘管在學術、商業與政府治理

2 數位人文最早是指用電腦技術支援人文學者的工作，但後來電腦科技成為思考人文研究自身的重要條件。第一波的數位人文學術研究，約為 1990 晚期到 2000 初，焦點在於大規模的數位化計畫，以及建置技術的內在結構，傾向以量化資料進行分析，像是利用資料庫來儲存或檢索、建立語言詞庫等；第二波數位人文則是在 21 世紀初開始，著重在創造一個生產、策展，與知識互動之環境與工具，強調數位原生與多樣的數位情境，傾向以質化、詮釋、實驗、情感、產製的，注意到複雜度、媒介特殊性、歷史脈絡、分析深度、批評與詮釋，如：數位典藏 (Berry, 2011)。

中有非常不同的展現，但它使得傳統的硬科學對於社交媒體傳播與線上行為產生極大興趣。運算的社會科學強調的就是用電腦運算來收集與分析大量資料，能達到空前的廣度、深度與規模 (Burgess, Bruns, & Hjorth, 2013; Lazer et al., 2009)。舉例而言，研究者以 Twitter 上的新聞來源，混合電腦計算與手工方法在鉅量資料時代進行內容分析，以達到系統性的嚴謹，既兼顧情境的敏感性，又可使電腦運算達到演算上的正確性 (Lewis, Zamith, & Hermida, 2013)。

然而，社交媒體的鉅量資料對傳播研究帶來許多理論及實務上的議題。Manovich (2011) 指出在方法論上產生三個重要議題：第一，多數人的「表層資料」(‘surface data’ about lots of people)，以及有關少數人的「深度資料」(‘deep data’ about a few people) 之間的差異，前者意指人口統計學等量化研究，後者意指心理分析、文學研究、詮釋學等質化研究，介於這二種方法論中間的，則是統計學與抽樣的概念；第二，研究者如何進用或存取交易資料 (transactional data，如：某照片在何時何地上傳)；第三，在資料專家與未經資料訓練的人文研究者之間新的「資料分析落差」(data analysis divide)。Manovich 強調，透過電腦運算與人文研究所收集到的深層資料，是二種截然不同的資料內容，並沒有任何一方比另一方優越，也沒有一方能取代另一方，研究者必須要懂得如何問出新型態的問題，結合二種不同的資料內容進行分析探索，才能擴展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方向。

簡言之，第三波數位人文強調的向運算轉，意指透過批判性研究與數位研究方法上的融合與創新，以演算法促進搜尋、檢索與批判過程之應用，可掌握其他研究方法無法察覺的面向，特別是數位媒體文化與使用者行為的動態變化。因此，本文從方法論角度出發，透過實際個案研究經驗與批判性的文獻檢閱，說明社交媒體與行動傳播（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之資料形式特徵與傳播活動特色，以及如何因應這些特徵進行研究方法設計及資料分析架構。

## 貳、社交媒體與行動傳播的資料形式特徵

從資料的形式特徵來看，社交媒體研究的鉅量資料研究與傳統社會科學的「量化」研究有很大差異。傳統社會科學的量化研究，偏向以量表或問卷方式詢問受訪者對於某事的態度、意見或行為，加上受訪者的人口統計學變項（如：性別、學歷、職業等），透過統計學方式進行變項之間的關聯性分析。但此方法的缺點在於研究者無法讓受訪者填答每個小時實際在做的事，如：你一天用了幾次

手機、看了多久的電視。因此，有人認為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並不能反映人們的真實使用行為。

相較於傳統社會科學對人類互動的研究，依賴的是一次性、自我報告的資料來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結合資訊技術的數位媒體研究，透過視訊監看、E-mail 往來記錄分析、智慧裝置的使用記錄分析，可以達到每分鐘連續互動的觀察，提供了人際關係的結構與內容之資訊 (Lazer et al., 2009)。

目前許多關於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傳播裝置的研究採取在真實情境的實驗法，結合資訊科技的使用者行為記錄分析 (user log analysis) 及質化研究方法 (焦點團體、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進行使用者行為資料的收集與分析，研究者以小樣本人數的使用者為實驗受試者群體，讓他們使用載入行為記錄程式的行動裝置，連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段期間，觀察他們的行為如何產生變化，例如：MIT 媒體實驗室的 Reality Mining 計畫 (Eagle & Pentland, 2006)，芬蘭學者與 Nokia 手機研究中心合作的 Lifelogging 計畫 (Kärkkäinen, Vaittinen, & Väänänen-Vainio-Mattila, 2010)，政大資料系與傳播學院合作的電子書閱讀器研究計畫 (鄭宇君, 2013; Cheng, Liao, Li, Chueh, & Cho, 2013)。

在這種真實情境的實驗法當中，雖然使用者人數是小樣本資料 (大約是數十人)，但他們在實驗期間所產生的使用者記錄卻是鉅量資料，資料量由數萬筆到數十萬筆 log，研究者如何在其中過濾出「有意義」的行為資料，本身就是一個傳播研究的重要議題。特別是行動裝置的隨身性，人們經常隨意觸控式手機螢幕上滑動或按鍵，這些無意識動作會造成大量的 user log，如何建立一個好的分析單位，幫助研究者過濾與詮釋參與者的使用行為資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李蔡彥、鄭宇君, 2011)。

以電子書閱讀器使用者研究為例，單靠鉅量資料分析本身並無法解釋人們的行為，必須結合質化研究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才能解釋人們的數位傳播活動。如何找到合適的分析單位，整合來自使用者自身描述的閱讀經驗，與電子書閱讀器記錄的數十萬筆 log 資料，便是資料分析與呈現的一大難題。因此，透過使用者受訪時自述的閱讀情境，像是每天的「閱讀次數」轉換為計算機程式可判讀的操作型定義，藉此分析每一次閱讀歷程的內部操作順序，以及判讀閱讀的情境與類型。

透過質化資料與使用者 log 資料的分析，得以瞭解某位重度使用者的每日閱讀歷程，包括在通勤、上學、晚上等不同情境的閱讀類型，得以辨別長時間閱讀或是短時間閱讀，連續閱讀或非連續閱讀，並能進一步區辨平日與假日有不同的

閱讀行為，從圖 1 可以看到該名使用者平日的通勤及上課時間以短時間閱讀為主，晚上及假日則是連續的長時間閱讀。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的去中心化結構，參與人數眾多、訊息流動範圍廣闊，當研究者想要瞭解事件的鉅觀樣貌，在全球使用者參與的社交媒體中，該如何界定研究對象的母體範圍？例如：研究者想要瞭解臺灣總統大選期間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討論什麼？不同社群的傳播模式是否有所差異？這些問題難以透過傳統社會科學的母體界定及抽樣方式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因此透過鉅量資料的人文分析取徑，可幫助研究者收集人們在社交媒體中分散的資訊使用行為資料，並透過軟體工具協助分析展現其鉅觀形貌。

由於社交媒體的鉅量資料研究主要以使用者所留下的數位足跡為依據，無論是使用者的網路留言、在 Facebook 上按讚次數與打卡地點、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的記錄等各種數位行為痕跡，而它的研究前提假設是使用者的數位足跡無法說謊，因此透過分析使用者的數位足跡可以找出使用者真實的數位傳播行為。

但是，這種方法有二個主要侷限：第一是使用者的隱私問題使得資料難以取得，除了 Facebook、Google 等平臺服務業者擁有用戶的交易資料之外，其他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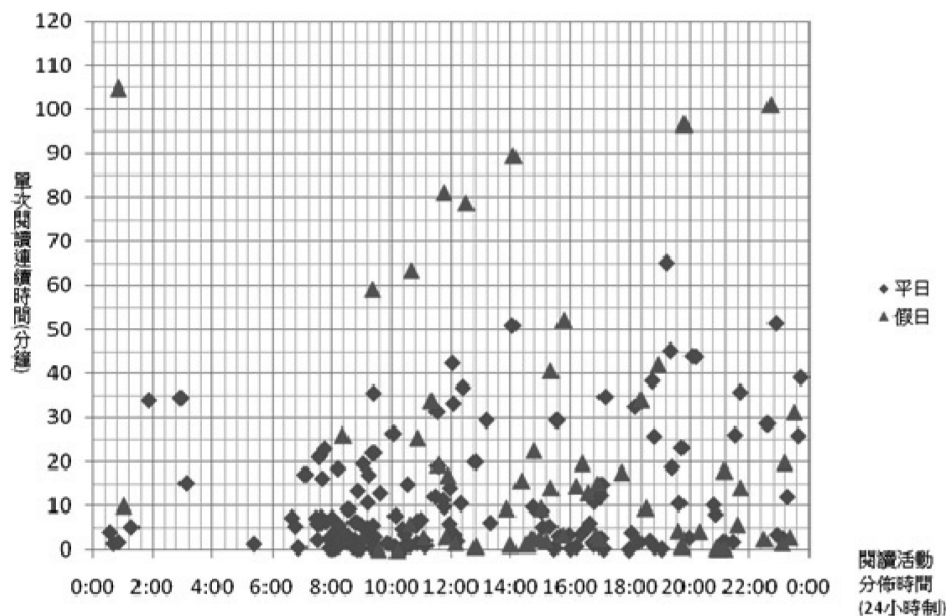


圖 1：電子書閱讀器的重度使用者之使用歷程

資料來源：鄭宇君（2013）。

究者不易取得使用者的數位足跡；第二是沒有留下數位足跡的使用者傳播行為資訊無法取得，包括心理、社會、情感層面等面向的傳播活動，如：Facebook 線上交友對於人的自我認知及情感影響，這些面向要結合質化研究方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詮釋，如：深度訪談或民族誌取徑的網路參與觀察所獲得的深度資料，研究者才能進一步解釋使用者進行特定傳播活動之動機、目的，以及這項活動對其日常生活實踐的意義。

## 參、社交媒體的使用者分布：從常態分布曲線到冪律分布曲線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科學研究所探討的對象是現實社會中的個體人，以完整的「個體人」做為統計分析的基本單位，因此母體與抽樣的概念主要依循的是常態分布曲線概念，以平均值  $\pm 1.96$  標準差的鐘型曲線為典型代表，量化研究便是依循大數法則針對母體進行抽樣與統計分析，以尋找「均值人」為目標，藉此描述整體社會特徵的依據（葉啟政，2001）。

然而，網際網路世界的分布特徵不是依循常態分布，而是冪律分布（power-law distribution），它是以絕大多數的低連結度節點與少數的高連結度超級節點（hub）所構成，前者像是一般的個人部落格，後者像是 Google、Yahoo、Facebook 等網站節點，因此網際網路節點所構成的複雜網路是無尺度網路（scale-free networks），而節點與連結數的分布關係依循的是冪律分布曲線，而不是隨機網路所依循的是常態分布曲線（Barabási, 2003; Barabási & Bonabeau, 2003）。冪律曲線在網路世界的應用，最為人熟知的是長尾理論或 80-20% 的法則，即 20% 的使用者貢獻了 80% 的使用量，或是 1-9-90 法則用來描述 Web 2.0 的媒體創用行為<sup>3</sup>。

在社交媒體普及之後，當 Facebook、Twitter 的人際網路關係可串起上百萬名使用者的網路，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距離從過去的六度分隔拉近為四度分隔，有學者引用冪律曲線來解釋人們在社交媒體中的人際互動與參與行為，亦即把社交媒體當中的每一個人當成社交網路中的一個節點。Hartley (2012) 指出，人們在社交媒體中的交友行為遵循冪律分布，多數使用者的連結節點數量（朋友數與追隨

3 以 Youtube 的媒體創用內容（users generated contents）為例，假使線上有 100 個人，只有 1 人會創作內容，10 人會與它互動（如：給意見、評分），其餘 89 人只是觀看（van Dijck, 2009）。

者的總合)通常只有幾百個人,只有極少數使用者擁有上萬個連結節點,前者指的是一般使用者,後者通常是名人、生產者(如:記者)、各領域的代表人物等(如圖2所示),而一個新的節點加入網絡時會傾向連結那些具有高連結度的節點,換言之,新的使用者剛加入社交媒體時,也會傾向連結自己所關注領域的高連結度節點。

Rheingold (2012) 以幂律分布來解釋社交媒體時代的公眾參與行為,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人們在社交媒體會有不同程度的參與,這些事件都是由少數人發起領導、協調、協作、書寫論述、定調運動主軸,這些少數參與者透過集體協作貢獻大部分的內容,他們對群眾活動貢獻度最高,而絕大多數人只是透過分享、訂閱、評論、標籤,或閱讀等方式參與事件,但每個分享者的些微力量聚沙成塔,才讓這些事件得以流傳並廣為人知。近年發生在臺灣的反媒體壟斷、反核遊行等,亦是透過上述過程,達到在社交媒體上訊息傳散與動員群眾的目的。

當社交媒體使用者的參與情況呈現幂律分布,對於傳統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產生極大挑戰,過去在現實社會中以「個體人」為分析單位,依循常態分布曲線進行大數法則的抽樣,透過統計分析尋找「均值人」的方式,這種資料收集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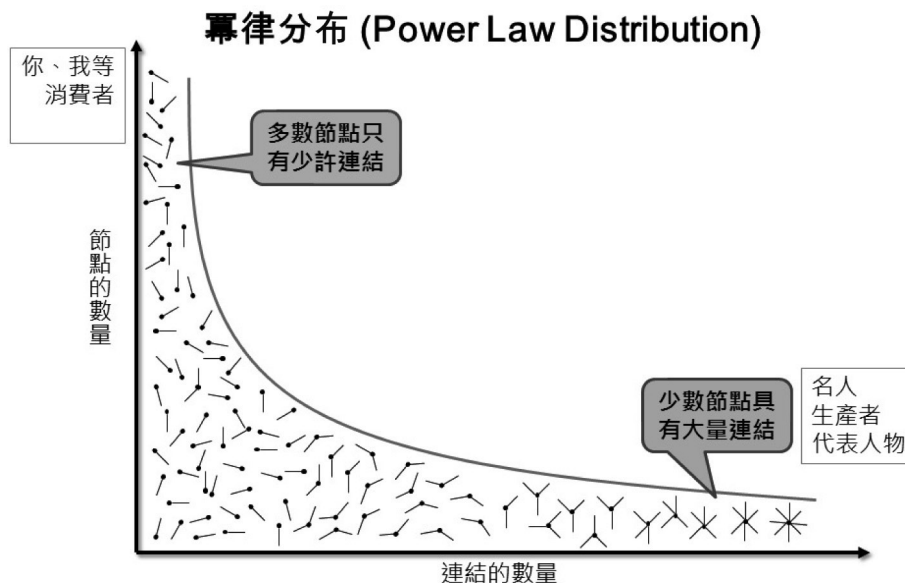


圖 2：社交媒體中的幂律分布關係

資料來源：改自 Barabási (2003: 71) 無尺度網絡, 轉引自 Hartley (2012: 188)。



分析方式是否還適合用來描述社交媒體使用族群的鉅觀輪廓？今日人們在網路上的使用行為愈來愈趨向片段與碎裂化，網路上所留下的留言、點閱數、按讚數、推文等只是碎裂的使用者足跡，而網路用戶也不等於是現實世界的完整個體人（此乃傳統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位），研究者如何從碎裂的使用者足跡資料中，勾勒出真實使用者的傳播活動樣貌，便成為人文社會研究的一大挑戰。

boyd & Crawford (2012) 就曾指出，Twitter 的用戶帳號不代表真正的使用人數，研究者必須深入探索帳號與人之間的連結為何？可能多人共用一個帳號，或是一人持有多个帳號，或是機構帳號或機器人帳號，例如：Twitter 號稱有 5 億用戶，但很高比例是不活躍用戶、重複用戶、機構用戶等，在社交媒體研究中如何判別活躍帳號（active accounts）本身就是個重要的研究議題。

從日常生活的觀察不難發現，許多人在網路平臺服務中只是開設帳號卻很少使用，但也有不少人開設大量帳號發送 tweets，有些是透過程式自動聚合的代理人帳號，有些是機器人帳號大量發送相同內容；然而，即便是代理人帳號或機器人帳號，也不能說它背後沒有「人」的意圖存在，完全將它剔除在分析的範圍之外，這些透過程式發送 tweets 的帳號，亦有人文活動的參與，例如：其他使用者也會轉發這些 tweets，或者某些新聞機構的官方 Twitter 帳號，除了自動發送最新的新聞之外，有時也有編輯發文與讀者進行真實互動<sup>4</sup>。

因而，在社交媒體研究當中，倘若人文社會研究者所關心的不只是「網絡節點」，而是真實的人類活動，那麼如何從鉅量資料中過濾出真實的使用者活動便是一個關鍵議題：在大量的社交媒體數據中，研究者如何在其中找出真實的媒體創用者足跡<sup>5</sup>？

以 2012 年臺灣總統大選 Twitter 上中文討論為例（實際上包含了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的 tweets），在大選前後一周透過 Twitter API 以關鍵字搜尋方式擷取了 2.8 萬則中文 tweets，共得到 9,416 個不重複的使用者帳號（鄭宇君、陳百齡，2013 年 7 月）。研究團隊曾經透過計算機程式擷取所有發文帳號個人檔

4 以 2012 年臺灣總統大選的 Twitter 討論為例，在相關 tweets 中收集到約 9,500 位發文的使用者帳號，研究者原本想先剔除代理人帳號或機器人帳號，再分析剩下的真實使用者帳號，但即使透過人工方式逐一檢視這些帳號的近期發文，也很難判斷某些帳號到底是否為「真人」所發布，即便是代理人帳號，也有一定數量的追隨者，這些追隨者也會轉發此帳號的推文，因而這些帳號也可能確實參與了人們的傳播活動。如何區辨真人用戶與機器人用戶帳號，也是目前社交媒體研究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有些資料科學家透過長期收集 Twitter 的所有帳號推文，再計算這些帳號是否表現出固定的行為模式來做為判準。

5 本文以媒體創用者（media prosumers）為描述當前社交媒體中的使用者，因為他們既消費又生產，每個人都會在 Facebook 上貼文、打卡，也會觀看別人的內容。

案中的資料，包括使用者 ID、自選語言別、自我標示的地理位置，以及當時擁有的朋友數（friends/followings）、追隨者人數（followers），並將個別使用者擁有的朋友數與追隨者人數相加，視為他所擁有的連結數量<sup>6</sup>。藉此得以瞭解參與 2012 年臺灣總統大選的 Twitter 討論社群之使用者分布情況，如圖 3。

圖 3 顯示了社交媒體的冪律分布不僅是理論上的概念，在實際個案分析中亦可證實，如：參與 2012 臺灣總統大選的 Twitter 討論社群亦呈現冪律分布的狀況。仿照圖 2 的表示方式，圖 3 的 X 軸代表單一節點所擁有的連結數量（意即某一帳號所擁有的朋友數與追隨者數量總合），Y 軸代表的是 users 數量。擁有最多連結數量的用戶是中國異議藝術家艾未未 @aiww（位於最右方的節點），他當時擁有 13 萬名朋友與追隨者，其餘擁有 1 萬個以上連結的用戶大約只有 70 人，絕大多數使用者帳號擁有的連結數在 5,000 個以下，其中包含一般使用者，以及無法判別的機器人帳號或垃圾帳號。有些個人用戶可透過人工檢視找出真實身份的線索（包括所處地理位置、職業、身份認同、個人部落格或其他相關網路資料），但絕大多數帳號鮮少留下可供追溯真實身份之線索，難以從其數位足跡中判斷其使用動機與目的。倘若研究者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從 9,000 多位用戶中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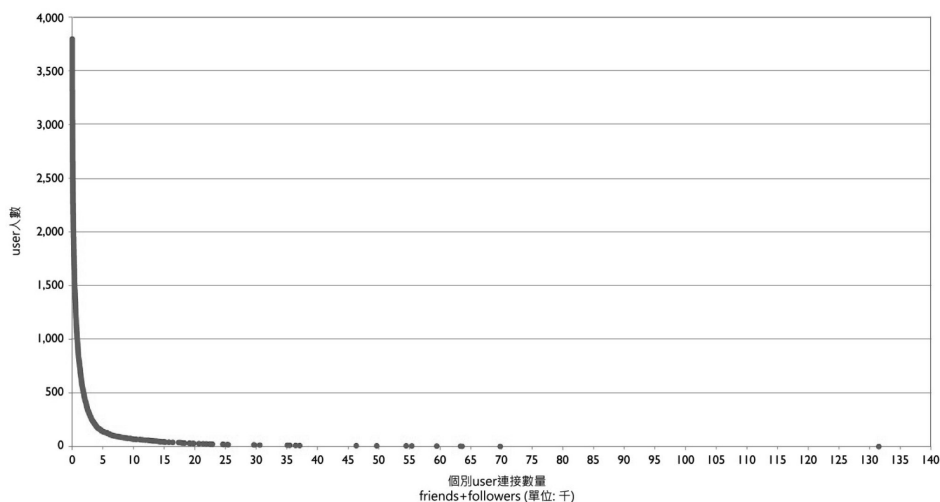


圖 3：2012 臺灣總統大選 Twitter 討論社群的冪律分布

6 本研究擷取使用者個人檔案的時間為 2012 年 3 月，發文帳號的朋友數及追隨者人數只能反映當時的數量。然而，由於每個帳號所擁有的連結數可能達成千上萬個，擷取使用者個人檔案所需計算資源更為龐大，擷取過程中機器數度當機，有些帳號可能當時就已被刪除，或是其他因素未被擷取到，最後研究團隊並未擷取所有帳號的個人檔案，僅得約 3,796 個帳號資料。圖 3 即是根據此 3,796 個節點所繪製而成的圖表。

取一定數量樣本進行用戶帳號分析，所抽取到的樣本絕大多數是位於圖3左方這些影響力低的用戶，難以掌握到具影響力的關鍵用戶。

當社交媒體的使用者行為遵循著冪律分布曲線，研究者在面對母體與樣本的態度必須有別於傳統社會科學研究依照常態分布曲線——以尋找「均值人」為目標，而忽略「離散人」的重要性。相對地，在社交媒體研究中，如何找出那些對於社交網絡深具影響力的「離散人」更顯重要，像是從整體社交網絡中找出那些具有高連結度的使用者，除了名人、意見領袖因為有眾多追隨者，在訊息傳遞過程中較一般使用者更可能具影響性，但追隨者人數多寡不等於影響力大小，有些社交媒體參與者雖然擁有的追隨者人數不像名人那麼多，但積極與多方社群互動，在訊息的傳遞上反而扮演重要的橋樑角色。這些「離散人」在社會網絡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卻難以從大量節點中用隨機抽樣的方式找出，因為隨機抽樣可能會抽到大量不活躍或難以掌握的節點，研究者必須透過鉅量資料的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才能找出這些人及其網絡關係。

在行動傳播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現象，特別是智慧型手機具有拍照、社交、遊戲等各種類型功能，造成使用行為更加分殊化。有人熱愛拍照、不玩遊戲，愛玩遊戲的人也各自喜愛不同款遊戲，倘若把所有人的使用行為記錄「均值化」來看，研究者反而看不出特殊的傳播活動行為特徵，因此在研究分析時，必須透過「分群」方式在不同類型使用行為中（拍照、社交、遊戲）找出各種類型的重度使用者（power users），再針對其使用行為特徵進行分析（Cheng et al., 2013）。

這些重度使用者也許在群體中為數不多，但他代表的是某一類媒體創用行為的「專家」，相較於其他使用者，他更擅長從事某種媒體創用行為，例如：班上最常使用平板電腦隨身閱讀的學生、同學中最會使用手機拍照打卡的使用者，研究者分析這群重度使用者的使用記錄（user logs），更容易掌握人們如何因應情境脈絡而產生傳播行為的變化。

## 肆、鉅量資料分析之研究侷限與倫理議題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科學研究與鉅量資料分析的研究設計之最大不同在於，從理論驅使（theory-driven）到資料趨使（data-driven）之間的差異。傳統社會科學是透過理論驅動以決定資料收集與測量方式，而鉅量資料的收集經常是由資料背景的人進行，他們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概念並不熟悉，以所能取得的最多資料進行分析，試圖從中發掘事實。

批評者認為，鉅量資料是以滾雪球方式或合法可收集到最多資料進行分析，但研究者多半只從一、二個平臺進行研究，這容易造成取樣偏誤（availability bias）的問題，研究者不再根據理論定義的分析單位和測量方法來收集資料，反而傾向選擇任何可取得的資料數據，正當化數據後再使用它們，如此一來，容易導致後來對於資料的詮釋與效度問題，根據線上資料所得的研究成果未必能延伸到不同平臺 (Mahrt & Scharkow, 2013)。

Schradie (2013) 也指出類似觀點，無論是經由 Google、Twitter 等 API 取得鉅量資料從中推論人類行為，這些資料的量都還太小，她強調問題在於數位落差。相較於大學程度與中產階級生活型態的人，低收入與低教育程度的人較少有機會近用網路或是創造數位內容。倘若新聞記者、學術研究者或政策制定者仰賴數位媒體的鉅量資料分析結果，那他們忽略了這些資料並不包含許多窮人或工人階段的行為資料，這個鉅量資料落差可能導致記者的報導不正確，或學者的研究誇大了現實。她認為，這並不是說要丟掉鉅量資料，而是需要找到方法來使用這些儲存在數位雲的資訊，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它如何代表社會整體，而不只是那些上線的人，研究者必須認知到這些鉅量資料比原先所想像得還要小。

因此，是否採用鉅量資料分析取徑？Mahrt & Scharkow (2013) 建議，研究者必須認清研究問題的核心：關注的是集體還是個人？因果解釋還是預測？如果只是透過鉅量資料分析部分的網路使用者，那很難將研究結果推論至整體網路使用者，因為其中收集到的個人差異（或人際間變異）的訊息太少了；相對地，如果透過鉅量資料分析的方式來研究群體層次的問題，也未必能將研究結果套用在個人層次上。

另一方面，從研究倫理的面向來看，雖然社交媒體研究收集的資料來源多半來自網路上的公開討論資料，但多數使用者並不知道自己的資料被收集與分析，他們是非自願的資料公開者。特別是透過社會網絡分析之後，研究者可能發現某些使用者扮演不同社群的橋接者角色，或正好是訊息擴散過程的關鍵者，但當事人未必知道在事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為了解釋這些使用者在社交網絡關係中的重要角色時，又不能不與他的網路身份結合，包括研究者長期進行網路田野觀察所得的資料記錄。可是一旦將這些社交網絡關係發布之後，這些關鍵性使用者的網路身份就被曝光，這可能影響其日常生活，甚至是人身安全，如：中國大陸匿名的網路使用者。因此，是否揭露社交媒體分析中的使用者公開資料，包括使用者的帳號名稱、貼文、社交網絡關係，都是研究者必須考量的倫理議題。

綜觀目前所檢閱的文獻中，對於類似議題的處理，不同研究者有不同作法。倘若研究主題不是聚焦在特定的個別使用者身上，多數的社交網絡關係不會發布使用者的網路身份（user id），但若研究主題是與特定的個別使用者相關，如：研究網絡化社會的著名學者 Barry Wellman 的 Twitter 社交網絡關係，跟他互動的使用者帳號名稱會顯示在研究結果中，以解釋這些人的互動關係與頻率 (Gruzd, Wellman, & Takhteyev, 2011)。

另一方面，若是重大事件最常被引用或分享的使用者帳號，研究者通常會發布這些使用者帳號名稱 @user，以及他們在事件期間所發布的 tweets 數量與內容，這些使用帳號經常是新聞媒體、政府機關等機構帳號，或者是新聞記者、知名部落客、公眾人物等，他們有許多追隨者，本身會意識到每則發言都是在對眾多追隨者公開談話。因此，揭露這些使用者帳號的發言內容，較沒有侵犯個人隱私的疑慮，如：英國衛報記者與紐約時報記者在 2011 年倫敦暴動時利用 Twitter 進行突發新聞的報導 (Vis, 2013)。偶有例外情況，當知名度低的使用者發布某則 tweet 在短時間內被大量分享，在這類情況下，使用者在當下就知道自己的 tweet 被大量轉發，若有不妥內容，他會立即刪除該則推文，這類情況經常關於災難的第一手照片或是訊息。

社交媒體鉅量資料研究所涉及的隱私議題，仍有諸多爭議待解。基於學術的立場，研究者希望發掘社交媒體中公眾意見與訊息的流動過程，包括公眾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訊息傳遞角色，而非揭露個別使用者的私人談話，因此研究者在資料分析與發布研究結果的過程中，需要更加審慎考量研究發布後的結果是否可能對無辜的第三者造成傷害，才能兼顧研究的正當性與研究倫理的重要性。

## 伍、結語

儘管鉅量資料分析可幫助人文社會研究者看到傳播活動的不同面向，但研究者亦當小心這種方法可能的偏誤。boyd & Crawford (2012) 曾經提醒，bigger data 不一定等於是 better data，雖然鉅量資料分析提供了大量數據，但不代表這樣的取徑適合所有研究問題；且鉅量資料分析必須在脈絡下才有意義，研究者分析社交媒體上所收集到的訊息，並無法確實反映使用者線下的真實關係。換言之，單從鉅量資料的分析結果本身並無法解釋人們為什麼要進行某種傳播活動，必須透過理論觀點與質化資料的輔助，才能詮釋人們的數位傳播活動。

因此，研究者必須小心鉅量資料分析常見的幾個迷思：首先，資料數量愈大愈好？實際上，過於龐大的資料將增加研究過程中篩選資料的困難度，研究者最好一開始就能根據研究目的精確地設計資料收集方式，避免之後耗費過多精力從大量垃圾資料中篩選出有用資料；其次，有了鉅量資料分析，還需不需要理論？許多學者都同意，理論可協助研究者進行有效的研究設計，減少取樣偏誤，能更精確地收集到所要資料；第三，鉅量資料分析面對的是不斷變化的傳播活動，這一刻的意見討論數量與內涵可能就與下一刻有很大差別，如何掌握與測量時間變異量便是鉅量分析的一大挑戰，以目前狀況而言，研究者還難以進行即時的資料收集與分析，多半是設定一段時間間隔進行資料收集，之後再選定合適的時間單位進行資料分析，例如：突發災難事件的社交媒體資料浮現，經常是以秒或分為計算，但大型比賽轉播或政治選舉事件，則以小時或天為分析單位，因此研究者選擇以「分鐘」、「小時」或「天」做為分析單位，所呈現的是不同時間變異量的切面，端看研究者希望從資料變異量中察覺那種類型的洞見。

鉅量資料人文研究的模式之所以存在，乃在於人文學者與電腦科學家之間的協作能夠幫助研究者開展更多挖掘社會真相的途徑。因此，如何有效減少資料專家與人文學者的資料分析落差乃是當前的首要工作，根據先前個案研究經驗與文獻檢閱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 一、熟悉資料的基本單位：瞭解使用者數位足跡的 **metadata** 格式，像是使用者在 **Twitter** 發送一則貼文，這個動作在數位媒體中所記載的資料格式包含那些欄位，像是使用者帳號、貼文內容、貼文時間、貼文地點、使用語言類別等，這可以幫助研究團隊在有限人力及計算資源下，選擇較為有效的資料過濾與分析方式。
- 二、瞭解並轉譯資料專家與人文學者的彼此思維邏輯：跨領域研究團隊成員必須瞭解資料語言邏輯與質化研究厚描之間的差異，找出合適分析單位以整合來自資料與質化研究的資料，以決定使用何種語言表達最能呈現事物的豐富面貌。
- 三、鉅量資料分析僅是真實現象的某一時間切片：面對社交媒體上隨著時間不斷變化的傳播活動，研究者必須意識到所收集的鉅量資料僅是真實現象的破碎痕跡或是某一時間片段的資料變異量，必須仰賴研究者的分析經驗，以及對事物觀察的敏銳度，調整細節或改變資料篩選條件，才能有效地詮釋資料分析結果與找出洞見，並透過鉅量資料分析掌握真實現象在時間流變中的樣貌。

## 參考書目

- 李蔡彥、鄭宇君 (2011)。〈資訊科技與新媒體研究之發展〉，《傳播研究與實踐》，1 (1)：75-80。
- 林俊宏譯 (2013)。《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場：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革新》。臺北，臺灣：天下文化。（原書 Mayer-Schönberger, V., & Cukier, K. [2013].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London, UK: Murray.）
- 葉啟政 (2001)。〈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統計社會學的兩個概念基石〉，《臺灣社會學》，1：1-63。
- 鄭宇君 (2013)。〈從數位學習到新素養：電子書閱讀器對高中生社群的可能影響〉，《新聞學研究》，114：127-163。
- 鄭宇君、陳百齡 (2013 年 7 月)。〈探索 2012 臺灣總統大選之社交媒體浮現社群：鉅量資料分析取徑〉，「2013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臺灣，臺北。
- 鐘慧真、梁世英譯 (2013)。《Big Data 大數據的獲利模式：圖解·案例·策略·實戰ビッグデータの衝撃》。臺北，臺灣：經濟新潮社。（原書城田真琴 [2012]。ビッグデータの衝撃 = Impact of Big Data：巨大なデータが戦略を決め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Barabási, A. L. (2003).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Plume.
- Barabási, A. L., & Bonabeau, E. (2003). Scale-free networks. *Scientific American*, 288(5), 50-59.
- Berry, D. M. (2011). The computational turn: Thinking about the digital humanities. *Culture Machine*, 12. Retrieved from <http://people.cs.vt.edu/~kafura/CS6604/Papers/Digital-Humanities.pdf>
- boyd, d., & Crawford, K.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cholarly phenomen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662-679.
- Burgess, J., Bruns, A., & Hjorth, L. (2013). Emerging methods for digital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 1-3.
- Cheng, Y.-C., Liao, W.-H., Li, T.-Y., Chueh, C.-P., & Cho, H.-C. (2013). Exploring the reading experienc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E-Book rea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line Pedagogy and Course Design*, 3(1), 17-32.

- Eagle, N., & Pentland, A. (2006). Reality mining: Sensing complex social systems.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10*, 255-268.
- Giles, J. (2012).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Making the links. *Nature, 488*, 448-450.
- Gruzd, A., Wellman, B., & Takhteyev, Y. (2011). Imagining twitter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 1294-1318.
- Hartley, J. (2012). *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West Sussex, UK: Wiley.
- Kärkkäinen, T., Vaittinen, T., & Väänänen-Vainio-Mattila, K. (2010). *I don't mind being logged, but want to remain in control: A field study of mobile activity and context logg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10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NY.
- Lazer, D., Pentland, A., Adamic, L., Aral, S., Barabási, A. L., Brewer, D., et al. (2009).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cience, 323*, 721-723.
- Lewis, S. C., Zamith, R., & Hermida, A. (2013). Content analysis in an era of Big Data: A hybrid approach to computational and manual method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 34-52.
- Mahrt, M., & Scharrow, M. (2013). The value of Big Data in digital media research.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 20-33.
- Manovich, L. (2011). Trending: The promises and the challenges of big social data. In M. K. Gold (E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inneapolis, M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manovich.net/DOCS/Manovich\\_trending\\_paper.pdf](http://www.manovich.net/DOCS/Manovich_trending_paper.pdf)
- Rheingold, H. (2012). *Net smart: How to thrive onlin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Schradie, J. (2013). Big Data not big enough? How the digital divide leaves people out. *PBS Mediashift*. Retrieved from <http://www.pbs.org/mediashift/2013/07/big-data-not-big-enough-how-digital-divide-leaves-people-out>
- van Dijck, J. (2009). 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generated conten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 41-58.
- Vis, F. (2013). Twitter as a reporting tool for breaking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1*, 27-47.



# The Computational Turn for New Media Stud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heng, Yu-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As digital technologies penetrate deeper into our lives, mobile devices and social media occupy more and more of our time, user behavior and communication content increasingly diversify. Following this communication shift, methods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social sciences become seriously challenged. To identify digit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users, new media research turn to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new ally.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employed to collect large amounts of data and to trace digital footprints of users. Driven by the Big-Data approach, this computational turn is currently taking place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its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ase-study experiences, this paper addresses issues concerning the Big-Data approach used in new media studies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possibilities are identified and explained along with challenges.

**Keywords:** the computational turn, mobile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Big Data, digital humanity

---

\* Email: colisa@gmail.com

Received: 2013.09.06

Accepted: 2013.10.26

## 流動的空間，液態的隱私： 再思考社交媒體的隱私意涵

江淑琳\*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從社交媒體的角度討論當前隱私研究的面向，以及從使用者角度重新思考隱私的意涵。本文先指出社交媒體是流動的空間，在此空間所揭露的隱私意涵會隨使用者與情境而改變，過去研究未體認到此點，而出現隱私矛盾（privacy paradox）的現象。本文認為，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來看隱私，使用者所採取的隱私管理政策是目前研究的重點，然而從此角度出發也發現使用者存在控制的矛盾（control paradox），誰該為隱私被入侵負責，文獻上也提供各種討論。接著，本文檢視目前臺灣已出版的臉書與隱私研究，並討論目前國內外既存文獻的方法問題。最後，本文繼續思考社交媒體時代的隱私研究方向，並提出網路環境脈絡中隱私權力形式不同於傳統社會定義下的隱私權異同之處。

**關鍵詞：**隱私、隱私矛盾、隱私管理政策、控制矛盾、社交媒體

---

\* Email: CShulin@googlemail.com

投稿日期：2013 年 9 月 11 日

接受日期：2013 年 11 月 6 日

## 壹、前言：流動的空間，液態的隱私

本文從社交媒體使用者的角度，重新思考新媒體時代中，隱私意涵與研究面向。Bauman (2000) 提出「液態現代性」的概念時，指出「液態性」(fluidity) 的特色是沒有固定形狀，遇到不同的情況，會不斷改變其形。Bauman 提出這個概念的原意是用來反駁 Ulrich Beck 的「第二現代性」(second modernity)，本文則挪用此液態概念來看待目前在網路、平板電腦或手機等移動性裝置 (mobile devices) 之間流竄、打破各種形式空間的社交媒體，以及社交媒體上所揭露的個人資訊之隱私意涵。

網路是一個流動的空間已經無庸置疑，從早期的電子郵件到當今最多人使用的社交媒體——臉書，我們看到一個發展成熟的流動空間。這個流動空間的特色是，我們想要暫時占為己有的私人訊息，很容易就從我們手中溜走 (Solove, 2007)，很容易就去到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地方，而且別人可能比我們更瞭解我們自己 (Nissenbaum, 2010)，進而出現身分認同上的危機 (Bossewitch & Sinnreich, 2013)。

社交媒體處於流動的空間，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發的電子郵件 (email)、寫的部落格 (blog) 文章或在全球使用者已超過 12 億人註冊的臉書 (Facebook)<sup>1</sup> 上所發的動態文，會被誰看到、會被如何使用。但是我們也不是完全不想被看到，發出訊息的用意是要傳到接收者，所以我們需要有接收者。當訊息跑到我們設定的訊息接收者，對我們而言，隱私並沒有被侵犯。由此來看，隱私的定義是液態的，意思是說，沒有固定的定義，依情境而定 (Nissenbaum, 2010)。

臉書的訊息在不同的流動空間中穿梭 (Nissenbaum, 2010)，我們可以從三種經驗類型來說明臉書何以為流動的空間。首先，從使用裝置的面向來看，只要維持上網的狀態，使用者可以在電腦或手機等不同的裝置上使用社交媒體，例如睡前利用電腦在臉書上發動態，第二天早上眼睛一睜開、滑開平板手機就可以看到多少好友在動態上按讚或回應，個人揭露的資訊流動於電腦與手機兩種裝置之間。

第二，臉書打破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線，公私領域的空間互溢。使用者在臉書上抒發個人情感或狀態的發文，出現在公共的網際網路空間，雖然可以透過個人隱私設定來控制觀看的朋友，但朋友再繼續轉發或分享，私人資訊便可能不斷被複製出現在原始使用者無法掌控的公共空間了。

1 參考網址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3/09/05/facebook-delays-new-privacy-policy/?\\_r=0](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3/09/05/facebook-delays-new-privacy-policy/?_r=0)

第三，臉書打破我與陌生人的空間界限。使用者在揭露訊息、發動態的同時，資訊同時出現在好友的臉書頁面上，個人資訊從使用者的臉書空間流動到朋友或第三人的臉書空間，朋友再透過分享、按讚或回應等功能，不知不覺也出現在自己與好友之外的第三人臉書頁面上，例如我們會看到自己的臉書頁面出現 A 好友在其好友 B 的動態上回應或按讚，但 B 並不是我們臉書上的好友。

網際網路出現前後，我們對資訊及隱私有了不同的關心面向。網際網路出現之前，我們擔心的是資訊稀有的問題，網際網路出現之後，我們關心的是資訊如何移動。談到隱私，我們過去擔心的是資訊如何隱藏不為所知，現在我們關心的是資訊如何揭露、收集、使用 (Bossewitch & Sinnreich, 2013)。

因此，隨著空間的流動，隨著我們對隱私的不同關心角度，隱私不能再只從公／私兩元區分法來看，而即便試著區分，公私領域的界線與定義也已經模糊，應從液態的、流動的角度來分析。Palen & Dourish (2003) 提出隱私控制是一種動態的過程 (a dynamic process)；Nissenbaum (2010) 從自我揭露的訊息是否合乎社會規範來定義隱私，她認為，在新媒體時代，要從脈絡看 (privacy in context/contextual integrity)。越來越多學者從動態的過程，以及當下情境來定義隱私，液態的隱私意涵於焉出現。那麼，在流動的空間中，要如何研究隱私的意涵呢？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論文從臉書研究文獻所發現的「隱私矛盾」現象出發，從使用者角度再思考社交媒體上的隱私意涵與未來研究方向。

## 貳、隱私矛盾與原因

### 一、隱私矛盾

社交媒體之所以吸引使用者的原因在於足夠的信息流量 (information flux)，當訊息接收者接受到的訊息多於提供者所提供的量時，社交媒體就達到吸引使用者的目的，稱之為正面流量 (positive flux)，反之則為負面流量 (negative flux) (Bossewitch & Sinnreich, 2013)，當揭露在社交媒體上的資訊呈現正面流量時，便可以吸引更多使用者，這也是社交媒體發展的主因。

資訊傳播科技越來越發展之際，使用者開始擔心自己的隱私被外洩，然而，研究者卻發現，使用者在宣稱擔心自己對隱私的控制權利與能力將因為資訊傳播科技發展而受到影響的同時，卻自我揭露更多的私人訊息，這種對隱私的態度與實際行為不一致的現象，學者稱之為「隱私矛盾」 (privacy paradox) (Norberg, Horne, & Horne, 2007)。

以目前全球最多人使用的臉書為例，使用者雖然擔心隱私外洩，但仍然願意自我揭露私人訊息 (Barnes, 2006)。Acquisti & Gross (2006) 被視為「隱私矛盾」的經典研究發現，研究樣本中的大學生有九成雖然擔心個人隱私被入侵，但仍願意在臉書上自我揭露。

過去與網路空間相關的研究，從物理空間面向爭論網路空間屬於公領域或私領域，進而討論其他使用者能否對在網路空間（如部落格）的發文發表評論或引用。從這個角度來討論隱私，是從隱私受到的外部威脅切入，討論本應屬於私領域的個人訊息應該如何受到保護免於被侵犯。從這個角度出發，即是假設要如何阻止個人資訊外流以保護隱私，但社交媒體使用越來越普及之後，被認為本應受到保護不被揭露的個人資訊，卻在網路上不斷出現，顯然這樣的假設無法解釋社交媒體出現後的自我揭露現象，所以學者才會以矛盾稱之。

## 二、找尋隱私矛盾的原因

這種矛盾的現象受到研究社交媒體的學者好奇，試著找出臉書使用者的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原因。在回答問題之前，先借用 Leino-Kilpi et al. (2001) 整理的隱私四個面向：

- (一) 物理空間面向 (physical dimension)：重點在個人可以在物理空間上多接近其他人，關係到個人的空間與管轄領域，個人可以在這個空間或領域裡不受他人打擾。
- (二) 心理面向 (psychological dimension)：個人可以控制自己認知與情感的輸入或輸出以形成價值，以及有權利在何種狀況下與誰分享想法或私密的資訊。
- (三) 社交面向 (social dimension)：文化會影響個人與其他人維持關係的方式。
- (四) 資訊面向 (informational dimension)：個人有權利決定對誰、透過甚麼方式、揭露多少與自己相關的資訊。

這四個面向的隱私不是從公／私劃分，也不是純然劃分為給／不給個人資訊，而是提醒我們從更多元動態的角度思考 (Van der Velden & Emam, 2013)，包括放入心理面向 (psychological privacy)，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研究隱私揭露是主動或被動，例如，臉書公司讓使用者控制自我資訊揭露的程度，將隱私的控制權或交到使用者手上，是否讓使用者覺得有控制隱私的安全感，所以心理上更願意主動自我揭露。從社交面向 (social privacy) 出發，再加入資訊面向

(informational privacy) 所提及之個人是否主動揭露，以及分析隱私揭露之後是被監控還是分享訊息。此外，也可以試著理解隱私定義是固定不變抑或動態發展、隱私揭露只是單純分享或是某種交易。

Raynes-Goldie (2010) 進一步區分兩種隱私——體制的隱私 (institutional privacy) 與社交隱私。體制的隱私指的是法律定義下的隱私，組織如何使用並管理其所收集到的個人資訊，如何保護這些資訊，例如法務部主管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社交隱私指的是個人將資訊揭露給朋友、點頭之交或家人，關心的重點是，這樣的隱私該如何管理。社交隱私所考慮的是臉書頁面上的身份管理與脈絡管理，而非考量臉書背後公司如何使用並處理使用者的個人資訊。使用者並非不在乎隱私，但是他們在乎的不是體制的隱私，而是社交隱私，如果從體制的隱私去訪問臉書使用者，便會出現隱私矛盾的現象。

Van der Velden & Emam (2013) 指出，目前文獻大多放在隱私的外部威脅，而非使用者對隱私的感知。但現在的年輕人感興趣的不是資訊隱私，也不是政府或企業收集他們的個人資訊，年輕人比較在意的是社交隱私。

與隱私相關的另一個分析概念——監控也常在臉書研究被提及。監控的概念源自於傅柯的圓形監獄、全景式、由中心向外監視。在社交媒體中，隱私的揭露是種參與式監控 (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包括由分享個人資訊——個人基本資料、活動、信仰、狀態、喜好等等——所形成的相互平行的實踐 (mutual horizontal practices)，所以不是由上而下的監控，而是由下而上的監控，sousveillance (sous 是法文字首，意指 below，與 surveillance 的 sur 意指 above 相對) (Bossewitch & Sinnreich, 2013)。參與式監控是一種分享，並非交易 (sharing, not trade) (Albrechtslund, 2008)。如果一直以圓形監獄的概念去看臉書上的自我揭露為傳統由上而下的監控，會造成年輕族群的恐慌，也無法深入瞭解數位時代的使用者為什麼、如何使用社交網絡。

Dourish & Anderson (2006) 強調，對臉書使用者而言，隱私是一連串的交流或妥協，也是一種集體的資訊實踐，使用者一起學習資訊應該如何被分享、管理或保留。資訊與隱私實踐是脈絡式、表演式，而非靜態或固定統一的。如果侷限於一成不變的隱私定義，研究者很難說明為甚麼臉書使用者明明擔心隱私被侵犯，但仍願意提供私人資訊。

綜合上述角度觀之，隱私矛盾就可以得到解釋。使用者並非不在乎隱私，但其所在乎的隱私與發現「隱私矛盾」的研究者所界定的隱私定義或許不同，也可能是因為使用者願意在某種程度、範圍內犧牲隱私而獲取相應的回饋。

Tufekci (2008) 即認為，隱私矛盾之所以不是一種矛盾，原因在於，使用者其實（主動地）知道公開隱私有其好處，公開個人隱私的同時，其實也在獲取別人的隱私，因而達到社交的目的。所以，研究者應該問的是，如何在給／不給個人資料之間取得平衡，使用者如何（how）選擇／選擇哪些（what）個人資訊被揭露的動態過程。

## 參、動態隱私界定

從動態角度談論隱私可追溯到 1890 年 Warran 與 Brandis 兩位法律學者對隱私概念的分析，從隱私擁有者的角度出發去定義隱私，而非後來被習慣使用的公私領域二分法。這兩位學者認為普通法賦予個人有權（利）去決定自己的想法或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傳播給他者（引自 Leino-Kilpi et al., 2001），之後的許多研究則採用 Altman (1975) 的隱私概念，強調個人有權控制是否傳播、傳播何種資訊予他人。這些學者的分析方式，基本上賦予了隱私擁有者自主性，位移到當前社交媒體使用者的隱私自我揭露上，則是由使用者決定甚麼是隱私，不一定是法律上所保護的個人資料。

另有學者從文化的角度思考隱私的動態性，提出隱私不僅是理論上或法律上的現象（technical phenomenon），亦即不是理論上或原則上應該如何的一種現象，隱私是文化與生活的產物，所以應該要隨時被檢驗 (Dourish & Anderson, 2006; Papacharissi, 2010)。再者，誰有權力決定個人資料被近用的程度，也是個人與所處社會之間一個重要的協商場域 (Nissenbaum, 2010)。

Falk & Riel (2013) 的研究從男子氣概（masculinity）與避免不確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兩個文化指標，比較了瑞典人與德國人對臉書的隱私考量。瑞典人在研究裡被定義為低男子氣概、對不確定性的接受度比較高，德國人則相反。研究發現，瑞典人比德國人擁有更多臉書上的朋友，而且好友中的陌生人數也比較多；瑞典人對臉書公司及臉書上的好友有比較高的信任。德國則呈現相反的結果，德國人較在乎臉書上的隱私、較少對臉書上的朋友自我揭露，對臉書的信任感較低，希望對隱私的揭露有更多的控制。

Nissenbaum (2010) 提出「情境完整性」（context integrity）認為在新媒體時代要從情境與脈絡來看待隱私，隱私是一種界限的控制（privacy as boundary control），視脈絡來決定如何適當地控制個人資訊，也顯現出自己與他人的接近性，如果違反當下的社交規範或脈絡（a violation of contextual integrity），就等於冒犯隱私。

那麼，如果隱私定義隨著情境與使用者而改變，沒有了規範性的隱私定義，數位時代的隱私研究重點該是甚麼？Trepte & Reinecke (2011) 指出，社交媒體的使用者覺得資訊隱私受到威脅，卻也相信透過隱私設定與內容管理，可以從社交與心理隱私上獲益。據此，使用者會採取甚麼樣的隱私管理政策，是目前社交媒體隱私研究的可行取徑之一。

## 肆、隱私管理政策與控制矛盾

### 一、使用者的隱私管理政策

隱私無法簡單化約為固定的條件或特質，隱私是透過界限管理（boundary management）以促成個人的自我發展（Cohen, 2013）。陸續有學者分析使用者對不同型態資訊的隱私考量（e.g., Chiang & Chang, 2013），以及使用者如何管理臉書上的隱私（傳播隱私管理理論，[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 CPM]），包括如何分類不同來源的交友邀請（例如同事、父母）（e.g., Frampton & Child, 2013）等。

從這些新發展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觀察到甚麼是使用者界定、隨情境改變的液態隱私定義。從研究結果也可以大致得知使用者介意的隱私方向，有助於科技系統修正隱私設計。

#### （一）資訊型態的隱私設定

靜態或動態資料會影響使用者的隱私界定。使用者並非不在乎隱私，或許因為臉書採實名制，而使用者在加入臉書上的新朋友時，對象多半是真實生活中已經認識的人，所以並不在乎被知道靜態的個人資料。Acquisti & Gross (2006) 的研究顯示只有極少數的使用者啟動隱私設定。更多使用者認為臉書是一個安全而封閉的世界，所以使用者會放心放上個人的資訊（Donath, 2007）。

筆者針對 307 位大學生進行臉書隱私的半結構性問卷調查與訪談，試圖理解大學生如何看待臉書上的隱私議題，以及大學生願意在臉書上公開那些個人資訊，研究發現，大學生多半認為自己願意放上臉書的訊息就不是隱私，不在乎被別人看到，而且也覺得自己已經進行安全的隱私設定（Chiang & Chang, 2013）。



美國調查公司 Pew Internet 在 2013 年 8 月下旬對 12 到 17 歲的青少年所做的調查也有類似的結果。調查發現，有 46% 的受訪者會關掉記錄地點的服務，女生比男生更在意自己所在地點被知道，男女生在意的比率分別為 37% 及 59%<sup>2</sup>。

動態的個人資料是正在發生的個人資訊，使用者不見得願意馬上就公開給大量的其他使用者觀看。筆者進一步調查擔心隱私外洩與自我揭露的關係發現，擔心與不擔心隱私外洩的兩群受訪者，分別有高達八成以上不介意在臉書公開「靜態」的個人資料，靜態的個人資料包括個人真實姓名、電話、地址、念過的學校、工作的場所；但問到是否公開「動態」的個人資料時，表示擔心隱私外洩的受訪者在揭露動態資料時則較為保守，動態的個人資料指的是揭露當下正在進行的活動，例如打卡、與朋友聚會時標記（tag）照片等（Chiang & Chang, 2013）。

## （二）關係性的隱私設定

臉書上的隱私設定也是關係性的（給誰看）。Young & Quan-Haase (2009) 的研究發現，大學生有自己的隱私保護政策，並非天真的資訊揭露者，他們會使用假的個人資訊——假的名字、年紀、居住地等等來保護自己的隱私免於受到侵犯。又或者如果不想讓某些人看到自己的動態，也會改變動態或個人資料的可見度，即只設定給某些人觀看。

目前與關係相關的臉書隱私研究主要放在是否加入父母、老師或工作上的同事或上司為臉書好友。Frampton & Child (2013) 指出，使用者受於同儕壓力會加入同事或上司為好友，但其實也會擔心加入同事或上司之後，等於隨時都被監視，有些上司會從臉書上的動態發文去判斷請病假的下屬是不是說謊，因此，使用者為了不讓同事或上司知道太多自己在工作場所之外的生活，會採用隱私設定的方式，讓同事或上司只看到部分資訊。對使用者而言，隱私的界定是關係性的。

因此，當我們問使用者界定的隱私為何時，靜／動態資訊、揭露的對象都是影響的因素。所以，也許研究者該問的不是使用者認為的隱私為何，因為這恐又會落入「隱私矛盾」的問題方式——設定存在固定不變的隱私定義，忽略隱私定義是變動的。研究者或許應該試圖進一步從「關係」的角度，從使用者的自主性出發，配合揭露的訊息內容（靜態／動態）去訪談使用者，歸納出在不同脈絡、不同資訊接收對象、資訊內容下，使用者所界定的隱私。

2 參考網址 <http://pewinternet.org/Reports/2013/Teens-and-Mobile-Apps-Privacy/Summary/Summary-of-Findings.aspx>

## 二、控制矛盾

當使用者覺得比較有權力控制自己所揭露的資訊時，會相對願意自我揭露。不過，我們應該將隱私考量再細分為對個人資訊的「散布」(dissemination)、「收集」(collection)或「近用、使用」(access、usage)，使用者心理上認為控制隱私的權利，實際上只控制了個人資訊散布的權利，不代表有權利控制隱私被誰收集或近用(accessibility)，這種以為對隱私保有自主性的心理安全感，並不是真正擁有隱私控制權的現象，是一種「錯置的信心」(misplaced confidence)，學者稱之為「控制的矛盾」(control paradox) (Stutzman, Gross, & Acquisti, 2012; Van der Velden & Emam, 2013)。

這種控制的矛盾暗示使用者其實並不清楚臉書的隱私設定，也不一定使用隱私設定功能，並沒有實際上控制個人資訊。Tuunainen, Pitkänen, & Hovi (2009) 透過網路問卷調查 210 名臉書使用者，發現大部分的臉書使用者都是主動的使用者，會在臉書上揭露大量私人資訊，而且並不太擔心自己的資訊被不認識的人看到。雖然他們不太清楚臉書的隱私政策 (Facebook privacy policy)，尤其是第三人 (the third party) 其實可以透過臉書獲取使用者的個人資訊，但在接受過調查之後，許多使用者表示未來將會注意個人在臉書上的設定。

即便使用者確實使用了臉書的隱私設定，期待與實際之間也可能存有落差。Liu, Gummadi, Krishnamurthy, & Mislove (2011) 的研究發現，臉書上有 36% 的訊息使用原始設定，臉書設定的隱私功能只符合使用者 37% 的期待，而且臉書上被揭露的訊息遠高過使用者的預期。從這份研究可以發現，臉書公司雖然賦予使用者控制隱私揭露的自主性，但與使用者的期待仍有一大段落差。

Stutzman et al. (2012) 進行了一個長期性的研究計畫，從臉書在 2005 年的早期發展到 2011 年共計 6 年時間，發現三個衝突的趨勢。第一，臉書使用者越來越追求隱私，明顯減少公開分享個人資料；第二，但是當臉書公司在 2011 年左右改變了一些隱私設定的方式之後，這個趨勢也跟著改變了；第三，臉書使用者分享個人資料的數量與範圍更為增加，因此，對「沉默的傾聽者」(silent listeners)——臉書公司本身、第三方的 app，以及廣告商——自我揭露也隨之增加。

當控制的矛盾出現，沉默的傾聽者隨之增加，而隱私的定義又交由使用者決定之後，一旦隱私受到侵犯，誰該負責，是接下來隱私研究討論的議題。

## 伍、隱私的倫理取徑 (Ethical Duty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從隱私的規範性意義轉移到液態、動態與脈絡化的定義，由使用者自主地揭露隱私之後，隨之而來的是隱私保護之責任歸屬。當揭露隱私的權利／力交給使用者，究竟是使用者本身、第二方（儲存隱私資料的公司或政府機構）或第三方有隱私外洩的責任，目前仍有不同看法。

美國的做法是要求產業負責，歐盟則要求政府管制，有學者提出第三條取徑，由使用者自行控制，將臉書上的資訊當作是一種個人品牌來自我管理。但這第三條路如果遇到控制的矛盾現象，由個人來管理隱私的這第三條路就是條過於理想的路 (Van der Velden & Emam, 2013)。

從法律的觀點而言，隱私主要受到一般人權或組織的權利所保護，並且也會受到特定的資料保護法所保護，歐盟引領了資料保護法的發展，甚至被認為其所訂定的資料保護法過於嚴格，不過如果看線上社會網絡的個人資料法之發展，尚有許多發展的空間，資料保護法用意在保護個人的資料免於受到違法者或商業的侵害，但是很難規範到人類之間的社會關係 (Tuunainen et al., 2009)。

有學者從倫理取徑討論資訊隱私的揭露，該取徑又可區分為兩類。第一類從倫理取徑出發的論述以 Bruno Latour 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為基礎，認為科技本身並非完全中立，科技不僅是「工具」(tool)，也不只是達成某項「目的」的「手段」(ends/means)，人 (humans) 與非人 (non-humans) 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共構的整體 (co-constitutive unit)，我們無法明確區分科技的 (technical) 與社會的 (social) 面向，因為科技是在一個複雜的社會過程中 (例如基於利益、權力、價值、假設與信仰等) 設計發展而成 (Light, MaGrath, & Griffiths, 2008)。

回到臉書與隱私的討論上。Light et al. (2008) 認為，設計者／使用者與臉書之間應是相互形塑的關係，然而研究者通常看到的是設計者或使用者如何使用臉書，在臉書上揭露隱私，特別強調人類能動性，而忽略了科技的能供性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up>3</sup>。因此，Light 等人提醒我們，設計者／使用者及臉書這項科技設計，同時負有隱私揭露的倫理責任 (disclosive ethics)，不能將責任完全單方面歸咎於設計者、使用者或科技。這正是對於以下將談到、從使用者立場定義隱私時，常被認知的第二類責任歸屬之反思。

3 根據劉慧雯 (2013年7月) 的區分，affordance 的中文譯詞目前在國內有「機緣」與「能供性」兩者。「機緣」帶有哲學意涵，表達某種機率條件與緣分，較常使用於人文傳播研究；「能供性」著眼於物品對象對人提供的能力，較常使用於資訊科技與人機介面設計等領域。本文所引 Light et al. (2008) 之用法在其文章脈絡中之意涵傾向後者，故以「能供性」譯之。

第二類看法認為科技本身中立，責任歸屬在人類，包括設計者與使用者。歸屬於設計者指的是科技的設計者應該「為大多數使用者謀求最大之善」，且擔負確保其設計要達成此欲求的目標之責任 (Light et al., 2008: 2)；在第二類中，也是目前較多學者討論並爭議者，則是將責任歸屬於科技的使用者，尤其如臉書此類社交媒體將隱私權設定的權利／力交給使用者之後，當人們自主性地選擇揭露何種隱私時，同時也被期待對所揭露的自我隱私負有倫理責任，包括對於自我及對他人，對於自我指的是要自我保護該隱私，例如進行線上交易時，要確保自己的金融資訊安全性等，對於他人指的是所揭露的隱私不能侵犯到別人，例如揭露具有性騷擾意涵的隱私內容 (Allen, 2013)。

然而，使用者是否察覺或有能力控制自我揭露的資訊？根據 Acquisti & Gross (2006) 的研究指出，有三種使用者會近用線上社交網絡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即：提供線上社交網絡的網站 (hosting sites)、網路本身 (the network)，以及第三人 (third parties)。提供社交網絡的網站本身就擁有使用者個人資料，網路本身隨著時間與空間的擴張，例如資料的耐久性與使用者增加，會有更多機會近用使用者的個人資料，除了上述兩者之外，容易加入線上網絡，以及缺少基本的安全措施也便於讓惡意第三者竊取使用者身分以近用或誤用使用者資訊。

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使用者在同意下所上傳的資料就有隱私保護的責任嗎？使用者有能力保護在社交媒體上自我揭露的個人資料嗎？隱私被侵犯的責任歸屬在誰？雖然本文的興趣在重構隱私概念於社交媒體研究中，但隨著隱私概念重構之後，使用者擁有定義並揭露隱私的權力／利，資料保護的責任歸屬便值得探討。例如臉書提供使用者設定個人隱私揭露內容，使用者可以自己決定要在個人檔案上揭露何種資料：電話、住址、工作地點、婚姻狀況；也可以在塗鴉牆上隨時更新現況，因此使用者在某種程度上被期待負有保護自我隱私的倫理責任。

除了上述兩類之外，法律學者 Allen (2013) 的看法或可視為責任歸屬的第三類說法，其認為這樣的倫理責任應該奠基使用者合理期待臉書公司的隱私權政策，以及相信政府對於隱私的保護上。在政府與臉書公司提供合理的隱私權保護下，使用者才能自主性地定義並揭露隱私，並負有保護隱私的倫理責任。這或許可以暫時為誰應該負隱私保護之責下短暫的註解，並避免從使用者自主性角度定義隱私之後，政府政策與臉書公司因而規避保障使用者隱私免於被侵犯的責任。

## 陸、檢視國內相關文獻

前文已指出隱私考量不能自外於文化脈絡，因此，本節試圖提供國內臉書與隱私相關研究，檢視國內臉書使用者對隱私的看法是否出現文化上的差異，以及國內相關研究對臉書隱私議題的討論與可再豐富之處。

筆者在搜尋國內外文獻時發現，國內學術期刊較少出現臉書與隱私相關的學術論文<sup>4</sup>。例如，筆者以「臉書」為關鍵詞檢索「臺灣期刊論文索引」時，共搜尋到 20 篇與臉書研究相關的論文，其中僅有兩篇有關臉書與隱私之研究。

其中一篇為劉靜怡（2012）整理分析 Nissenbaum（2010）從情境脈絡來看待隱私意涵的觀點之後，進而以臉書為討論對象，分析網路時代的隱私困境。這是目前較有系統整理並討論網路環境脈絡中的隱私概念之作。另一篇為邢姍姍、閻瑞彥、蔡馨瑩、張家菱（2013）透過線上問卷平臺招募填答者，分析使用者隱私態度、隱私管理與知覺隱私品質，以及臉書所帶來的高人氣，對使用者隱私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使用者雖重視隱私，但自我隱私管理與知覺隱私的程度卻很低；使用臉書所帶來的人氣（popularity）與滿足，是影響後續使用行為的關鍵因素。其餘相關研究多為分析臉書的行銷功能，或是臉書與民主治理、選舉的關係。

筆者續以「臉書」為關鍵詞檢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共搜尋到 77 筆資料，研究議題涵蓋行銷、選舉、語言、臉書與學習成就之關係等，然其中僅有三篇碩士論文討論臉書與隱私的關係。張展嘉（2013）研究影響臉書資訊分享隱私行為，研究發現，信任會增加使用者分享隱私的意願；王旗麟（2012）分析使用者隱私保護與欺瞞行為，發現使用者為保護隱私會使用欺瞞行為；雲思綺（2012）分析臉書使用者的隱私保護策略，研究發現使用者多表示在意隱私，但不太清楚臉書的隱私政策。

就研究議題而言，上述五篇列舉之國內有關臉書與隱私的研究，除劉靜怡（2012）深入討論隱私概念之外，其餘四篇研究從實證角度探討國內臉書使用者的隱私態度與行為、影響使用者分享隱私的動機，以及使用者的隱私保護策略，但並未深入討論受訪者對隱私的認知，也未有比較臺灣使用者的文化特質與隱私定義的分析，因而無從得知臺灣的使用者對臉書上的隱私意涵或定義之態度與行為，與國外使用者相較是否具有文化上的差異性。

就研究方法而言，除劉靜怡（2012）以非量化方式討論隱私概念與網路時代

4 至筆者完成此文的 2013 年 10 月底止，共有兩篇期刊論文與三篇碩士論文以臉書與隱私為題，其他論文如分析自我揭露的動機，因不直接討論隱私概念，本文暫不討論。

的隱私困境之外，其餘四篇多採用線上問卷完成，在研究方法上顯得過於同質，這與國外既有文獻的研究方法問題相似，因此，下一節繼續檢視既有文獻之研究方法。

## 柒、檢視既存文獻之研究方法

臉書發展至今約 10 年，國外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學者並開始反省既存研究不足之處，本節整理臉書使用者的隱私態度與行為相關文獻，指出臉書研究既存的方法問題，並據此於下一節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Caers, De Feyter, De Couck, Stough, Vigna, & Du Bois (2013) 整理國外臉書研究指出，臉書研究對象多以美國、大學生（年輕族群）為研究樣本進行量化研究，且多以同所大學、同年級的學生為分析對象，樣本過於同質，缺少國籍或文化多元性。研究所採用的樣本數介於數百到上千人之間，多為方便取樣，與臉書註冊使用者超過 10 億人相較，研究對象的身份顯得過於集中且樣本過少，在概化研究結果時要相當謹慎。例如 Dwyer, Hiltz, & Passerini (2007) 研究社群網站使用者的信賴與隱私考量時，也指出該研究的限制在於學生受訪者人數太少，樣本不夠多元，且只以傳播學院學生為研究對象。

Caers et al. (2013) 進一步指出既有的研究之方法問題。臉書研究通常採取短時間、單次問卷調查，而非長時間的追蹤、比較，無法看出受訪者的隱私與態度行為是否隨時間而改變。再者，採取受訪者自我報告的方式，請使用者自我報告臉書隱私考量與行為的關係，其真實性也有待商榷。而採用問卷為研究方法，問卷的問題設計不如深度訪談深入，難以明確得知受訪者是否清楚臉書隱私政策而作出該回答，無法比較知道與不知道者之差異。

與研究方法相關的是研究者如何定義「隱私」，尤其以量表式的問卷要求使用者填答研究者定義下的某項隱私之介意程度，可能造成研究者認為的隱私與使用者所認知的隱私不一致，而出現文獻上的「隱私矛盾」現象。這同時也忽略了社交媒體上的隱私所具有的流動與液態特質。例如，將人口統計學資料（如姓名、年齡、性別等）作為隱私，以此設計變項讓受訪者回答隱私考量與揭露行為，但並未分析隱私揭露的脈絡與對象，結果得出受訪者對隱私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現象，即文獻中所提到的「隱私矛盾」。

為檢視國內大學生對臉書隱私的態度與行為，筆者以開放式問卷與深度訪談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大學生使用者並不擔心個人資料（如真實姓名、畢業學校、打工地點等）或加入粉絲頁會洩露個人隱私，但使用者擔心打卡或標記照片會洩露隱私，而有此考量者，打卡次數也較無此考量者為低。筆者從深度訪談結果發現，大學生臉書使用者在自認為擁有隱私控制權的前提下，會主動揭露個人資料、加入粉絲頁，以及打卡或標記照片，因此研究結果顯示並不存在「隱私矛盾」（Chiang & Chang, 2013），由此看出，研究者對隱私採取不同的界定方式（或不予界定），確實會得出不同的研究結果。當使用者不採取傳統社會定義下的隱私內涵，而以較為開放式的問卷填答與深度訪談，有助於進一步從使用者角度得知其隱私的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 捌、未來研究建議

社交媒體提供使用者越來越多自我揭露的機會，隱私的界線也越來越模糊，隱私是一個混亂又複雜的概念已毋庸置疑 (Nissenbaum, 2010)。本研究從社交媒體所處的流動空間思考隱私的液態特質，並指出在進行動態的隱私研究，強調使用者的個人自主性與控制權時，可能會遇到的質疑。隨著社交媒體不斷發展，有必要建立更多元的研究成果，重構新媒體時代的隱私概念。據此，本文從研究方法與研究議題提出以下建議。

### 一、研究方法上的建議

- (一) 調查研究結合資料上的探勘 (data mining)：過去量化研究所使用的樣本數較少，建議未來可以透過大型的問卷調查理解臉書使用者對隱私的認知、態度，並且在調查之前與之後使用資料探勘的方式，收集使用者在臉書上的自我揭露行為，以此對照使用者的態度與行為是否一致。然以此方式所收集到的資料可以得知臉書使用者的隱私考量之概觀與趨勢，但無法得知使用者的不同實踐方式，也無法開發使用者新的隱私界定方式。
- (二) 焦點團體或個別訪談：為補充上述方法的可能缺失，可以透過人數較少的焦點團體或個別訪談，得知臉書使用者較細微及變化中的隱私考量，較容易抓住液態的隱私意涵，也有助於發展調查研究的研究假設或問卷設計。由於臉書使用者定義隱私是種動態的過程，隱私的意涵也是液態性的，不斷累積各種質化的研究結果，有助於進行大型的調查、量化研究。

- (三) 實驗法：過去研究多以量化的問卷方式或使用自我報告進行臉書與隱私的研究，未來建議透過實驗設計以研究臉書使用者對隱私設定的理解，以及在實踐上如何進行個人隱私設定，藉此看出使用者介意的隱私為何。目前研究臉書隱私現象的學者已陸續進行實驗法與問卷調查，或與訪談法並行的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以補充自我報告所取得資料的完整性，並可以得知使用者在不同情境下的隱私態度與行為。未來隨著臉書隱私政策與議題更加多元化之後，可以將實驗法用於新的隱私議題研究上。

## 二、研究議題上的建議

從液態的隱私意涵觀看臉書使用者的自我揭露行為，以下幾個方向是本文建議未來研究社交媒體使用者的隱私界定時，值得繼續發展的議題。

- (一) 進行長期的研究。臉書自 2004 年發展至今將近 10 年，當時最早使用的大學生也已陸續進入職場或其他生命週期階段，但目前研究停留在單次的問卷調查或自我報告，未來研究者可以進行長期的研究，分析近 10 年隨著臉書隱私政策的發展，以及使用者生命階段的改變，使用者對臉書上的隱私考量之變化情形。
- (二) 進行不同人口統計學變項的研究。隱私矛盾的研究文獻已經針對人口統計學變項進行分析，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社交媒體所提供更新的自我揭露方式，分析這些自我揭露方式與性別、居住地、年紀、職業別等與隱私考量的關係。
- (三) 分析使用者的隱私管理政策。臉書賦予使用者自行設定隱私的控制權，使用者擁有隱私管理政策，目前已有使用者對於父母或同事、主管的隱私設定研究，未來研究可以分析更多不同的情境脈絡下、不同的使用者身分如何透過隱私設定以控制個人資訊的接收者與觀看者。
- (四) 研究文化差異與隱私考量的關係。美國與加拿大的臉書使用人口不及總使用人數的三分之一，但目前對於文化差異與隱私考量的研究多偏向研究美國，且整體研究文獻有限。未來研究者可朝向不同國家、不同文化面向進行比較研究。
- (五) 分析使用者的隱私設定素養。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分析使用者對臉書隱私政策的理解與使用，分析使用者進行那些隱私設定，比較使用者知道並會使用隱私設定功能前／後的實際隱私設定實踐。



(六) 臉書公司持續改變的隱私設定功能，與使用者的臉書隱私管理政策，兩者之間如何相互形塑新媒體時代下的隱私意涵，也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 玖、結語

本文針對當前人們普遍使用的社群媒體臉書及其重要的隱私課題進行概念探討，釐清對臉書隱私的相關認識與界定方式，從使用者的角度探討隱私管理過程中所透露的矛盾現象，並勾勒出個人使用者面對網路的體制與社交特性，如何在看似矛盾、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隱私權保護觀念下，彈性地參照社交關係脈絡進行個人隱私管理政策，並討論國內相關文獻與既有研究方法，繼而提出對未來研究之建議。文末再回到社群媒體隱私意涵的主軸上，提出網路環境脈絡中的隱私權形式與傳統社會定義下的隱私權之異同，以作為本文結語。

傳統社會定義下的隱私權概念，從觀看者的角度看待隱私揭露是一種監視與被監視的關係，略談或忽視隱私所有者自主性與權力；網路環境脈絡下的社交媒體則提供使用者自我定義並管理隱私的權力，凸顯使用者的自主性。不過，值得提醒的是，將定義權交給使用者，並不代表使用者要為隱私被侵犯負全責，臉書公司或政府政策仍負有保護個人隱私權的責任，這與傳統定義下對個人隱私所應負的倫理責任並無二致。

臉書提供使用者自我定義並管理隱私的權力，一方面回應了網路提供使用者自我揭露的流動空間特性，同時也反映了隱私在此流動空間的液態意涵，某種程度上解決了在流動空間中很難明確區分公／私領域，並以此兩元論定義隱私的困境。而從使用者的角度再思考社交媒體的隱私意涵，也提供了研究者方便觀察使用者在臉書上自我揭露的現象。

最後，本文透過檢視臉書與隱私的相關研究文獻，再思考網路環境脈絡下的隱私意涵，然臉書功能持續發展，相關研究正在快速累積中，一則文獻檢視難能窮盡，二則希冀未來累積更多樣的研究方法、研究議題與文化經驗，累積更多研究成果，更加豐富、細緻化並脈絡化社交媒體上的隱私意涵。

## 參考書目

王旗麟（2012）。《探討臉書使用者隱私保護與欺瞞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邢姍姍、閻瑞彥、蔡馨瑩、張家菱 (2013)。〈隱私或人氣？隱私態度與個人因素對社群網站後續使用行為之影響〉，《北商學報》，24：71-92。
- 張展嘉 (2013)。《影響臉書資訊分享隱私行為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雲思綺 (2012)。《我國臉書使用者個人隱私保護策略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慧雯 (2013 年 7 月)。〈建構倫理閱聽人：從機緣分析角度理解臉書提供的社交可能性〉，「2013 年中華傳播學會」論文。臺灣，臺北。
- 劉靜怡 (2012)。〈社群網站時代的隱私困境：以 Facebook 為討論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1：1-70。
- Acquisti, A., & Gross, R.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Awarenes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rivacy on the Facebook.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4258, 36-58.
- Albrechtslund, A. (2008).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s 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 *First Monday*, 13(3). Retrieved from <http://firstmonday.org/article/view/2142/1949>
- Allen, A. L. (2013). An ethical duty to protect one's own informational privacy? *Alabama Law Review*, 64, 845-866.
- Altman, I. (1975).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behavior privacy, personal space, territory, crowding*.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Barnes, S. B. (2006). A privacy paradox: Social net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Monday*, 11(9). Retrieved from <http://firstmonday.org/article/view/1394/1312>
-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ssewitch, J., & Sinnreich, A. (2013). The end of forgetting: Strategic agency beyond the panopticon. *New Media & Society*, 15, 224-242.
- Caers, R., De Feyter, T., De Couck, M., Stough, T., Vigna, C., & Du Bois, C. (2013). Facebook: A literature review. *New Media & Society*, 15, 982-1002.
- Chiang, S. L., & Chang, C. Y. (2013, March). *Facebook and privacy: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iv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Taiwan STS annual conference,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Cohen, J. E. (2013). What privacy is for. *Harvard Law Review*, 126, 1904-1933.
- Donath, J. (2007). Signals in social supernet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231-251.

- Dourish, P., & Anderson, K. (2006). Collective information practice: Exploring privacy and security as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1*, 319-342.
- Dwyer, C., Hiltz, S. R., & Passerini, K. (2007, August). *Trust and privacy concern with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 comparison of Facebook and MySpa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Keystone, CO.
- Falk, S., & Riel, N. (2013).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user privacy behavior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 empirical study comparing German and Swedish Facebook user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Jönköping University, Jönköping, Sweden.
- Frampton, B. D., & Child, J. T. (2013). Friend or not to friend: Coworker Facebook friend requests as an ap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 2257-2264.
- Leino-Kilpi, H., Välimäki, M., Dassen, T., Gasull, M., Lemonidou, C., Scott, A., et al. (2001). Privac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38*, 663-671.
- Light, B., McGrath, K., & Griffiths, M. (2008, December). *More than just friends? Facebook, disclosive ethics and the morality of techn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CIS 2008 Proceedings,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Paris, France.
- Liu, Y., Gummadi, K. P., Krishnamurthy, B., & Mislove, A. (2011, November). *Analyzing Facebook privacy settings: User expectations vs. re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MC'11, Berlin, Germany.
- Nissenbaum, H. F. (2010).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berg, P. A., Horne, D. R., & Horne, D. A. (2007). The privacy paradox: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tentions versus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1*, 100-126.
- Palen, L., & Dourish, P. (2003, April). *Unpacking "privacy" for a networked worl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 2003,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Fort Lauderdale, FL.
- Papacharissi, Z. A. (2010). Public and private expression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In Z. A. Papacharissi (Ed.), *A private sphere: Democracy in a digital age* (pp. 25-50).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Raynes-Goldie, K. (2010). Aliases, creeping, and wall cleaning: Understanding privacy in the age of Facebook. *First Monday*, 15(1). Retrieved from <http://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775/2432>
- Solove, D. J. (2007). *The future of reputation -- Gossip, rumor, and privacy on the interne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utzman, F., Gross, R., & Acquisti, A. (2012). Silent listeners: The evolution of privacy and disclosure on Facebook. *Journal of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4(2), 7-41.
- Trepte, S., & Reinecke, L. (2011). *Privacy online: Perspectives on privacy and self-disclosure in the social web*. New York, NY: Springer.
- Tufekci, Z. (2008). Grooming, gossip, Facebook and MySpa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1, 544-564.
- Tuunainen, V. K., Pitkänen, O., & Hovi, M. (2009, June). *Users' awareness of privacy on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 Case Faceboo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Bled eConference eEnablement: Facilitating an Open, Effective and Representative eSociety, Bled, Slovenia.
- Van der Velden, M., & Emam, K. E. (2013). "Not all my friends need to know":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eenage patients, privacy, and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20, 16-24.
- Young, A. L., & Quan-Haase, A. (2009). *Information revelation and internet privacy concern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 case study of Faceboo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T'09,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University Park, PA.

# Fluid Space, Liquid Privacy: Rethinking 'Privacy'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Chiang, Shu-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reconsiders 'privacy' and relevant issues for conducting privacy research about 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 It indicates that for users, social network sites function as a fluid space, where privacy is necessarily context-varying, therefore inevitably different in implications. This tends to be ignored by privacy researchers, however, such that there exists a 'privacy paradox' in the bulk of privacy research. Addressing this paradox issue with a user-centered perspective, the author focuses on users' privacy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finds a "control paradox" among privacy-conscious users regarding who is to blame for privacy violation. The paper then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Facebook privacy research in Taiwan, with methodologies discussed comparatively among relevant studies, local and abroad. It concludes that privacy investigation today is far more challenging as the concept of privacy tends to be liquid in a network society.

**Keywords:** privacy, privacy paradox, privacy management policy, control paradox, 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

---

\* Email: CShulin@googlemail.com

Received: 2013.09.11

Accepted: 2013.11.06

## 國內政論性節目中國防部與軍事名嘴的資本流動／競逐——以 2011 年重大軍法事件為例

崔艾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生

### 摘要

在電視媒體這個大場域中，各類型的政論性節目為了要競爭生存空間，各自擁有一批與其閱聽大眾屬性相近的名嘴，提供議題及曝光的機會，也創造了名嘴們資本流動的空間，而資本間的相互轉換都是在為爭取最佳的社會位置，以爭奪最優渥的經濟資本。這與國防部追求以專業威信讓人民信賴的象徵資本的過程有何衝突？二者的資本優勢及劣勢，以及其資本的運用策略，都將決定著媒體場域中對訊息的詮釋權。

本研究採論述分析，檢視所蒐集的政論性節目軍事名嘴在論述文本的意義上分屬哪些資本類型，亦針對問題，本研究發現：名嘴們的資本運作在場域中都是為了爭取最佳的社會位置以獲得最優渥的經濟資本；相較於國防部受制於場域權力與特性，資本間缺乏流動及轉換的動能。

**關鍵詞：**資本流動、軍事名嘴、電視政論節目、國防部、媒介場域

---

\* Email: [bjamy650514@hotmail.com](mailto:bjamy650514@hotmail.com)

投稿日期：2012 年 6 月 28 日

接受日期：2013 年 4 月 12 日

## 壹、前言

在臺灣有一群人，他們精通天文、下知地理、可以聊娛樂八卦、批評政治亂象、暢談財經，對於軍事國防也可以滔滔不絕；當然，儘管限定在國防事務類中，也是有其專業屬性和類別的區分，大致可區分為軍風紀廉政類（泛指軍隊軍紀醜聞）、軍售預算類、武器裝備、救災類等。在臺灣民眾的眼中，他們的公信力、說服力甚至影響力，都超乎政府主管政策的部門，在某些領域中，他們似乎成了主流民意，不僅是輿論的先知，也左右著社會的氛圍。名嘴現象在臺灣已經形成特色，由名嘴組成的來賓團，知名度也水漲船高，連大陸遊客都願意留在飯店欣賞政論性節目，便足見其吸引力（邱瓊平，2011年12月4日；滕淑芬，2008）。臺灣瘋名嘴的現象，已不僅限於家戶內，更擴大至工作職場或是網路社群。且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研究者深刻感受到現今國防事務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必須得靠媒體經營的現實，從若干年的「珍珠奶茶換軍購」、「尹清楓引發的軍購弊案」到最近的「江國慶冤死案」、「204兵工廠爆炸死傷案」、「國軍人才招募」企劃案等，不論是政策面、管理面或對外的公關經營，國防部公眾形象的建構與媒體經營可說是息息相關，另宣傳的觸角也不僅限於傳統媒體，國防部為了迎合世代的資訊接收習慣，開闢 Facebook（國防部發言人信箱）、全民國防論壇，陸軍司令部甚至架設「司令的部落格」，希望直接與民眾或官兵溝通，但這都僅限於被動的政策宣達和回應，因為在主流媒體的傳播上，相較於政論性節目的議題設定及軍事名嘴的熱烈回應，國防部的曝光率相對性的不足，且多處於被動角色。

基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下二點：

- 一、檢視媒體軍事名嘴的資本優勢及劣勢，以及其資本的運用策略。
- 二、觀察同為電視媒體場域中的公部門與媒體間的互動模式。

## 貳、文獻探討與理論觀點

### 一、當軍事專家「變成」名嘴

#### （一）專家

專家（expert）是指透過經驗或訓練取得專業領域知識的人，具有較一般人為多的記憶能力、資訊選擇及問題解決的表現能力（Chi & Glaser, 1980）；又或是在該專業領域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針對上述對專家的名詞定義，本研究以為可以在以下層次中得見專家的特質（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2006）：

1. 專家不僅有基本事實且資料庫（知識量）龐大。
2. 知識結構環環相扣，複雜寬廣且深，也就是說可以用不同的角度評估單一事件影響的知識結構
3. 對問題的表徵分析品質較佳，會花較多時間分析和呈現問題，因此，對於問題困難程度認識較深
4. 以理論或高層概念透視現象相關知識，而不以事物的表象作為分類的標準。

本質上，軍事專家是具有龐大知識量和深層思考結構的，但會成為媒體節目上討論的軍事議題，卻通常會超越理性的對話。以本研究而言，所述之軍事議題便區分為軍紀廉政、武器裝備類、救災等輿論關心的部分，對於國防事務的認識也許不用軍事方面豐厚的知識量，因為還需要法律或政治專業方面人物讓討論的廣度增加，此外，表達的方式亦有所差異，這便是所以研究者認為以名嘴稱之較為適當的原因。

## （二）名嘴

政論性節目型態多為一周五天或五天以上的帶狀性節目，為滿足觀眾對熱門議題的好奇心，各節目主題內容不但相似且議題類似的受邀來賓重複性亦高（曝光率高），知名度可快速累積，故政論性質的談話性節目儼然成為栽培名嘴的殿堂，林富美（2006）一份針對新聞文字記者的研究便指出，記者們一致認為上電視節目是他們大量曝光進而成為名人的主因。然而，名嘴至今卻被越來越多批判的聲音貶抑為民主政治的「負資產」，由於電視政論窄化的議題選擇、偏激的言論與激情的表演，以及充斥小道爆料的文化，引來知識份子與學者不少的批判，在唐士哲（2012）的研究中，更直言這些對名嘴的批判，可被歸納為四點「行徑」：

1. 爆料：透露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後臺行徑，如貪腐、性醜聞，但多半以保護消息來源為由，拒絕提供明確的證據。
2. 干預：對特定司法訴訟或行政事務的細節多所批評，並以連續且集中的議題談論方式，試圖短期內造成強大輿論壓力，以改變現狀，例如迫使不適任的官員下臺，或者在重大司法案件中，對不適任的偵辦人員道德操守的質疑。
3. 結黨：於選舉前在節目中為特定候選人或政黨抬轎，並整肅異己；選舉後，在政論議題的選擇上或政治論述建構上，不避諱彰顯對特定政治人物或政黨的好惡。



4. 營私：因個人的輿論影響力，成為特定權勢團體或個人酬庸或籠絡的對象，並試圖用此為自己圖謀更多的名聲或財富利益。

這些批判可以感受到對名嘴現象的集體社會焦慮，電視政論節目的媒體傳播，相信原先的設計應該是吸納多元化的聲音，也讓各個專業立場作理性的溝通，更或是獲得與權力團體的對話，但我們卻在現今名嘴現象中，觀察到過度的表演性質，甚至成為少數人發表濫情言論以搏收視率和知名度的舞臺，運用媒體製造民粹氛圍、塑造意識正確，原先是為了針貶社會亂象的名嘴，現在卻也成為了媒體亂象。然而，如何解釋部分名嘴行為失控及背後的原因，本研究以為布迪厄（Bourdieu）的資本論應可以為我們梳理出較清楚的脈絡。

## 二、布迪厄的資本論

在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學派的傳統議題中，資本通常代表了金融財富和生產要素，但布迪厄不但擴展了資本的經濟概念，也賦予了資本多元化形式和現代意義。首先，布迪厄明確賦予了資本的三個特性：第一是資本的生成性，即資本是積累的勞動；第二，資本的排他性，即資本應該與私人占有的關係一致；第三，資本的獲利性，即資本是一種能獲得更多資源的資源（Bourdieu & Wacquant, 1992 / 李猛、李康譯，1998）。資本一詞從物質性、金錢性延伸到文化性、關係性和象徵性，布迪厄把資本分為四大類：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徵資本（Bourdieu, 1986）。本研究整理相關學者論述，並分述如下（邱天助，2002；周新富，2005；張國彬、石明宗，2011；沈游振，2003）：

- （一）經濟資本：經濟資本反映在機具、原料、財產和收入上，此資本亦可以直接轉換成量化的貨幣價值，並可以用財產權的形式予以法律保障。
- （二）文化資本：在布迪厄看來，文化資本有三種存在的形式，分別是：具體的狀態，以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的模式；客觀的狀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體制的狀態，這一種形式賦予文化資本完全是原始性的財產，而文化資本也是受到這類財產的庇護，以上三種形式，多半亦稱之為：能力式文化、商品式文化、體制式文化。略述如下：
  1. 能力式文化：指文化資本的身體化狀態，是社會文化在不同個體身上的主觀內化，也間接形成了我們所謂的具有差異性的知識和文化水準。
  2. 商品式文化：是以物質（如圖片、書籍、講演、表演、工具或機器）的型態存在，是有價的，不僅可以交易、買賣，也可以傳遞，要達到此狀

態必須具備經濟資本，而要使這些商品式文化發揮其功用，則須要有能力式的文化資本施以轉化。

3. 體制式文化：是指個人所持有的文化資本在制度上被認可，它是透過制度使資本在勞動市場裡被認知並認同，如學歷或證照。

(三) 社會資本：Bourdieu (1983: 245) 是這樣定義，「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它以集體性擁有資本的角度為每位會員提供支持，並為他們提供聲望的保證」。因此，我們幾乎可以說社會資本就是一種關係資本，是指個體透過在群體中的關係網絡，經由相識和認可的程序，透過關係的使用能達到影響的效果，並進而產生利益的過程。

(四) 象徵資本：是個人在信用、名望和認可上有用的資源，可視為一種榮譽頭銜，它可以帶給人聲譽和威信的社會優勢。其影響力在於擁有大量象徵資本的人，能夠壟斷制度和階級，甚至能夠壟斷輿論和社會意識。我們也可以從一些具有聲望或高知名度的電視名嘴在操作社會議題的過程中，看出另一種透過象徵資本施以正當性的象徵暴力。

### 三、資本間的社會運作

#### (一) 資源 = 資本

資源的形式有很多種，例如教育資源、財力資源、人力資源或技術資源等，藉由資源的占有和運用，便可以取得存在的優勢並發揮作用，在某些條件和情境下，甚至可以將資源轉化為資本，以賺取自身的價值和利益（趙志浩，2010）。當然，這不只是單向的，資本也可以回向為資源，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可以以對技術、教育和藝術方面文化資本的取得，獲得在這方面的利益，這也是文化資本發揮作用的具體表現。當然，若從這些具有軍事專業背景的名嘴來觀察資本與資源的互換模式，我們可以得見，許多軍事名嘴的出身背景就是軍隊退役的高階管理幹部，他在服役過程中，自然擁有許多軍隊的技術資源或人力資源（如爆料來源的「深喉嚨」），當媒體需要這些技術或軍隊內部消息以獲取收視率時，名嘴們自然可以將他們的資源變成資本，換取勞動報酬，也就是資本的具體實踐。

#### (二) 資本間可以相互轉換和流動

在布迪厄看來，不同的資本是可以進行轉換的，從他對文化資本的類型論述中，資本轉換的思想便已看出端倪，以一個具體的例子來看，假使一個富商買

了一幅名畫，儘管他沒有將其文化價值內化，但也不妨礙客觀的「商品式文化」的資本累積，這種購買基本上是經濟資本向文化資本的轉換，而名畫出售方面則實現了相反方向的資本轉換（林克雷、李全生，2007）。再進一步從布迪厄的論述中分析資本的轉換，他認為：要理解資本的真正邏輯和控制資本的保存法則，必須拋棄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方面是經濟主義的觀點，它在最終的分析中總將每一種資本型態都簡化為經濟資本，另一方面是符號主義的觀點，它則是將社會交換簡化為交往現象，布迪厄明白的指出，在資本轉換中經濟資本可以輕易且有效的轉換為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在與其它資本的轉換中仍居主導的地位（包亞明譯，1997）。由於經濟資本的可兌換性和兌換的期待，它其實也成為其它資本流動的主要目標，所有資本的積累都是為了創造更高的經濟資本，這是一種基於創造更大利益的流動。若將軍事名嘴的工作視為勞動價值的象徵，既能表現出其軍事專業的知識和學養，也是重要的象徵資本。如在某些收視率較高的節目曝光率高，不但提高了軍事名嘴透過節目的場域「現身」及累積價值的機會，更有利名嘴們建立軍事專業形象並擴展其個人勞務市場，也就是說，他可以在宣傳自身文化資本的同時，也是象徵資本的積累，並快速增加經濟資本的實力。

名嘴何以能在電視媒體形態的政論性節目中，扮演軍事專家的身分，針對各項國防事務評論，甚至對龐大的國防組織嚴聲斥責並喊話？這不僅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的充分展現，從製作形態來看，節目中穿插著街頭訪問、觀眾 call in 等，收視率的數字能充分反映出經濟資本掛帥的論點，民意也成為名嘴們強大的支持後盾；但在這個場域中的另一個主體——國防部，又是如何因應的？因權力的壓迫和刺激所產生的行動策略又是甚麼？因之，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正是本研究據此探索的另一個啟發。

## 四、場域論

### （一）場域、次場域與資本

布迪厄在其關係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除了提出「資本」概念外，另一個重要的核心觀點就是「場域」（field）。這是布迪厄用以表述行動者在社會的活動空間，並視為行動者動用資源、爭取利益和展開鬥爭的所在，通常會譯為社會場域，或簡稱為場域。場域是由不同的資本類型和力量關係所決定的，一方面是不同資本的持有者為爭奪或累積資本的行動者，另一方面則是競爭博弈的空間，擁有特定資本的行動者，無時無刻都想藉此改變彼此的位置、對資本的評價，以及

場域的競爭規則 (Bourdieu & Wacquant, 1992 / 李猛、李康譯, 1998)。然而，資本的決定和流動也不竟完全是行動者的操縱，Benson (2008) 認為每個場域也各有其內在規則，並有獨特的交換和報償經濟，隨著社會分化程度的增加，資本類型也愈形複雜，相對應的衍生出更多的次場域，但這些次場域也有其自身的邏輯性與必然性，並有著相對於其它場域的自主性，而當代社會的建構原則便是圍繞在經濟、精神、文化之間的對立，構成行動者在場域中所欲爭奪的資本並形塑出場域的特徵。

## (二) 場域與行動者

在任何的場域均有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競爭，每個行動者經由日常生活的實踐，運用習性及資本以爭取有利的社會位置 (Bourdieu, 1996 / 蔡筱穎譯, 2000)。可以說習性 (habitus) 存在於個體內，引導著個體的行為與反應，能夠顯示個人特殊的標誌和風格，呈現社會經歷的特殊性，甚至從個人的習性，則可得知階級的歸屬 (陳珊華, 2004)；而場域涉及的則是個體外的社會空間，也是地位結構的空間，它如同一個市場體系，地位與彼此的關係決定了各種資本與資源的分配，人類活動的目標就是在累積和獨占各種資本，以維護或提升自己在場域中的地位 (Dumais, 2002)。所以我們說場域就是個競爭場所，將電視媒體的政論性節目視為一個競爭場所時，我們看到行動者 (名嘴們) 在場域中所爭取的、消耗的、動用的，不僅有物質、有經濟、也有文化的。因之，場域的界定視所追求的資本不同，各有其不同運作的邏輯和必要的結構 (高宣揚, 2002)。

依據布迪厄對場域概念的理解和研究，本文針對電視媒體的政論性節目提出以下結構及特質：

### 1. 單向的傳播和低控制度

電視、廣播類的傳統媒體均屬於單向式的資訊傳播，以單向、推 (push) 的方式呈現資訊，閱聽者無法決定閱聽甚麼訊息、閱聽的次序，可以說是被動式的接受資訊，使用者的資訊控制度低。而所謂的資訊控制度，就是資訊蒐集者對資訊內容及資訊呈現方式的掌控程度 (Ariely, 2000, 轉引自吳玲玲, 2004: 48)，而閱聽者對於電視媒體的主控權只有轉台或是關掉電視的選擇，無法篩選閱聽的內容、次序，也正是因為如此，政論性節目在單向的資訊傳播下，閱聽人缺乏參照的言論，也缺少思考，是較為容易控制的閱聽族群。因此，閱聽者以單向的方

式接受政論性節目中所傳達的所有資訊，對於傳達者來說，這就是場域所提供給他的機會和資源，同理，名嘴們在資訊的詮釋上是較其他行動者有更多的支配力量。

## 2. 收視率為場域中的競爭源頭

節目需要觀眾才會有收視率，廣告效益也將隨之提升。這也就可以說明名嘴「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節目效果是為了在場域中獨占資本，以維護或提升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因此，在政論性節目中所觀察到的競爭關係，一方面是名嘴們以習性及資本與爭取有利的節目位置，另一方面是透過詮釋權力的失衡，打壓另一結構（如國防部）以創造獨有的競爭優勢。

## 3. 政論性節目中的重要支配力量：資本 VS. 政治

名嘴之所以存在於政論性節目中，一開始是透過資本的表現換取閱聽人的認同和論述上的信任，文化及社會資本是決定場域中競爭優勢的關鍵，然而，場域的結構是為整個大環境的政治力量所支配的，也就是在整個電視媒體的大場域中，政論性節目便成為相對性的次場域，會有許多政治力的干預與支配，名嘴們的論述要有資本的根基，更要有政治性的考量在內。要能服膺場域的價值取向，才能夠先達到場域所賦予他的象徵資本及社會地位，從而創造出更多的附加經濟價值。

## 五、小結

研究者基於對國防事務、對社會和國防之間互動關係的關心，更對因為現今資訊透明且快速傳播所產生的軍事名嘴，他們出現／線並獲得認同的原因，及背後所產生的資本流動和作用感到好奇。另基於上述文獻的介紹與討論顯示，電視政論性節目媒體的特質，我們看到了場域與資本在其中作用的現象，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資本觀點及場域論可作為運用及分析的工具，以呈現國防部與軍事名嘴間使用與爭取的資本類型、二者互動的樣貌。綜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問題：

- （一）軍事名嘴擁有哪些資本？各自資本間的運作現象及策略為何？
- （二）同在電視媒體場域的名嘴及國防部，各擁有以何種權力、優勢，對於軍事議題的回應方式建基於何種資本基礎？

(三) 軍事名嘴透過電視媒體與國防事務之間的互動模式？出現哪些資本流動或競逐關係？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國防部 2011 年（民國 100 年）引起政論性節目熱烈討論的事件作為研究文本，透過文本分析的方式探討在政論性節目（場域）中軍事名嘴及國防部（行動者）回應的意向表達方式，並觀察其背後資本運作邏輯及相對的權力關係。

### 一、研究範疇

國內政論性節目甚多，但針對政治性議題通常論點立場對立，且並無針對國防事務專責討論的節目，議題變換隨社會現象或輿論關心方向，由製作單位依收視率及收益等因素自行擬定，是為本研究之限制。另本研究溯自 2011 年期間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之國防重大事件，統計顯示軍紀類「國軍少將涉及共諜案」、「江國慶冤死案」為討論主題次數最多者，共計有中天新聞台、TVBS 新聞台、三立新聞台及年代新聞台等電視台，均於常態性的政論性節目中列為討論主題（整理如表 1）。是故，為平衡各電視台內容立場，本研究將針對所選定之兩議題<sup>1</sup>，以報導次數較多的「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TVBS-2100 全民開講」、「三立新臺灣加油」等節目內容為主要文本，作為研究範疇以進行後續分析：

### 二、研究事件主題

研究者針對 2011 年期間，各政論型態電視節目討論軍事議題之單元進行分類，內容多半涉及違反軍法紀事件（為最多）、性別議題或軍事裝備新知等，此次所蒐整的兩項議題，一方面為文本內容最為豐富，較有利於分析；另一方面考量的是，「共諜案」及「士兵冤死案」均涉及《陸海空軍刑法》，屬於軍法範疇，對於事實應具有專業判準依據的，由此更可窺見軍事名嘴在論述議題時，對於事件內容的問題意識及方向。

1 其中「江國慶冤死案」因媒體持續關注，並隨案情發展及審理陸續討論，故可區分為 1/29-2/24 為第一階段，5/24-5/31 為第二階段，本研究文本分析範疇限定為第一階段的討論內容。

討論主題	日期	節目名稱	持續天數
軍紀類			
國軍少將當共諜 臺美軍情大洩密	02.11.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	11
	02.11.	TVBS「2100 全民開講」	
	02.11.	TVBS「新聞夜總會」	
	02.12.	三立「新臺灣加油」	
	02.13.	TVBS「新聞檢驗室」	
	02.15.	年代「新聞面對面」	
	02.19.	民視「新聞觀測站」	
	02.24.	TVBS「2100 全民開講」	
	02.24.	TVBS「新聞夜總會」	
	02.25.	TVBS「2100 全民開講」	
	02.28.	TVBS「新聞夜總會」	
	03.01.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	
	03.24.	TVBS「2100 全民開講」	
	04.20.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	
04.20.	TVBS「新聞夜總會」		
軍法錯殺！江國慶冤死 誰能還公道？	01.29.	三立「新臺灣加油」	26
	01.29.	TVBS「2100 全民開講」	
	01.30.	三立「新臺灣加油」	
	01.30.	TVBS「2100 全民開講」	
	01.31.	三立「新臺灣加油」	
	01.31.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	
	01.31.	三立「大話新聞」	
	02.01.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	
	02.05.	三立「大話新聞」	
	02.06.	三立「新臺灣加油」	
	02.07.	三立「新臺灣加油」	
	02.24.	TVBS「2100 全民開講」	
	05.24.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	
	05.24.	三立「新臺灣加油」	
	05.24.	中天「2100 全民開講」	
	05.25.	三立「新臺灣加油」	
	05.25.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	
	05.25.	中天「新聞夜總會」	
05.26.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		
05.26.	年代「新聞面對面」		
05.26.	中天「2100 全民開講」		
05.27.	民視「頭家來開講」		
05.28.	三立「新臺灣加油」		
05.30.	三立「大話新聞」		
05.31.	年代「新聞面對面」		

表 1：2011 年國內政論性節目針對「國防事務」議題討論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TVBS 節目「2100 全民開講」亦包含「2100 週末開講」、「2100 拘新聞」。

2. 虛線所示為議題持續的階段性。02/24 之前為第一階段，之後為第二階段。

### (一) 國軍少將涉及共諜案

前陸軍司令部通資處少將處長羅賢哲於擔任泰國武官期間，因出入不當場所、性交易的不檢行為，遭中共要脅吸收，並五度將國軍機密賣給敵對方，總共獲利 15 萬美元，相當臺幣 440 萬，此種收集、交付軍事機密的間諜活動，且收受賄賂的行為，已構成《陸海空軍刑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為敵人從事間諜活動罪」，該罪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但因羅賢哲在偵查及審判中自白，依法減輕其刑後，去年（2011）7 月間將羅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羅賢哲不服續提起上訴，最高法院於今（2012）年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 (二) 江國慶冤死命案

為 1996 年 9 月 12 日位處臺北市大安區的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內 5 歲謝姓女童遭到姦殺身亡的案件，軍方的專案偵辦小組速偵速審，將認定涉案的江國慶於 1997 年 8 月 13 日執行槍決，江員被槍決時年僅 21 歲。因判決草率，在被告槍決後，家屬仍向監察院陳情，2010 年監察院公布調查報告，指出當時的空軍作戰司令陳肇敏違反《軍事審判法》，並向國防部提出糾正。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 2011 年 10 月 27 日已依照《刑事補償法》決定，將補償江家家屬一億三百一十八萬五千新臺幣，亦完成包括江國慶案時任的空軍總司令黃顯榮等人的行政懲處。全案至此，引起社會輿論譁然，此案為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以外，第一宗確認的冤獄錯殺案。

## 三、研究設計

針對本研究主題，本研究採質化的「論述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式，另為回應本研究有關資本流動相關問題，則將針對政論性節目中名嘴使用的資本加以分析，方式運用方式如下：

- (一) 論述分析：「論述」(discourse) 可被定義在社會結構中一組系統的文本、訊息、對話或會話 (Lupton, 1992, 引述自黃靖惠, 2010)。從粗略的層面來看，人在研究論述時，將語言視為具有表演與功能的性質，不只是中性且單純的溝通工具 (Rapley, 2007 / 張可婷譯, 2010)。因此，「論述」二字具有高度的歧異性，因為背後所探討的語言均有複雜的意義及意識形態。以新聞傳播文本進行論述分析的代表學者 Teun A. Van Dijk 及 Norman Fairclough 而言，就綜合了英美學派（解析語言文本意義）和法國



學派（由意識形態的批判揭露意義如何形成）兩種立場的知識論（倪炎元，1996），發現二者都是在處理「語言現象」。然而就本研究而言，分析的視野不在於軍事名嘴或政論節目中所使用的語言或句法，也非其意識形態的批判，而是著重在檢視所蒐集的論述在意義上分屬哪些資本類型。

（二）資料分析的分類編碼：針對名嘴因政論性節目的型態和特質所產生的資本類型，將參考布迪厄的界定，再由研究者判定編碼，茲將分類後的各項指標舉證如表 2。

指標	資本意涵	名嘴論述之例證
經濟資本	經濟資本反映在機具、原料、財產和收入上，此資本亦可以直接轉換成量化的貨幣價值	名嘴因同一議題，持續於同一節目曝光所累積的通告費，即經濟資本
文化資本	藉由社會教育（軍事教育）、商品形式或制度（民選議員、專業證照、執照）可所內化或呈現在外的資本	後來發生的空軍基地掉槍案，也是同一批刑求江國慶的人，一抓到就馬上認錯，可見他們刑求的多嚴重（0131 中天黃敬平）
社會資本	個體透過在群體中的關係網絡，經由相識和認可的程序，透過關係的使用能達到影響的效果並進而產生利益的過程	軍方當年協助偵辦的憲兵隊跟我說，當年江國慶測謊的鑑定結果是送到調查局和刑事（0201 中天黃敬平）
象徵資本	個人在信用、名望和認可上有用的資源，可視為一種榮譽頭銜，它可以帶給人聲譽和威信的社會優勢並進而產生利益的過程	無法由論述中直接觀察，然可間接由名嘴於同一節目持續出現的頻率次數，展現個人的知名度及價值

表 2：政論性節目名嘴所擁各項資本指標分析示例

## 肆、研究發現

### 一、名嘴的資本運作及流動

#### （一）社會資本是「爆料」的基礎

Lin 認為社會資本是在現實社會裡，有很多情況是依照特殊主義運作的，講究社會關係、廣結人際網絡，透過人與人之間關係網絡的運作，往往對於職場成功或提高職業成就有很大的幫助（Lin, 2001，轉引自黃毅志，2002）。而在政論性節目中，名嘴們的職業成就便是來自資訊提供的多寡及價值性，擁有哪些「爆料」的管道，得知哪些重要訊息，一方面是藉廣達的人際脈絡證明其社會資本雄厚，另一方面也順勢提升其文化資本的能力。

昨天晚上還有軍方當年協助偵辦的憲兵隊跟我說，當年江國慶測謊過程只有 10 分鐘便判定沒過，而刑事局對於測謊不敢斷定是否有過，但後來軍方以調查局為主？……（0201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資深媒體人黃敬平）

今天有一個消息告訴我，當時在軍中流傳，陳肇敏如同皇帝，所以江國慶在走投無路的狀況下，有人教他去和陳下跪……（0130 三立「新臺灣加油」民進黨立委黃淑英）

我要告訴大家羅賢哲這個案子是在 2008 年以前監控的，所有照片都被拍下……但我所瞭解的，在美國 FBI 後來約詢的過程中，羅將軍是全盤否認的……（0215TVBS「2100 全民開講」）

## （二）知識詮釋的權力：文化資本的膨脹

### 1. 經驗知識即能力文化資本

社會輿論對於造成江案的主要論證是由於當時反情報總隊的不當刑求，許多名嘴透過自身當年服役的經驗或回憶，再詮釋所認識的反情報總隊，憑藉著他們在軍隊及社會教育過程中所累積的文化資本，內化成巨大的想像，一方面製造輿論、另一方面則透過節目加乘其論述價值。

早年國軍為了防堵共諜的滲透及抓匪諜，於是在軍中成立了反情報總隊，他們辦案根本沒有水準可言，後來發生的空軍基地掉槍案，也是同一批刑求江國慶的人，一抓到就馬上認錯，可見他們刑求的多嚴重。……（0131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資深媒體人黃敬平）

反情報總隊不是偵查體系，倒像是陳肇敏的錦衣衛……（0129 三立「新臺灣加油」臺北市議員王鴻薇）

當時是由政戰系統控制軍法系統，任何事情都由政戰交軍法，你就知道國防部誤判是怎麼回事了！……（0129TVBS「2100 週末開講」資深媒體人張友驊）

### 2. 體制文化資本的轉換

節目中不論是領有律師執照，或經由民選的合格議員，都是透過制度使資本在勞動市場裡被認知並認同，他們對於意見的論述多充滿主觀及定論，而這也是

由於體制制度所賦予他們傲慢卻又合法的權力。而此種經過對原先職業的背景知識所轉化的資本型態，能夠據以說服他眾並增加自身言論的信度。

刑求所造成的傷害罪，追訴期已經過了，但《刑法》125條的濫權追訴罪，仍可以用在他們身上……（0131 三立「大話新聞」前民進黨立法委員徐國勇）<sup>2</sup>

我認為是整個官僚體制為了怕誤判後，會造成官僚體系大動盪，所以這明顯的是官僚殺人……（0129TVBS「2100 週末開講」律師馬在勤）

### （三）曝光率換取象徵資本的優勢

象徵資本相當於所有牽涉到名望及認可的一套規矩，因此 Bourdieu 延伸象徵資本的概念，論述「象徵暴力」，主張其為宰制階級（通常是上階層）藉由長期的合法化過程，強迫眾人接受某一種符合其利益的世界觀（Bonnewitz, 1997 / 孫智綺譯，2002）。換言之，電視節目中經常出現的名人是符合某階層的主流文化，他們傳達的訊息代表著他們所認知、界定的社會世界，擁有實際效果的社會優勢，因此受邀參加電視節目錄影的名嘴們，他們的論述便象徵著某些階層的文化，其曝光率高低即為媒體對其論述代表性的肯定程度，也相當程度的呈現出電視台的收視率與名嘴的象徵資本。以下針對本研究議題中，各政論節目受邀名嘴所出現的頻率次數進行初步統計，觀察名嘴因為軍事議題在媒體的曝光度，間接瞭解其象徵資本累積情形。

僅就本研究中「江國慶冤死案」議題進行統計，總計第一階段報導天數為 8 天、報導節目計有 12 台，其中在三立新聞台「新臺灣加油」節目中從事件爆發後的 1 月 29 日至第一階段 2 月 24 日期間<sup>3</sup>，共計播出 5 次，每集與談的名嘴統計如下表 3，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觀察所得：

1. 5 天節目時段、共計 23 人次的與會評論者中，以羅淑蕾／國民黨立委出現 3 次為最多，5 天中有 3 天的節目時段都可以看見她的出現，曝光度高達 60%。其次是黃達元／江國慶家屬委任律師、趙天麟／前民進黨高雄市議員、徐國勇／民進黨立委及莊碩漢／前民進黨立委，均為出現 2 天，曝光率為 40%。

2 徐國勇曾任第六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及臺北市議員，並曾任臺北縣政府法律顧問，亦為執業律師。

3 以表 1 所統計之議題討論次數，可以看出媒體第一階段注意「江國慶冤死案」為 1/29 至 2/7 為期一週，隨後僅於 2/24 再出現一次後，隨即失去話題性，第二階段為 5/24 日起，持續至 5/31，亦為期一週。

時間	名嘴曝光次數
01.29.	黃達元／江國慶家屬委任律師（2/23）、趙天麟／前民進黨高雄市議員（2/23）、黃淑英／民進黨立委（1/23）、羅淑蕾／國民黨立委（3/23）、顏文章／前民進黨立委、現為綠色立委聯盟總監（1/23）
01.30.	梁文傑／民進黨臺北市議員（1/23）、王鴻薇／新黨臺北市議員（1/23）、陳建銘／民進黨新北市議員（1/23）、郭正亮／前民進黨立委（1/23）、何志偉／民進黨臺北市議員（1/23）
01.31.	徐國勇／民進黨立委（2/23）、姚文智／民進黨、前新聞局局長（1/23）、羅淑蕾／國民黨立委（3/23）、莊碩漢／前民進黨立委（2/23）
02.06.	黃達元／江國慶家屬委任律師（2/23）、李慶元／國民黨臺北市議員（1/23）、陳其邁／民進黨、前總統府副秘書長（1/23）、何志偉／民進黨臺北市議員（1/23）
02.07.	徐國勇／民進黨立委（2/23）、羅淑蕾／國民黨立委（3/23）、李應元／民進黨、前行政院秘書長（1/23）、趙天麟／前民進黨高雄市議員（2/23）、莊碩漢／前民進黨立委（2/23）

表 3：三立新聞台「新臺灣加油」節目軍事名嘴曝光次數——「國軍少將涉及共諜案」、「江國慶冤死案」二議題為例

註：（）括號內表示議題期間的出席的人次（個人出現次數／所有與會評論者），而曝光度即以個人出現的天數／5天計算。

2. 5天的節目中，與談評論人計有17人之多，分析其政黨背景，為國民黨者為羅淑蕾等2人（約11%）、民進黨背景者有趙天麟等13人（約為76%），其他者有黃達元律師等4人（約23%）。

在表4所示，TVBS新聞台「2100全民開講」節目在從事件爆發後的第一階段中，共計播出3次，每集與談的名嘴統計如表3，我們可以得出以下觀察所得：

1. 3天節目時段、共計16人次的與會評論者中，以張友驊／資深媒體人出現3次為最多，而3天的節目時段中都可以看見他的出現，曝光度高達100%。其次是陳揮文／資深媒體人、邱毅／國民黨立委，均為出現2天，曝光率為67%。
2. TVBS「2100全民開講」與會的名嘴分析其背景，以16人次作為統計依據，可以發現以資深媒體人居多，為11人次，約占68%；另以專業人士次之，如林峯正、馬在勤、姚立明等人，為3人次，約占18%；僅有邱毅具有鮮明之政黨背景，占12%。
3. 以與會名嘴的背景資料分析可知，該節目以資深媒體人的大量曝光，節目主軸實以各媒體人自身工作及生活的轉換，累積為能力式的文化資本為主，其次以專業人士的體制式文化資本為輔助，得見該節目是以各名嘴間之文化資本為節目內容的依據。

時間	名嘴曝光次數
01.29.	林峯正／民間司改會執行長（1/16）、馬在勤／執業律師（1/16）、陳揮文／資深媒體人（2/16）、周玉蔻／資深媒體人（1/16）、張友驊／資深媒體人（3/16）
01.30.	黃光芹／資深媒體人（1/16）、姚立明／文化大學教授（1/16）、陳東豪／資深媒體人（1/16）、邱毅／國民黨立委（2/16）、張友驊／資深媒體人（3/16）
02.24.	許聖梅／資深媒體人（1/16）、陳揮文／資深媒體人（2/16）、黎建南／政治評論人（1/16）、邱毅／國民黨立委（2/16）、陳高超／資深媒體人（1/16）、張友驊／資深媒體人（3/16）

表 4：TVBS 新聞台「2100 全民開講」節目軍事名嘴曝光次數——「國軍少將涉及共諜案」、「江國慶冤死案」二議題為例

最後，在表 5 所示，中天新聞台「新臺灣星光大道」節目在從事件爆發後的第一階段中，共計播出 2 次，每集與談的名嘴統計如表 3，我們可以得出以下觀察所得：

1. 2 天節目時段、共計 9 人次的與會評論者中，以黃敬平／資深媒體人、黎建南／政治評論人各出現 2 次為最多，而 2 天的節目時段中都可以看見黃、黎的出現，曝光度高達 100%。
2. 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與會的名嘴分析其背景，以 10 人次作為統計依據，可以發現以資深媒體人居多，為 8 人次，約占 80%；其次則為長期擔任社會觀察者的黎建南，出現 2 人次，約占 20%。
3. 從 2 日的節目名嘴背景分析中發現，該節目無政黨背景與會的名嘴，是以與三立「新臺灣加油」的名嘴組成背景有相對性的極大差異。但名嘴本身言論是否具有政黨色彩，則不在本研究範疇內。

因為象徵資本可以經由學歷、民選代表的機制等產生，是由官方許可與確保，並藉由官式任命的效果，而在法律上形成一種具有壟斷與強制性的分類方式，故蘊涵著正當性的象徵暴力，是具有輿論權力支配能力的。因此，我們不但瞭解各類資本在名嘴上節目時的操作模式，更能由政論性節目中的名嘴組成背景

時間	名嘴曝光次數
01.31.	黃敬平／資深媒體人（2/10）、黃光芹／資深媒體人（1/10）、陳東豪／資深媒體人（1/10）、黎建南／政治評論人（2/10）、張友驊／資深媒體人（1/10）
02.01.	黃敬平／資深媒體人（1/10）、楊文嘉／資深媒體人（1/10）、鄭師誠／資深媒體人（1/10）、陳揮文／資深媒體人（1/10）、黎建南／政治評論人（2/10）

表 5：中天新聞台「新臺灣星光大道」節目軍事名嘴曝光次數——「國軍少將涉及共諜案」、「江國慶冤死案」二議題為例

(資深媒體人、政黨代表及少數的專業人士)看出其資本間的競逐關係,如具有黨職、政務官背景、或具專家(律師)身分的名嘴代表著象徵資本在媒體中的獨占,資深媒體人則以長期的社會觀察心得作為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成果,其競逐的結果就是觀眾群對於節目的支持程度,也反映在收視率上。

#### (四) 經濟資本成為象徵資本積累的出口

綜上而論,象徵資本在名嘴的職涯中,累積著榮譽與威信資本,它既是談判的武器,也是收入的保證,名嘴在節目中說公道義的非功利性外表下,實際上是一種經濟邏輯,在不同種類的資本與流通方式之間,建立起對應關係。2010年11月29日的《蘋果日報》,便針對政論性主持人及名嘴的通告費做了一份調查:其中主持「2100 全民開講」的李濤便以年收入2,160萬高居單個節目的榜首,與會的名嘴通告費也因其知名度而有所差異,例如:曝光率最高的張友驊通告費粗估10,000元/小時、15萬元以上/月;周玉蔻5,000-10,000元/小時;姚立明、余蓁蓁、邱毅、陳揮文等亦均有2,500-5,000元/小時的行情。因此,若我們以本研究中TVBS「2100 全民開講」中曝光率達100%的資深媒體人張友驊為例,在議題熱燒的短短一周內,節目製播了三次相同的議題討論,且均有張的出席,出席費便可能高達5-6萬元(因節目長度為2小時),然這僅是欠缺嚴謹數據的粗估,本研究欲藉此表達名嘴的象徵資本,正如布迪厄所言,所有資本的積累都是為了更高的經濟價值,顯見這是一種基於創造更大利益的資本流動。

## 二、場域中的權力失衡

### (一) 無關資本:場域中的政治正確就是「名嘴」

在上述表3的分析中,可得見三立新聞台所製播的「新臺灣加油」節目裡,參與名嘴具有國民黨背景者僅約11%、民進黨背景者則為76%,與TVBS「2100 全民開講」及中天「新臺灣星光大道」節目相較,與會名嘴具政黨背景的比例相較而言為高。當然,這也與收視群的背景有關。以林政谷(2007)的研究顯示:民眾觀看政論性節目都是戴著有色眼鏡,各自選擇與自己政黨喜好相近的節目來看,若政論性叩應節目是支持泛綠政黨,則收視的閱聽人也會是支持泛綠政黨;反之亦然,表示電視政論性節目對於閱聽人的政黨傾向存在正向的關係。這也就說明了,在不同的政論性節目中仍存在著場域的權力失衡,即便是擁有最多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名嘴仍須服膺場域的價值取向,才能順利的轉換資本或是創造資本。

## (二) 被控制的曝光與互動

名嘴與國防部同為身處在電視媒體場域中的行動者，一方面，媒體創造了名嘴，也同時為名嘴創造資本的工具，形成一利益共享的結構；另一方面，國防部則為另一行動者。依布迪厄的觀點，在媒體所指揮的電視節目場域中，名嘴與媒體的共構，顯示該場域的資源分配情形；簡言之，我們在節目中所看到的談論內容、方向或長短，均是透過控制後，所呈現在閱聽人前的作品，掌控媒體權力的擁有較多資源及資訊的詮釋權，受制於媒體者（以本研究而言，即國防部、閱聽人等）則分配較少資源與對於輿論的弱控制度。

軍方不願承認錯誤，明顯的是國家體制殺人，但國防部昨天發布新聞稿，卻仍未向江的家屬道歉……（0131 三立「新臺灣加油」綠色立委聯盟總監嚴文章）

馬英九要把你的態度講出來，而且要叫國防部將懲處交出來，當全國人民受到委屈，總統要回覆他人名譽，而不是透過發言人輕描淡寫。……（0131 三立「新臺灣加油」民進黨議員何志偉）

在以上論述中，我們通常會先看到名嘴們對於官方（國防部或總統）態度的指陳充滿情緒張力，但為了平衡報導並增加媒體公正性，使閱聽人能對事件有更客觀的瞭解，於是，多半會在場域結構的另一端，也就是媒體通常會在節目中節錄片段式的新聞畫面或主持人逐字念出新聞稿的方式處理公部門（總統府或國防部）的發言，以為對應。

（新聞稿）主持人：我們看到國防部昨天的聲明稿，現在還沒判決定讞，若司法終審確定，國防部將以負責任的態度追究相關人員刑責。……（0131 三立「新臺灣加油」）

（新聞畫面）總政戰局代局長王明我：羅案中的色誘和利誘是我們偵辦的重點……（0211TVBS「掏新聞」）

然而，這是明顯的單向傳播，即利用時間和內容達到論述控制的效果；另外有一種型態則具有互動，但實質上仍是由媒體作為主控者，加以引導並管控回應的內容：

(電話訪問)前國防部長陳肇敏：現在要由司法單位來作審判。

主持人：有要求江國慶下跪向你求情嗎？

(電話訪問)前國防部長陳肇敏：沒有！他是跟我道歉的。

主持人：所以他是在你面前認罪嗎？

(電話訪問)前國防部長陳肇敏：這裡面有很多不是事實的東西，反正我們現在就配合司法來做。……(0130 TVBS「2100 週末開講」)

### 三、小結

場域(政論性節目)已然形成行動者(軍事名嘴)動用資源、爭取利益和展開鬥爭的所在，它如同一個市場體系，地位與彼此的關係決定了各種資本與資源的分配，透過累積和獨占各種資本，以維護或提升自己在場域中的地位。本研究亦發現軍事名嘴在電視媒體的政論性節目場域中期望透過文化、社會資本的交換以累積更多經濟資本(通告費)、象徵資本(知名度)，而國防部則在媒體場域中受制於次場域(政論節目)的曝光控制，因場域結構的束縛與限制，對於象徵資本的維持和累積顯得力不從心。綜上，軍事名嘴及國防部二者的共同點均視象徵資本為值得累積的資本，不同的是，軍事名嘴運用次場域的資源，使用並追求更高更多的經濟資本。於是，藉由對場域的認識及對名嘴資本流動現象的發現，國防部更可以思考的是如何面對場域中的機會與資源，讓競逐轉化為競合，從鬥爭、批判到追求雙贏互利的局面。

### 伍、結論

名嘴現象是臺灣媒體的一股風潮，影響所及不僅將閱聽人在政治及族群上分裂，在一般議題上也左右著大多數閱聽人對事件的認識。本研究主題在軍事國防事務，所選定的議題為2011年內政論性節目討論最熱烈的話題，但「國軍少將涉及共謀案」或「江國慶冤死案」都偏屬軍紀類事件，對於專業性較高且涉及層面較高的武器裝備類之討論，反倒乏人問津，因此，從節目型態到名嘴背景，均讓研究者深刻體認到臺灣政論性節目的單一政治性並缺乏理性論辯的空間。是故，名嘴各自在所屬的場域中建立權力空間，以場域屬性為論述優先，最終的目的是透過言論的壟斷與強制性創造個人文化資本的附加價值，同時，也是為了要獲取最終的經濟資本，這是政論性節目場域中的資本循環模式，所謂的名嘴在資本流動的過程中名利雙收。研究者將資本運作策略以圖1表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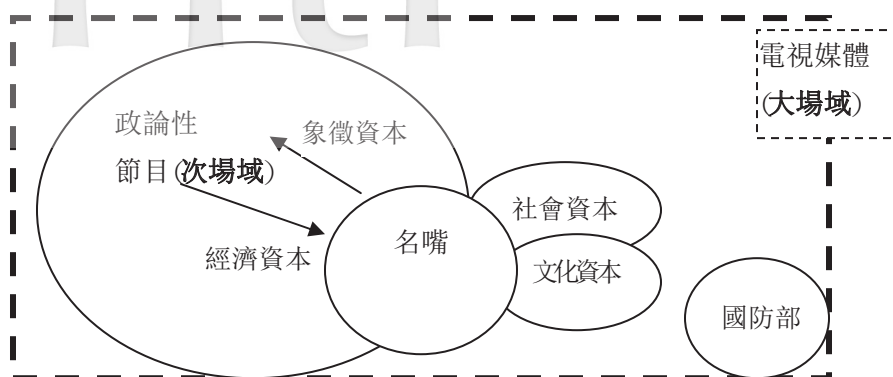


圖 1：名嘴於政論性節目場域中的資本循環模式

在電視媒體這個大場域中，各類型的政論性節目為了要競爭生存空間，各自擁有與其閱聽大眾屬性相近的名嘴，提供議題及曝光的機會，利用名嘴自身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創造收視率的保證，同時，名嘴也從政論性節目中因論述的被認可、被信任，換得了個人的象徵資本，並回饋給政論性節目（次場域），使自身所屬之節目能在大場域中具有競爭能力，而節目透過高收視率再回應給名嘴的即是所有資本的最後目的——經濟資本的獲得。從這中間的過程，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 一、軍事名嘴透過原有的學校、社會教育、工作經驗或人生閱歷，轉換為珍貴的文化資本，而因為其原先便具有的象徵資本（知名度）累積社會資本，營造綿密的人際網絡，以獲得更多資訊的來源與詮釋的能力，資本間可以相互轉換及流動，我們也在上述的討論中知道，事實上，所有名嘴的資本運作在場域中都是為了爭取最佳的社會位置以爭奪最優渥的經濟資本。
- 二、名嘴及國防部同屬在電視媒體的大場域中，但在節目操作（次場域）的獨占下，國防部處於相對劣勢的位置，且若進入了政論性節目的場域中，國防部對於國防事務的回應即便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本及立論基礎，但仍受制於場域權力與特性，僅能單向回應且其內容、時間備受控制，資本間缺乏流動及轉換的動能。
- 三、場域中充滿了社會行動者的權力鬥爭和較量，名嘴間競逐的最終目的是因節目收視率連帶使自己通告費增加的實質性經濟資本，國防部則是能夠以專業威信讓人民信賴的象徵資本，看似二者的資本追求目標不一樣，又為何有所衝突呢？原因便在於名嘴的資本累積需要靠著在場域中的獨占和操縱，才能

有所經濟報償，而這與國防部的文化資本運作策略有所衝突和牴觸，公正、理性的辯論型態在充滿權力爭奪的場域中無法爭取到優勢位置和發言權。因此，國防部除非另闢戰場（離開次場域），否則僅能受制於場域及其他競爭者，且以其資本的運用模式是永遠無法達到資本流動之目標。

## 參考書目

- 包亞明編譯（1997）。《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中國：上海人民。
- 李猛、李康譯（1998）。《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國：中央編譯。（原書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吳玲玲（2004）。〈資訊控制制度與專家知識效應對網路消費者決策之影響〉，《應用心理研究》，22：47-66。
- 沈游振（2003）。〈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哲學與文化》，30（11）：93-120。
-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臺灣：桂冠。
- 邱瓊平（2011年12月4日）。〈愛上選舉？上月陸客創新高〉，《聯合新聞網》。  
取自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6759773.shtml>
- 林克雷、李全生（2007）。〈廣義資本和社會分層——布迪厄的資本理論解讀〉，《烟台大學學報》，20（4）：63-68。
- 林政谷（2007）。《政論性叩應節目收視情形與政黨傾向關聯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富美（2006）。〈當新聞記者成為名嘴：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的探討〉，《新聞學研究》，88：43-81。
- 周新富（2005）。《布爾迪厄論學校教育與文化再製》。臺北，臺灣：心理。
- 倪炎元（1996）。〈主流與非主流：報紙對一九九〇年國民黨黨內政爭報導與評論的論述分析〉，《新聞學研究》，53：143-159。
-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臺北，臺灣：生智。
- 唐士哲（2012）。〈電視政論與政媒互動實踐初探〉，《傳播研究與實踐》，2（1）：109-133。

- 陳珊華 (2004)。《小學生文化資本之累積與作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 孫智綺譯 (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臺灣：麥田。(原書 Bonnewitz, P. [1997]. *Premières leç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Pari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張可婷譯 (2010)。《對話、論述研究法與文件分析》。臺北，臺灣：韋伯文化。(原書 Rapley, T. [2007]. *Doing conversation, discourse and document analysis*. Los Angeles, CA: Sage.)
- 張國彬、石明宗 (2011)。〈三連霸的象徵資本詮釋——以臺師大籃球隊為例〉，《運動教練科學》，22：1-14。
- 黃靖惠 (2010)。〈不同媒體場域的評審：以歌唱競賽節目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7：173-205。
- 黃毅志 (2002)。〈林南 (Nan Lin) 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理論對於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之啟發〉，《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2 (2)：153-163。
- 趙志浩 (2010)。〈論文化資本的社會運作〉，《湘南學院學報》，31 (3)：1-3。
- 蔡筱穎譯 (2000)。《布赫迪厄論電視》。臺北，臺灣：麥田。(原書 Bourdieu, P. [1996]. *Sur la télévision*. Paris, France: Liber-Raisons d'agir.)
- 滕淑芬 (2008)。〈大陸觀光客來了〉，《臺灣光華雜誌》，33 (8)：6-19。
- 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 (2006)。〈從資訊處理典範到體會之知：專家研究典範的變遷〉，《思與言》，44 (1)：101-130。
- Benson, R. (2008). 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 *Journ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2, 147-177.
- Bourdieu, P. (1983).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NY: Greenwood.
- Chi, M. T. H., & Glaser, R. (1980). The measurement of expertis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nd skill as a basis for assessing achievement. In E. L. Baker & E. S. Quellmalz (Eds.), *Educational testing and evaluation: Design, analysis, and policy* (pp. 37-47).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umais, S. A. (2002).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and school success: The role of habit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 44-68.

# Capital Flow/Competition of Military Pundits on Domestic Political Talkshows: A Discursive Analysis of Talkshow Episodes on Major Military-Law Events in 2011

Tsui, Ai-Me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o compete for survival and prosperity on TV arena, each political talkshow has its own list of star pundits similar in traits as its target audiences. By providing them topics and exposure opportunities, the talkshow creates for these pundits a space of capital flow, which means differently types of capitals become interchangeable. Eventually, all capital exchanges serve but to secure most favorable social positions for acquiring most lucrative economic capitals. In strong contrast, the Defense Ministry tends to rely on symbolic capitals to ensure their professional prestige and authority, so as to win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This paper asks what kinds of conflicts could be expected when these two scenarios clash on military topics, 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capital use from both sides necessarily decide what get interpreted and circulated on TV. Via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talkshow episodes on major Military-Law events in 2011,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types of capitals being evoked and appropriated, and strategies used. It is discovered that unlike those pundits, the Defense Ministry tends to be constrained by the power pla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arena, being less flexible in capital exchange.

**Keywords:** capital flow, military pundits, political talkshows, the defense ministry, media arena

---

\* Email: [bjamy650514@hotmail.com](mailto:bjamy650514@hotmail.com)

Received: 2012.06.28

Accepted: 2013.04.12

## 我群與他群：兩岸學生社會認同 差異之跨群體溝通研究\*

李佩雯\*\*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旨在關切來臺陸生與臺生在跨群體溝通互動過程中，分別區辨出哪些畫分我群與他群的社會認同差異？而臺、陸生又是如何詮釋彼此的社會認同差異？本研究一共進行了 23 位臺生與 23 位陸生之深度訪談。結果顯示，對來臺陸生衝擊較大的社會認同差異為：「族群認同」與「國族與政治認同」，此結果與過去文獻所述並不完全一致；對臺生而言，感受較強烈的社會認同差異則為涉及團隊合作價值的「學生認同」與「社經地位與獨生子女認同」。

**關鍵詞：**兩岸學生、社會認同、社會認同理論、陸生、跨群體溝通

\* 本文改寫自筆者 101 學年度國科會計畫：「兩岸大學生之跨群體認同協商研究」（101-2410-H-128-018）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由衷感謝匿名評審的悉心指教，三名研究助理：柯妮廷、張文嘉、張雅筑在研究期間的耐心協助，以及所有受訪兩岸學生的熱心分享。

\*\* Email: pwlee@cc.shu.edu.tw  
投稿日期：2012 年 11 月 20 日  
接受日期：2013 年 5 月 21 日

## 壹、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大陸)北方的人他們特別有優越感，然後因為來這裡，大家一般經濟條件也還不錯啦，然後可能有的時候從小公主、小王子長大的，然後他們覺得，就會有優越感。所以我覺得，如果說臺生和陸生最大的衝突的話，應該是大家都有「優越感」這件事情，因為臺灣學生還把中國大陸想得很落後，縱使很多老師一直說這件事情，大陸已經很發達了，他們還是不想聽，對！還是不會接受這些事情。(C7)

我覺得(陸生)會很堅持己見，因為我不知道是他們的教育還是一胎化的關係，所以父母很寵他們吧，所以他們會覺得，自己就應該做自己(想要的)，所以他們不會去為同學著想，我覺得他們「團體」觀念沒有那麼強，他們都是以自身(的角度)去看事情。然後其實，有人，我們自己臺生就會私下討論，會覺得這樣有點自私，因為我們不太會這樣做。(T18)

資訊科技急速發展，促使國際競爭趨於白熱化，亦造就了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特性(陳學飛，2002)。為提升競爭力，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無不致力於跨國間的學術交流，此波教育交流熱潮落實在具體行動上，最明顯可見的即是各國對人才培育流通的重視(Rizvi & Lingard, 2000)。亞太地區亦受到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衝擊，對於高等教育的需求與重視相對提高，各國為了滿足這樣的需要，遂針對高等教育進行多元形式的擴充，並在政策上進行鬆綁。這股世界潮流使得原本主要為跨國高等教育「輸入」的國家(例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逐步展開跨國高等教育「輸出」的行動。是以，國際學生流動也不再僅從非英語系國家前往英語系國家，或從東方社會移至西方社會，近年來跨亞洲社會間的國際學生流動情形時而可見(姜麗娟，2010)。

事實上，中國大陸從本世紀開始逐漸崛起為世界主要的留學目的國之一，它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家。反觀臺灣高等教育，面對生育率逐年下降，大學的經營管理者無不憂慮著少子化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部分大學院校為解決招生不足之困境，遂同意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就學(江怡慧，2010；吳政達、湯家偉，2009)。而臺灣與中國大陸語言與文化相似，地理位置鄰近，開放大陸學子來臺就讀，可能有助於臺灣發展高等教育市場、紓解目前供需不平衡的問題

(吳政達、湯家偉, 2009)。

自1988年起, 臺灣政府便開放大陸海外學人及傑出人士來臺訪問; 1992年之後,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暨施行細則」的實行使臺海之間的文教、經貿交流蓬勃發展, 各種形式的考察團和學術交流絡繹不絕, 包括教師交換、共同出版學術刊物、合辦學術研究會議、簽訂姐妹校合約等(陳志柔, 2008)。2008年「大陸地區文教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文教活動審查要點修正案」頒布後, 臺灣各大學院校便以與大陸高等教育締結姐妹校的方式, 開始積極招募大陸地區優秀學子前來臺灣短期交換就讀, 來臺研修的期限也由初開放的四個月放寬為六個月, 最長可停留一年(教育部電子報小組, 2010年4月2日)。目前大陸學生以交換生的身分在臺體驗寶島求學生活的人數從95學年度的448人, 增加到100學年度的11,227人(教育部統計處, 2012)。2010年8月, 立法院臨時會通過陸生三法修正案<sup>1</sup>, 正式開放陸生來臺取得大學或研究所學位, 並於2011年(又稱「陸生元年」)6月(張鈞凱, 2012: 50), 首度招收大陸的學生來臺就讀, 同年9月正式實施。據統計, 100學年度教育部首次開放陸生修讀學位一共吸引了928位陸生來臺就讀四年制大學及碩博士班(教育部統計處, 2012)。未來, 兩岸學子在大學校園裡的文化接觸與學術交流將成為常態。

研究指出, 臺灣最吸引陸生的除了新穎的生活與學習經驗外, 另一個特點乃是優質的學術環境和人性化的校園管理。雖然歐美等西方國家依舊是陸生留學的首要選擇, 但是臺灣大學院校中優秀的海歸師資, 可提前協助他們適應西方靈活互動式的教學體制(林奇伯、林佩萱, 2010; 林家正, 2011; 林益豐, 2004)。教育部也強調, 陸生來臺研修不僅可使得學術環境多元化、增加國內高教學生的來源, 更可以「彰顯我國教育優勢、促進兩岸學子互助互信、展現教育之柔性國力, 並激勵國內學生學習動機及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 換言之, 開放陸生來臺乃是對國家社會利益、高等教育發展、青年學子學習的三贏政策(教育部電子報小組, 2010年4月2日)。整體而言, 兩岸學術文教交流的主要目的, 在於藉文化知識上的交換, 達到兩岸經濟發展、文明提升的目標, 同時刺激本地生的危機意識, 鼓勵良性競爭, 此舉對於華人經濟圈的人脈拓展與深化具有加分效果(李建興, 2011; 陳志柔, 2008; 滕淑芬, 2008)。

1 即關乎陸生來臺就學及大陸學歷採認政策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等三項修正法案, 此陸生三法於2010年9月3日修正生效。隨後, 《大陸地區人民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及《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二子法亦於2011年1月6日修訂發布, 兩岸教育與文化交流正式邁入一個新的里程(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 2011: 40)。

綜觀現狀分析，臺灣與大陸學生之間的學術交流開放似乎利多於弊，好處遠勝於壞處。然而，令筆者好奇的是兩岸在歷史教育上的分歧和政治立場上的落差，外加兩邊媒體長年對於彼岸形象的負面誇大與滲透，是否讓看似「同文同種」的兩岸學生因成長背景迥異而出現交流障礙？藍佩嘉、吳伊凡（2011：25）就曾經指出：

到外地居住的生活體驗，必然有文化探索的層面，遷移者在移入國生活並與當地人互動，往往未必是消弭了人群界線，而是更鞏固了主觀感知到的差異。

筆者擔心的是，歷史刻板印象所造成臺灣民眾的「怕」、「排外」（張鈞凱，2012：54），以及大陸人民在臺灣所感受到的「期望落空」、「被排擠」都可能抵耗兩岸學生彼此見習交流的機會，卻反倒放大了偏見、差異深化的途徑。

陸生來臺留學乃是不可扭轉之趨勢，亦是政府百年教育綱領中的重點施行決策（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2011），但是與此相關的實證研究卻為數不多，近期著眼於陸生的文章與報導則多數可見於聯合報系、天下雜誌群、《遠見雜誌》、《商業週刊》、《師友月刊》等，其內容也以教育界人士的政策辯論為主軸（柯曉翔，2011），包括臺灣招收陸生的優劣勢分析與政策開放建言（吳政達、湯家偉，2009；林玉体，2010；張國保，2010；張瑞雄，2007；黃政傑，2008；楊景堯，2004）、開放陸生來臺政策的現況與歷史流變（林彥宏，2010；林海清、李宏謨，2011；張國保、楊淑涵、張馨萍，2011），以及2011年首度招收陸生後的檢討與改善方針（張鈞凱，2012；黃政傑，2011）。少數以來臺陸生為主體的研究透露了兩岸學生在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和政治立場上的拉鋸（柯曉翔，2011；胡紹嘉，2012；蕭伊婷，2009）。陳志柔（2008）指出，即便大陸學生與學者對臺灣多元的學術環境心生嚮往，但是臺灣居民內心的價值信念、政治言論自由等特質，皆令來訪的彼岸人士感受到兩岸之間的分別。

由上述的統整可知，學界目前對兩岸關係的探討多側重於宏觀的政策性分析，相較之下忽略了「民眾觀點」。殊不知兩岸開放後臺灣與大陸民眾的身分認同因為相互間的交流正在不斷地重組、重構；兩岸學生微觀層面的日常接觸亦可能塑造兩岸關係的走向（林瑞華、胡偉星、耿曙，2011：29-30）。回顧少數陸生來臺的研究，其內容僅呈現出陸生或臺生單方面對兩岸學習交流上的態度、認知（例如：王嘉州，2011），有關兩岸學生之間的比較，或是探索彼此互動內容



的傳播／溝通類研究目前著實匱乏，尤其是針對政治民主和兩岸認同等觀點之深層探析皆極為鮮見（柯曉翔，2011；胡紹嘉，2012）。無可諱言，兩岸學生因彼此國族與政治認同對峙所可能產生的矛盾情結明顯可期，然而當大部分兩岸關係研究都將焦點擱置於此時，面對臺、陸生截然不同的成長環境與經歷，筆者不禁思考，諸如此類容易造成兩岸學生人際關係緊張的社會認同差異是否尚存在於其他認同構面？如果是，又會是哪些層面？兩岸學生究竟是如何解讀這些具爭議性之社會認同差異？它們可能對臺、陸生之間人際互動造成甚麼樣的影響？以上所提，乃是眼前筆者針對兩岸學生關係建立與維繫企圖探知的重要課題。

誠如筆者所言，雖然兩岸學子所使用的語言相似，傳統道德觀念相近，惟其成長背景在政治、歷史、地理環境、資訊傳播，和教育等文化構面上的拉鋸與抗衡，致使這兩個特殊團體的互動應更適合被視為「跨群體溝通」（intergroup communication，詳見於文獻探討）。既有關注留學生、旅居者（sojourners）與寄居文化（host culture）間互動的文獻（如：Navara & James, 2002）多數採取跨文化適應（intercultural adaptation/adjustment）的研究取向（如：林瑞華等，2011；胡紹嘉，2012；Kim, 1995），但是以跨群體溝通的觀點來理解兩地學生特殊互動經驗的研究，幾近於零。據此，筆者欲借力跨群體溝通的研究觀點來尋索影響兩岸學生人際交流之社會認同差異，冀望本研究能彌補國內跨群體溝通文獻及兩岸學生溝通比較研究的明顯不足，最終期盼本研究之結果能協助發掘兩岸學生交流上的敏感地帶，進而促成臺、陸生良善的學習關係與跨文化溝通知能之提升，才不枉費海峽兩岸開放學術交流之美意。

## 貳、文獻探討

### 一、我群與他群：跨群體溝通的研究觀點

#### （An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依循著問題意識所言，筆者將先界定跨群體溝通研究，接著闡釋溝通與社會認同形構之關聯，最後再將討論視野拉近至陸生來臺相關之學界研究。跨群體研究（the study of intergroups）在社會心理學範疇的發展歷史，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紀初期。1970 年代在歐洲，Tajfel 和他的同儕（Tajfel, 1978）開啟了跨群體這個研究議題並提出「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至今，社會認同理論在跨社會科學領域中始終保有重要的地位，該理論亦影響許多傳播理論的發展（Harwood, Giles, & Palomares, 2005）。

究竟何為跨群體溝通<sup>2</sup>？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通常立基於個人所隸屬的眾多團體，而非單純的只是包含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互動；換句話說，我們與他人的溝通互動或多或少、或隱或顯都會受到我們所屬團體的影響 (Giles, Reid, & Harwood, 2010)。就跨群體溝通的定義而言，學者們的看法頗為相似。Harwood et al. (2005: 2-3) 認為，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當任何一個團體基於「群體的成員歸屬」(group membership) 來定義自己或他人的團體時，則稱之為跨群體溝通；易言之，當「社會認同」，而非「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在互動的過程中對於其互動成員的認知變得強烈而顯著的時候，跨群體溝通隨即產生。當我們認定某些群體的成員歸屬很重要時，很自然地，關於這個群體的事物與關係都會成為組成「我是誰」的一部分，而這樣的過程也會逐漸讓我們意識到「我群」(ingroups) 與「他群」(outgroups) 的分別 (Giles et al., 2010)。

上述 Harwood et al. (2005: 3) 對跨群體溝通所提出的定義強調了以下三個重點：

- (一) 跨群體溝通並非只是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溝通。相反地，跨群體溝通指的是當個人之間的溝通受到互動者所屬的群體成員歸屬所影響時，互動雙方所進行的活動稱之為跨群體溝通。雖然我們亦可稱跨群體溝通為一種團體溝通，但是一般的團體溝通不見得可以算是跨群體溝通。
- (二) 跨群體溝通的產生並不需要互動當中的兩造都產生群體成員歸屬的意識才成立，只要互動當中的其中一方心中具有這樣的認知隨即構成。舉例來說，在課堂討論中若有臺生因為陸生同學在場，而刻意發表與國家主權獨立相關的言論，則此時即便陸生們當下沒有產生那樣強烈的群體成員歸屬認知，但是因為與其互動的臺生具備那樣顯著的群體認同區別，則跨群體溝通成立。
- (三) 這個定義也表明，自我與他人的分類與區別是相互扣連的<sup>3</sup>。承上例，當某臺生刻意發表其國家主權立場時，不僅是定義了對方為陸生群體，同時

2 跨群體溝通與傳播／溝通學界中所熟知的「跨文化溝通」分屬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例如：國際傳播學會將兩者分列為不同的研究分支），其研究傳統亦有所異。跨文化溝通領域探究的是不同文化群體間之溝通互動行為，而跨群體溝通則著眼於兩個群體基於成員歸屬而非個人認同所進行之溝通。廣義來說，跨文化溝通與跨群體溝通確有其互為關聯之處，但本研究主要側重於探討臺生與來臺陸生之社會群體成員歸屬差異，故以跨群體溝通取向作為專注之理論框架。

3 Woodward (1997 / 林文琪譯, 2006) 表示，認同透過差異而被凸顯，差異乃是藉由排除「他者」或局外人等邊緣化否定行動來達成。意即，認同多半植基於「我們」與「他們」這種二分法，於分類系統中將某些人、事、物分配至不同的位置上。因此，認同取決於差異，分類系統根據人們的特性，區分出相對的兩個群體：我們／他們，自己／別人。Hall (1989) 亦主張，人們必須要知道自己不是誰，以求瞭解自己究竟是誰。而認同的存在也必須透過個人與他者 (the Other) 之間的辯證關係來證明。換言之，認同代表的是他者與自我之間的關係。舉例而言，Said (1994) 認為，

也定義了臺生自己本身為「非」陸生群體；也就是說，這個對我群與他群分類的行為，讓在場的所有互動者彼此之間都產生一種明顯分類的連帶關係，而臺生這方的相對群體認同在當下就會立即顯現。因此，當跨群體溝通產生時，我群和他群的分類、群體歸屬的顯著程度、社會群體的「區辨」(identification) 都會相互伴隨著發生。

另外，Turner (1982) 也指出人們在互動時，若社會認同成為主導，則產生跨群體溝通行為。這個觀點也與 Sherif (1966: 12) 的定義呈現一致，他認為「當隸屬於某個團體的個人（或群體）基於群體的區辨與其他群體產生互動時，即屬於跨群體溝通行為」。跨群體溝通可包含的情境範圍很廣，舉凡黑人與白人、上司與下屬、醫生與病人、老師與學生、日本人與韓國人之間，受他們所屬群體成員歸屬所影響的溝通互動皆可稱之 (Gudykunst & Lim, 1986)。

跨群體溝通的研究於 1990 年代在西方傳播領域中逐漸受重視，其關切的是，群體之間基於其成員歸屬的溝通行為如何影響他們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Dougherty, Baiocchi-Wagner, & McGuire (2011) 應用跨群體溝通的研究取徑與社會認同理論探究了 28 位護士被其病人騷擾的經驗。結果發現，受訪的護士們在陳述自身的經驗時不斷將病人的違法行為歸咎於其社群成員歸屬，同時許多受訪護士也以自身及病人的社會認同來合理化病人的性騷擾行為，企圖以社群成員歸屬的刻板印象來幫助自己對性騷擾事件釋懷。

儘管跨群體溝通的研究常見於分析權力不均、歧視偏見、暴力、競爭與衝突等族群、宗教、跨年齡群體間的社會現象，但跨群體溝通亦可能促成良性的溝通，例如：群體間的認同拓展、合作、利他、談判協商等。雖然跨群體溝通的研究歷程並不算短，但臺灣目前關於這類的研究文獻仍然付之闕如。而國外的文獻則多數以同一文化脈絡下的共存文化群體 (co-cultures) 為研究對象，相對而言忽略了跨國籍或跨地域的群體溝通現象 (Imamura, Zhang, & Harwood, 2011;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11)。

簡而言之，當社會認同，而非個人認同，成為兩造溝通互動中重要而顯著的立基時，遂形成跨群體溝通。筆者認為兩岸因長期分隔，政府關係多年來陷入冷

---

西方文化將東方與北非等國建構為、甚至妖魔化為「他者」：危險的異己份子，西方國家與自由傳統的主要威脅；藉以凸顯西方世界長久以來所認知的自我優勢與主宰權力。此外，Hall (1990) 強調，透過差異所建構的認同意義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不斷進行改造的一種過程；他也以 Derrida 的「延異」(differance) (延遲發生與形成差異) 概念為例，說明意義總是被遞延的，絕非完全固定或完整的 (Woodward, 1997 / 林文琪譯, 2006: 36)。另一方面，標示與承認差異的存在亦可豐富認同之意涵，因為差異可作為多元性、異質性以及混合性 (hybridity) 之來源 (同上引: 60)。

凍與對峙，再加上近期大陸經濟高度發展，致使兩岸開放後，大陸與臺灣人民之間存在著一種對彼此感到好奇、相互較勁，甚或敵視對立的矛盾情結（藍佩嘉、吳伊凡，2011）。故筆者在本文中援引跨群體溝通的研究觀點，藉以加深理解臺生與陸生之間在不同社會認同歸屬下所衍生出之我群／他群溝通。

## 二、社會認同與跨群體互動

如前述，社會認同的概念與理論對跨群體溝通的研究影響深遠，兩岸學生之社會認同差異亦是本研究之核心，但是在討論社會認同的內涵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釐清溝通與社會認同建構的關係。Hecht, Jackson, & Ribeau (2003) 指出，人們透過兩種方式將溝通內化（internalize）為認同。其一，社會現象的符號意義乃是透過社會互動交換而產生，而認同的形成是當具有關聯性的符號意義經由社會互動的過程，在不同的情況下，歸納詮釋後內化於個人。易言之，當個人在互動之中詮釋到某些符號意義，且將這些意義與自身做連結，則社會互動即內化成認同。其二，當人們將自身置於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izations，如：個人所屬的群體）當中，他們會透過社會互動的方式來確認自己和這些分類的關聯性；這時候，個人的認同便透過這些社會互動所創造出的分類而形成或再形成社會認同。此外，特定的認同也意味著特定的期待，而這些期待會影響個人的溝通行為，所以個人的認同經由認同所附加的期待外化（externalize）到我們與他人的社會互動當中，換句話說，認同與社會互動的溝通行為是彼此相互形塑的。

「社會認同」可被更確切地定義為「個體透過不同的群體成員歸屬所組成的自我面向，同時這些面向對個人而言充滿了情感和意義上的重要價值」（Tajfel, 1972: 31）。從傳播學的面向來看，Hecht (1993) 認定個人和社會互動為認同發展的主要基礎，因而提出了認同的不同層次（layers），其中，「公共社會層次」（communal layers）指的是存在於群體之中的認同，群體成員共有某些特質同時共享某些群體的回憶，因此建構出一個群體的認同，亦可被理解為社會認同。另外，據 Gudykunst (1998) 的定義和分類，社會認同乃是影響個人與他群溝通互動最重要的自我概念因素。一旦個人覺察到自身隸屬於某些群體（我群），則個人的社會認同便開始形成。社會認同往往可基於我們所隸屬的人口普查項目（如：國籍、族群、性別、年齡、社會階層）；我們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學生、老師、家長）；我們在正式或非正式組織中的會員關係（如：學校、政黨團體、民間社團）；亦或是人們所屬的汙名團體（如：街友、同志）等方式來區

分。雖然個人可能隸屬於許多不同的群體，也擁許多不同的社會認同，但在特定情境中，通常某一種社會認同會特別顯著，影響著個人如何思考、感受與行事 (Harwood et al., 2005)。例如，在學校的脈絡情境中，照常理來說個人的學生認同會特別顯著，此社會認同亦影響著學生的一言一行。

個人的群體成員歸屬對其社會認同有著正面及負面的影響貢獻。當個人所屬的群體與他群之間的比較呈現有利、合意的結果，則其社會認同遂對個人產生正面的影響貢獻。換句話說，個人獲得正面的社會認同取決於其所解讀的他群成員行為是否比我群來得負面。此外，社會認同還具備以下幾個特點：1. 當某些社會認同在互動情境當下是特殊的、只有少數人持有的，則這些社會認同對我們來說才會顯得格外重要；2. 人們是否覺察、啟動某些社會認同必須取決於我們是否解讀對方為某些群體中「典型」的成員；3. 我群和他群的社會關係也影響了人們在互動過程中是否啟動社會認同；假使我群與他群之間的關係良好，那麼當我們與他群的成員互動時，我們也許不會啟動社會認同的部分 (Gudykunst, 1998: 74)。循此邏輯，姑且不論臺生或陸生是否皆為典型成員，眼前的兩岸學生交流情境陸生多半占少數，加上兩岸在歷史上的特殊對峙關係，皆使得這兩個群體間的互動容易涉及彼此的社會認同。

社會認同理論在發展的早期便指出，人們可透過「個人認同」（亦即個人對於認知自我為一獨特的個體，擁有獨一無二的特質之概念）和「社會認同」的概念來瞭解多種面向的自己 (Harwood et al., 2005)。SIT 主張人類與生俱來的慾望會以一種優於、異於他群的態度來看待我們所屬的群體，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群體成員歸屬乃是自我認知構成當中相當關鍵的要素 (Tajfel, 1978; Tajfel & Turner, 1979, 1986)。而這些關於我們所屬群體的正面比較結果，會讓我們跟著提升對自己的感覺與評價。亦即，人們會產生慾望去維持正向的社會認同，而他們對於我群和他群的認知與社會關係也同時受到這個慾望的影響 (Giles et al., 2010)。有些社會認同會受到我群在社會中存在的階級高低所左右，因此某些團體備受禮遇且擁有較高的社會階級、財富和權力，故社會認同的確會造成群體間權力不均的現象 (Tajfel, 1978; Tajfel & Turner, 1979)。

此外，SIT 最關鍵的概念在於，當群體或社會認同變得顯著，則跨群體互動的個人不會依據其個人的想法行事，而是會依據其所屬的社會群體的信念系統來行動 (Tajfel & Turner, 1986)。換句話說，當一個特定的社會認同變得十分顯著，我群的行為可能會因為既有的刻板印象或為了符合社會的期待，而使得我群對他群的認知變得更僵化，最後形成歧視性或具傷害性的跨群體互動行為 (Hecht,

Jackson, & Pitts, 2005)。舉例而言，莊耀嘉（2003：96-97）的心理學研究便發現臺灣年輕人普遍對大陸人民存在負面觀感，尤以認同自己為「臺灣人」者偏見最強。如此將大陸人明顯歸為他群的強烈偏見，亦同時形塑了臺灣年輕人對於兩岸交流的負面態度，遂可能造成兩岸學生於人際關係上的疏離與不和諧。同樣的，林瑞華等人（2011：47）的大型問卷及深度訪談研究也發現大陸臺商的當地融入情況與臺人的「身分認同」具有顯著關係，僅認同自身為「臺灣人」而不認同中華文化的受訪者，往往會在互動初始便在臺灣與中國群體間畫上一道涇渭分明的線，亦即畫出「臺灣人／我群」和「大陸人／他群」的區別，其結果自然影響兩群體間的融入與深層接觸。

論證至此，吾人可知跨群體間可能因彼此社會認同的信念顯著差異，致使兩造各自存有吾優彼劣的比較傾向，甚或產生負面認知、偏見與歧視行為。反觀兩岸的學生，在政治、歷史等社會文化背景殊異的情況下，普遍存在社會認同的差異，而差異較為顯著的一群可能預先就對彼岸學生抱有負面的認知態度，也較容易依照其刻板印象看待彼此，終究可能造成兩岸交流上的隔閡或負面的跨群體互動。是以，筆者認為深入探知兩岸學生之間具差異性的社會認同內涵，藉以發掘兩岸交流潛在的認知危機，確有其必要性。

### 三、陸生來臺求學之相關學術研究

那麼，從國內有關陸生來臺求學的研究文獻中，我們目前已經得知了甚麼？韓宜娟（2011）的研究聚焦於來臺交換陸生的就學動機與生活適應，其問卷分析的結果顯示，陸生的就學動機越高，生活適應越良好；他們在臺生活的主要壓力源頭來自於課業表現，而其深感困擾的事情則是兩岸人民對彼此持有的刻板印象。同樣地，林家正（2011）發現參與其交換生就學滿意度研究的義守大學與臺灣大學的陸生，認為臺灣居民對大陸人民存有負面刻板印象，在某種程度上對來臺就學的陸生產生歧視；而這些陸生在試圖融入臺灣的學校生活上，例如人際交往方面，則表示面臨較大的困難。他們指出，來臺後日常生活往往無法融入臺灣當地的學生群體，當然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與陸生僅僅短暫停留一到兩個學期有關。不過，陸生對於大學課堂上的互動參與教學模式則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多數也對臺灣的政治環境擁有一定的接受度。

蕭伊婷（2009）從臺灣的大學生著手，探究他們預期陸生來臺就學的生活壓力程度。結果顯示，臺灣大學生對於「意識層面」的壓力感受為最高，其造成的

原因可能是從過往至今，兩岸在進行交流時，常因政治禁忌或意識型態不同而引發衝突，因此該研究建議政府應對兩岸交流真正的價值與意義進行正面宣導，讓大學生脫離政治意識型態的枷鎖，鼓勵學生體會不同的學習思考、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另一方面，該研究也發現「不曾去過大陸與不曾與外籍生接觸」的學生在文化和經濟的感受壓力程度較高，這個結果證實了教育行政單位應積極推廣學校間的國際交流，建立兩岸學生的溝通平臺，讓兩岸學生有機會深入瞭解彼此的社會民情與文化，培養多元文化的世界觀。

反之，柯曉翔（2011）則是以深度報導的方式探討 25 名陸生如何建構他們的臺灣經驗。結果發現，陸生在接觸臺生時對於「國家認同」最容易產生矛盾衝突，陸生多數以為臺灣的居民希望有一天能回歸「祖國」，也覺得自己來到臺灣不過是「出境」；然而真正與臺灣同學交流後卻驚覺兩造之間各持不同觀點（同上引：57）。柯曉翔將受訪的陸生依其公民意識分為三類：第一類的陸生接受大陸官方所灌輸的意識形態，每當談到歷史或政治議題，立刻往黨國一方靠攏；第二類的陸生人數最多，因為在臺期間吸收了多元面向的資訊，因此對過去深信不疑的觀點，逐漸產生動搖，在此過程中開始產生困惑，但是尚且無法做出具體的價值判斷；第三類的陸生則是終於得得以在臺灣自由的環境下，熱衷於質疑與批判權威。這些陸生企圖以另一種觀點來檢視歷史、反思未來，雖然過程中可能因為困惑而無法做出確切的價值判斷，但是他們也在學習創造屬於自己的真相與意義。

特別的是，胡紹嘉（2012）為目前唯一從跨文化溝通的角度研究陸生跨文化接觸與人際互動的學者。他以敘事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一位來臺陸生的自我認同轉變與其來臺後的跨文化適應經驗。不同於學者 Kim (2002) 所提之「壓力—適應—成長」三階段迴旋向上論，該名陸生的跨文化適應過程歷經「適應—壓力—調解—成長」四個階段。胡紹嘉推論造成此差異的主要因為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文化和語言相近性，致使陸生在一開始來到臺灣時不至於完全迷失於陌生的環境，而反倒是在後期遭遇到更多社會與個人認同意義上的調解與斡旋（胡紹嘉，2012：82）。胡紹嘉發現：

中國—臺灣之間的文化差異因此不是習俗、儀禮、信仰與種族間的歧異，亦非傳統和現代間的抗頓，而是成員身分認同、社會現代程度與國家政治制度上的差距。這使得陸生在旅臺期間，不可避免的會經歷地主國文化對原生文化的社會與政治認同所造成的衝擊與失諧狀態……

一方面陸生因此對於母國的民族認同與社會歸屬感會變得更強烈，而非減褪，但另一方面，其亦更能對不同文化採取換位和同理的方式進行思考，包括對地主國與其母國皆然。（同上引：80）

換言之，該研究受訪之陸生與臺灣學生之間因為社會文化與政治成員身分認同上的差異，致使這名陸生在旅臺期間體驗了身分認同上的不一致與不和諧，終究造成其對母國文化認同上的反思和個人身分認同、生涯規劃上的重構。惟認同本來就非永遠固定不變的，這位陸生在認同上的換位和同理思考除了讓他更強烈認知自己對於中國的歸屬感之外，也促使他更為理解臺灣學生與居民的政治意識從何而來（胡紹嘉，2012：82）。

由目前累積的文獻歸納得知，來臺交換的陸生明顯感受到臺灣學生對其持有之刻板印象、敵意，也同時體會到國族、政治，和其他社會文化認同差異所帶來的猛烈衝擊。而臺灣學生在面對陸生時，亦同樣對兩岸政治等意識形態問題備感壓力。這幾年的研究的確說明了兩岸學生之間存在著社會認同差異所造成的關係緊張，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先前的文獻都僅呈現陸生或臺生單方面的見解，且多數也以量化問卷調查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如：江怡慧，2010；林家正，2011；蕭伊婷，2009；韓宜娟，2011），恐怕無法真正瞭解所謂「刻板印象」背後深層的內涵，遑論刻板印象一詞流於籠統、空泛，無法協助吾人清楚理解兩岸學生在交流問題上的源頭。

基於個人的社會認同種類繁複 (Gudykunst, 1998)，其所產生的影響不一，因此筆者將本文的目標定位在兩岸學生社會認同差異之探索。除了欲深入瞭解兩岸學生所持國族、政治認同的意涵以外，筆者認為這兩個群體各自帶著不同的成長背景進行互動，那麼其他明顯影響這兩個群體溝通的社會認同差異又有哪些？而這些彼此似乎相互抗衡的社會認同差異之於兩岸學生之間的互動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關切的是：來臺陸生與臺灣學生在跨群體溝通互動的過程中，分別區辨出哪些畫分我群和他群的社會認同差異？其背後的論述為何？換言之，臺、陸生如何看待、詮釋彼此的社會認同差異？冀望藉此研究提問以釐清兩岸學生互動關係中可能引發矛盾、緊張的跨群體溝通問題癥結。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方法中的「詮釋現象學觀點」(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來瞭解兩岸學生在交流過程中如何看待其社會認同



差異。詮釋現象學關注的是人類有意識的生活經驗與個人存在世界之間的關聯；易言之，詮釋現象學研究多應用於解釋人類所經歷的生活現實和其所代表的意義 (van Manen, 1990)。其研究框架包含了三個研究步驟：「描述」(description)、「還原」(reduction)、和「詮釋」(interpretation)，意即收集被研究者生活經驗的描述、還原組織被研究者生活中的重點經驗，和詮釋分析被研究者所描述的重點經驗所富含的意義 (Lanigan, 1979, 1988; Nelson, 1989b; Peterson, 1987)。為收集受訪者詳盡的生活經驗，傳播學者們主要採用三種詮釋現象學的方法，包含：深度訪談法、關鍵事件訪談法 (critical incidents)，和焦點團體訪談法 (Orbe, 1996)。本研究依適切性選擇以深度訪談法作為主要研究工具。

深度訪談法乃是收集被研究者生活經驗很重要的一項工具，因為該方法讓受訪者得以用他們自己的話語來陳述他們的生活故事 (Anderson & Jack, 1991)。筆者於訪談之初先請受訪者詳細回顧與臺、陸生相處過程中印象深刻之重要事件，隨後再系統性地輔以詢問筆者事先擬定的一套半開放式訪談題組，並在必要時深入探問與本研究相關之子問題。待資料收集完成，筆者遂針對訪談內容轉換之逐字稿進行歸納還原，檢視受訪內容中一再出現的重要議題 (Nelson, 1989a)，最後並對這些主題進行詮釋。

## 一、受訪者招募與訪談流程

合乎本研究條件的受訪者必須為臺灣籍的大學在學生（包含大學生與研究生）或來臺的中國籍學生（包含來臺短期交換生、大學部及研究所學位生），且與上述兩方之另一方在課堂中或課餘閒暇曾有互動經驗持續至少一個學期以上者。為避免臺生或陸生受訪者顧忌其談話內容有損與另一方之人際關係，本研究採個別招募，不以彼此熟識之配對臺、陸生朋友為招募對象，亦不進行臺生與陸生受訪者對照混合訪談。招募與訪談之涵蓋期間為 2012 年 2 月至 2012 年 8 月，筆者選擇北臺灣陸生招收人數眾多之某私立大學（簡稱 A 校）<sup>4</sup> 為主要受訪者招募校園，並透過大學生的人際脈絡以滾雪球的方式介紹北臺灣地區他校之少數臺灣與大陸受訪個案。訪談進行的地點多數為鄰近捷運站之咖啡廳或學校會議室，平均訪談時間為 45 分鐘至 1 小時。每位受訪者皆被問及與臺生或陸生接觸時的重要事件、曾經引發負面感受的經驗，以及和對方相處時所觀察到的行為與價值

4 根據 A 校學務處的調查數據統計，該校 100 學年度一共招收 453 位大陸交換生、26 位大學部四年制陸生、兩位碩士學位陸生。

觀念差異。訪談結束後，每位受訪者獲贈小禮物一份以茲答謝，並再次允諾不透露其真實姓名。

為提高陸生組訪談內容之真實性，於每回訪談進行前，筆者均再三向每位受訪陸生強調本研究之目的，確認其訪談內容僅供學術出版使用，同時向陸生提及筆者過去赴大陸交流及輔導陸生之經驗，以取得陸生之信任，盡可能減低陸生因筆者之臺灣籍身份而對其欲陳述之事實過度修飾。但是，所有的陸生受訪者中仍有三對兩兩彼此熟識之受訪者（分別是：C1 & C2、C3 & C4、C14 & C15），為了避免單獨面對筆者時可能產生的尷尬、焦慮，特別要求以兩人為一組的方式進行訪談。這樣的雙人訪談歷時較長，通常為 1.5 小時。

## 二、受訪者資料

陸生受訪者共有 23 名，包含 17 位女性，六位男性，平均年齡約為 22 歲。其中交換生的個案有 15 位，包含 13 位大學部學生，兩位碩士班學生；大學部四年制學位生三位，碩士班學位生五位。陸生受訪者就讀之科系以文科為主，包括傳播、新聞、中文、法律、數位多媒體、藝術行政管理、國家發展，和化工等，此乃因為 A 校在臺灣與大陸地區向來以文科系所著稱，故吸引相關科系學生投報。有 10 位陸生來臺交流的時間大約為一年，其餘 13 位則為半年左右，當中僅有一位（C18）過去曾經因為工作需要來過臺灣短期出差。由於目前來臺就讀之陸生仍以大學部交換生為主流，故本研究招募到之陸生受訪者也以交換生占多數。另外，A 校 100 學年度的陸生男女比例大約是 1：3，故受訪個案之男女比例亦約略反映此數據（如表 1）。

臺生受訪者則有 23 名，17 位為女性，6 位為男性，平均年齡是 21.6 歲。當中有 19 名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學生，四名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因來臺交換陸生多數為大學部三年級生，故與陸生有較多接觸的受訪臺生亦集中在此年齡層。所有臺生受訪者中僅有一位為他校大學部學生，其餘全數為 A 校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臺生受訪者亦主要就讀文科系所，包含傳播、資管、廣電、新聞、觀光、企管、英語、行政管理等。其中有 10 位曾經前往大陸觀光或參訪，10 位中有二位曾到過大陸成為交換學生。多數的臺生受訪者都曾自願擔任 A 校的國際學生小天使，少數則是在社團內或上課班級中結識陸生。總的來看，臺生與陸生平均接觸的時間大約為 1.3 年（如表 2）。本研究之受訪人數取決於資料蒐集內容是否已經出現飽和的結果；當筆者發現受訪者的陳述已不斷出現重複、類似的經驗時，遂停

編號	受訪者來臺身份	性別	年齡	科系	來臺時間	原居住地
C1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2	傳播	一年	福建
C2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1	傳播	半年	陝西
C3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1	法律	半年	陝西
C4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男	21	法律	半年	陝西
C5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1	中文	半年	遼寧
C6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1	傳播	半年	陝西
C7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1	傳播	一年	福建
C8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0	傳播	半年	陝西
C9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男	21	傳播	半年	遼寧
C10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男	21	文學	半年	山東
C11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2	傳播	半年	陝西
C12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21	數媒	半年	浙江
C13	A 校大學部交換生	女	18	中文	半年	山東
C14	A 校碩士班交換生	女	24	新聞	半年	陝西
C15	A 校碩士班交換生	女	24	新聞	半年	陝西
C16	A 校大學部學位生	女	19	傳播	一年	上海
C17	A 校大學部學位生	男	19	新聞	一年	福建
C18	A 校大學部學位生	女	19	新聞	一年	杭州
C19	A 校碩士班學位生	女	23	傳播	一年	上海
C20	A 校碩士班學位生	女	29	新聞	一年	北京
C21	他校碩士班學位生	男	23	化工	一年	福建
C22	他校碩士班學位生	男	24	國家發展	一年	廣東
C23	他校碩士班學位生	女	25	藝術行政管理	一年	廣東

表 1：受訪陸生基本資料

止招募新的受訪者。據 A 校註冊組公布的資料，100 學年度該校的男女學生比率約略是 1：2，是以受訪的臺生以女性居多。

## 肆、研究結果

為呈現出兩岸學生各自的立場和看法，筆者茲將研究結果分列成「陸生眼中的臺灣學生」與「臺生眼中的大陸學生」兩類，以求讓讀者聽見受訪雙方較完整的聲音。其中，陸生的受訪內容擷取出較多的篇幅，原因乃是陸生受訪者的平均訪談時間較長、內容較深入；而許多受訪臺生均熱衷與國際學生互動，是以臺生受訪者比起陸生，在訪談內容表達上似乎稍較委婉、中立（詳見後方研究限制）。故以下的呈現方式與筆者個人對於臺、陸生的直觀看法無關。

編號	性別	年齡	學校科系年級	與陸生相處時間	是否到過大陸
T1	女	19	A校廣告系一年級	半年	是
T2	女	19	A校觀光系一年級	半年	否
T3	女	20	A校傳播系二年級	一年	否
T4	女	20	A校資管系二年級	半年	否
T5	男	20	A校傳播系二年級	兩年	否
T6	男	23	A校傳播系二年級	一年	否
T7	女	21	A校資傳系三年級	三年	是
T8	女	21	A校英語系三年級	一年	是
T9	女	21	A校廣電系三年級	半年	是
T10	女	21	A校傳播系三年級	一年	否
T11	男	21	A校行管系三年級	一年	是
T12	男	21	A校資管系三年級	半年	否
T13	女	25	A校傳播系三年級	半年	否
T14	女	21	A校廣電系三年級	兩年	否
T15	女	21	A校新聞系三年級	三年	否
T16	女	21	A校新聞系三年級	一年	否
T17	女	21	A校新聞系三年級	兩年	是
T18	男	22	A校傳播系四年級	一年半	否
T19	女	23	他校企管系四年級	一年	是
T20	女	23	A校新聞所一年級	三年	是
T21	女	23	A校傳播所一年級	一年	是
T22	男	27	A校傳播所一年級	一年	否
T23	女	23	A校新聞所一年級	一年	是

表 2：受訪臺生基本資料

## 一、陸生眼中的臺灣學生

訪談過程中，陸生傾向用「我們的人」、「我們那邊」、「你們這邊」來指涉陸生、大陸，和臺灣，以避免政治敏感。不少陸生反應，在臺灣曾經遭遇過差別待遇、被排擠、被指控為來臺競爭資源的「他者」。他們發現就算與某些臺生相處愉快，依然很難打入臺生們的圈圈。陸生們表達，「我感到自己彷彿是一個過客」、「上課總有種孤伶伶的感覺」、「覺得和臺生是兩個地方的人，不能真正融入這個集體，有『局外人』的感覺」、與臺灣同學有一種「無形的距離感」。平時就算一起上課，陸生也感嘆臺生們鮮少主動找他們交流。有一位陸生更是直接地說道：

臺生不在意陸生，有你沒你都一樣無所謂。因為陸生還是得回大陸，他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最後還是相隔兩地，且臺生已經有自己的圈子。……臺生和陸生之間基本上是「你過你的，我過我的，我們之間是不搭界的」。(C11)

雖然不是每位受訪的陸生皆如此悲觀地看待與臺生之間的關係，然而從這類的聲音中不難解讀出陸生在臺灣被畫為「他群」的無奈感。以下，筆者將就陸生訪談資料中所歸結出兩岸學生在族群、國族與政治、學生、性／別、宗教等認同上的差異進行說明，其中將包含陸生眼中看到明顯區辨兩岸學生的認同差異、他們如何詮釋這些區別，以及發現差異後陸生又是如何看待自己。

### (一) 族群認同之別：大陸人不一樣了，我們不是素質落後的他者！

依據 Phinney (1990) 的文獻回顧，「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於學術上之定義略顯分歧，學者們因其研究領域之別，故強調族群認同意義中之不同要素。歸納而言，族群認同意指個人認定自我為某族群的一份子，並且與該族群因共享文化(culture)、民族遺產(heritage)、歷史(history)、傳統(traditions)、價值觀(values)、相似行為(similar behaviors)、地區起源(area of origin)，及語言(language)所衍生而來的情感與認知(王甫昌，2003；Collier, 1998; Hecht, Collier, & Ribeau, 1993; Phinney, 1990)。

還原本研究之訪談內容後筆者發現，陸生原本以為眼前高度發展的中國，會讓海峽另一邊的臺灣人也連帶覺得與有榮焉，但是這樣的期望卻與事實不符。多數臺生仍然根深蒂固地將大陸人與土、落後、沒禮貌、保守、素質差、盜版山寨氾濫、黑心等行為與文化價值觀畫上等號，並且經常有意無意地利用這一類的貶抑論述來鞏固臺生的族群「優越感」。這類族群認同區隔對受訪陸生帶來最顯著的衝擊。從上海來臺就讀大學學位的 C16 感覺剛開始在臺灣上課好似被當成「稀有動物」一般，多次被臺生問道：「你們廁所有門嗎？你們的手機都是 iPhone 嘛，都是山寨的？我們兩岸互動啊，給你們大陸賺了多少钱啊？」。家鄉在山東的大學部交換生 C10 也發現「臺生普遍認為陸生素質不好，也一直認為大陸還很落後，很亂、小偷很多」。有些臺生還會特別挑出新聞報導裡陸客的惡行惡狀，要求陸生來幫大陸說說「好話」，令陸生非常尷尬。但是當臺生對於大陸整體行為素質的批評不再只是些嘲弄的問句，而是課堂小組討論中犀利的針鋒相對時，研究生 C23 難掩其憤憤不平的情緒：

我覺得老師還好……是學生，我覺得大家就開始有……有香港的呀，然後臺灣的呀，然後……就開始……各個都在開始……我可以用「數落」這個詞吧，就各個都在數落，數落就大陸……他們的經歷，哪個素質不好，那個素質不好，這個素質不好。然後我覺得我一個人在那，那麼渺小，然後我就……唉……壓力太大了。我很生氣。（C23）

即便有些臺生會「好心地」告訴比較親近的大陸同學，「你是『進化』的大陸人」、「你『很不像』大陸人」，但這樣帶有語病的說法亦透露出臺生對於大陸人抱存的既有框架和刻板印象，反而使陸生不滿。

反之，許多陸生也批評臺灣的新聞明顯帶著「看大陸笑話」的色彩（如：C17，A校大學部四年制陸生），並且充斥著對政治人物的怒罵鬥爭，過於聳動、視野太小，有過度誇張之嫌。陸生們認為這樣的負面新聞報導文化，影響了臺灣社會因一件芝麻小事便大驚小怪的「島民」族群特質。

我覺得臺灣人說話，會有一些誇張的成分，我覺得這是普遍的現象。就是，可能，真的很常「真的假的？」，然後就會「超誇張的」，結果你就一聽，突然就覺得，原來就這樣。而且就是，尤其看臺灣的新聞，真的覺得來臺灣之後，覺得是，到另一個世界來……都是一些花邊新聞，可是很少會看到很正式的東西。……也常會看到報導一些大陸的事情，但是還是很浮誇的那種東西。（C5）

上述的例子顯示，臺生和陸生皆透過負面區辨的評述來表達一種以自我族群為中心（ethnocentric）的優越感，誠如本文開頭所引 C7 的話，造成了兩岸學生間深層的隔閡，亦引起陸生最多的反彈。

除了行為與文化內涵的比較以外，陸生們發現在口音、詞彙、簡／繁體字等語言使用面向，也都顯而易見兩岸族群認同之區別。而臺生對於這類外顯溝通元素差異的反應，似乎企圖顛覆所謂兩岸「同文同種」的說法，也讓某些陸生覺得兩岸學生之間維持的是一種「表面上的和平」，即便雙方語言相通，但是歸根究底還是「隔了一道臺灣海峽」。舉例而言，多位陸生表示，自己在臺灣曾因為特殊的口音遭到冷眼、吃過閉門羹，有種一開口就會立刻被「貼標籤」的感受。C16 曾經因為口音的不同被臺生戲稱為「大陸妹」，導致一開始上課時她極不願意開口，或乾脆去掉「兒化音」，刻意學習臺灣腔。遼寧大學的交換生 C9 也有

過類似的經驗，在北部某大學的校園裡，只要他一開口說話，所有人就會以異樣眼神看著他，這些臺生甚至會問他：「你是不是大陸來的？飛彈會打過來嗎？」讓他一度覺得臺灣學生好敵對，只好在當下謊稱自己是馬來西亞人脫困。另外，有些陸生與臺生討論簡體字的使用與淵源，卻被臺生直接噏「你們沒文化」。而陸生所慣用的詞彙在某些臺生眼裡卻成了一種笑料，幾位陸生只好委婉地表達兩岸的幽默感確實有落差，不僅臺語的笑話聽不懂，有些臺生的笑點更是難以理解。

反觀自己，陸生認為自身的族群並不如臺生所形容的素質低落，那些臺生口中的不當行為其實僅是少數人的作為，因此他們將臺生的負面態度與敵意歸咎於臺生對大陸的瞭解不足、新聞報導的偏頗，以及從小意識形態的教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臺生所展現出來的生活慣常秩序，例如：排隊等電梯、搭公車等，倒是令許多陸生們在讚美之餘，紛紛跟進仿效。

## （二）國族與政治認同之別：「一個祖國」夢的破滅

所有陸生來臺之前皆被臺辦或校方交代不宜談論國家主權與政治類的話題，因此，陸生在臺灣多半盡可能避免發表這類言論。許多陸生私底下表示「其實也沒甚麼不能說的」，但是他們發現臺生對於兩岸關係的議題反倒更加冷感，在課堂上並沒有陸生來得踴躍發言，他們也相信這可能與臺灣的政治與新聞環境有關。

猶如過去的文獻所示，許多陸生來臺後遭遇的首要不適應即是「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美夢破碎。陸生們深信不疑的國族認同本將臺灣包含在「祖國」的範疇之內，但真正來了以後卻發現，這邊的教育強調「臺灣是一個國家」。依陸生們的認知，來臺灣交流明明只是「出境」，卻屢屢被臺灣同學問及第一次「出國」的心情。來臺交換長達一年的 A 校大學部陸生 C1 描述，臺生上臺報告會習慣性地稱「中國」，而非「大陸」，就連錄製學校裡的廣播新聞，大陸地區的新聞也被編入「國際新聞」，令負責播報的 C1 很為難。

除了國族認同上的明顯區隔，陸生們察覺臺生普遍以臺灣的自由、民主、開放為傲，而相對地認定大陸的政治不民主，新聞自由度不足。但是，許多陸生對於這類政治認同上的詆毀頗不以為然。陸生們認為大陸一直存在著「民主」，同樣會選出代表來為個人發聲，只是大陸的選舉比較像是一種「象徵」的過程。在言論自由度上，有些陸生指出兩岸的民主程度「相去不遠」，大陸人民同樣可以

在網路上罵國家領導人，許多黨內高官的爆料也是從網路上開始。陸生們說道，臺生以為大陸真的只播些冠冕堂皇的新聞和節目，真是一大誤解。陝西西北大學研究生 C14 表示，有些臺生特別喜歡藉著討論某些新聞事件來突顯和嘲諷大陸民主與人權的低落：

（那個臺灣男同學）每次問的問題，就是剛開始我覺得他是個政治愛好者，到後面我們發現他是一個針對大陸的人，呵呵呵。而且臺灣的媒體就是報導大陸的……一半一半吧，但是負面相對多一點。然後他會專門把什麼……人權問題呀，然後前面有段時間發生都更，然後他就說：「在臺灣就是拆一個房子真的很難，就是要建一個房子也要經過程序，我知道不像大陸，你要蓋一個房子一天就能蓋起來了」。呵呵，然後當時就是我心裡會不太舒服。

據陸生觀察，有時候臺生問話的方式好像只是想印證他們自己的見解，而非真的想求知。面對臺生對於大陸政治現況的認知差距，陸生的回應趨向於「一黨專政並不是壓迫，而是為了更符合大陸的國情和人民的數量」。一般陸生不會針對對峙的政治立場與臺生進行激烈的辯駁，但最起碼會設法維護祖國的形象。比方，當臺灣學生跟他們提起大陸的重大醜聞，陸生會選擇避而不談，因為他們相信這些事件確實需要政府的介入。

論及國家主權，兩岸學生明顯地各有各的主張。受訪的陸生表示從臺灣的歷史教育角度，他們能夠理解臺灣人的國族立場從何而來，惟現階段除了互相尊重以外，過分爭論並沒有好處；臺灣要統一或獨立，都不是陸生或臺生能改變的事，是「國家」的事。陝西來的大學部交換生 C6 這麼解釋：「這個問題我們也沒法解決，只能靠時間去解決……臺灣人只要好好做自己『保持原型啊』，其他交給大陸」。換言之，與臺生接觸之後多數陸生仍然抱持著「一個中國」的理念，但卻以一種較輕鬆、彼此尊重的心情來看待。至於大陸跟臺灣比起來究竟「夠不夠民主」的問題，多數陸生明確表示，現有的政治制度符合其當前的國情，他們也期待臺生能對中國的政治體系有更透徹地瞭解，以免妄下評斷。

### （三）兩岸「學生認同」之別：提升兩岸競爭力？學習態度大不同

據陸生觀察，臺灣學生對學習不是很感興趣，然而課外活動倒是表現出色；臺生對於未來的規劃較少，似乎並不特別在乎成績，即便臺生思想活躍、外在占



優勢、溝通能力強。幾乎所有受訪的陸生皆對臺生的學生認同和其學生角色扮演感到百思不解，甚至有位大陸的交換生直接坦言，臺灣學生真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過得太安逸了！」臺灣大學生上課學習氛圍的散漫令陸生們覺得不可思議，例如：遲到、早退、吃東西、隨處走動、不帶課本、不聽講等，這些都是在臺灣教室裡相當常見的現象，然而在大陸「這麼做是可以被老師趕出去的」（C13）。陝西來的大學交換生 C2 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吃東西的就一定會有，然後就玩手機，各種各樣的人都會有。然後有大陸同學就跟我講說，他都不好意思認真聽課，旁邊的在吃東西，然後看了他都一邊口饞了，然後說，大家都這樣子上課，他就不好意思跟老師做延伸、做深入一點的交流。……你就會覺得很怪喔，大家都不是，就會有那種從眾心，大家都沒有那麼 care 老師在講甚麼內容……他就會覺得挺不好意思的。

除了學習風氣低靡，間接影響到陸生的學習品質外，臺生的「生活作息」與「時間觀念」亦深深困擾著陸生，卻又無計可施。即便臺生比陸生受到更多團隊、小組合作的訓練，但臺生卻習慣在 12 點過後才上網（以 Facebook 為主）討論報告，小組集會遲到、「放鴿子」的情形更是屢見不鮮，這些做作業的「特殊習慣」讓多數陸生吃不消。即將升上大四的交換生 C11 描述：

（臺生組員）比較喜歡忙「後半場」，我比較喜歡忙「前半場」。就是，我的前半場、後半場「十二點」是一個分界線。我十二點之前說話，他們十二點之後說話，……我可以接受晚一點，但是我不能接受你十二點的時候開始討論，那就比較痛苦了。但是他們的時間就這樣子。

無獨有偶，來臺修習廣電課程約莫一年的 C7 也談到類似的無奈經驗：

有一次……我們拍片是凌晨兩點拍，因為（臺生組員）12 點多才下班。對，但是在大陸的話我會說啦，我會說這件事情太瞎了，我不會這樣做。但是在這裏的話，你可能就……沒有甚麼發言權了，那其他人，其他劇組的人都這樣做的話，你就只能去配合他們。嗯哼，你也不好意思說甚麼。對啊，無非生物鐘改一下啦！

臺灣學生的作息時間與他們的「工讀認同」有著絕對密切的關係。陸生們指出，大陸採「應試教育」，家長通常將所有的希望集於唯一的小孩身上，每個教育階段的升學壓力皆頗大，學生自然沒有空間和時間外出打工，父母也不鼓勵（C20）。相較之下，陸生很訝異臺生們如此看重工讀的經驗，藉此拓展人脈，並且不以藍領的工作為恥（例如：便利商店或超市收銀員）。然而，這份很不一樣的工讀認同也讓兩岸學生產生不少矛盾。比方，四年制陸生 C18 無法理解為何臺生把打工看得比課業還重，甚至依打工的時間來安排課表，或放棄某些在校的學習機會。臺生忙工讀也使得兩岸學生能面對面討論功課、互動的機會減少，誠如陸生之間流傳的戲謔說法：「一方（臺生）主打工，另一方（陸生）主環島」。

而陸生缺乏的工讀認同也不禁令他們反思自己的「獨生子女認同」。多數陸生身邊的貴重物品都是父母供給的，相較於臺生自己掙錢購買必需品，C10 語帶尷尬地說：

我們大陸那邊，一般都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的話，所以父母就會很慣。慣著，所以有什麼，因為就只有你一個人啊，所以有什麼好的都給你，然後只有好的其實沒有壞的。這邊好像不會那麼刻意的去，就是說，沒有錢了，然後找爸爸媽媽要。很少。這邊觀念就是讓學生獨立。

當 C10 被臺灣同學問起家裡的兄弟姊妹時，經常讓他不知該如何回答。不少陸生很坦白地說，獨生子女較以自我為中心，不容易體會別人的感受，以至於人際關係處理較差。接續前述的兩項認同差異，筆者也觀察到兩岸學生在「消費與金錢使用觀念」上的分別。在北部某大學就讀化工研究所的 C21 不諱言的說，父親答應支付他在臺所有的生活費用，因此他在飲食方面，一般比較隨性，與臺灣籍女友外出，也多由他負責買單。而 C21 在受訪的陸生當中，並非唯一不必為自己的花費傷腦筋的陸生。比較起來，臺灣學生多數會考量自己每天的各種支出與消費，一方面讓陸生擔心自己吃好的、用好的會嚇跑臺生，另一方面也忍不住大嘆「這樣不是很累嗎？」、「臺灣同學會不會太小氣了」（C18）？。

簡言之，作為一個學生，在學習上，臺生似乎比較「樂活」，無須承受太大的競爭壓力，但也因此讓陸生覺得他們（尤其是大學部的臺生）不夠勤奮、不具競爭力、也沒有抗壓性。比較之下，陸生們即便欽羨臺灣學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創造力，然而在人口眾多的大陸，他們很清楚自己還是得靠優秀的成績與學歷來翻

身。不過經濟上，身為獨生子女的陸生反而不必像臺灣學生一樣糾結於打工與課業之間。這種因為社會文化身份相互交織所產生的認同差異，讓陸生看到自己身為大陸學生既辛苦又幸運的一面。

#### （四）性／別認同之別：性／別、感情觀大開眼界

許多陸生的訪談透露，兩岸學生在牽涉到性／別認同的觀念上有著明顯出入。首先，陸生很少與一般人談論「初夜」、「性關係」、「墮胎」、「同居」這類敏感話題，然而臺生對這類議題所持的態度和觀念，比起大陸而言相對「開放」許多。依陸生們的認知，似乎只有已婚人士或親密的家人、朋友間才有可能在私下討論性事，可是他們發現不僅一般臺灣人很樂意去談論性，連電視新聞對於性的關注也頗高。有些陸生強調，「同居」這樣的行為在大陸學生之間是幾乎看不見的，但在臺生之間似乎已是不足為奇的現象。

再者，多位陸生特別指出他們對臺生性別認同、性向的多元化滿是驚訝，有的陸生其實並無法接受。C14 和 C15 兩位研究所交換生一起受訪時說道，臺灣校園裡較為陰柔的男性不在少數，尤其與大陸北方偏大男人主義的男性比較，相去甚遠。

之前就大概覺得臺灣男生跟我們那邊的男生很不一樣，還有一些男生會特別的偏女性化一些，我們看到了會很吃驚！因為在我們那邊偶爾、就是很少會看到，可是在這邊可能你冷不丟的就會看到一個打扮的還蠻女性化的一個男生穿著呀，然後頭飾、手飾都會有，就是這樣走在街上會成為焦點，就是會覺得很奇怪。……我會不是特別願意跟他去往來，就是我覺得這個人就是，反正在我的認知裡面，我覺得男性應該不是那個樣子的。（C14）

四年制的大學部陸生 C16 也表明自己一開始無法接受身邊「性別倒置」（亦即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不一致）的同學，還有當他發現同班同學 Facebook 上寫的戀人其實是「同性」時，瞬間她以為自己來到了完全不一樣的世界。過了一年，C16 漸漸學會「包容」多元性別認同的臺生，她也坦承性別平等教育在臺灣，的確比較到位。

就算是異性戀之間的感情觀，陸生仍然發現兩岸的觀念存異。舉例來說，臺生認為戀愛、分手乃正常之人生經歷，年輕人應該多談幾次戀愛才可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伴侶，「結婚」不見得是感情繼續的最重要考量，戀愛雙方能不能開心的相處才是關鍵。但是大陸學生的想法相對保守些，他們對每一次戀愛皆慎重其事，並且幾乎都以結婚為前提與對方交往（C1 & C2）。是以，許多大陸女同學會盡量避免去碰觸「臺陸戀情」，因為在他們的感情觀裡，這種可能沒有未來的情感是很不切實際的。此外，臺灣學生兩性之間的模糊界線，像是一般異性普通朋友之間親密的非語言舉動，也讓陸生們怯於跨出情感上的那一步，深怕自己過度解讀異性的純粹友善。

思考婚姻的時機，陸生似乎比臺生更為早熟一些。臺灣學生看待婚姻的承諾，不是特別著急，一切傾向順其自然；但大陸學生在感情世界裡總是希望目標能明確，感情可以盡早「定下來」。目前還是碩一學位生的 C21，與臺灣女友感情穩定，當他跟女友談到「未來」時，臺籍女友的答覆運用了這樣的比喻：

她有給我做過一個比喻吧，她說，我喜歡，就是作業馬上交，她喜歡到 deadline 再交。因為我之前就是去修課之類的，我都會作業馬上交，因為我就是，還沒有確立關係的時候，我就跟她聊到這個問題，就說，我可能會（留在臺灣）。她就跟我說，我喜歡作業馬上交，她喜歡到 deadline 再交，妳懂這個意思嗎？她說，這個問題到時候，自然會有解決的辦法，應該是這個意思。

在大陸，和 C21 一樣大學畢業或研究所畢業就準備結婚的人並非少數，不過大陸學生們相當重視父母親對結婚對象的觀感和要求（例如：穩定的經濟基礎），而臺生相對上比較在意兩人世界的相處。

陸生們接觸到臺生不一樣的性／別、性向認同之後，由一開始的驚嘆逐漸轉為習慣、嘗試接受。他們一邊觀察，一邊重新思考，但是面對感情，多數陸生還是情願停留在原本保守、保護自我的認同狀態。對於臺生較為「開放」的感情世界，雖然不完全反對，但目前暫時觀望。

##### （五）宗教信仰認同之別：當無神論遭遇多元宗教信仰

談到民主自由，兩岸學生的宗教信仰認同差異亦不容忽視。有些陸生對「法輪功」在臺被視為合法宗教，感到相當詫異，也曾經因此與臺生產生激辯。對多

數陸生而言，法輪功是「不應該存在的邪教」，法輪功的信徒聚眾滋事並在公開場合反抗中國政府的施壓，也連帶使陸生們覺得自己不受歡迎。惟臺灣人的認知是，法輪功只是受到大陸當局的「迫害」和「妖魔化」，它和一般的宗教無異，任何人皆有選擇其為個人信仰的自由。

此外，多數陸生從小遵循唯物主義、無神論，當熱情的團契學員主動與他們接觸時，陸生們還是不免會覺得「怕怕的」、「不舒服」。例如：某些教會為了傳教而邀請陸生參加活動，但是並不會在一開始便明說是教會活動，結果陸生們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誤入。然而當陸生發覺活動背後真正的目的而拒絕加入教會時，臺灣學生便終止與陸生的聯絡，最終彼此不歡而散。研究所交換生 C15 另外兩位大陸友人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其實那時候剛來可能一個月吧，然後就有圖書館一個老師就說，我們有個活動是和臺灣同學交流的，然後大家提供免費的披薩，然後說妳們要叫同學的可以叫，我們就全校發這個消息，大家就來了蠻多人。結果一到那個活動才發現，真正的臺灣學生沒幾個，然後是那種好像是宗教的，就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他們辦的活動……反正我在大陸，我們就是無神論，不太碰宗教的。之前你要是經常告訴我你今天要去哪拜拜，我會說「你還挺迷信的啊！」

由此可知，大陸學生對宗教的反應仍舊以「排斥」（C15）居多。他們在缺乏宗教文化洗禮的環境下成長，面對繁瑣的宗教程序及過分熱情的教徒，其直覺反應即是「不習慣」、「不接受」；有些陸生甚至會將宗教信仰與「怪力亂神」做連結。惟不理解陸生這一層社會認同差異的臺生，卻可能因為過度的傳教行為而被解讀為「迷信」、「詐騙」，甚至可能因為對某些宗教自由的支持（例如：法輪功）而被陸生指為非理性之士。

## 二、臺生眼中的大陸學生

許多受訪的臺生對於和國際學生交流持有濃厚的興趣，因此對陸生多數持正面看法，並不認為陸生如想像中封閉或難以親近。但受訪臺生也承認身邊不乏存在對陸生持負面觀感的臺灣同學，就讀 A 校大學部廣電、傳播科系三年級的 T14 和 T10 均表示，他們身旁有些臺灣同學仍然抱著「大陸比臺灣落後」的優越心態，

而行管系的 T11 也坦言一般臺生對於主動和陸生接觸並不積極，除非必須共同合作小組報告：

我覺得大家對（陸生）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就會覺得陸生反正你們也只是來一個學期交流有甚麼大不了這樣子，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一群一群的。迫於課堂上必須要分組或是要討論事情，老師才會就是請我幫忙，所以我覺得我認識陸生其實也就是透過老師讓我可以跟他們多接觸，那你說如果我真的沒有跟他們接觸，其實我也就是一學期跟他們上完課，然後他們就是走他們，我們走我們，也不會特別有交集。

以下筆者將受訪臺生與陸生互動經驗中的社會認同區辨依五個類別進行說明：學生、社經地位與獨生子女、國族與政治、族群、性／別與宗教認同，並在文中描述臺灣學生如何看待自身與陸生之間的認同差異。

### （一）兩岸「學生認同」之分：團隊合作與個人利益的拉鋸

據受訪臺生所言，來臺陸生呈現兩極：有一群極度認真、優秀，另一群來臺灣的主要目的則是「觀光」、「環島」，他們並不如學校老師及新聞報導所強調，個個都是精英。而認真的那群陸生常被拿來與臺生做比較，他們普遍比臺生在意考試成績，在課堂上踴躍發言，但是也不免被臺生說成「愛出頭」、「破壞行情」，因為他們總是戰戰兢兢地提早做完功課而讓臺生備感壓力。碩一生 T20 曾經擔任陸生的導師助理，她表示臺生最常抱怨的是：「老師都一直誇（陸生）多好，多用心、多認真，然後上課時陸生就是目光的焦點」。

許多兩岸學生之間的摩擦皆出現在小組合作中。在團體作業的內容和風格上，臺生們認為陸生的做法重單一主軸、循舊有框架，而臺生則是希望作業能呈現更多元、豐富的樣貌，導致兩邊學生經常意見不合。有些陸生在受訪臺生口中被形容為「堅持己見」、「強勢」、「好勝」、「自我感覺良好」的一群。資傳系大三學生 T7 憤憤不平地說道，臺灣學生在課業上的合作皆以團體為重，畢竟是「team work」，但是陸生比較會以自我為中心，以自己的意見為優先。多次擔任國際小天使<sup>5</sup>的 T15 認為，團體報告很少出現在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之中，因

5 A 校每年皆會招募自願的大學部學生來接待國際學生，幫助其適應初到臺灣的生活，稱之「國際小天使」。

此陸生多數缺乏小組分工潛規則的認知，亦不理解團體利益的重要性，容易顯得比較自我，或是上演「失蹤記」，加重同組臺生們的負擔。臺生們則傾向於將陸生這類的特質歸咎於「一胎化政策」，以及大陸人口眾多，為了突顯自己、力爭上游的「競爭力」論述。如以下兩位大學部同學的見解：

我覺得（陸生）會很堅持己見，因為我不知道是他們的教育還是一胎化的關係，所以父母很寵他們吧，所以他們會覺得，自己就應該做自己（想要的），所以他們不會去為同學著想，我覺得他們「團體」觀念沒有那麼強，他們都是以自身（的角度）去看事情。然後其實，有人，我們自己臺生就會私下討論，會覺得這樣有點自私，因為我們不太會這樣做。（T18）

我覺得陸生就是不像臺灣的學生，就是可能他們的人口很多，所以他們的競爭力比較大，然後就會顯得說他們要在這麼多的人之中就是比較突顯自己，他必須堅持自己的想法跟一些觀念。他就是不容易去接受別人的想法這樣子。（T11）

再者，臺生反應，因為臺灣校方給予大陸交換生的方便，讓陸生們得以自由選課，但是這樣一來某些陸生若是對課程先前累積的專業知識不足，反而更易形成小組合作上的障礙。

由於師長與媒體的高度關注，臺生對陸生存有一種嫉妒、較勁的矛盾情結。比較過差異之後，多數臺生著重於強調自身的優勢，例如：多元風格、創造力、與團體合作導向。雖然也有不少臺生看見陸生在作業與課堂上力求表現，但是在訪談中卻很少聽見臺生們反思自己的競爭力。換言之，大部分的臺生仍舊不願強調／承認陸生優秀的一面，反倒認定他們是自視甚高的一群。

## （二）社經地位與獨生子女認同之分：富二代消費優勢形成臺生壓力

除了上述在團體報告中因為陸生習慣單打獨鬥所形成的小組合作障礙外，最令臺生震驚的是陸生強大的消費能力。臺生們多數曾經聽聞，家境優渥的陸生（不少為富商第二代）為3C產品、專櫃化妝品、名牌包包、大型演唱會的愛好者，但是當他們親眼見到過去「苦難的大陸同胞」頓時成為搶著付帳、請客，甚至脫口而出「臺幣不是錢」（T2）的富家子弟時，心中所感受到的衝擊不在話下。受

訪的臺生抱怨，當他們陪同陸生出遊遇到需要斟酌的消費情境時，多次被比較直接的陸生指出：「這還好吧，你們家裡給的錢不夠嗎？」當下讓臺生很下不了臺。就讀 A 校傳播科系二年級的 T6 描述與父親為大陸清華大學教授的陸生往來一度造成他心態上的自卑：

一開始會覺得他們會不會有點看不起我們，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好有錢喔，感覺很富裕。……會不錯的原因是因為一胎化啊，我覺得他把一個資源都給一個小孩，我覺得那一定是不錯的，一定都還滿有錢的。（陸生朋友）就會說：「欸，下禮拜要不要去哪裡？」然後我明明就有時間，可是我要假裝我沒時間，因為我沒有錢跟他們去，可是就會很尷尬，我又不想要，因為我很愛面子，我不想要讓人家知道我沒錢，就要說我有事情。

而廣電系大三的 T9 則會盡量避免談起與金錢觀或經濟能力相關的話題，以免雙方產生歧異，但是她的內心免不了將對方視為「暴發戶」，並不會想和對方一起購物，深怕被比下去。

臺生們同樣將陸生闊綽的消費行為歸因為「一胎化」的結果。T17 認為，如此優勢的社經背景加上獨生子女的身份，使得某些陸生從小在父母的保護下，幾乎遭遇任何需求皆能立刻被滿足，反而不懂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順勢印證了「驕縱」的獨生子女形象。曾經擔任學校暑期大陸交換生小隊輔的 T5 也有類似的觀察：

前幾天我朋友跟一個陸生約要拿東西，結果他們是遲到一個多小時，然後來了也沒有道歉什麼樣的，然後好像是因為還在逛街。……但是我就覺得，剛好碰到的那幾個有這種情況的都是穿著打扮很時髦的，然後感覺上家裡經濟情況還不錯，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那個一胎化的關係，從小被嬌生慣養大了，才會造成他們現在這個樣子。

正因為多數陸生在家中是獨生子女的關係，因此臺生們感受到他們比較無法理解兄弟姊妹之間的感情，有些人不太樂意與臺灣學生談論家庭，似乎碰觸到這類話題便會選擇回避或是沉默。



當陸生們在學校成為老師誇獎的對象，休閒生活又有家中豐厚的經濟支援，看在某些臺生眼裡遂產生「沒面子」的矛盾心理。有些臺生選擇與這樣的陸生保持距離，然而過度炫富且不懂得檢視自身言行的陸生確實會引起臺生加倍的反感，而臺生們也自然而然將這樣的陸生視為「暴發戶」和「被寵壞的獨生子女」，寄望藉由這樣的論述，一方面安慰自己（我不是暴發戶，我沒有被寵壞），另一方面與陸生們畫界。

### （三）國族與政治認同之分：檯面上避而不談的禁忌

談到國家主權與政治，臺生們其實很清楚兩岸學生各持不同的立場，就算雙方能夠理性的對談，臺生們覺得聊到這類話題還是會尷尬，多數認為最好是「避而不談」。許多受訪臺生提到，在課堂上聽到陸生發表自己的統獨立場，臺灣學生也通常選擇沉默，即使內心並不認同對方的說法。有的臺灣老師也會事先提醒臺生最好不要和陸生討論政治。「因為『教育』的觀念不一樣」，T15這麼說，「所以我通常問到一定程度我就會打住」。

不過少部分臺生還是抵不過內心的好奇，只可惜他們選用的是「挑釁」、「不恰當的玩笑」，企圖透過表面詢答的形式，在實質上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結果反而造成不愉快的氣氛，釀成彼此的心結。例如，有些臺生會堅持陸生來臺灣是「出國」，或是如碩一生 T22 所見：

我們的同學就會故意的開玩笑跟陸生說：「你們中國大陸是我們臺灣的一部分」等等。會這樣，故意這樣講，可是陸生其實不會真的很生氣什麼的，他們會大概尷尬一下，但是就不會表示什麼意見。

的確，不少臺生觀察到陸生在臺灣其實不太敢發表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因為在這裡他們畢竟是少數。

比較特殊的案例是，大三新聞系的 T16 於某日在 Facebook 上轉載了一個救助日本地震災民的訊息，沒想到遭受一名陸生強烈的反彈。這位陸生回應她：「妳是臺灣人，你管日本鬼子幹嘛？這是他們應得的！」據 T16 所言，這位陸生雖然平時不談國家主權立場，卻在這個事件上明顯表達「國家」的歷史教訓不可忘，臺灣同學也應當同仇敵愾，不該忘本助日。

簡言之，臺生們大部分堅持與陸生在國族與政治認同上的對立，但是不願在交流過程中深談這樣的主題，以免「傷感情」，同時「對大家也沒有好處」。惟少數政治狂熱的臺生不滿大陸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遂以政治議題刻意刁難陸生，而陸生即使在一般情況因為「做客」的心態不願反駁，但是並不表示他們願意接受臺生普遍的國族觀點。

#### （四）族群認同之分：陸生只是沒文化的暴發戶？

數位臺生坦承對陸生存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對於大陸人民的「水準素質」深深存疑，諸如：講話太大聲、對服務人員不客氣、插隊等，這些行為都是受訪臺生對陸生的怨言。T15 認為許多臺生仍然不願接受大陸已經和我們想像中不一樣的事實：

其實臺灣學生還是對陸生很不瞭解，可是臺灣學生知道大陸現在發展得很好，他們會有點拒絕承認的感覺，就覺得他們可能就是，有點像「暴發戶」那種，就是比較沒有文化這樣。臺灣學生會比較不想要接觸他們。對他們會覺得你們就只是有錢那樣，就是來臺灣這樣，然後就沒有什麼氣質和文化這樣。

資管系三年級的 T12 在訪談中很不好意思地說，因為自己本來就對陸生持有負面觀感，所以的確會把他們的言行舉止「放大來看」。臺生也發現，陸生們通常不願多談大陸人民行為素質不良的新聞，以免損及族群形象。

另一方面，陸生的「口音」對臺生來說，明顯標示了「大陸人」與「臺灣人」之別。有些臺生對大陸口音很反感，甚至覺得做作。T9 表明自己很怕和北京腔的陸生走在一起，她說：「我會惶恐說人家怎麼看我……就是『分類』，喔！你跟大陸人在一起」。T14 一半揶揄地說，自己沒來由的不喜歡大陸口音，甚至聽到這樣的口音就會默默避開。

就族群認同而言，許多臺生仍然自恃優越，並根深柢固地相信大陸人乃素質低落的一群，部分更以「有錢不代表有文化」的暴發戶論述將臺灣的文化水平置於大陸之上。有些臺生亦經常以口音的差異作為區隔自己與陸生群體的主要途徑，甚至將大陸口音等同於落後、欠缺素養的標記。

### (五) 性／別認同與宗教信仰認同之分：「爸媽那個年代」的感情觀與精神信仰認知的欠缺

最後，如同前述，臺生們指出陸生的性／別與宗教信仰認同在某種程度上不如臺灣學生般多元。舉例來說，某些陸生仍然抱有「男尊女卑」的觀念，對於「性別角色」和「性別平等」的認知態度，依臺灣學生的眼光來看，趨向守舊與傳統。據臺生觀察，多數陸生無法接受具女性氣質的臺灣男同學，稱他們「太誇張了」、「實在太娘了」。在言談中，臺生也驚覺有些大陸女同學對於性別關係中的暴力問題多採取「被動忍耐」的想法，認定女性本應忍辱負重以維繫兩性關係。碩士生 T20 描述，大陸女同學似乎都「很小女生」，感覺上大陸某些地方似乎還是「以男性為主」的社會。她打了一個比方：

譬如說（有個大陸男學生）就是說：「啊女生不能提重的」，就是要幫人家拿東西，「怎麼可以讓女生拿呢？」……可是有一些情境，這男生又會說：「什麼事啊，就你這個『女生』別管了」，就是那種就不要妳說話。對，這種時候就會……就是這樣子性別上面，兩個情況都會有讓我覺得「啊」的那種，比較不舒服的會是男生那一塊。

陸生對於男女關係及適婚年齡的觀念相對亦比較保守，重視父母意見的他們幾乎都會被期待在完成學業後即可結婚，臺生們則反應他們在臺灣比較不會有這種壓力。也因為如此，臺生們解讀陸生的感情觀好似自己「爸媽那個年代」。惟陸生亦會質疑對感情採自由、開放態度的臺生是否較為不負責任，傳播科系二年級生 T3 就被陸生問道：「你們對於感情這個方面是不是都很隨便啊！你們男生是不是都玩玩？」不認同這番說法的 T3 只能回答，「應該是因人而異吧」！

宗教上，陸生們會向臺生提問有關農曆、拜神、中元普渡等種種問題。陸生們以「眼見為憑」的觀點詢問臺生如何確定神明與其他靈界的存在：「你們沒有看過，怎麼會去相信？」遇見這類問題臺生們也只好笑笑，難以具體回應。因為很少接觸宗教的關係，有些陸生一開始也常被校園裡熱衷傳教的臺生同學嚇住，不知該如何處理。反之，不太熟悉陸生多數為「無神論」者的臺生也遭遇過下述尷尬的經驗：

有一次我在車上，我就跟陸生們介紹說：「我們〇〇大學有很多社團，然後我們有什麼玩樂的啊～也有一些宗教信仰的社團啊，然後像是什麼……汎愛社啊或是說什麼基督教的社團啊！」……我那時候講出來的時候，他們有反應是說：「我們不談政治」，我那時候想說宗教和政治有什麼關係，然後後來人家把我拉過去說：「共產黨不信宗教」我才「喔～對」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心直口快，沒有想那麼多，然後就直接這樣講。（T17）

最近一年常與陸生往來的 T11 指出，來臺灣前的「行前說明會」，陸生們皆會被要求「在臺灣不能講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法輪功』，就是宗教信仰」。

據此，臺生們發現自己接觸的陸生在性／別認同的觀念上受傳統父權體制的影響而趨向於保守，看待感情和男女交往多數以結婚為關係建立的最終目標，與臺生所相信的婚前多交友的理念大不相同。而宗教信仰更是多數陸生較為陌生的領域。上述這些範疇皆為兩岸學生交流上容易出現的平行線，也是臺生自詡為較多元、自由、符合世代變遷的群體社會認同。

## 伍、分析與結論

本文旨在探究來臺求學的陸生與臺灣學生在跨群體溝通過程中，藉以畫分出我群和他群的社會認同差異，而兩岸學生又透過怎樣的論述來詮釋這些社會認同區辨。本研究採用詮釋現象學的觀點搭配深度訪談法，一共訪談了 23 位陸生與 23 位臺生。以下筆者將摘要研究結果，並與文獻進行分析比對，最後提出幾點理論研究貢獻。

從訪談內容來看，陸生對臺生的觀察較為深入詳細，多半與其「做客他鄉」的敏感觀看位置有關；而許多受訪臺生也許因為沒有花太多心力注意身旁的陸生，因此在訪談過程中筆者相較必須更竭力地詢問才能獲得具體的回應。研究結果透露，多數陸生在臺灣深有被列為「他群」之感，言談中表示欲打入臺生舊有的人際交往圈簡直難上加難（尤其是短期交換生）；臺生亦坦言與陸生之間未有明顯交集，通常是「你過你的，我過我的」，除非承授課教師安排同組合作報告。這樣的結果似乎是海峽兩岸開放大學學習交流原本始料未及的。歸其因，筆者認為這樣的隔閡應與本研究發掘之社會認同差異有關。

首先，兩岸學生之「族群認同」的區隔在於陸生被臺生看成「素質落後的他者」，不論在口音、語用文字、穿著打扮、慣常行為等面向，陸生被某些自視優越的臺生貶為較粗俗、「非同文同種」的一群。陸生則是在宣稱臺生「對大陸不夠瞭解」的前提下不甘示弱，以容易大驚小怪的「島民眼界」來描述臺灣人的新聞媒體症候群。第二，「國族與政治認同」的差異在於陸生領悟了臺生不願共築「一個祖國」的綺夢，同時堅守大陸為一封閉、不開化的「共產專政」政治個體的意識形態。在該議題上，兩岸學生多數倒是培養出「避而不談」或是「點到為止」的默契，認為此乃「高層」之責，學生之間談政治無濟於事。第三，兩岸學生的認同差異存於懸殊的大環境「競爭力」，臺生的學習態度被陸生看成過度「安逸」，而臺生則反過來挑剔陸生在應試教育的培訓下顯得「墨守成規」與「個人導向」，不懂得於小組報告的團體與個人利益權衡中尋找變通。第四，社經地位與獨生子女認同的區分在於有些陸生的「獨生」出身、「暴發戶」般的消費方式和不自覺的「嬌貴」人際相處方式，容易令臺生敬而遠之。最後，性／別與宗教信仰認同的分別在於陸生憂心臺生性／別概念和感情觀過分「開放」，隨興所至，不懂得負責任；對於宗教的狂熱容易趨向「迷信」、甚至詐騙。反之，臺生則認為陸生感情觀太過「單一、保守」，掩埋了關係發展的「多元」可能性；宗教上過度依賴科學，不理解信仰背後精神層面的意涵。

兩岸學生所區辨出之社會認同差異類目雷同，但是誠如社會認同理論所示，比較後兩岸學生雖然較清楚彼此之社會認同內涵，然因跨群體立場不同，致使受訪之陸生與臺生多數傾向為我群做「正面」的推論及認同歸因（除了少數陸生發現臺生於學生認同、性／別認同上確實較為多元自由、富有創造力而心生仿效之意以外），企圖以上述引號內的各種論述來合理化我群的行為暨價值觀，充分顯露其對原生地文化之強烈歸屬。然此強化我群認同之舉，過份者亦可能造成如社會認同理論與過去文獻（林瑞華等，2011）所指，分隔出疏離、甚至權力不均的我群與他群。

依筆者的歸納與觀察，來臺陸生面臨衝擊較大的社會認同差異為：「族群認同」和「國族與政治認同」，此結果並未符合既有文獻所述，臺生對陸生的排斥感更多是來自於看不慣他們的族群特質。歸咎原因，其一，臺生並不如陸生想像中那麼歡迎近幾年來在國際、經濟上迅速崛起的「大陸同胞」，反倒對陸生祭出固有的刻板印象，自恃優越，在許多日常層面上都讓陸生飽受排擠之感，如此種種皆超出來臺陸生之預期。其二，筆者發覺，陸生「一個中國」的觀念及「維護祖國榮譽」的思想教育根深柢固，一旦遭逢臺生挑釁、不領情之臺獨國族觀，很

難不令陸生錯愕。另一方面，對臺生而言，感受較強烈的社會認同差異為涉及團體／個人利益價值取向的「學生認同」和「社經地位與獨生子女認同」。原因之一，在政府、媒體和教師的高度關注下，臺生以「樂活」的學習態度對上陸生積極競爭的求學途徑，不免使臺生頓生不安全感，再加上陸生在臺選課得享某些優惠，但在課程小組報告中有些人卻因種種理由（例如：環島、不熟悉小組合作文化）表現不佳，更易讓臺生心生反感。原因之二，臺生雖曾聽聞大陸學生多數為獨生子女，出身優渥家庭，但某些闊綽、驕縱形象依然與臺灣人多年來被灌輸的大陸同胞意象不符，因此在真正接觸後感受到落差。總括來說，造成兩岸學生間明顯社會認同矛盾的主因皆與臺灣和大陸政府與媒體長年於兩地構築之意識形態有關，如果兩岸學生，甚或民眾無能跳脫意識形態的枷鎖，走出獨立思辨的自由意志，則此跨群體交流之前途堪憂。

另外，性／別、宗教認同上的區辨固然在本研究的訪談中未被強調為造成兩岸學生交流關係緊張的主要社會認同，惟因此兩類話題平時在學生群中的談論頻率頗高（尤其是性／別認同的議題），筆者認為兩岸學子並不可掉以輕心。無論在與彼岸同學談感情、建立友誼時，皆應以理解、尊重對方的自我位置、價值觀與宗教立場為前提進行交流，避免令彼岸同學留下無知、負心、輕浮、不尊重宗教信仰的負面評價亦或是造成傷害。

回顧前述與臺生、陸生相關的研究文獻得知，陸生來臺後在人際關係上的不適應多與其短暫停留和臺生的刻板印象有關，而陸生來臺後對其國家認同所產生的矛盾情結與適應對策也與本研究發現的結果雷同，例如，陸生在臺期間的見聞有助於他們對臺灣人國族與政治立場的「換位思考」（柯曉翔，2011；胡紹嘉，2012）；不同的是，本文更進一步去理解兩岸學生所持刻板印象，以及國族認同緊張背後具體的樣貌。與過去文獻有些許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可分為以下兩點說明：第一，之前的研究調查（蕭伊婷，2009）發現臺生普遍對於陸生的政治意識形態備感壓力，在本研究中筆者確實發現多數臺生面對此類爭議性話題傾向採迴避的方式處理，但筆者亦在訪談中聽到其他臺生以「挑釁」、「玩笑話」（例如：中國是臺灣的一部分）的方式故意挑起異端，這類臺生似乎並不怯於表明自身對峙的政治立場。大部分的臺生在訪談過程中，並不願意深入談論與陸生在國族與政治認同上的差異，也許因為臺灣大學生本對兩岸政治事務冷感，此應與校方、老師課堂上「勿提兩岸政治」的叮嚀，以及重複轟炸式的電視政治新聞有所關聯。第二，先前研究較少提及，兩岸學生的族群、國族政治立場之爭尚可延燒至「歷史事件的內容」，比方，T16 在 Facebook 上聲援日本 311 震災卻引來陸

生大肆撻伐的個案，無疑是大陸近日出現的釣魚臺反日潮的翻版。固然並非所有陸生皆有此仇日之民粹情愫，但從該例中，兩岸學生皆須留意、反思往後交流歷史事件觀點時可能陷入的意識形態泥淖。

探索至此，吾人不難想像過度的我群鞏固與他群畫界皆可能破壞兩岸學生往來的意願與交流的成果。陸生眼中與臺生間的社會認同區別多數是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放任的民主自由」、「新聞亂象」、「島民心態」、「迷信」等論述來詮釋；而臺生則是以「一胎化政策」、「沒文化的暴發戶」、「素質論」、「競爭力」、「共產黨專政」等論述來看待與陸生之間的差異。誠如 Hall (1990)、藍佩嘉、吳依凡 (2011) 及胡紹嘉 (2012) 所強調，「認同」非固定，它是不斷流動與形構的動態概念。理解差異後，兩岸學子應學習透過有效的跨群體溝通來協商彼此的認同。胡紹嘉 (2012) 及柯曉翔 (2011) 的研究中曾提到「換位」與「意義重構」的類似概念，其實上述引號內看似負面的論述皆可變成換位思考的依據。換言之，兩岸學生因為在互動過程中瞭解對方的社會文化位置與背景，故應可推究其言行從何而來，嘗試同理其價值觀、態度與信念。舉例而言，明白了多數陸生皆為家中的獨生子女，臺生應試著換位同理其在團體關係與個人表現上可能遭遇之挑戰。

另一方面，兩岸學生亦可藉由差異比較的換位思考來適度強化、修正我群認同建構，例如：透過上方的差異「論述」以認清我群之優勢，並重新檢視其社會認同之根源與背後的意涵（我是誰？）(Hall, 1989)，以求改善個人因原有的社會認同而對我群與他群衍生之不實際的期待。爾後逐步調整自身的行為、態度、價值觀，與對待他群所可能產生的歧視言行，甚至可藉兩岸的差異比較，最終達到接納多元社會認同的正面結果 (Woodward, 1997 / 林文琪譯, 2006)。此外，待深入理解、充分調適我群的社會認同後，兩岸的學子應可避免因為對方一時的負面評述而落得迷失自我。舉例來說，碩士班交換陸生 C14 來臺後曾一度因為看不清我群的社會認同位置而經歷自我認同的危機：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慢慢瞭解這邊，就文化呀、這種政治氛圍啊，覺得自己生活的環境還挺悲慘的，後來就是心態慢慢的在調適，發現……就像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不可能都是覺得臺灣都是好的呀，它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對於我們自己都應該客觀的，就是理智的看待這些問題，不能一味的覺得這邊好、那邊不好，或是那邊好、這邊不好。

換言之，兩岸學生在面對社會認同差異時若只是著眼於他群的長處，或是一味忙著鞏固自己的優勢，合理化自己的短處，而不懂得透過溝通協商換位思考、相互適應調整，那麼真正的交流學習遂難以實現。惟令筆者擔憂的是，因陸生自認為客，在臺生面前他們多半不敢將自己內心的想法真實地表達，而臺生也以他們為客，保持著「相敬如賓」的距離。

總結本文的理論研究貢獻：第一，國內與陸生相關的研究過去都只將核心置於探究兩岸學生「政治認同」上的對峙，但是本研究協助吾人理解除了國族與政治認同之外，其他導致兩岸學生關係緊張的社會認同差異（包含：族群、學生、社經地位與獨生子女、性／別、宗教信仰等）如何「同時」影響兩岸學生的跨群體溝通，尤其族群、學生、社經地位與獨生子女認同所造成的差異衝擊並不亞於國族政治認同。換言之，未來兩岸跨文化／跨群體知能教育內容所囊括之構面尚可更為多元。第二，現有的跨群體溝通研究通常探索比較的是一個國家文化體制下的共存文化群體（例如：美國的黑人與白人群體），鮮少如本研究比較華人文化範疇中跨地域的兩群體溝通，亦即陸生群體與臺生群體。第三，國外過去的跨群體溝通研究幾乎僅關切「某種」社會認同對立的兩個群體（例如：臺灣人與中國人間的國族認同對峙）之間的溝通互動行為，而忽略了群體雙方其他社會認同之綜效（*synergy*）。但是本文發現明顯形塑跨群體關係的關鍵不會單單來自於某「一種」社會認同（例如：國族政治認同）；事實上，深深影響跨群體間溝通互動的是兩造所擁有的「各種社會認同彼此相互交織出來的集合」（*intersectionality*）(DeFrancisco & Palczewski, 2007)。畢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往來不會只牽涉到一種社會認同，在不一樣的脈絡裡，不同的社會認同會自然地浮現、被強調，並且相互「交織」，產生衝擊。Clair (1998: 57) 在 *Organizing Silence* 該書中舉例說道，描述一個群體，單單僅強調其某一社會認同所屬是不夠充足的，代表一個群體的認同往往包含了他們的性別、種族、宗教、年齡、族群、和階級，而此社會認同的名單其實可以不斷往上遞增。最後，本研究亦發掘一個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認同隸屬，其內涵有時並無法彼此完全清楚區隔，意即某群體各個社會認同歸屬背後的意義內涵可能彼此互為關聯。舉例而言，本文所歸納之陸生的「獨生子女認同」，在陸生群體中便與學生認同（如：團隊合作上的障礙）、社經地位認同（如：消費金錢觀）、甚至性／別認同（如：依父母之見為依歸的感情觀）彼此交纏涵蓋而對陸生群體的整體價值觀和行為產生深刻衝擊。是故，未來的跨群體溝通研究可進一步探討社會認同彼此間如何互為包納、形塑，然後其對某群體的溝通行為又造成怎樣的限制與影響。



比較可惜的是，本研究的受訪臺生有幾位較具開放的國際觀，與陸生交流上似乎較無法體悟一般臺生感受到的社會認同差異。然而，換個角度思考，一般臺生可能對於與陸生接觸的態度較為漠然，亦不見得能從其身上聽見交流過程中的社會認同區辨。再者，筆者原以為自己身為臺灣籍教師可能使陸生部分的訪談受限，惟後來發現訪談過程中陸生們多半坦然，臺生們反而略顯緊張。這或許是因為陸生受訪者有一半以上在學期結束後便會離開臺灣，但是臺生擔心在師長面前說出與陸生間的互動問題會留下「非政治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的不良印象。筆者建議將來進行這類的兩岸研究，應增加招募「非自願」與陸生接觸之受訪者；另一方面也可額外訓練學生研究助理作為訪談者，以免除受訪者因為壓力而不願深入揭露之虞。

綜言之，Gallois (2003) 在 2003 年國際傳播學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年會發表的演說中表示，許多群體無法達到有效的跨文化溝通，因為他們的社會認同造成這些群體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存在著具對抗性 (antagonistic) 的跨群體互動，因此，傳播學者們急需要探究這些社會群體的政治歷史背景如何影響和形塑他們所屬成員的社會認同。同樣的，Hecht et al. (2005) 強調，運用社會認同的概念來研究不同群體因歷史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溝通行為，比較能夠理解文化群體間互動的可能性，以及他們的社會政治歷史所帶給他們不同深度的衝擊與影響。然而，人們對於不同群體之間的認知差異往往是世界上許多社會衝突或暴力事件的根源，舉凡種族歧視、戰爭、恐怖主義、歧視憎恨的言論、屠殺等，多數都是起因於一個群體對於另一個群體的敵意與憎恨 (Giles et al., 2010)。不幸的是，跨群體互動與交流的最終結果不一定能消弭對峙的界線 (藍佩嘉、吳伊凡，2011：25)，如果缺乏有效的溝通與協商，跨群體雙方非但無法重新瞭解一個新的文化群體，更無法經由不斷換位與校訂尋找出「我是誰」的主體位置。是以，「跨群體認同溝通協商」(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將會是筆者與有志之學者未來共同努力的兩岸及國際學生交流研究課題。

## 參考書目

- 王甫昌 (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臺灣：群學。
- 王嘉州 (2011)。〈來臺陸生的政治態度與臺灣主權接受程度〉，《臺灣政治學刊》，15 (2)：67-113。

- 江怡慧（2010）。〈以層級分析法探討陸生來臺遊學之考量因素〉，《東亞論壇季刊》，470：75-89。
- 吳政達、湯家偉（2009）。〈從國際學生流動趨勢分析開放陸生來臺就學政策〉，《教育研究》，187：39-46。
- 李建興（2011）。《百年教育》。臺北，臺灣：高等教育。
- 林文琪譯（2006）。《認同與差異》。臺北，臺灣：韋伯文化。（原書 Woodward, K.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林玉体（2010）。〈談「陸生」來臺與承認中國學歷〉，《新世紀智庫論壇》，50：84-94。
- 林奇伯、林佩萱（2010）。〈兩岸交流學生大調查：陸生認為只有3.2%臺生用功〉，《遠見雜誌》，285：174-179。
- 林彥宏（2010）。〈一廂情願抑或兩情相悅？陸生來臺政策之匯流與轉變〉，《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6（2）：145-179。
- 林家正（2011）。《大陸學生來臺交換就讀滿意度之研究：以臺灣大學與義守大學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海清、李宏謨（2011）。〈兩岸高等教育交流的挑戰與應變〉，《中臺學報人文社會卷》，23（1）：25-40。
- 林益豐（2004）。《大陸學生來臺就讀大專院校意願與選校決策之研究》。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碩士論文。
- 林瑞華、胡偉星、耿曙（2011）。〈「階級差異」或「認同制約」？大陸臺灣人當地融入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54（4）：29-56。
- 姜麗娟（2010）。〈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流動與跨國高等教育發展之探討與啟示〉，《教育資料與研究》，94：113-138。
- 柯曉翔（2011）。《跨海公民課——大陸交換學生的臺灣經驗》。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紹嘉（2012）。〈旅歷臺灣，返想中國：一位來臺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111：43-87。
- 張國保（2010）。〈近十年臺灣技職教育發展談招收中國大陸學生來臺就學之問題與策略〉，《高等教育》，5（1）：1-35。
- 張國保、楊淑涵、張馨萍（2011）。〈兩岸高等教育交流相關議題與政策方向之探討〉，《教育政策論壇》，14（3）：1-32。

- 張鈞凱 (2012)。〈臺灣陸生政策的歧視與不合理——陸生現身說法，呼籲臺灣社會平等以待〉，《海峽評論》，257：50-54。
- 張瑞雄 (2007)。〈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問題之剖析〉，《師友月刊》，480：1-5。
- 教育部電子報小組 (2010 年 4 月 2 日)。〈教育部針對大陸學生來臺研修之政策立場〉。取自 [http://epaper.edu.tw/print.aspx?print\\_type=news&print\\_sn=2984&print\\_num=0](http://epaper.edu.tw/print.aspx?print_type=news&print_sn=2984&print_num=0)
-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 (2011)。《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臺北，臺灣：教育部。取自 <http://140.111.34.34/main/download/download2.php?d=34&u=%2Fmnt%2Fraid%2Fedu1%2Fdocdb%2Fa%2Fdownload%2Fddb4b79fa303f.pdf>
- 教育部統計處 (2012)。〈近年來境外學生在臺留學／研習人數〉。取自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2&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 莊耀嘉 (2003)。〈族群與偏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社會認同理論的檢驗〉，《本土心理學研究》，20：73-104。
- 陳志柔 (2008)。〈20 年來兩岸教育文化交流現象〉，游盈隆 (編)，《近二十年兩岸關係的發展與變遷》，頁 327-347。臺北，臺灣：聯經。
- 陳學飛 (2002)。《高等教育國際化：跨世紀的大趨勢》。福州，中國：福建教育。
- 黃政傑 (2011)。〈陸生首招的成果與問題〉，《師友月刊》，530：0-4。
- (2008)。〈陸生能解救臺灣的大學？〉，《師友月刊》，497：a1+1-4。
- 楊景堯 (2004)。〈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就學對臺灣私立大學生存之助益〉，《展望與探索》，2 (9)：111-114。
- 滕淑芬 (2008)。〈臺生、陸生的第一類接觸〉，《臺灣光華雜誌》，33 (12)：30-37。
- 蕭伊婷 (2009)。《我國大學生預期陸生來臺就學之生活壓力調查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韓宜娟 (2011)。《陸生來臺就學動機與生活適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藍佩嘉、吳伊凡 (2011)。〈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臺生的認同與畫界〉，《臺灣社會學》，22：1-57。
- Anderson, K., & Jack, D. C. (1991). Learning to listen: Interview techniques and analysis.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 11-2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lair, R. P. (1998). *Organizing silence: A world of possibiliti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ollier, M. J. (1998). Researching cultural identity: Reconciling interpretive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In D. V. Tanno & A. Gonzalez (Eds.),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across cultures* (pp. 122-14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Francisco, V. P., & Palczewski, C. H. (2007). *Communicating gender diversity: A critical approach*. London, UK: Sage.
- Dougherty, D. S., Baiocchi-Wagner, E. A., & McGuire, T. (2011). Managing sexual harassment through enacted stereotypes: An intergroup perspective.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5, 259-281.
- Gallois, C. (2003). Reconcili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in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Potential or peri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 5-15.
- Giles, H., Reid, S. A., & Harwood, J. (2010). Introducing the dynamics of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In H. Giles, S. Reid, & J. Harwood (Eds.), *The dynamics of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pp. 1-16).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Gudykunst, W. B. (1998). *Bridging differences: Effective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udykunst, W. B., & Lim, T.-S. (1986). A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In W. B. Gudykunst (Ed.),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pp. 1-9). London, UK: Edward Arnold.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 222-237). London, UK: Lawrence & Wishart.
- (1989). 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Radical America*, 23(4), 9-20.
- Harwood, J., Giles, H., & Palomares, N. A. (2005). Intergroup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n J. Harwood & H. Giles (Eds.),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pp. 1-20).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Hecht, M. L. (1993). 2002 -- A research odysse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0, 76-82.
- Hecht, M. L., Collier, M. J., & Ribeau, S. A. (1993).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echt, M. L., Jackson, R. L., II, & Pitts, M. J. (2005). Culture: Intersections of intergroup and identity theories. In J. Harwood & H. Giles (Eds.),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pp. 21-42).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Hecht, M. L., Jackson, R. L., II, & Ribeau, S. A. (2003).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Exploring identity and cultur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Imamura, M., Zhang, Y. B., & Harwood, J. (2011). Japanese sojourners'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s: Exploring the influences of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relational solidarity in intergroup contact.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1*, 115-132.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11). *Definition of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divis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ahdq.org/about\\_ica/secdetinfo.asp?SecCode=DIV20](http://www.icahdq.org/about_ica/secdetinfo.asp?SecCode=DIV20)
- Kim, Y. Y. (2002). Adapting to an unfamiliar cul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overview. In W. B. Gudykunst & B. Mody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259-27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1995).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 integrative theory. In R. L. Wiseman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170-19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anigan, R. L. (1988). *Phenomenology of communication: Merleau-Ponty's thematic in communicology and semiology*.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The phenomenolog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Today, 23*, 3-15.
- Navara, G. S., & James, S. (2002). Sojourner adjustment: Does missionary status affect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6*, 695-709.
- Nelson, J. (1989a). Eyes out of your head: On televisual exper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 387-403.
- (1989b). Phenomenology as feminist methodology: Explicating interviews. In K. Carter & C. Spitzack (Eds.), *Doing research on women's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ory and method* (pp. 221-241). Norwood, NJ: Ablex.
- Orbe, M. (1996).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ductive approach to studying "non-domina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m. *Communication Studies, 47*, 157-176.
- Peterson, E. E. (1987). Media consumption and girls who want to have fu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 37-50.
- Phinney, J. 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499-514.

- Rizvi, F., & Lingard, B. (2000).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Complexities and contingencies. *Educational Theory*, 50, 419-426.
- Said, E. (1994). From orientalism. In P. Williams &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pp. 132-149). New York, NY: Harvester Wheatsheaf.
- Sherif, M. (1966). *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ir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UK: Routledge & Kegan Paul.
- Tajfel, H. (197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UK: Academic Press.
- (1972). Experiment in a vacuum. In J. Israel & H. Tajfel (Eds.), *The context of social psychology: A critical assessment* (pp. 69-119). London, UK: Academic Press.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7-24). Chicago, IL: Nelson-Hall.
-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8).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Turner, J. C. (1982). Towards a cognitiv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group. In H. Tajfel (Ed.),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15-4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Manen, M. (1990).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s: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An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Identities between Mainland Students and Local Taiwanese Students

Lee, Pei-W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social identities distinguished by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local Taiwanese students. The focus is on how these two parties interpret the disparities. A total of 23 local Taiwanese students and 23 Mainland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jor differences of social identities experienced by Mainland students were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and political identity,” a finding quit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previous research. As to Taiwanese students, the differences were felt more strongly in “student identity,” which involves teamwork values, and “socio-economic and single-child identity.” For Taiwanese students, these two factors had more impact on their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 students and Taiwanese students, soci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Mainland students,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

\* Email: pwlee@cc.shu.edu.tw

Received: 2012.11.20

Accepted: 2013.05.21

# 資訊時代的最低限倫理：G. Vattimo 《透明社會》的詮釋倫理與多元主義 The Ethics of Interpretation and Pluralism in G. Vattimo's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黃厚銘\*

Huang, Hou-ming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壹、前言：資訊時代與多元主義

在 Web 2.0 的發展趨勢下，過去被動的閱聽人也開始身兼創造資訊的個人媒體。但實際上，原先 T. Berners-Lee 在歐洲高能物理研究中心（CERN）所構想的 WWW（World Wide Web）就已經是一個雙向溝通媒介的資訊系統，而不只是片面接收資訊的管道。後來 Netscape 公司所發行的 Netscape Communicator，亦是結合了 HTML 瀏覽器與編輯器功能的軟體。這顯示其所設定的使用者不只是 Web 內容的接收者，也同時是內容的創造者。繼之，隨著 blog 大幅降低製作個人首頁的難度，輕薄短小的微網誌不再要求完整的論述，一直到以個人為中心的 Facebook，以及再加上行動電話所促成的個人行動通訊，就此打破了長期以來個人溝通與大眾傳播、閱聽人與媒體之間截然二分的狀況，似乎實現了主動閱聽人的理想。一種彷彿眾聲喧嘩的資訊或知識狀況似乎悄然成形了。

但此刻資訊內容的多元化與資訊量的快速增生，竟不是如 Baudrillard (1978/1983: 96-100; 1988: 208) 所言，是由單向、不負責任且不回應 (irresponsible) 與非溝通 (non-communicative) 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導致的「資訊超載」和臃腫、遲鈍的大眾，而是來自閱聽大眾自身主動參與所造成的結果。然而，Baudrillard 的提醒，卻也讓我們不禁懷疑，如此大量的資訊交流究竟有多

---

\* Email: hermes@nccu.edu.tw



少是有效的溝通？資訊量的增生是否等同於知識水準的提升？以及，資訊科技的發展究竟是導致意見的分歧，使得共識的建立更加遙不可及，甚至是真實與虛假的區分不再有意義，以致資訊時代的大眾也註定只能倍感虛無（*nihilistic*）、無力？抑或，在資訊科技「將麥克風交給各式各樣的弱勢族群」（Vattimo, 1989/1992: 5）以後，接受事實或價值的多元性仍可以跳脫相對主義（*relativism*）與虛無主義（*nihilism*），而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

## 貳、正視當下：資訊時代與跨領域研究

隨著啟蒙現代性在理性、科學、真理之間畫下了一連串的等號，因果法則進而成為所謂萬事萬物運作之原理原則（*logos*）的唯一內涵。科學獨立於哲學之外，首先在自然世界展現其效力。影響所及，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內部，各個分支學科一邊致力於證成學科的科學性質，與哲學畫清界線；一邊則為了各自學科的獨立性，特別強化自身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或是研究觀點的特殊性，以便與其他學科有所區隔，甚至搶占更具科學的地位，從而展開了學科分殊化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身為社會學者的筆者，在傳播學的期刊上評介一本哲學家的著作，就顯得奇特且難以理解。再者，啟蒙現代性的科學所植基的形式邏輯（*logic*），是以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等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來掌握萬事萬物運作的原理原則。除了要求學科（*-logics*）之間清楚明確的劃分以外，也排斥形式邏輯以外的其他思考模式，從而打壓了含混性（*ambiguity*）與愛恨交織（*ambivalence*）所可能具有的社會文化意義<sup>1</sup>。

但正如 M. Foucault 主張 I. Kant 的〈答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這篇文章標誌著哲學家不再只以普遍、互古的本質性提問來進行思索，轉而正視自己當下的特殊性，並從此開展出有別於傳統形上學的現代哲學（Foucault, 2000a: 303）；社會學成立之初，K. Marx、M. Weber 及 E. Durkheim 等人，也是著力於從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影響，來理解現代社會有別於傳統社會的特性。在傳播學發展史上有著不可忽視地位的 M. McLuhan 亦抱持類似的關懷，從傳播媒介的角度來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劃分階段，指出電子媒介在塑造當代社會文化特

1 就字源而言，*ambivalence* 與 *ambiguity* 雖然都有 *ambi-*，也就是二元、雙重的意思，前者 *valence* 的字根所意味的是在評價上的既愛又恨，而後者 *guity* 的字根則是認知性、存在性的。因此，*ambivalence* 所指的是情感與評價的愛恨交織，而 *ambiguity* 才是涉及認知與思想上的含混、模糊。但不論是評價上的 *ambivalence* 或是認知上的 *ambiguity*，都是一種正反並存、交融的狀態，因而不見容於啟蒙現代性依據形式邏輯所展開的二元對立思考方式。據此，本文所謂的含混思考，所指的即是不同於啟蒙現代性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

性的作用上，具有截然不同於拼音文字與印刷術的影響，進而促成地球村的出現 (McLuhan, 1964; McLuhan & Fiore, 1967)。就這一點來看，當代社會文化的特殊性這個議題，可以說是前述三個學科的共同關懷。更重要的是，想要解答這個問題，電子媒介的影響幾乎是無可逃避的關鍵之一。此說法不僅可見於諸多學者的理論概念中<sup>2</sup>，在現實生活的層面上，電子媒介也確實構成了人們日常生活行動與互動的基礎。尤其是晚近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的出現，不僅使得全球資本主義成為可能，也導致社會運動在宣傳與動員上的變化，進而引發我們對政治與民主的不同想像。甚至在具體而微的人際關係面向上，從室內電話到行動電話、從電子郵件到 Facebook 的發展，也一再改變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獲取新知，以及與他人聯繫的方式。我想，學術如果不只是在象牙塔內思考針尖上面可以站多少位天使的問題，那麼不論是哲學、社會學，或是傳播學，都得面對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等電子媒介對當代社會文化（或所謂後現代文化）的影響。

在筆者看來，Vattimo 這位哲學家，正是在此強調跨領域的時刻，展現了傳播學、哲學與社會學之間可能相互交流，進而激盪出思想火花的典型之一。他的身分本身就是含混的。Vattimo 既是個哲學家，也是歐洲議會的議員。他是天主教徒，但同時也以研究宣告「上帝已死」的哲學家 F. Nietzsche 而聞名。Vattimo 最為人所稱道的一句看似自相矛盾的話就是：「感謝上帝，讓我成為一個無神論者。」此外，除了天主教徒的身分，他也同時是個出櫃的同志。就其學術訓練來說，他既是詮釋學大師 H. Gadamer 的學生，也是個 Nietzsche 專家。

在思想上，他一方面曾明確倡議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 (Vattimo, 2003/2004: 3-10)，其哲學思想緊緊扣合於當代社會文化的社會學色彩；另一方面在《透明社會》(The Transparent Society) 這本書，不僅引用 McLuhan 以技術來理解社會文化特性的作法，Vattimo 還根據網際網路等電子媒介的影響來凸顯出後現代文化的特殊性 (Vattimo, 1989/1992: 4, 14-15)。他所說的後現代情境，正是源自於傳播媒介的大量增生 (Vattimo, 1989/1992: 12-27)。此一打破學科界線的取徑，正是 Vattimo 含混 (ambiguous) 思考的表現，而有別於啟蒙現代性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式。

總之，不論是理解資訊時代社會文化特性的要求，還是 Vattimo 的思想本身，都證成了跨學科特性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2 除了 McLuhan 的「地球村」概念外，Lash (2002) 所提出的「技術化的生活形式」也說明了電子媒介如何成為日常生活基礎的互動介面。下文中，我們也會看到 Lyotard (1979/1984) 所謂「電腦化社會」。當然，本文所討論的 Vattimo (1989/1992) 在提出「普遍化溝通的社會」(society of generalized communication) 時所欲描繪的也正是在電子媒介與資訊科技的普及下所形塑之社會樣態。

## 參、傳統、現代與後現代：媒介科技對社會文化變遷的影響

前述將所謂的后現代狀況視為是當代傳播媒介與資訊科技之發展結果的觀點，實際上早就可見於諸多關切著媒介科技對社會文化變遷之影響的論述中。例如，McLuhan 可以說是率先以媒介或科技的特性，來理解媒介如何影響社會文化變遷的思想家。出身英美文學訓練的他，卻依據不同的媒介特性來劃分人類文明的發展階段，並以此聞名於世。McLuhan 主張，以口語為主要傳播媒介的時代，所塑造出來的是以聽覺文化為其文化特性的部落社會；拼音文字和印刷術等媒介在科技之相對速度上的加速則帶來去部落化的效果。有效統治範圍的擴大與文字的統一進而導致民族國家的出現。同時，每個人在閱讀大量印刷出版之書本（也包括聖經）的過程中，孤獨地運用理性或面對上帝，也形塑出個人主義的文化特色。McLuhan 主張此一階段的文化特性為視覺文化。但隨著科技加速至電子媒介的絕對速度，則又逆轉了之前的趨勢，而帶來再部落化的影響，使得全世界的人類將其他人穿在皮膚上，而形成 McLuhan 所謂的地球村，此乃觸覺文化的表現 (McLuhan, 1964; McLuhan & Fiore, 1967)。值得注意的是，寫作《理解媒介》( *Understanding Media* ) 一書的 McLuhan，其對媒介的定義幾乎是等同於科技的，以致諸如衣服、鐘錶等等也都在他的討論範圍之中 (McLuhan, 1964)。

無獨有偶的是，試圖以「液態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 ) 概念來掌握當代社會文化特色的社會學家 Z. Bauman，也使用非常類似的方式來劃分人類文明發展的階段，並證成其「液態現代性」的概念。他同樣著重於科技的速度，以濕體 ( wetware )、硬體 ( hardware ) 與軟體 ( software ) 這組概念區分來捕捉不同科技的特性。並據此主張傳統社會是以人力、獸力等濕體為主要科技，現代社會則隨著工業革命、機械的發展而改以硬體為主要科技，直至當代的液態現代性社會，科技的特色則轉變為架構在即時性電子媒介上的軟體。不論 Bauman 是否同意「液態現代性」等同於「後現代」，Bauman 認為我們當下的社會已經隨著電子媒介與科技的發展而不同於 Marx 等人所處的現代社會。相對於以工業與機械技術為主的「固態現代性」社會是以空間的征服和占領為主，以電子媒介為主的當代「液態現代性」社會則著重於速度、流動與彈性，進而凸顯了時間的重要性 (Bauman, 2000: 111-118)。

實際上，McLuhan 與 Bauman 的說法也類似於社會學對傳統社會、現代社會與後現代社會的劃分。亦即，啟蒙運動之後理性與科學的地位提升，以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打破了「只有社會沒有個人」( Durkheim, 1893/1984: 142 ) 或是

強調集體性的傳統社會，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展也提供了個體性在現代社會中萌芽與發展的空間。而電子媒介，尤其是網際網路，則是理解後現代文化特性的關鍵。例如，Lyotard 受魁北克政府委託，所撰寫的研究報告《後現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一書，就是以電腦化來掌握後現代社會的文化特性。這本名列後現代文化代表性著作之一的書籍，至少具有兩個特色。其一是，正如 Foucault 在談論 Kant 的文章〈論何謂啟蒙〉裡所說的，現代哲學的標誌是哲學家不再只是以時間上自古自今、空間上普世的觀點來探討一些涉及本質的形上學問題，而是轉而正視自己當下的特殊性。Lyotard 的《後現代狀況》也是資訊化、電腦化開始進入哲學家視野，促使他們思索此一發展趨勢在社會文化上意義的開端之一。其二是，這本副標題為「電腦化社會的知識報告」的作品卻是以《後現代狀況》為名，明示著 Lyotard 認為電腦化、資訊化與後現代敘事知識地位的提昇，和大敘事的崩解等現象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Lyotard, 1979/1984）。此外，不論是 Baudrillard 或 Vattimo 也都以資訊化、網路化作為後現代文化在傳播溝通技術上的基礎。

總之，無論是將所謂的後現代狀況視為是再部落化的地球村，或是液態、流動的生活樣態，還是資訊化、電腦化的社會，這些概念都隱喻、指向了我們今日越來越複雜、含混、不確定的生活世界。它不再是有著單一中心、固定的、系統性的結構，因而也打破了啟蒙現代性的單線進步觀。各種資訊科技與媒介——特別是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的普及使用，也同樣帶來了眾聲喧嘩、反覆無常的樣貌與不再普遍有效的片語隻字。若說現代社會是以文字、印刷術等機械性傳播媒介為基礎，那麼當代的網際網路等電子媒介究竟只是機械媒介的延續發展，還是具有斷裂與質變的影響，從而開展出截然不同於啟蒙現代性的後現代文化？進而，既有啟蒙現代性的思考方式是否仍舊足以用來反思後現代的社會文化現象，乃至於幫助我們構想人類文明的出路？這些既是 Vattimo 試圖解答的疑問，也是此刻正思索著自身社會文化特性的我們所無可迴避的課題。若說，正如 E. Husserl 與 M. Heidegger 等人所指出，形式邏輯與理性所體現的科學是形上學思考的集大成（Vattimo, 1989/1992: 86-87）。那麼，Vattimo 引領我們一路追探出的，便是在告別啟蒙現代性。面向後現代文化的此刻，正需要一種能夠打破學科界線與超越二元對立的含混思考方式，方能適切回應後現代狀況對我們提出的挑戰。從而，含混性思考也就成為 Vattimo 的思想特色之一。由此可見，Vattimo 的《透明社會》更是在後現代的脈絡下，以後現代的思考方式，對後現代社會進行思考（in and of postmodern society），從而介入了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爭議。

## 肆、現代與後現代的爭議：規範性判準或虛無的相對主義？

Kant 在其 1784 年發表於《柏林月刊》的短文〈答何謂啟蒙〉中，明白指出啟蒙的意義在於擺脫個人因為懶惰和怯懦所導致的不成熟狀態。這意味著理性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因此不論是在認知、道德還是美感的判斷上，都不應再依賴權威的指導，而要訴諸自己與生俱來的理性，勇敢地運用理性。然而，Kant 卻也覺得理性的運用是有限制的，因此他區分了理性的公開運用與私自運用，並以其《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這三本著作探討人類理性構造，以免人類因踰越其能力的界限而犯錯 (Kant, 1997: 7-20)。

兩百年後，經常被視為後現代思想家一員的 Foucault 卻在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之前，不僅試圖邀請 J. Habermas 等現代性與後現代思想家共同舉辦研討會探討 Kant 這篇短文的意義，也親自以「何謂啟蒙」、「論啟蒙與革命」、「何謂批判」等三場演講來討論 Kant 這篇文章與 Foucault 自身思想工作之間的關聯性 (Foucault, 1997)。但相對於啟蒙現代性深信只有訴諸理性與科學，才能對抗權力與權威對真理的扭曲和對主體 (subject) 的打壓，Foucault 則提出「知識／權力」概念。他一反啟蒙現代性把權力與知識、真理對張的基本立場，不再認為權力只會打壓對真理與知識的追求，而主張所有的知識都有相應的權力體制，而所有的權力也都有賴於知識提供其正當性基礎，而以真理之名行之。他甚至依據「主體」一字在字源上的構造，主張唯有屈從於「知識／權力」的共同運作下，主體 (sub-ject) 才得以生成 (Foucault, 2000b: 331-332)。即便不否認理性與科學曾在啟蒙時代發揮了對抗宗教、政治等權威與權力的效果，但主張「正視當下」的 Foucault 認為我們應該在當代的脈絡下「點化」Kant 的批判概念，將批判的內涵從認識理性的限制轉變為「對界限做思考」。因此，Foucault 的「批判」是在思考「必然性在當代的限制」與「不必然如此的可能性」，並以「踰越」(transgression) 概念來總結在其立足的當下對啟蒙之時代意義的看法 (Foucault, 2000a: 315-316)。其中，深具特色也極為一貫的是，由於 Foucault 認為知識與權力之間存在著糾葛不清的密切關係，為避免他自己的思想也變成另一個打壓差異的教條，因此他所提出的「踰越」概念是一個徒具形式而沒有實質價值內涵與中心方向的主張——Foucault 只是要我們不斷跳出框架，卻無意告訴我們應該何去何從。

曾接到 Foucault 邀請共組前述研討會的 Habermas，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自承在當時他並不瞭解 Foucault 的用意 (Habermas, 1989a: 174)。這顯然與 Habermas 承續啟蒙現代性的基本立場有關。實際上 Habermas 還曾在《現代性的哲學論

述》(Habermas, 1985/1990: 238-293)、《新保守主義》(Habermas, 1989b: 173-179) 等書籍中，將 Foucault 歸類於後現代思想的陣營裡，並以「新保守主義者」稱之。他認為這些後現代思想家的主張缺乏規範性判準，造成的結果將是各行其是，對現實缺乏批判性，只充斥著無所著力的悲觀、虛無態度 (Habermas, 1989a, 1985/1990)。

循此，我們不難理解，何以 Habermas 會提出「溝通理性」與「理想的言說情境」等具有價值意涵的概念，來回答他自己從《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Habermas, 1991) 一書以來就念茲在茲的民主問題。實際上，Habermas 在獲得以其恩師的 T. Adorno 為名的獎項之得獎演說中，就是以「現代性：一個未竟之志」為題指出，我們今日所面對的問題在於啟蒙理性的潛能尚未充分發揮，而不應因技術理性、經濟理性與統治理性的結合所帶來的後果而放棄繼續追求啟蒙，或背棄理性 (Habermas, 1981)。他甚至也覺得 Adorno 與 Horkheimer 合著的《啟蒙的辯證》一書過於悲觀，給讀者的感受已不足以用灰色來加以形容 (Habermas, 1985/1990: 106-130)。相對地，循著他自己在勞動與互動之間所做的區分，或是在以工具性控制為知識旨趣的自然科學、以理解為旨趣的歷史——詮釋科學和以解放為旨趣的批判理論三者之間所做的區別，Habermas 認為當代問題的癥結在於工具理性或功能主義理性的獨大發展，而不是源自理性與啟蒙本身必然或本質性的瑕疵。從而他提出溝通理性的主張，指出我們應該繼續促成理性此一面向的發展，方能真正完成啟蒙的未竟之志。

至於 Habermas 所構想的「理想的言說情境」，要求溝通對話的各方都遵守下列幾個規範性判準。這包括，說話者在客觀世界的面向上所提出的主張必須合乎事實、在主觀世界的面向上要真誠面對自我、在社會世界的面向上必須遵守與其位置相應的社會規範，以及在互為主體世界的面向上，所說的話必須是可以被理解的。而從相對於「理想的言說情境」的「被扭曲的溝通」概念來看，Habermas 確實是抱持著典型啟蒙現代性的構想，以對立的角度來處理權力與知識、真理的關係。進而，他深信，只要在形式上能夠遵守前述的規範性判準、實現「理想的言說情境」，自然就能夠達成具有正當性的共識。但也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Habermas 與 Foucault 之間的差異。Habermas 認為 Foucault 等後現代思想家缺乏規範性判準以致流於虛無與無力；但 Habermas 所強調的溝通、理性與共識等概念，卻也是 Foucault 等強調多元、差異的思想家深感疑慮的原因。而這正是堅持啟蒙現代性的思想家與重視多元與差異的後現代思想家之間爭議的焦點。

總之，Habermas 是以一個程序上合乎正義的原則來確保眾人之間所達致的共識內容之正當性。亦即，以在對於客觀世界的認知上合乎真實、在社會世界的關係上合乎規範、在內心主觀世界的表達上合乎真誠性，以及在互為主體的生活世界裡可被他人所理解等四個面向，來區辨所形成的共識究竟是來自他所謂的「理想的言說情境」，還是所謂「被扭曲的溝通」。這套不涉及內容的程序標準，界定了什麼是有效的溝通，以及什麼樣的共識具有正當性，應當為眾人所遵循。

但 Habermas 承繼啟蒙遺緒、強調共識的溝通理性構想，卻也引來 Lyotard、Foucault，乃至於 Vattimo 等人的質疑。不論這些思想家如何定位自身的位置，大體上稱之為後現代對啟蒙現代性的批判，當不致招來太多的反對意見。如前所述，不同於啟蒙現代性思想家將權力與知識、主體性對張，認為權力會打壓對真理與對主體性的追求，Foucault 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有相應的權力機制來加以落實，而所有的權力也都需要一套知識來提供其正當性的基礎。進而主體也正是屈從於知識與權力的共同運作下才得以生成。而為了避免自己的主張也成為另一個追求共識的真理政制，Foucault 遂提出「踰越」的概念，主張我們應該努力探問「必然性在當代的限制」、「可以不必如此的可能性」，以免差異受到打壓。換言之，Foucault 所強調的是差異與多元，而非共識。在《後現代狀況》一書中，Lyotard 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一方面帶入 L. Wittgenstein 的「語言遊戲」概念，說明科學知識與敘事知識之間不可共量的差異，並指出科學知識需要敘事知識來提供正當性基礎，以破解科學知識高高在上的獨霸位置；另一方面也以敘事知識的性質和重要性，來證成藉由反諷等方法想像更多另類步法，甚至是創造更多樣語言遊戲之必要性。這再度顯示出後現代思想家對多元性與差異的堅持 (Lyotard, 1979/1984)。

此外，從影響 Vattimo 極深的哲學家 Nietzsche 身上，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種對於多元性與差異的讚揚。簡言之，經常被奉為後現代思想鼻祖的 Nietzsche，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對啟蒙現代性與相關的理性、科學等概念提出質疑。Foucault 也曾詳細分析 Nietzsche 的系譜學，並以之為自己的思想方法。他有關「知識／權力」之間糾葛的說法也呼應了 Nietzsche 在〈非道德意義下的真理與謊言〉(Nietzsche, 1999) 中對科學與真理的質疑。此外，在《輕盈的科學》(Nietzsche, 1882/1974)、《道德系譜學》(Nietzsche, 1908/1989) 與《超越善與惡》(Nietzsche, 1886/2002) 這幾本書中，Nietzsche 一再對世俗道德所區分的善惡提出挑戰。例如，他指出行善與為惡都一樣是出於自利，兩者之間並沒有道德上高尚或低劣之分。更有甚者，他還指出，從保存物種的角度，有時為惡與殺戮

還比博愛更為有用 (Nietzsche, 1882/1974: 73)。藉此，Nietzsche 試圖挑戰道德上的善之崇高價值，或是從功利主義的觀點對道德起源的解釋。

然而，經過這樣一番破壞後，我們不禁懷疑，是否還有任何必要建立一個最低限的倫理或道德？實際上，這也是後現代思想家最常面對的挑戰與質疑。一方面，就認知面來說，質疑任何真理性的後現代思想家，又希望我們以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他們的論述與著作？如果真理並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不可共量的語言遊戲，那麼我們又何必在乎別人說了什麼、寫了什麼？另一方面，就倫理道德的層面來說，既然善惡之分只是相對的，有其時代與文化的脈絡，甚至還可能是武斷而涉及背後的權力關係，那麼我們又如何評價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等等令人髮指的「惡行」？還是只能抽離地說，凡存在者必合理、事出必有因？然而，果真如此的話，這又會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會不會回到 T. Hobbes 所謂「所有人對抗所有人」(Hobbes, 1996) 的自然（其實是野蠻）狀態？

倘若後現代思想家所設想的「理想」狀態就是如此，相較之下，或許 Habermas 的溝通倫理所強調的程序正當性會更得人心？至少批判理論基於其價值與倫理的立場，是不吝於與現實拉開距離、與一切不合正義的事情相對抗的。反觀，後現代思想似乎只著力於大破，缺乏大立的建設性意義，乃至於這破壞似乎也無任何助益。但實際上，像是 Foucault 將 Kant 的批判所蘊含的界限思考轉化為對界限做思考的踰越概念，這也意味著 Foucault 仍有他所倡議的「箴言」。所謂箴言，就是必須以勇氣去完成的行動 (Foucault, 2000a: 306)。只是對 Foucault 而言，這箴言的內容已經從 Kant 所謂的「勇於求知」轉變成「勇於踰越」了。Foucault 試圖以這純粹負面、消極性的主張，來避免自己的學說變成另一個打壓差異的真理政制。由此可見，Foucault 也試圖以「踰越」的概念來介入多元主義、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之間關係的問題。他崇尚多元、反對單一的價值，但又不希望淪於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從而失去批判與實踐的力道。這顯示出，多元主義如何能夠不虛無、能夠不無力，這確實成為後現代思想家無可迴避的疑難。反之，對於像 Habermas 那樣堅持價值與真理普遍性的現代性思想家而言，普遍道德如何能夠不變成獨斷、甚至暴力的恐怖主義者，也一樣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Habermas, 1989b: 41)。而 Vattimo 就是接下了前述這普遍性與多元性之間看似二元對立關係所帶來的挑戰，進而表明了以含混思考來面對後現代狀況的立場。



## 伍、含混思考與多元性作為規範性判準

Vattimo (1989/1992: 1-4, 7-9) 認為，啟蒙現代性的單線進步觀，及其背後的形式上學思考，所期待的是藉由理性無遠弗屆的穿透力，洞見萬事萬物運作底層的原理原則，進而達成一個全然透明世界的理想。也就是說，希望能夠藉著把理性落實為科學，甚至是各個分殊的學科，而能夠以符合邏輯的方式理解世界，進而加以預測、控制。而不僅是科學，媒介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中介，理應也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瞭解這世界。因此，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分支學科的同時，也發展出越來越多的溝通媒介，而形成 Vattimo 所謂的普遍化溝通的社會或世界 (soceity of generalized communication) (Vattimo, 1989/1992: 1, 9, 13, 24)，期待越多的媒介與溝通終究有助於人們的相互瞭解。但弔詭的是，Vattimo 認為學科與媒介分化增生之長期發展結果，卻是一種不透明的狀態 (Vattimo, 1989/1992: 4)。換言之，我們以不斷分支的學科和不斷增生的媒介來追求啟蒙現代性的透明社會理想，但所導致的卻是後現代社會文化的不透明特性。人文科學是科學將其觸角延伸至人類本身的產物，原以為把人類納入科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使之透明化，但最後卻是越來越多元、越來越不透明。溝通原本是為了透明，但現代社會越是追求透明化的理想，卻也促成了不透明的後現代社會 (Vattimo, 1989/1992: 12-27)。亦即，後現代社會文化的形成是來自啟蒙現代性的極致發展，我們卻再也無法期待用單一、簡單的原理原則來認識與掌握世界，而必須承認世界的多元化 (Vattimo, 1989/1992: 4, 12-27)。

在此，一方面，Vattimo 對媒介與溝通大量增生結果的分析，類似於 Baudrillard (1978/1983: 95-110) 有關內爆、大眾、過度真實的看法，致力於凸顯出事實的消失與後現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媒介大量增生之間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他認為後現代來自現代性的極致發展的想法，也看似接近 U. Beck 或 A. Giddens 等思想家。但相對於他們以現代性開始反思其自身來定位後現代，並藉以否定後現代的存在 (Beck, Giddens, & Lash, 1994)，Vattimo 則肯定了後現代的情境，並要求我們以一種符應於後現代情境的思考方式來理解當代人的處境，與思索我們的出路，而展現出有別於二元對立思考方式的含混思考。

Vattimo 的含混思考來自於其詮釋學與 Nietzsche 的思想背景。實際上，詮釋學本身就是來自於對啟蒙哲學的反省。不論是啟蒙哲學家 R. Decartes 在其《方法導論》、還是社會學家 Durkheim 在《社會學方法論》中，都是以破除成見為首展開其討論 (笛卡兒, 1999: 57; Durkheim, 1895/1982: 72)。這相似性並非

偶然，而是凸顯出啟蒙現代性的思考把成見與科學、真理以一種二元對立的方式加以區分。亦即，成見是有礙於真理的追求及我們對真相、事實的認識的。相對於此，Vattimo 對形上學與啟蒙現代性的批評，及相應的多元性主張，則是受到 Nietzsche 的影響，甚至將之與詮釋學結合起來。Vattimo 經常引用 Nietzsche 的話來說明詮釋學的基本主張：「沒有事實，只有詮釋。而這主張本身也是一個詮釋」(Vattimo, 1997: 6, 12)。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這句話是自相矛盾的弔詭。但從含混思考的角度來看，這句話正呈現出 Vattimo 弱的哲學 (weak philosophy) 之特色。亦即，詮釋與事實之間並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關係，正如只有堅信上帝才會因為遵守上帝「不能說謊」的要求，而承認上帝並不存在一樣 (Vattimo, 1997: 7)。詮釋學並不完全否定成見，反之，沒有存在於認識之前的成見，我們根本就無以進行認識，但在此同時，詮釋學卻也要求我們要對我們的成見有所保留，要開放地隨著認識的過程調整我們的成見，以便作為接下來進一步認識的基礎。這是一種既依賴成見，卻又隨時可以打破既有成見的方式與態度，以致我們也無法簡單地說，究竟詮釋學是反對成見還是為成見辯護。同理，Nietzsche 所構想的理想狀態則是「知道自己正在做夢地做夢」(Nietzsche, 1882/1974: 116)，而他在《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Other Writings*) 一書雖然刻意強調酒神精神的重要性，但其理想的文化則是必須同時結合酒神文化與日神文化的特性 (Nietzsche, 1999)。由此可見，不論是 Nietzsche 的思想或詮釋學本身都蘊含了一種含混思考的特性，而有別於強調二元對立、清楚劃分的啟蒙現代性思考。

據此，我們才有辦法理解 Vattimo 在這本書裡所提出的最重要主張，那就是多元性作為規範性判準 (take plurality lived explicitly as such as a normative criterion) (Vattimo, 1989/1992: 70)。亦即，原本單純的多元性理應會導向一種「怎麼做都可以」(Anything goes.) 的狀態，而這也是一般對後現代思想的瞭解。乃至於由於後現代思想強調多元性，其對 Habermas 所謂的規範性判準是非常保留的。但 Vattimo 卻把多元性標舉為一種規範性判準。也就是說，唯一足以作為規範性判準的，就是多元性自身。只有我們如此堅持捍衛多元性，真正的多元性才能夠實現。反之，要是不以多元性為規範性判準，我們將無以反對那些打壓多元性的主張與作為。由此可見，主張多元性，卻又看似自相矛盾地把多元性標舉為規範性判準的作法，其實是類似於詮釋學既主張沒有事實只有詮釋，卻又看似自打嘴巴地補充，這主張本身也只是一種詮釋的作法。這樣的主張，若是以形式邏輯的二元對立思考來檢視，顯然是自相矛盾而無可理解的。但只要我們跳脫出這樣的思考方式，將能夠清楚地看出此一主張的合理性與力道。

實際上，Vattimo 正是以 Habermas 作為對話的對象 (Vattimo, 1989/1992: 105-120)。Habermas 經常以缺乏規範性判準，導致論述缺乏基礎，甚至流於虛無、悲觀來批評後現代的思想家。但 Habermas 的溝通理性本身的疑難，也不乏批評者。主要是針對溝通理性本身的排他性與階級性。就這一點而言，Vattimo 並沒有更特別的見解。比較特別的是，Vattimo 自己所提出來的主張。相對於 Habermas 所提出的溝通倫理 (communicative ethics)，Vattimo 則提出詮釋的倫理 (ethics of interpretation) 作為後現代狀況下人類文明的出路 (Vattimo, 1989/1992: 105-120)。而其內涵就是前述的多元性作為規範性判準。亦即，多元性作為規範性判準的主張，其實正是基於詮釋學有關對話 (dialogue) 與詮釋看法所提出的。而對話之有別於溝通，就在於對話更強調過程，而非溝通所要達成的共識。並且，對話的目的是要擴大我們的視域，而非定於一尊 (Vattimo, 1989/1992: 26, 38)。循此，Vattimo 又從 W. Dilthey 等詮釋學的思想中，提出擺盪 (oscillation) 於有所歸屬 (belonging) 與迷離 (disorientation) 之間的狀態，作為其心目中的理想狀態 (Vattimo, 1989/1992: 8, 10)。換言之，沒有歸屬於社群、傳統，則沒有詮釋的立足點，正如詮釋不可能沒有成見作為依據一樣。但在此同時，太強烈的社群歸屬，卻也會妨礙我們開放視域，以便容納更多元的主張。因此仍需要與社群、傳統等保持距離，讓自己多少處於迷離的狀態。

循此，Vattimo 不再認為當今的左派政治所欠缺是一個有根有據 (well-founded) 的理論，以便讓進步行動的計畫具有力量與邏輯一致性，尤其如果這理論是建立在傳統形上學對世界結構的認識之上 (Vattimo, 1989/1992: 90-91)。反之，正如前述擺盪在有所歸屬與迷離之間的主張，Vattimo (1989/1992: 52-53) 主張結合立基 (founding) 與去基 (unfounding)。一方面忠於啟蒙現代性的除魅，而不再輕信任何絕對的、基礎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卻也還能在修辭上論證某些價值確實高於其他的價值。而這唯一高於其他價值的規範性判準，即是前述的多元性。進而，Vattimo 還順著 Nietzsche 的主張，賦予虛無主義其正面意義。亦即，正因為反對任何至高無上的價值，所以虛無。但此一虛無主義恰恰可以同情地反對基於任何價值所施展的壓迫。但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反而弔詭地襯托出虛無主義所具有的倫理性質 (Vattimo, 1989/1992: 11, 102, 116; 1997: 1-14)。在此，Vattimo 翻轉了虛無主義所具有的負面意義。同時，Vattimo 也區分了會導致徹底虛無主義的相對主義 (relativism) 或相對主義式懷疑論 (relativistic scepticism) 與具有倫理內涵的虛無主義與多元主義 (pluralism) (Vattimo, 1989/1992: 25, 117)。前者只是多元的隔離，但後者則是藉由對話來不斷擴大我們的世界，因而也不是朝向共識收斂 (Vattimo, 1989/1992: 38)。

## 陸、結論：含混思考的力量

由此可見，主張多元性作為規範性判準的 Vattimo，一方面不同於那些對規範性判準有所保留的後現代思想家，另一方面卻也和大多數後現代思想家一樣，反對 Habermas 追求共識的溝通倫理。其主張的詮釋的「倫理」，以擴大我們視域的對話取代追求共識的溝通。進而，Vattimo 也與 H. Lefebvre 到 Baudrillard 這條從法國左派到後現代的思想路數相近，不能被簡單地被貼上後現代的標籤，再立即將之等同於虛無、無力。相反地，正由於他們正視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諸如從以生產為主到以消費為主的轉變，或所謂後工業社會、晚期資本主義、後現代等等的發展。在面對 Marx 所預言的革命似乎不再可以期待的處境下，Vattimo 等人仍堅持思索解放的其他可能或尋求政治途徑的出路。這一點，也可以從 Vattimo 在歐洲議會的實際政治參與得到佐證。

Vattimo 的諸多主張，挑戰了啟蒙理性與科學所依據的形式邏輯把明晰（clear-cut）等同於二元對立的基本立場，而呈現出一種含混思考的特性。如前所述，這樣的思考在啟蒙現代性的長期支配下是被打壓為不科學、不合邏輯、沒有意義的。但只要我們願意停下來欣賞這含混思考所蘊含的力量，甚至將會發現 Vattimo 的思想與傳統東方或中國的思想之親近性。例如，易經中的陰陽，就不是二元對立、互不相容的，而是二氣交感，相互搓揉摩盪、既相生又相剋的<sup>3</sup>。乃至於，Vattimo 也因為其思想中所蘊含的含混性，而被稱之為弱的哲學、弱的思想。強調弱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ness）這一點也與主張以柔克剛的道家聲氣相通。因此，筆者認為，Vattimo 這本書，及其所蘊含的極具特色的思考與主張，不僅是挺立於哲學、社會學與傳播學的匯流中，也向我們開顯出會通東西方思想的可能性，值得關切學術本土化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留意。

## 參考書目

- 笛卡兒（1999）。《近代理性哲學的開創者：笛卡兒作品選讀／廖仁義導讀·選讀》。臺北，臺灣：誠品。
- 黃厚銘（in press）。〈含混思考的力量〉，《社會理論學報》。
- Baudrillard, J. (1988).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有關《易經》中陰陽二氣交感的關係之詳細說明，請參看（黃厚銘，in press）。

- (1983). 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 (P. Foss, P. Patton, & J. Johnson, Trans.). In J. Baudrillard (E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pp. 97-110). New York, NY: Semiotext(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8)
-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eck, U., Giddens, A., & Lash, S.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rkheim, 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W. D. Halls, Tra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3)
- (1982). Rules for the observation of social facts (W. D. Halls, Trans.). In S. Lukes (Ed.),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pp. 60-84).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5)
- Foucault, M. (2000a).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 Rabinow (Ed.),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ael Foucault 1954-1984. Vol. 1* (pp. 303-319). London, UK: Penguin.
- (2000b).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P. Rabinow (Ed.),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3* (pp. 326-348). London, UK: Penguin.
- (1997). *The politics of truth*. New York, NY: Semiotext(e).
- Habermas, J.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1990).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F. G. Lawrence, Tra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5)
- (1989a). Taking aim at the heart of the present: On Foucault's lecture on Kant's what is enlightenment (S. W. Nichol森, Trans.)? In S. W. Nichol森 (Ed.),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pp. 173-179).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1989b).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S. W. Nichol森, Tra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1981).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22, 3-14.
- Hobbes, T. (1996). *Leviatha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nt, I. (1997). Was ist Aufklaeung? In S. Lotringer & L. Hochroth (Eds.), *The politics of truth* (pp. 7-20). New York, NY: Semiotext(e).
- Lash, S.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UK: Sage.
-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 B. Massumi, Trans.). Manchester, M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London: Routledge.
- McLuhan, M., & Fiore, Q. (1967).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 Nietzsche, F. (2002).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c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J. Norman,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6)
- (1999).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other writings* (R. Speirs,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W.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1974). *The gay science: With a prelude in rhymes and an appendix of songs* (W.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2)
- Vattimo, G. (2004). *Nihilism and emancipation: Ethics, politics, and law* (W. McCuaig, Tran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3)
- (1997). *Beyond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hermeneutics for philosophy* (D. Webb,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4)
- (1992).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D. Webb,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9)